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三十・三十書系

何若書 著
(Denise Y. Ho)

萬芷均 譯
姜進校

策展革命

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陳列



open access

本書電子版為開放取用圖書，在遵守相關授權條款的前提下，公眾可以免費閱覽、下載和傳播。開放取用電子書的出版獲得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資助，特此致謝。

建議引用格式：何若書著：《策展革命：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陳列》，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5。DOI: 10.978.988237/3389

This book is freely available in an open access edition thanks to funding fro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It may be read online, downloaded, and shared under the terms of a Creative Commons (CC-BY-NC-ND 4.0) license.

Suggested citation: Denise Y. Ho, *Curating Revolution: Politics on Display in Mao's Chin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25. DOI: 10.978.988237/3389

策展革命

三十・三十書系

策展革命

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陳列

何若書 (Denise Y. Ho) 著

萬芷均 譯

姜 進 校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三十 · 三十書系

《策展革命：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陳列》

何若書 著

萬芷均 譯

姜 進 校

© Denise Y. Ho 2025

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
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
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978-988-237-338-9 (平裝)
978-988-237-975-6 (電子書)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 · 香港中文大學
傳真：+852 2603 7355
電郵：cup@cuhk.edu.hk
網址：cup.cuhk.edu.hk

本書出版得到耶魯大學弗雷德里克·希爾斯出版基金
(Frederick W. Hilles Publication Fund, Yale University) 贊助支持。

■ 30/30 SERIES

Curating Revolution: Politics on Display in Mao's China (in Chinese)

By Denise Y. Ho

Translated by Zhijun Wan

Edited by Jiang Jin

© Denise Y. Ho 2025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88-237-338-9 (paperback)
978-988-237-975-6 (ebook)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cup.cuhk.edu.hk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book is supported by Frederick W. Hilles
Publication Fund of Yale University.

Printed in Hong Kong



本書電子版採用創用 CC 授權條款 CC-BY-NC-ND 4.0，提供免費閱覽和下載，
具體使用條款請參見：<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The digital edition of this book may be downloaded and shar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NoDerivatives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BY-NC-ND 4.0).
For information about this license, se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DOI: <https://doi.org/10.978.988237/3389>

群峰並峙 峰峰相映

《三十·三十書系》編者按

在中國人的觀念裏，「三十年為一世，而道更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已逾兩世，人們討論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或強調其間的斷裂性及變革意旨，或著眼其整體性和連續性。這一談論以至爭論當然不是清談，背後指向的乃是中國未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至更長遠的道路選擇。

《三十·三十書系》旨在利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獨立開放的學術出版平台，使不同學術背景、不同立場、不同方法的有關共和國六十年的研究，皆可在各自的知識場域充分完整地展開。期待群峰並峙，自然形成充滿張力的對話和問辯，而峰峰相映，帶來更為遼闊和超越的認識景觀。

本書系自2013年開始出版，致力於推出全球視野下有關共和國六十年的重要研究。研究者分別從政治學、人類學、歷史學、社會學、文化研究等學科的優秀傳統和全新視角出發，突破地域界限、學科壁壘和既往研究在方法與對象上的框限，為這一領域引入了種種具有前瞻性、成長性的研究方向，共同呈現了一個開闊而富有生機的中國研究圖景。無論主題、關懷、方法，這些作品之間既有照應和互補，也不乏衝突與砥礪。當它們在同一平台上呈現時，恰恰拼出一個豐富而多元的光譜，正切合了《三十·三十書系》所期待的學術景觀——群峰並峙，峰峰相映。

秉承這一理念，本書系將繼續追蹤關於共和國六十年的前沿研究，兼收中文原創著作及譯著。本社一貫注重學術翻譯，對譯著的翻譯品質與對原著的學術價值要求，共同構成學術評審的指標。

「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是香港中文大學的精神所在。以此精神為感召，本書系將繼續向不同的學術立場開放，向多樣的研究理路開放，向未來開放，歡迎學界同仁賜稿、薦稿、批評、襄助。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部

2024年1月

電郵：cup-edit@cuhk.edu.hk

獻給我的父母，何志勤和樂翠珠。

目 錄

圖 片 目 錄	xi
致 謝	xv
導 言	1
第 1 章 樹立革命豐碑：中共一大會址	25
第 2 章 展示新中國：蕃瓜弄今昔展覽會	61
第 3 章 策展信仰：少先隊員的迷信與科學之爭	105
第 4 章 培養意識：階級教育展覽	139
第 5 章 文化大革命的實物教育：紅衛兵功勳展	175
第 6 章 革命中的文物：上海博物館	211
結 語	247
參 考 文 獻	267
索 引	287

圖片目錄

0.1.	上海市博物館照片(《良友》，第120期，1936)	11
0.2.	上海市博物館照片(《少年》，第1期，1937)	12
0.3.	上海市博物館的參觀者(上海市檔案館H1-1-31-73，無日期)	13
0.4.	《海港》劇照(1972)	21
0.5.	《海港》舞台設計(1974)	21
1.1.	一大會址外觀(上海市檔案館H1-22-1-1，無日期)	31
1.2.	一大會址會議室(上海市檔案館H1-22-1-2，無日期)	32
1.3.	蘇聯與土耳其的和平代表團在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合影 (上海市檔案館H1-27-1-56，無日期)	44
1.4.	馬拉維工人運動主席參觀中共一大會址 (上海市檔案館C1-2-5169，無日期)	44
1.5.	《瞻仰黨的一大會址》(上海宣傳畫藝術中心供圖，1974)	51
2.1.	《春滿蕃瓜弄》(1974年5月)	63
2.2.	蕃瓜弄俯瞰全景(上海市檔案館H1-11-6-41，1963年8月11日) ..	71
2.3.	蕃瓜弄的搬家日(上海市檔案館H1-6-11-44，1964年7月19日) ..	72
2.4.	蕃瓜弄的第一個春節(上海市檔案館H1-11-6-45，1964年2月2日) ..	74
2.5.	蕃瓜弄(奧克蘭圖書館喬治·格雷爵士特別館藏供圖)	79
2.6.	智利訪問團的女代表們參觀蕃瓜弄 (上海市檔案館H1-13-8-86，1966年4月18日)	85

2.7.	智利訪問團的女代表們參觀棚屋 (上海市檔案館 H1-13-8-82, 1966 年 4 月 18 日)	86
2.8.	智利訪問團的女代表們穿過新公寓樓 (上海市檔案館 H1-13-8-84, 1966 年 4 月 18 日)	87
2.9.	蕃瓜弄一間公寓牆上掛著的裝飾物 (2012 年 6 月 20 日)	98
2.10.	上海城市歷史發展陳列館中的棚屋模型 (2013 年 6 月 12 日)	101
2.11.	1978 年的家裝內飾 (2010)	103
2.12.	2008 年的家裝內飾 (2010)	103
3.1.	《一貫害人道》的電影劇照 (1952)	109
3.2.	「熱愛科學、破除迷信」展覽中的寺廟插畫 (上海市檔案館 C27-1-51, 1963)	112
3.3.	「破除迷信」展覽掛圖 (上海宣傳畫藝術中心供圖, 1965)	115
3.4.	「熱愛科學、破除迷信」展覽上關於自然災害的插圖 (上海市檔案館 C27-1-51, 1963)	119
3.5.	「熱愛科學、破除迷信」展覽上關於算命先生的插圖 (上海市檔案館 C27-1-51, 1963)	119
3.6.	「熱愛科學、破除迷信」展覽上關於靈媒的插圖 (上海市檔案館 C27-1-51, 1963)	120
3.7.	「熱愛科學、破除迷信」展覽上關於驅魔道士的插圖 (上海市檔案館 C27-1-51, 1963)	120
3.8.	《乘飛船, 探索外太空》(上海宣傳畫藝術中心供圖, 1979)	125
4.1.	階級教育展覽道具設計 (1974)	140
4.2.	階級教育展覽道具設計 (1974)	140
4.3.	《收租院》展覽場景之一 (2016)	141
4.4.	憶苦思甜展覽上的工人們 (上海市檔案館 H1-23-24-8, 無日期) ...	149
4.5.	上海階級教育展的照片 (上海市檔案館 H1-23-29-18, 無日期)	155
4.6.	上海階級教育展中申新九廠工人的照片 (上海市檔案館 H1-23-29-13, 無日期)	160
5.1.	抄家影像 (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文化大革命影像典藏)	188

5.2.	抄家影像 (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文化大革命影像典藏)	188
5.3.	紅衛兵功勳展上嚴紀常的裘皮大衣	193
6.1.	龍華塔明信片 (東方研究所虛擬城市項目供圖, 約 1930 年代)	212
6.2.	上海博物館展出的青銅器 (上海市檔案館 H1-14-3-23, 約 1960 年代)	222
6.3.	委內瑞拉婦女代表團參觀上海博物館 (上海市檔案館 H1-13-2-84, 1963 年 7 月 21 日)	222
6.4.	上海博物館工作人員在購入上海人民公社標牌時的合影 (《文匯報》鄭重收藏供圖, 無日期)	233
6.5.	上海博物館工作人員在上海博物館門廳合影 (《文匯報》鄭重收藏供圖, 1967 年 9 月 27 日)	238
6.6.	上海市查抄文物圖書清理小組的收據 (上海海燕圖書文化有限公司瞿永發供圖, 1968 年 8 月 14 日)	238
6.7.	譴責孔家門匾 (托馬斯·H·哈恩紀錄圖片庫供圖, 1974)	241
6.8.	審查孔家奢華生活 (托馬斯·H·哈恩紀錄圖片庫供圖, 1974) ..	241

致 謝

能夠得到多位老師的指導，我深感幸運。我在耶魯大學讀本科時，有幸在周雨和孔杰 (George Krompacky) 的引領下走進中文的世界，更獲得首批萊特獎學金 (Richard U. Light Fellowship) 的資助前往北京學習。多年之後的2014年，我在母校的聽眾席上再次看到周老師和蘇煒老師的身影，不禁心潮澎湃。在歷史系的研討會上，約翰·德莫斯教授 (John Demos) 向我們傳授歷史學家的研究技藝，約翰·加迪斯教授 (John Gaddis) 鼓勵我們真正以一個歷史學家的視角思考問題，史景遷教授 (Jonathan Spence) 則以他精彩的故事激發了我前往中國的興趣。畢業後，我在雅禮協會教學研究獎金的支持下，前往長沙工作了兩年；至今，我仍受益於那裏的老師和學生。

非常感謝我在哈佛的導師。首先要感謝孔飛力教授 (Philip Kuhn)，他是教學和學術的楷模，多麼希望他在生前就能看到本書的出版。柯偉林教授 (William Kirby) 向我介紹了上海當地的連絡人，並始終鼓勵我繼續研究。沈艾娣教授 (Henrietta Harrison) 體貼的反饋和淵博的學識為我樹立了極高的標竿。除了我的論文委員會，斯文·貝克特教授 (Sven Beckert)、包弼德教授 (Peter Bol) 和入江昭教授提供了來自其他領域的洞見，豐富了我的學習經歷。我很榮幸能在包弼德教授和歐

立德教授 (Mark Elliott) 的指導下開始講授「稻田課」。¹ 華若璧教授 (Rubie Watson) 仔細閱讀了論文中的一個章節，並激勵我闡明和完善論點。

本書的研究工作獲得了許多機構與個人的幫助。我要感謝哈佛燕京圖書館和馮氏圖書館的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尤其是南茜·赫斯特 (Nancy Hearst) 的幫忙。我大部分檔案工作是在上海市檔案館和上海市圖書館完成的。除了館內的工作人員，我還要感謝當時任職於黃浦區人民政府的沈祖煒和黃浦區檔案館的胡遠傑。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段煉、金大陸和馬軍總是熱情相待，解答了我的許多問題。許多受訪者分享了他們的回憶與看法，大多數人的身分都必須保密，但其中我特別感謝上海博物館的李俊傑和鍾銀蘭、上海宣傳畫藝術中心的楊培明以及《文匯報》的鄭重。我還要感謝肯塔基大學圖書館的朱迪·富蓋特 (Judy Fugate)、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李露絲 (Louise Jones) 和大學服務中心的高琦，以及耶魯大學圖書館的孟振華和李唐。

我的許多工作單位都給予了慷慨的學術和資金支持。在研究生階段，我獲得了外語和地區研究獎學金 (Foreign Languages and Area Studies Fellowship) 的支持，還得到了來自哈佛大學歷史系、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以及美國富布賴特學生項目 (Fulbright U.S. Student Program) 的資助。在肯塔基大學，得益於研究和會議津貼，我每年都能前往中國做研究。至於學術團體與朋友，我要感謝肯塔基大學歷史系的同事們，特別是系主任弗朗茜·蔡森－洛佩茲教授 (Francie Chassen-López) 和凱倫·佩羅內 (Karen Petrone)，以及我的導師凱西·克恩 (Kathi Kern) 和格雷琴·斯塔－勒博 (Gretchen Starr-Lebeau)。在現代和古典語言方面，我和羅靚、馬特·威爾斯 (Matt Wells) 組成了「三人幫」，常常邊喝咖啡邊交流工作，相互鼓勵。感謝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同事，以及香港特別行政

1 編註：「稻田課」(Rice Paddies) 即為近代東亞文化課，由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 和賴肖爾 (Edwin O. Reischauer) 於1930年代創設，旨在全面介紹中國、日本以及後來的韓國和東南亞的歷史和文化。

區政府的直撥研究經費項目和研究資助局的資助(專案編號: 14403714)。我還要感謝耶魯大學歷史系,尤其是格蘭達·吉爾摩(Glenda Gilmore)和娜奧米·拉莫雷(Naomi Lamoreaux),感謝她們在2016年2月安排了一次關於本書的座談會。耶魯大學的弗雷德里克·希爾斯出版基金(Frederick W. Hilles Publication Fund)為本書的出版提供了資助。最後,我對為本書做出貢獻的學生們深表感謝:方博、郭念之、黃麗玲、李瑩、劉心怡、劉瑩、周雅文和方妍梅(Annemarelle van Schayik)。我也很感謝王雪兒為本書設計了封面。

多年以來,許多學者的文本細讀和嚴謹發問影響了我的想法。在亞洲研究協會年會上,各位聽眾、座談小組成員以及以下討論者都讓我受益匪淺:陳庭梅、陳小眉、賀蕭(Gail Hershatter)、張倩雯(Rebecca Nedostup)、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和華若璧。我也感謝在學術研討會上朗讀了本書節選的學者們:安雅蘭(Julia Andrews)、包蘇珊(Susan Brownell)、戴蒙德(Neil Diamant)、賴德霖、盧飛麗(Felicity Luftkin)、舒喜樂(Sigrid Schmalzer)、沈暎一、陳美鳳和汪悅進。感謝來自以下機構的觀眾們在伯里亞學院給我提出的寶貴意見:亞洲研究所、印第安那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香港大學、肯塔基大學和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我要特別感謝戴慧思(Deborah Davis)、鄧騰克(Kirk Denton)、韓森(Valerie Hansen)、沈艾娣、李潔、梅爾清(Tobie Meyer-Fong)、濮德培(Peter Perdue)、裴宜理、舒喜樂、華若璧、吳一慶以及劍橋大學出版社的兩位匿名審稿人,感謝他們閱讀了整個書稿並提供了詳細的反饋意見。我還要感謝南茜·赫斯特一流的編輯工作。劍橋大學出版社的露西·萊默(Lucy Rhymer)及其團隊以專業的精神和技術完成了本書英文版的出版工作;我對他們以及叢書編輯們的熱情深表感謝。

第一章的早期版本收錄於由李傑、張恩華主編的《中國的紅色遺產:共產主義革命的文化遺魂》(*Red Legacies in China: Cultural Afterlives of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哈佛大學亞洲中心,2016)。第六章部分內容基於第207期《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中的〈革命古代:文革中的上海文化官僚機構,1966–1968年〉(“Revolutionizing Antiquity: The Shanghai

Cultural Bureaucracy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8”)。非常感謝原出版商惠允使用以上章節。

我的同學和朋友們的學術研究和親身經歷，都時刻激勵著我。致女歷史迷們：貝茜·莫爾(Betsy More)、弗妮·奧利維羅(Vernie Oliveiro)、哈莫妮·奧洛克(Harmony O'Rourke)和茱麗葉·瓦格納(Juliet Wagner)，願你們書寫歷史、創造歷史。克莉斯汀·波林(Kristin Poling)不但與我在肯塔基州的諾林湖畔度過了一週珍貴無比的思考時光，更為本書英文版提議書名。我還與一代中國研究學者建立了深切的友誼，包括：李悅歆(Jennifer Altehenger)、瑪格麗特·博伊廷(Margaret Boittin)、陳細晶、江建明(J. Brooks Jessup)、金由美、克里斯·萊頓(Chris Leighton)、李傑、林雲雅(Silvia Lindtner)、凌敏華、凱特·梅森(Kate Mason)、潘律、錢穎、梅格·里瑟米爾(Meg Rithmire)、羅坤(Cole Roskam)、宋柏萱、唐小兵、王瑾、吳曉和張樂翔。金恬是最優秀的學姐，我將與你一樣提攜後進，以表達我的感激之情。最後，我世界各地的朋友們，特別是阿爾戈·卡米尼(Argo Caminis)、賴禾秀和阿瑞歐·索坦(Areio Soltan)，曾與我同桌共餐，分享歡樂——我欠大家一場盛宴。

家人是我最大的財富。我要感謝妹妹何若儀，她始終與我並肩，以高標準要求我們所有人。妹妹何若欣則以她的好奇心和覺察力，幫助我堅持真實的自我。弟弟何國樑在追夢的同時，也不忘始終支持我的夢想。我的兄弟姐妹能成為如此優秀的人，在世界上播撒善意，我為他們感到驕傲。自2010年以來，無論身在何處，有亞歷克斯·萊丁(Alex Ledin)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感謝他與我執手相依相伴。

最後，謹以此書獻給我的父母，亦是我的啟蒙老師——何志勤和樂翠珠。

導言

在毛澤東時代(1949–1976)的中國，策展革命就是將革命具象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兩年後的1951年，一本針對上海居委會幹部的手冊提出了「如何舉辦展覽？」的問題。地方幹部負責管理街道居民的日常生活，策展也是他們的眾多任務之一。這本薄薄的線裝手冊說明了從召開會議到登記戶口等各類具體職責，其中，宣傳工作是重中之重。手冊所描述的宣傳技巧在新中國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如社區黑板報、報刊展示櫃等。幹部們逐漸發現，展覽是一種格外有力的宣傳形式。雖然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接觸到許多物品，但唯有系統地組織展示各類物品，才可能揭示出問題的真實面貌。手冊寫道：「各項展覽品本身的生動與具有說服力，也是最重要的。」¹

舉辦展覽既是群眾教育，也是群眾動員。政府鼓勵上海的幹部們舉辦展覽，因為對於不習慣抽象事物和思想的人們而言，具體的物品更具吸引力，而且在解說的輔助下，任何人都能理解展覽的內容。手冊建議參觀者先看照片，再看展品，最後看圖表。最好的辦法是讓幹部從附

1 《街道里弄居民生活手冊》(新聞日報出版社，1951)，頁42。更詳細的展覽指南，請參見河北人民出版社編，《農村美術手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75)，頁147–158。

近居民那裏收集物品，將展覽與群眾的經歷聯繫起來。手冊還指導幹部如何選擇、佈置物品，又如何將展覽與政治運動相結合，例如愛護公物、抗美援朝以及鎮壓反革命和特務間諜分子等運動。展覽讓參觀者回顧過往，喚起他們在「舊社會」的生活回憶，由此將舊社會與新社會並列對比。在新社會中，中國人民「翻身」了，鮮明的對比「激發了群眾的愛國熱情」。幹部們努力激發群眾的愛憎之情，其最終目標是幫助居民樹立世界觀、認識世界及其制度。²還有什麼比真實事物更能反映世界的真相呢？

十年後，時任上海博物館副館長的沈之瑜同樣強調了博物館活動的基層屬性。在1960年的一次演講中，他強調了1949年以來中國博物館的轉變：解放前，上海作為通商口岸面臨外國入侵，英法博物館在中國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帝國主義以文化的形式赫然現身；解放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保護民族文化遺產理所當然地成為中國人民的使命。他舉例道，上海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與當地居民合作，尋找並修復了重要的歷史遺跡，如宋代的龍華塔和明代的豫園。沈之瑜稱，群眾向博物館的捐款數以萬計，反映了「思想覺悟和精神面貌起了巨大的變化」。他還強調了上海博物館在群眾教育中的作用，描述博物館工作人員如何舉辦巡迴展覽，深入群眾。從教室到文化宮，從工廠到鄉村，僅1959年一年，博物館覆蓋人數約380萬人。沈之瑜還引用毛澤東在1940年的重要著作〈新民主主義論〉，闡釋了上海博物館如何服務於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³毛澤東寫道，要發展中國的「民族新文化」，增強「民族自信心」，就必須了解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吸收其民主性和革命性的精華。毛澤東總結道，尊重歷史將引導人民群眾向前看。⁴

2 《街道里弄居民生活手冊》，頁42–43。

3 沈之瑜，〈學習毛澤東思想，提高文物、博物館工作中的政策性和思想性〉，陳秋輝編，《沈之瑜文博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3–5。

4 Mao Zedong, "On New Democracy," in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與居委會幹部手冊的作者一樣，沈之瑜也概述了展覽工作和實物展品的重要性，並以毛澤東〈實踐論〉一文為引導。〈實踐論〉指出，感性認識是認識的起點，但感性認識需要透過了解事物的本質及其內在規律深化為理性認識。⁵ 沈之瑜主張，這就是中國博物館學尤其是陳列和講解工作的指導原則。博物館不僅負責收集、展示文物，而且有責任對文物進行講解，將參觀者的感性認識提升至理性認識的高度。沈之瑜解釋道，這是博物館的教育工作。此外，展覽還需具備思想性、科學性與美感。展覽不僅應反映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揭示發展規律，還需追求美觀，但美觀又須服務於意識形態。社區展覽希望參觀者能用新的眼光看待日常生活，同樣，上海博物館也意在賦予參觀者一種看待世界的新方式。沈之瑜強調，透過展覽，觀眾將確立唯物主義的世界觀。⁶

不論是居委會幹部，還是博物館副館長沈之瑜，他們都利用展覽發起革命：他們策劃的展覽旨在激發人們的政治覺悟，創造一種將參觀者融入在內的革命敘事，並鼓勵參觀者參與其中，將革命敘事變為現實。社區展覽展示日常用品，上海博物館展示國寶，但二者不乏一些共同的假設前提。兩類展覽的策展人都認為，實體展品是實物教學，可向參觀者灌輸對歷史、民族和革命的正確理解。例如，社區展覽可能展示乞丐的破衣爛衫，突出戰時難民的貧苦；在博物館，講解員則可能向今天的紡織工人展示當年的紡織製品，將他們的勞動與歷史上的工人相連結。基層幹部和博物館館長都主張，展品必須輔以講解文字：對於社區展覽，這或許是為了方便街道鄰里的年輕人給不識字的居民朗讀解說詞；

Writings, 1912–1949, Vol. VII: New Democracy, 1939–1941, ed. Stuart R. Schram (M.E. Sharpe, 2005), 367–369.

5 Mao Zedong, “On Practice,” in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Vol. VI: The New Stage, August 1937–1938*, ed. Stuart R. Schram (M.E. Sharpe, 2004), 601–609.

6 沈之瑜，〈學習毛澤東思想〉，頁6–7。

對博物館而言，則可能是因為講解文字有助於參觀者實現從感性到理性的飛躍。兩類策展人都相信，展覽可以培養新中國人民參與社會主義建設的意識：街道居民會理解「現在的幸福生活情況」，熱愛「新的好的」，博物館的參觀者則會接受到「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⁷有了新的世界觀，參觀者自然會發起革命。展覽是策展於當下，立基於過去，也將塑造未來。

本書集中研究毛時代的展覽文化，即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76年毛澤東逝世為止。毛時代也被稱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時期，期間的展覽既反映革命，也推動革命。⁸對於國家和辦展官員而言，收藏與展覽具有雙重目的——決定歷史敘事，投射國家權力。展覽反映官方的歷史與政治，對知識進行組織與核准，書寫一部關於革命、為了革命的教科書。對於社區居民等普通人而言，展覽是一種宣傳手段，令革命變得具體、易於理解。與1950年代初的成人掃盲運動一樣，這些基本的展覽傳授革命詞彙，也提供模板，將個人經歷劃分為解放前與解放後兩個時期，將生活史劃分為新社會與舊社會兩個階段。⁹雖然國家級和市級博物館比街道和鄉村展覽更精緻、更知名，但展覽文化也將革命深入本土，在基層進行宣傳。

然而，在毛時代的中國，策劃展覽不僅僅是擺放展品那麼簡單。正如宣傳官員在談到工廠展覽時寫道：「展覽會的展出是全盤工作的一半……或者說才剛真正開始」。¹⁰在革命不斷的動蕩時期，展覽在政治

7 《街道里弄居民生活手冊》，頁42–43；沈之瑜，〈學習毛澤東思想〉，頁6。

8 周傑榮 (Jeremy Brown) 和馬修·約翰遜 (Matthew D. Johnson) 將1950年代中期至1980年的這段時期稱為「高度社會主義」(high socialism)，以農業集體化和工業國有制的開始與終結為標誌。參見Jeremy Brown and Matthew D. Johnson, eds., *Maoism at the Grassroots: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Era of High Socia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6–7。

9 參見Gail Hershat, *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25。

10 上海市檔案館，C1-2-3596-46，頁50。

運動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伴隨著革命運動的開展，展覽向人們示範如何參與運動，不僅傳授大量的革命話語，並且創造出一套行動方式。此外，正如前文幹部手冊的建議，參觀展覽的儀式也鼓勵人們表達情感，激發群眾行動。作為一種動員工具，展覽不僅是革命的教科書，更是革命的指導手冊。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關於階級的展覽向參觀者示範了如何批判、譴責他人，以及如何展示批鬥對象的財產。本書認為，正是策展革命教會了人們如何參與革命。毛主席的展覽文化號召群眾傾聽與表達、緬懷與哭泣、攻擊與批判。策展革命就是製造革命。

中國的展覽文化

1949年5月，一共2,853件文物作為上海博物館的首批藏品，由陳毅將軍所屬的第三野戰軍動用兩輛卡車運抵上海。陳毅將軍是1949年後上海的首任市長，也是上海博物館成立初期的支持者，正是他下令部隊保護文物。這批文物中，有些在挖掘戰壕時出土，陳毅命令收集起來「準備將來勝利後籌建博物館之用」。¹¹ 陳毅保管中國古代文物的過程，沿襲了以藝術象徵政權的悠久傳統。據中國上古神話，青銅神鼎證明了天命的真確。¹² 這種順應天命王朝承繼的觀念影響了帝王的藝術品和典籍收藏。¹³ 收藏並不局限於宮廷；在帝制晚期，地方精英也建立起一種

11 沈之瑜，〈懷念陳毅同志對文博事業的巨大關懷〉，陳秋輝編，《沈之瑜文博論集》，頁362–364。

12 Hung Wu, *The Wu Liang Shrine: 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92–96.

13 關於皇家收藏的歷史，請參見Jeannette Shambaugh Elliott and David Shambaugh, *The Odyssey of China's Imperial Art Treasur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關於正統典籍，參見R. Kent Guy,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r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7)。

鑒賞文化，透過修復、參觀歷史遺跡來強化共同的身分認同。¹⁴ 進入20世紀，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和革命者繼續將文物（包括器物與遺址）作為民族的象徵，既保護古跡藏品，也為革命樹新碑。對於後者，歷史學家王馬克（Marc Andre Matten）借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記憶之場」（*lieux de mémoire*）的概念指出，從中山陵到天安門廣場，中國的「記憶之場」塑造了國民的集體身分。¹⁵ 透過對「勝利後的博物館」的設想，陳毅擬構出一幅正統政權下國家機關的藍圖。

正如沈之瑜所述，中國最早的博物館由外國人創建。第一座博物館是1868年成立的徐家匯博物院，收藏了法國耶穌會會士韓伯祿（Pierre Heude）的自然歷史藏品。¹⁶ 1874年，英國皇家亞洲學會在英國王室贈予的土地上創辦了上海博物館。¹⁷ 從清末到民國時期，這兩座博物館都是上海的觀光名勝，旅遊指南形容其藏品「內有奇禽怪獸，為不常見之物」。¹⁸ 這類外國博物館均位於清帝國的前哨，是社會學家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所謂「展覽綜合體」的延伸，或者說是一種透過知識投

14 參見例如 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Polity Press, 1991)；Tobie Meyer-Fong, *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5 Marc Andre Matten, ed., *Places of Memory in Modern China: History, Politics, and Identity* (Brill, 2012); Pierre Nora,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Representations*, no. 26 (Spring 1989): 7–24.

16 一份民國時期的資料顯示，徐家匯博物館的歷史可追溯至1868年，即韓伯祿初次來華那年，但其他資料說明這座博物館始於1883年的耶穌會總院，並於1930年從耶穌會總院遷至震旦大學。參見上海通社編，《舊上海史料彙編》，兩卷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17 Arthur de Carle Sowerby, "The History of the Shanghai Museum (R.A.S.)," *Journal of the North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65 (1934): 3–10.

18 參見〈暮春遊徐家匯記〉，《申報》，1883年4月18日。關於博物館的竹枝詞，請參見顧炳權編，《上海風俗古跡考》（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頁316。至於旅遊指南中的描述，請參見顧冠英編，《中華全國名勝古跡大觀》（大陸圖書公司，1921），卷二，頁53。

射權力的學科關係體系與現代機構。¹⁹ 清末民初，出國旅遊的中國人開始接觸博物館制度與世博會現象。正如前往歐洲的阿拉伯遊客看到了仿造的巴扎集市，來自中國的旅行者也見證了西方的東方主義。此外，中國人也有參與策展的機會，並且自1851年倫敦萬國工業博覽會以來，為國際博覽會做出貢獻。²⁰ 然而，對於中國的改革者而言，博物館的潛力遠不止於獵奇藏珍或為世界分門別序。博物館和展覽與現代化的機器密切相關。例如，1895年，康有為的上海強學會提議開設一座博物館，展示最新的發明和機器，因為文字和圖畫都不足以充分理解一件物品。²¹ 到晚清時期，展覽文化與民族的聯繫日益緊密。中國開始在國內舉辦博覽會，以宣傳新的民族文化和土特產品。1905年，改革家張謇在江蘇南通建立了第一座中國博物館——南通博物苑。²² 張謇還倡導將皇家收藏向公眾開放。1925年國慶節（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正式對外開放。²³

19 Tony Bennett, “The Exhibitionary Complex,” in *Culture/Power/History: A Rea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ed. Nicholas B. Dirks et a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123–154.

20 Timothy Mitchell, *Colonising Egyp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尤見第一章；Susan R. Fernsebner, “Objects, Spectacle, and a Nation on Display at the Nanyang Exposition of 1910,” *Late Imperial China* 27, no. 2 (December 2006): 100。關於中國的觀察記錄，請參見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與世博：歷史記錄（1851–1940）》（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2）。

21 湯志鈞，《戊戌時期的學會和報刊》（台灣商務印書館，1993），頁85–93。

22 Fernsebner, “Objects, Spectacle, and a Nation,” 100–103; Qin Shao, “Exhibiting the Modern: The Creation of the First Chinese Museum, 1905–1930,” *The China Quarterly* 179 (September 2004): 684–702.

23 Cheng-hua Wang, “The Qing Imperial Collection, Circa 1905–1925: National Humiliation, Heritage Preservation, and Exhibition Culture,” in *Reinventing the Past: Archaism and Antiquarianism in Chinese Art and Visual Culture*, ed. Hung Wu (Center for the Art of East As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0), 320–341.

從清朝到民國，「博物館」一詞經歷了數次變化。清末出現了來自日本的舶來詞「博覽館」和「博物苑/院/園」。康有為主張使用「博物苑」，南通博物苑也採用了這一寫法。²⁴ 民國時期的一些博物館推動者甚至倡議造字。例如，有人提議在「口」字中加入一個「物」字；還有人提議「博」字加上寶蓋頭(宀)或禿寶蓋(冫)。²⁵ 雖然「博物院」一詞仍在使用，但1935年中國博物館協會成立時，還是選擇以「博物館」為名，這一標準名稱也沿用至今。在本書中，我將使用「博物館」一詞指代上海博物館等常設機構。中國共產黨成立的一大會址較難定義：它是一處具有紀念意義的會址，應算作文物，但同時它也是一座陳列展覽的紀念館。為簡便起見，我將一大會址中用於陳列展覽的紀念館稱為博物館，因其最初用途正是一座大型革命歷史博物館。至於短期展覽，則用「展覽館」、「展覽會」、「陳列館」等詞彙表示。在毛時代的中國，階級教育展覽甚至還有專門的簡稱——「階展」。

革命歷史博物館起源於國民黨。這裏的革命是指1911年結束帝國主義統治的辛亥革命以及促成國民政府上台的1927年北伐戰爭。在革命展覽中，歷史文獻和烈士遺物佔據主位，以教育、激勵參觀者。同時，這些展廳也是儀式空間：革命文物在此供奉，參觀者還須向孫中山畫像三鞠躬。²⁶ 鄧騰克主張共產黨的革命展覽文化可追溯至國民政府時代。他研究了1929年西湖國際博覽會的革命紀念館，觀察到幾種核心論述：關於國家進步的歷史敘事；國民黨、意識形態與國父的重要性；

24 沈之瑜，〈博物館學概論〉，陳秋輝編，《沈之瑜文博論集》，頁22。另見Shao, “Exhibiting the Modern,” 691–692，此文章將「博物館」和「博物苑/院/園」分別譯為“museum-library”和“museum-garden”。

25 例如請參見〈博物館界〉，《中國博物館協會會報》，第2卷，第3期(1937)，「上海市博正式開幕」的部分，頁15；袁同禮，〈抗戰期中我國博物館之動態與前途〉，《中國博物館協會會報》，復刊，第1卷，第1期(1941)，頁2–4。

26 Yunqian Chen, “Local Exhibitions and the Molding of Revolutionary Memory (1927–1949),”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47, no. 1 (Fall 2013): 29–52.

人民意志對革命的支持；以及現任領導人所繼承的革命傳統。²⁷除了革命敘事，民國時期的博物館推動者還主張，展覽可以成為群眾教育的工具。在1936年的一篇文章中，陳端志指出，新文化知識分子錯將博物館當作「是保存古器古物的古典倉庫」。他認為，博物館並非「裝飾品」，而是與蘇聯一樣，中國可以利用博物館傳播意識形態，改造人民的思想意識。²⁸

在上海，新規劃的大上海市中心就將上海市博物館包括在內。上海市博物館坐落於一座有著宏偉中式樓頂的現代混凝土建築之中，著重介紹上海和中國的歷史，展示紡織生產等本地產業，並陳列城市新建築的模型。²⁹博物館開放不足一年，抗日戰爭爆發。戰爭結束後，博物館於1946年5月遷址復館，更名為上海市立博物館。新館的規模稍遜於前，展出日佔時期被藏匿的部分藏品。³⁰面對中國持續的內戰，上海市博物館推出特別展覽，主題包括孫中山生平和書信、上海抗戰和國民革命。其中為期三天的孫中山展覽最受歡迎，共計51,263人參觀。³¹儘管上海市博物館未能搬回原址，其舊館大樓至今仍坐落於上海楊浦區。它既是一座民國時期的建築遺址，同時也與形制相同的上海市立圖書館大樓相呼應，體現了以博物館、圖書館作為文化建設雙翼的當代願景。³²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也有自己的計劃。陳毅安排兩輛卡車運送文物一事，就表明中共當時也在收集古文物。在土地改革中，共產黨幹

27 Kirk A. Denton, *Exhibiting the Past: Historical Memory and the Politics of Museums in Postsocialist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4), 尤見頁46–52。

28 陳端志編，《博物館學通論》（上海博物館，1936），頁29；陳端志編，《博物館》（商務印書館，1937），頁22。

29 〈博物館界〉，頁15–16。

30 李純康，〈上海的博物館〉，《旅行雜誌》，第22卷，第7期（1948），頁23；《上海市立博物館要覽》（1948年8月），頁2–3。

31 《上海市立博物館要覽》，頁13。當月的參觀人數佔全年總人數的一半以上，此後的月參觀人數再未超過19,000人。

32 陳端志編，《博物館學通論》，頁23。

部奉命保護從地主手中沒收的藝術品和書籍。隨著人民解放軍的進軍，他們接管了文物，並在各地成立文物保管委員會。³³ 共產黨接管上海時，上海市軍管會貼出大幅手寫告示，號召收集文物作為「我國文化上之至寶，研究我國歷史之珍貴資料」。³⁴ 對於共產黨自身的革命文物，呂烈丹解釋道，中國共產黨早在1930年就開始規劃博物館，並於1933年決定建立中央革命博物館。³⁵ 在共產黨的根據地，幹部們還發起了眾多以戰爭或生產為主題的公眾教育展覽。³⁶ 1949年10月11日，即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天之後，中國革命博物館在北京落成。緊接著，中宣部發出了徵集革命文物的號召。³⁷

1949年後，中國的博物館學以蘇聯為模範。中國官員前往蘇聯博物館考察學習，博物館行業的重要期刊《文物參考資料》也刊登了許多有關蘇聯博物館及其陳列方法的文章。1950年，國家文物局的王冶秋撰文對蘇聯革命博物館大加讚揚。王冶秋表示，革命博物館的規劃尚未完整，在實現共產主義之前需要不斷充實。³⁸ 中國共產黨採納了這一觀點，不僅收集歷史資料，也收集當代物品。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和上海博物館等機構都實時收集實物材料。這一時

33 〈中央工委關於阻止毀壞古書古籍的指示〉，1947年7月10日，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中央檔案館編研部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49–1956》（學習出版社，1996），頁665。關於山東古代文物保管委員會及相關展覽，請參見〈濟南舉行古代文物展覽〉，《東北日報》，1949年2月5日，頁3。

34 上海市檔案館，B1-2-245，頁10。這份文件日期為1949年7月20日。

35 Tracey L.-D. Lu, *Museums in China: Materialized Power and Objectified Identities* (Routledge, 2014), 114.

36 中國革命博物館編，《解放區展覽會資料》（文物出版社，1988）。

37 〈中央宣傳部關於收集革命文物的通知〉，1949年10月11日，中央宣傳部辦公廳編，《黨的宣傳工作文件選編》，四卷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頁34。

38 王冶秋，〈蘇聯國立革命博物館〉，《文物參考資料》，第10期（1950），頁66–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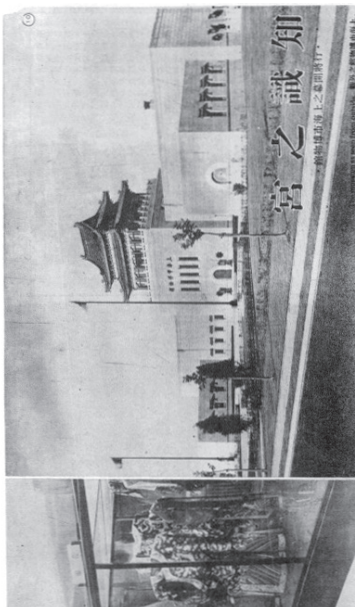


圖1. 上海博物館照片，包括辦公室、閱讀室、研究室與集會廳。《良友》，第120期（1936），頁10-11。

上海博物館之建築，係由著名建築師設計，其外觀極具中國傳統特色，而其內部則採用現代化之設備，以適應現代博物館之需要。該館之成立，旨在保存及展示上海之歷史文物，並為公眾提供一個學習及研究之場所。館內設有辦公室、閱讀室、研究室與集會廳等，以滿足不同之需求。此外，該館亦定期舉辦展覽，以向公眾介紹上海之文化遺產。

上海博物館之成立，是上海文化建設之重要里程碑。該館之建築，不僅是上海歷史文化之縮影，亦是現代建築藝術之傑作。館內之藏品，涵蓋了上海各個時期之歷史文物，從古代之青銅器、陶瓷器，到近代之書畫、文玩，無不齊全。此外，該館亦收藏了大量的古籍善本，為學者之研究提供了極大之便利。該館之成立，不僅豐富了上海之文化底蘊，亦為公眾提供了一個了解上海歷史文化之窗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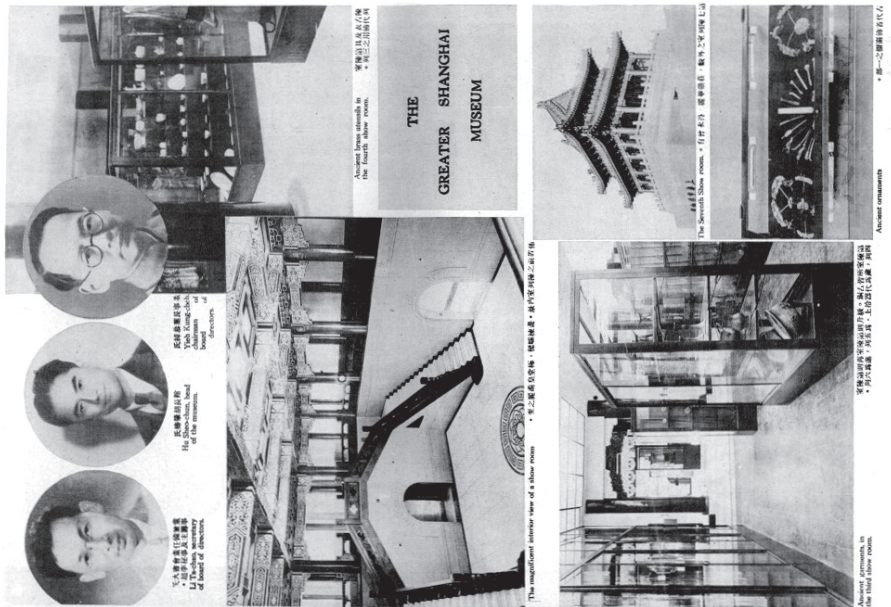


圖0.1. 上海市博物館照片，包括辦公室、閱讀室、研究室與集會廳。《良友》，第120期（1936），頁1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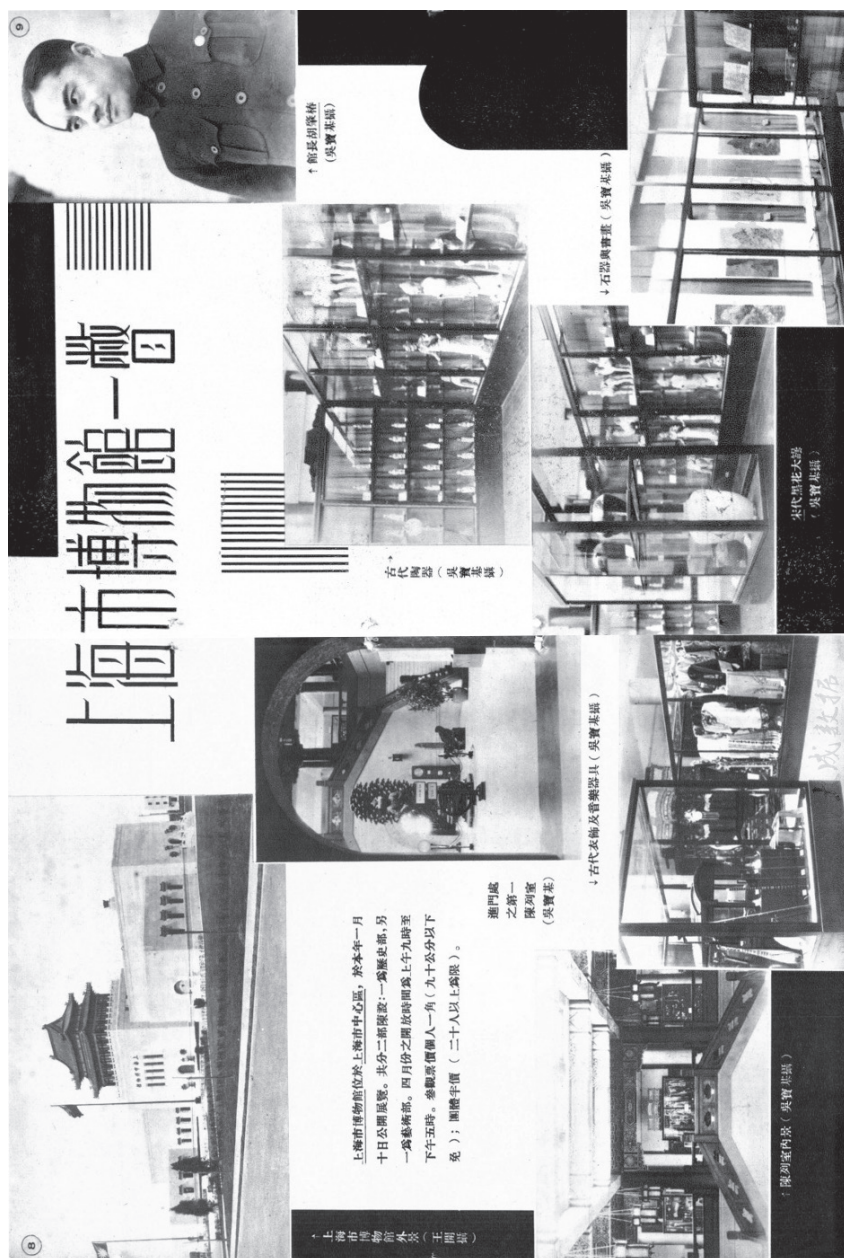




圖 0.3. 上海市博物館的參觀者，無日期。上海市檔案館 H1-1-31-73。

期的紅衛兵報還刊登通知，呼籲人們為文革收藏捐贈文獻。³⁹ 隨著革命的進程，新的篇章將被書寫，而展覽將指導群眾如何續寫新篇。

本書聚焦毛時代，著重研究作為政治、社會和文化實踐的展覽活動。本書將說明，展覽是一種參與式的宣傳形式：講解員和參觀者都參與了展覽的組織與回饋的過程；展覽融合了其他宣傳形式，如地方史與個人敘事；展覽還在政治運動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這類展覽實踐表明，雖然中國共產黨從國民政府和蘇聯模式中繼承了一些展覽技巧，但不少方法是基層的唯物主義階級革命所特有的。我建議以兩種相互交疊的模式來看待社會主義中國的展覽文化：一種是當權國家的展覽文化，另一種是革命運動的展覽文化。前者例如古文物博物館或革命博物館，它們的作用等同於官方教科書，為革命建國的國家賦予合法性，並將革命納入國家敘事。後一種模式的例子則包括鼓動人們參與土改或文

39 紅衛兵電影製片廠一革命群眾，〈上海紅衛兵革命造反展覽會徵集文化大革命重要文獻〉，《文藝戰報》，第36期（1967），頁4。

革等運動的展覽，這類展覽發揮指導手冊的功能，界定政治類別、傳授革命詞彙和口號、抨擊革命的敵人。這兩種模式也可能兼而有之，比如一場關於現代化的展覽就可以兼具認可與動員的功能。在毛時代的中國，政治展覽既承認了革命，也成就了革命。

毛時代的文化政治

1951年上海《街道里弄居民生活手冊》在展覽說明的最後建議道：展覽應與其他宣傳形式（如廣播）相結合。唯有這樣，展覽才能生動鮮活而富有戲劇性，「有聲有色」。⁴⁰ 毛時代的中國博物館和展覽以多媒體著稱，綜合多種宣傳形式，包括歷史、故事以及視覺和物質文化。在展覽空間中，講解員朗讀文本並鼓勵觀眾參與，展覽既是課堂，有時也是劇場。在社會主義教育與宣傳的交匯點上，展覽文化史有助於學界最近對以下問題的研究：何為社會主義中國的文化？文化如何影響政治，為中國的共產革命帶來了什麼？何為毛時代的政治文化，它以何種方式賦予政權合法性並鼓勵群眾參與政治運動？

有關文化生產的研究經常提到毛澤東本人關於文化、藝術與政治之關係的著作。1940年，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他將新民主主義文化定義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吸收古代和外國文化的民主性和革命性，並結合當代的社會主義文化。⁴¹ 雖然當時毛澤東寫道，這種文化作為上層建築將反映當代的政治和經濟，但在他的晚年，特別是在文革期間，他表示文化的目的就是改造經濟基礎。〈新民主主義論〉發表兩年後，毛澤東於〈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號召藝術家和作家向人民學習，並明確表示文學藝術要服從政治。⁴² 可見，毛澤

40 《街道里弄居民生活手冊》，頁43。

41 Mao Zedong, "On New Democracy," 367–369.

42 Bonnie S. McDougall, *Mao Zedong's "Talks at the Yan'an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束的早期文章與毛時代的政治運動構成了一種衝突：前者暗示文化反映政治，藝術家為共產黨服務；後者則暗示文化在社會變革中起領導作用。近期的學術研究亦突出了文化產品的重要性。2008年，康浩 (Paul Clark) 在《文革文化史》中主張，文化實踐既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核心，也是文學藝術現代化長路的一部分。⁴³ 歷史學家梅嘉樂 (Barbara Mittler) 分析了各類宣傳藝術，揭示出不論過去或現在，宣傳藝術都相當普遍且廣受歡迎。⁴⁴ 透過對特定文藝類型的研究，學者可追索其社會影響，如柏右銘 (Yomi Braester) 對電影的研究，說明了電影如何幫助人們憧憬社會主義新城市的建設。⁴⁵ 而對於社會主義視覺文化，唐小兵則寫道：「其核心是創造一種新的觀看方式……包括**如何看和看什麼**。」⁴⁶ 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本書將展覽視為一種文化產品，它指導人們如何對周遭的物品進行分類：過去的殘餘和古跡、當下的產品與未來的承諾，以及犯罪證明與階級標誌。

除了對文化產品的研究，學者們還探討了文化在政治中的角色。江曠 (Brian DeMare) 在其著作中聚焦於1949年前和建國初期的話劇團，展示出演員如何以宣傳員的身分在基層和前線開展宣傳工作；藝術不僅服務於政治，藝術本身就是政治。⁴⁷ 裴宜理的作品關注共產黨早期動員

Art: A Translation of the 1943 Text with Commentar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0).

43 Paul Clark,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44 Barbara Mittler, *A Continuous Revolution: Making Sense of Cultural Revolution Culture* (Asia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2012). 梅嘉樂認為，宣傳藝術之所以在當時廣受歡迎，後續仍經久不衰，是因為宣傳藝術能夠兼收傳統與外國的影響。

45 Yomi Braester, *Painting the City Red: Chinese Cinema and the Urban Contract*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46 Xiaobing Tang, *Visual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Paradigms and Shif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22–23.

47 Brian James DeMare, *Mao's Cultural Army: Drama Troupes in China's Rural*

的關鍵地點——煤礦大鎮安源的歷史，她借用「文化定位」(cultural positioning) 的概念，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其對文化的運用，從宗教、儀式，到戲劇、藝術。事實上，裴宜理認為，政治合法性依賴於文化和軍事的共同力量，有效的政治動員需仰仗文化。⁴⁸ 本書將深入展覽幕後，揭示基層宣傳的製造過程。與劇團的演員一樣，策展人根據觀眾的需求對訊息量身定製，講解員則排演文本以激發政治正確的情緒。正如安源的組織者、策展人和講解員都在傳授一種新的革命文化，一種將精英傳統（如藝術鑒賞與歷史書寫）與大眾習俗（如講故事和戲劇）相結合的文化。

新的文化產品與文化權力共同創造了社會主義中國的政治文化。歷史學家洪長泰研究了從巡遊到油畫等一系列國家資助的項目，並主張正是這些項目促成了1950年代共產黨政權的合法化。⁴⁹ 如果文化不僅是一種產品，也是一種實踐，那麼政治文化也包括儀式習俗，如毛時代的個人敘事——「憶苦思甜」和「回憶對比」。對於這種要求個人回憶昔日苦、對比今日甜的做法，人類學家安德訓(Ann Anagnost) 將其與土改中的「訴苦」運動相聯繫。⁵⁰ 歷史學家伍國重點關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2–1966) 中的憶苦思甜，並主張憶苦思甜旨在改造個人與集體對階級的理解。⁵¹ 雖然「憶苦思甜」主要是在政治會議中進行，但本書將展示基層展覽如何透過講解員的介紹與展品的講述，策劃「憶苦思甜」的敘事，並鼓勵參觀者回憶自己的苦難。在展覽的權威性與展廳的儀式感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48 Elizabeth J. Perry,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尤見頁4、8–9、287–288。

49 Chang-tai Hung, *Mao's New Worl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50 Ann Anagnost, *National Past-Times: Narrative, Representation, and Power in Modern Ch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38.

51 Guo Wu, "Recalling Bitterness: Historiography, Memory, and Myth in Maoist China," *Twentieth-Century China* 39, no. 3 (October 2014): 245–268.

中，敘事變得不容置疑。展覽既展示了官方對歷史與政治的解讀，也使參觀者成為實物教學的學生，進而在政治文化中發揮作用。丹尼爾·里斯 (Daniel Leese) 在分析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時，強調了話語和儀式在政治動員與政治操控中的力量。⁵² 同樣，展覽敘事和參觀儀式也為政權合法性 and 政治革命書寫了腳本。

如1951年上海街道幹部手冊所示，展覽如何成為一種強有力的宣傳方式？不同於其他宣傳形式，展覽依賴文物。雖然為了節省成本和方便起見，的確有以圖片或照片為主的展覽，但在理想情況下，展覽依然首重實物的呈現。根據展覽紀錄，最引人注目的始終是實物；參觀者往往希望看到更多展品，而非文字。展覽與展品非常適合中國基層的唯物主義階級革命。首先，展覽因地制宜，展示特定的故事；無論是多麼尋常無奇的知識，參觀者都可以將其所學應用於切身的生活和周遭的物件。其次，馬克思主義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三位一體中的一環，這就意味著，物質文物構成了歷史發展和生產關係的證據。最後，物品的真實性如此實在，連個人財物也能成為證明。在毛時代持續不斷的革命中，物品不僅可以傳達階級教訓，也能識別階級敵人。展覽文化向物質實體賦予了政治權力。

展覽之所

本書開篇，是上海博物館館長沈之瑜尋找1921年中共一大會址的故事。第一章〈樹立革命豐碑〉將探討中共一大會址作為革命文物與革命歷史博物館的雙重角色。博物館肩負書寫權威教科書的責任，其檔案揭示出策展人如何書寫、更改敘述，展覽又如何數次變更以支持當前的

52 Daniel Leese, *Mao Cult: Rhetoric and Ritual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政治局勢，以及中共一大會址如何塑造出以毛澤東為中心的建黨神話。中共一大會址的工作人員負責為共產主義革命策展，他們努力遵循「紅線」，根據毛澤東作品解釋歷史，並為毛澤東刻畫出國家締造者與偉大領袖的光輝形象。

第二章從革命歷史轉向日常敘事，以蕃瓜弄為研究對象，它從上海最貧困的貧民窟之一變成了混凝土公寓樓林立的工人新村。蕃瓜弄的改造象徵著共產主義國家的巨大轉變，不僅讓蕃瓜弄成為新中國的代名詞，裏面的居民也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的代表。蕃瓜弄以兩種方式進行展示。首先，不論是作為上海大歷史的一小部分，還是作為獨立的展示，蕃瓜弄都是展覽的主題。其次，官方保留了一部分棚屋，以供新舊社會的對比。蕃瓜弄因此化身展示的窗口，不僅令遊客和外國政要驚歎於新中國的成就，也給學生們上了一堂歷史課和階級課。第二章〈展示新中國〉將分析政治文化中的典型概念，並介紹「憶苦思甜」這一特殊的故事體裁。工人新村作為典型，透過憶苦思甜的敘事，代表著向共同富裕的未來前進。

展覽文化不僅限於宣傳新的經驗教訓，同時也抨擊不符合新社會的傳統信仰。第三章重點介紹專為新中國最年輕的政治對象——少年先鋒隊隊員——設計的地方小型臨時展覽。「熱愛科學、破除迷信」展覽的組織者有意培養具有現代意識的青少年，引導他們摒棄那些被國家界定為「迷信」的信仰與習俗。但反對宗教的展覽文字讀起來就像一本教義問答書，而教師在學生參觀後的觀察也表明，傳統信仰依然存在。透過這類反迷信展覽的案例我們看到，一方面，此類展覽展示出毛時代的宣傳內容，另一方面，儘管反迷信的政治運動接連不斷，但各種思想和習俗依然頑固不化。雖然「熱愛科學、破除迷信」展覽或許未能實現組織者的所有訴求，但它表明了展示如何成為基層宣傳的構成部分。

接下來的兩章將探討：物品如何與個人的階級地位相掛鉤、個人物品的展示如何成為毛時代展覽文化的組成部分，以及展覽如何明確為政治運動服務。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期間，從鄉村到省會，各級地方官員無不策劃舉辦了階級教育展覽。第四章以上海的階級教育展覽為範例進

行深入探討。由於後來的紅衛兵批鬥，大量的會議紀錄和觀後感報告反而得以留存，從中可以證明展覽是學習最新政治運動詞彙的課堂。此外，階級教育展覽還展示個人物品以證明其階級地位。隨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演變為文化大革命，曾在展覽佈告欄上勤奮謄抄的參觀者，模仿階展的形式和內容創造出大字報，並借此尋找他們曾在展覽上看過的實物證據。

第五章〈文化大革命的實物教育〉探討了由「東方紅百貨」（即上海南京路著名的永安百貨公司）的紅衛兵們所組織的展覽活動。紅衛兵利用文革抄家的沒收物品以及相關照片，對形式、文本和實物進行再造，進而論證造反有理。在此，展覽技巧成為對階級敵人進行政治鬥爭的一環；人們參觀紅衛兵展覽的過程則演示出展覽如何成為了儀式化的空間：參觀者高喊口號，講解員重現抄家過程，還有人自省當時查抄得不夠細緻。透過一些曾擔任講解員的紅衛兵的講述，我們將看到他們如何喚起觀眾的情感——因為情感是意識形態正確性的體現，他們又如何將講述文革本身視為一種「鬧革命」。

最後一章聚焦中國最著名的藝術收藏館之一——上海博物館。上博成立於1952年，在建國前受訓的博物館專家們領導了上博的發展，並培養出新一代的專家團隊。建館之初，上海博物館依照朝代順序展示中國藝術，確保以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各階段為綱。此外，上博還舉辦臨時展覽，展出革命文物或策劃階級教育展覽。但文革爆發後，紅衛兵的「破四舊」運動對上海博物館乃至全上海的文物都構成嚴重威脅。從第六章〈革命中的文物〉我們將看到，面對紅衛兵對文物的攻擊，上博的管理者堅持聲稱文物不屬於「四舊」，也不是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代表。他們借鑒了毛澤東對於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觀點，將歷史文物融入革命之中。儘管上海博物館在文革高潮時期被迫閉館，但它仍以革命的名義收藏不輟，以備日後展覽。

策展革命

在1972年拍成電影的革命樣板戲《海港》中，政治覺醒的時刻就發生在一次階級教育展覽上。一位名叫韓小強的年輕碼頭工人站在博物館的展廳中央，面對上海昔日的帝國主義壓迫與當下社會主義現實的強烈對比，他深受震撼。舞台以毛澤東語錄、描繪勞動群眾的油畫和展現帝國主義壓迫的文物為背景，在舞台前方，一位老碼頭工人吟唱著過去的苦難故事。老工人手持工人身分證，將自己的經歷與韓小強在新中國的角色做對比。韓小強聽罷，感動得熱淚盈眶，誓不忘根，重新投身革命。⁵³ 這場戲劇中的展覽擁有真實展覽中的所有元素：文物、圖片與毛澤東思想。老碼頭工人和年輕工人之間的關係代表了展覽的理想效果——實現從感性到理性認識的過渡：過去與現在相連，回憶帶來覺醒，覺悟引發行動。在繪製的舞台背景上，展覽的牆壁向外敞開，呈現出一幅閃閃發光的夜景。書寫著「毛主席萬歲」的紅色霓虹燈映照在上海靜靜的港灣中，半圓的弧線暗示著明天冉冉升起的太陽。

本書的目的正是還原《海港》這一場景所代表的毛時代展覽。我將追溯舉辦展覽的全部過程，從收藏到展覽，從解說詞的敘述到參觀者對展覽的接受。我將上述階段統稱為策展過程，儘管在各個時代，每個步驟可能都有其不同的標籤。1951年上海的幹部手冊說明了應如何舉辦展覽，包括陳列、佈置以及宣傳性的解說。⁵⁴ 沈之瑜在毛時代的著述中使用了「展覽工作」一詞，強調陳列和解說的雙重重要性，並提到1956年博物館學的一個口號：博物館有三性——收藏、研究、宣傳。⁵⁵ 進入改革時期後，指導手冊將「陳列」與「群眾工作」視為博物館的兩大任務，

53 上海京劇團《海港》劇組編，《海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4），頁48–58、167–209。

54 《街道里弄居民生活手冊》，頁42–43。

55 沈之瑜，〈學習毛澤東思想〉，頁5–7；沈之瑜，〈博物館學概論〉，頁24。



圖 0.4. 《海港》劇照，1972。



圖 0.5. 《海港》舞台設計。上海京劇團《海港》劇組編，《海港》，頁 282。

前者是對展覽的準備，後者則是為實現教育目的的解說敘述。⁵⁶ 本書透過案例研究，將展示社會主義中國的博物館和展覽如何策展收藏、策展敘事、策展儀式。以《海港》中虛構的階級教育展覽為例，策展從收集實物、繪製圖示開始，逐漸過渡至韓小強所聽到的敘述，直到他幡然覺醒，帶著革命的決心走向舞台之外的世界時，策展才算最終完成。

為了解策展的每個步驟，我主要以檔案資料為史料來源。雖然關於博物館和展覽的報刊報道也不乏對收藏、展覽內容和參觀者反響的描述，但有關收藏的報道（或者稱頌考古發現，或者表揚捐贈善舉）往往經過精心挑選，寫作也要經過審查，最終呈現的只是理想化的展覽效果。相比之下，上海市、黃浦區和閘北區檔案館的資料則涵蓋了一般性報告、會議紀錄、展覽文本的多版底稿、講解員問答稿、參觀者反饋報告以及各類展後紀錄，如學校的後續活動和講解員的自我批評等。此外還有來自上海市文化局、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辦公室和上海市委宣傳部等部門的其他材料。⁵⁷ 雖然這些官方文件也有其目的性，但它們揭示出博物館的幕後情況：策展人如何評估目標觀眾，如何設計相應的展覽？展覽的哪些部分在審查後得以保留，哪些部分遭到刪改？哪些觀眾問題最難回答，講解員如何應對？官員們又如何評估展覽成功與否？

短期文宣品和口述歷史也是本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例如，反封建迷信展覽的內容也收錄在針對兒童的手冊中，由此可見一種宣傳形式如何與另一種形式相互借鑒。官方新聞媒體並未報道階級教育展覽和紅衛兵展覽，但透過我從二手書網站上購買的講解員手冊和紀念冊，我們能夠將上海的案例放到更大的背景下進行研究。本書使用的口資料，包括已出版的口述歷史、網絡回憶錄和我個人進行的訪談，也都有助於豐富補充檔案資料和短期文宣品。對於具有官方職務的個

56 《文物工作手冊》（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無日期），頁164–165。

57 在黃浦區檔案館，我研究了有關上海城隍廟的資料，但檔案館不允許我自行查詢索引。在蕃瓜弄所在的閘北區檔案館，我獲准查看索引和照片，卻無法查看實際的檔案。我在北京市檔案館未能找到類似的資料。

人，如策展人，或已經出版回憶錄的個人，本書將具名引述；除此之外，則只公開普通受訪者的年齡與背景。至於展覽物品，中共一大會址和上海博物館繼續保留著各自的藏品；蕃瓜弄的公寓樓依然存在，但曾經保留的棚屋則早已拆除。同樣，日常生活中的器物也僅偶現於檔案照片或階展文宣品中。但即使沒有了這些化感性為理性的物品，本書也將還原人們對這些物品的策展過程，以便更好地理解它們所引發的革命。

本書介紹的博物館和展覽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的代表性。中共一大會址和上海博物館分別是革命歷史的標誌和中國藝術與文物方面的頂級藏館。中共一大會址是毛時代上海最重要的官方文物，也是全國革命朝聖之旅的起點。⁵⁸ 上海博物館作為國寶的守護者，展示出社會主義中國如何將藝術傳統融入革命敘事，為中國其他藝術博物館樹立了典範。⁵⁹ 這兩處展館，加上蕃瓜弄的工人新村，作為中國及其革命的典範，構成了許多外國代表團的遊覽路線。⁶⁰ 其餘的展覽持續時間較短，代表了中國的各類地方展覽。雖然蕃瓜弄是上海特色，但將棚屋或農房作為階級苦難象徵的展覽卻比比皆是。「熱愛科學、破除迷信」展覽與其他科普展覽遙相呼應。⁶¹ 階級教育展覽同樣無處不在，策展人和講解員前往各地互相學習：例如上海的階展就以山東為範本，而北京的紅衛兵同樣也成為了上海紅衛兵策展人的模仿對象。因此，儘管上海展覽的文物和敘事植根於本地歷史，但圍繞展品的展覽和儀式反映出更廣泛普遍的策展實踐。

58 文化部文物管理局編，《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第一批文物保護單位名單匯編》（文物出版社，1958），頁10；聶兵、峭岩，〈人民戰士心向党〉，《解放軍畫報》，1976年7月，頁2。

59 在上海與李俊傑的採訪，2011年7月20日。

60 參見〈駕艇起義的趙宗禮在上海參觀〉，《人民日報》，1964年10月26日，頁2；〈外事往來〉，《人民日報》，1978年4月7日，頁4。

61 例如，1964年，浙江省在各縣市組織了一場巡迴展覽。參見中共中央宣傳部編，《宣傳動態（選編）：1983》（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頁19-20、62-64。

為什麼要在上海策展革命？畢竟，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是一場農村和農民的革命；當解放軍和中共幹部進入城市時，他們被告誡要警惕城市的腐朽與不良影響。然而，有別於資本主義殖民地的形象，上海是一座無產階級的革命城市。1950年代的電影不僅包括慶祝上海解放的遊行、對資本家的改造，也包括政治運動中的街道動員。⁶² 兒童讀物和大眾報紙也將這座城市與革命聯繫在一起：百貨商場林立的南京路是草鞋軍踏足上海之地，外灘的洋樓如今已化身為社會主義的工作單位。⁶³ 《人民日報》稱現在的外灘是「人民的外灘」，《文匯報》上的一首詩也感歎前滙豐銀行的兩隻石獅曾是帝國主義的見證，現在卻屬於人民。⁶⁴ 即使在《海港》戲劇化的展覽中，上海的背景也非常重要：它承載了工人生活的轉變、反革命分子復辟資本主義的威脅，以及中國與世界革命之間的聯繫——因為韓小強負責裝載的正是運往非洲的種子。正如今昔巨變令敘事更加可信，對於上海的策展也使新舊中國的巨大差異一目了然。如果說策展的過程始於收藏，那麼上海就是一座充滿文物與故事的城市。從上海博物館的藝術稀珍，到成為階展展品的日常用物，策展人可以接觸到各種各樣的展品。而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建黨標誌——中共一大會址——策展革命正式開始。

62 參見Braester, *Painting the City Red*, 59–72。柏右銘認為，在1950年代，上海透過電影被成功改造成一座社會主義城市。直到1960年代中期，上海才在「南京路上好八連」運動中遭到抨擊。

63 何曉倩，〈我們行走在南京路上〉，少年兒童出版社編，《新上海的故事》（少年兒童出版社，1964），頁1–15；程起，〈五十年前的外灘：帝國主義銀行的集中地〉，《新聞日報》，1959年8月20日，頁3。

64 誠士，〈外灘——帝國主義侵略罪行的見證〉，《人民日報》，1965年3月12日，頁5；蘆芒，〈外灘，玫瑰色的早晨〉，《文匯報》，1963年5月28日，頁4。

第1章

樹立革命豐碑 中共一大會址

沈之瑜肩負著一個政治使命。1950年9月某一天，時年34歲的美術工作者協會黨組副書記沈之瑜被電召至上海市委宣傳部。他與楊重光一起站在位於華山路的辦公室裏，接受宣傳部副部長姚溱的指示。上海市委決定採納市長陳毅的建議，確認中共一大會址的地點，並在原址建立紀念館。沈之瑜與楊重光的任務是，盡其所能在次年建黨三十週年之前確定一大會址。姚溱操蘇北口音，他宣佈：「作為中共上海市委，〔我〕把尋找黨的誕生地看成是自己的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¹

在新中國的敘事中，黨的成立之地無疑是最重要的革命遺跡。與上海居民收集個人的歷史物件一樣，黨也在尋找中共一大會址的物質遺存。黨的一大會址一經發現與修復，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作為中共的正式誕生地，一大會址不僅因其文物價值受到保護，並且成為政治上的朝聖之所。上海官員還對周邊地區進行了保護，

1 關於確定中共一大會址的過程，本章的資料來源主要有三：一是沈之瑜在1988年的文章〈一大會址是怎樣找到的〉，陳秋輝編，《沈之瑜文博論集》，頁353-357；二是葉永烈在1991年對沈之瑜的採訪，題為〈中共之初的追尋：訪沈之瑜同志〉，陳秋輝編，《沈之瑜文博論集》，頁412-420；三是一部沈之瑜離世後的作品，其中包括沈之瑜夫人的紀念文章，參見陳志強，《文博先驅：沈之瑜傳》（上海文化出版社，2011），頁97-110。

並規劃建設一座革命歷史博物館。在修復後的會址旁，人們還在臨近的建築中舉辦了建黨故事的展覽。中共一大會址既是紀念遺址、展覽廳，也是一座收藏館；在革命不斷的年代，工作人員繼續在此收集當時的文物。建國六十多年後，中共一大會址的功能仍不曾改變，它是愛國主義教育的基地，是舉辦展覽的博物館，也是協助學術研究的收藏館。時至今日，中共一大會址依然是一個象徵，在上海熠熠生輝的摩天大樓之間，它是屹立不倒的記憶之所；在毛澤東宣佈1921年7月1日為建黨日之際，它是紀念徽章上的建築剪影。²

如今，中共一大會址已成為上海的歷史遺址，被棕色路標（遺跡的通用標誌）仔細地標識出來。沿著路標，遊客將來到位於新天地商業中心、由五間住宅構成的建築。這種兩層樓的房子是典型的上海里弄住宅，由灰紅磚相間砌成，門楣上刻著精緻的花飾。如今經過修復，這裏已煥然一新，門前的梧桐整齊劃一，大理石標誌牌上刻著「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建築一角還有五星紅旗正迎風招展。但在1950年，當沈之瑜沿著上海的濃蔭踏上尋訪之路時，沒有人知道中共一大會址究竟在何處。我們可以想像他在面對姚溱時的惶恐：「任務很光榮，但難度極大……這樣大的一個法租界到哪裏去找？」³然而，正如下文所述，找到會址反而是最容易的一步；如何利用這一革命遺跡來講述黨的歷史，才是在政治上一個艱難的挑戰。

本章將首先考察中共一大會址被發掘和鑒定為革命文物的過程。沈之瑜等人的回憶錄和檔案文件將揭示出物質文化——亦即革命遺跡——在政治合法性中的作用。接著，本章將關注在中共一大會址策劃展覽的問題，透過展覽計劃、官方問答稿等材料，我們可以看到在毛時代的中國研究歷史的重重困境。即使革命歷史展覽等同於權威的教科

2 現已確定中共一大於1921年7月23日召開。參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紀念館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1），頁103。不過，建黨節仍定於7月1日。

3 沈之瑜，〈一大會址是怎樣找到的〉，頁353。

書，但在社會主義中國政治運動動蕩不斷的背景下，雖然中共一大會址的工作人員努力與毛主義的政治「紅線」保持一致，但過程絕非易事。從他們在1960年代初策展革命的情形來看，無論是研究中共建黨的歷史，還是將其轉化為展覽文字和講解文本，做歷史的困難都難以迴避。文革期間，中共一大會址展覽成了大型的政治宣傳品。儘管改革時期對會址的修復倡導回歸文物本身與歷史的準確性，但它講述著建黨的歷史，則必將仍受制於黨。

革命的發掘與鑒定

尋找中共一大會址的工作，始於一份反革命文件和一名叛黨分子之妻。上海公安局的一名工作人員周之友是周佛海與楊淑慧之子；其父周佛海曾是中共一大最早的與會者之一，但後來加入了汪精衛的傀儡政府。⁴父親雖投靠敵人，兒子卻加入了共產黨地下組織，最終成為新中國公安機構的一員。周之友提醒宣傳部，他的父親曾寫過回憶錄，其中就包括關於中共一大的紀錄。⁵因此，在各方人士以及宣傳部和公安局的合作下，沈之瑜循著兩條線索開始了搜索。他拿到了一封介紹信，獲准閱讀屬於機密文件的周佛海回憶錄；同時，公安局也同意釋放周佛海的遺孀楊淑慧，以協助沈之瑜的革命任務。⁶於是，沈之瑜拿著介紹信

4 周佛海以中國留日學生代表的身分出席了中共一大。他於1924年脫黨，1938年叛國投敵，先後擔任汪精衛南京國民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和上海市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被判處無期徒刑，1948年死於獄中。見葉永烈，〈中共之初的追尋〉，頁413；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紀念館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頁98。

5 葉永烈，〈中共之初的追尋〉，頁413–414。

6 同上註；沈之瑜，〈一大會址是怎樣找到的〉，頁353；陳志強，《文博先驅》，頁98–99。

直奔圖書館，花了整整一天時間讀完了周佛海的回憶錄，從中找到一條線索：「在貝勒路李漢俊家，每晚開會。」⁷

兩天後，沈之瑜和同事楊重光第一次見到了楊淑慧。楊女士當時49歲，身著藍棉衣，一頭短直髮，與昔日身著印花旗袍的優雅形象大相徑庭。⁸ 她首先想到帶他們去南昌路的陳獨秀故居，那裏既是中共創始人陳獨秀的住家，也是《新青年》編輯部的辦公地點。她仍記得這棟房子，因為她和周佛海剛結婚後就住在這裏的亭子間。入正門來，是陳獨秀的會客室，她記得當時還有一塊小黑板，上面寫著：「會客談話以十五分鐘為限」，陳獨秀的一隻搖椅也曾放在客堂裏。⁹ 確定這一地點後，沈之瑜和楊重光決定兵分兩路，沈之瑜負責尋找李漢俊家，而楊重光則根據其他材料中的線索，尋找另一處可能的會址——博文女校。

楊重光獨自查找了上海市教育局的檔案，並採訪了以前的居民，由此證實了博文女校的地址。他將女校照片寄給毛澤東和另一位原始與會者董必武審核。毛澤東和董必武看了照片，表示女校曾為與會者提供住宿。不同於周佛海回憶錄中的記載，他們指出實際的會議是在李漢俊的哥哥李書城家中進行的。隨後，楊重光去北京拜訪了時任農業部部長的李書城，並確定其舊居位於法租界望志路78號。雖然博文女校並非一大會址，但仍被視為重要的革命遺址。為此，中共中央特派另一位與會者李達前往上海核實，確認無誤後，上海市政府買下了這處地產，並邀請前校長之女（其本人亦是當時博文女校的學生）監督博文女校的修復工作。¹⁰

7 相關段落轉載於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編，《上海革命史研究資料：紀念建黨70週年》（上海三聯書店，1991），頁321–324；陳志強，《文博先驅》，頁98–99。

8 葉永烈，〈中共之初的追尋〉，頁412–413。楊淑慧的照片可參見陳志強，《文博先驅》，頁110。

9 沈之瑜，〈一大會址是怎樣找到的〉，頁353；葉永烈，〈中共之初的追尋〉，頁415–416。

10 沈之瑜，〈一大會址是怎樣找到的〉，頁354–355。

與此同時，沈之瑜和楊淑慧沿原貝勒路（1943年更名為黃陂南路）數次踏看。沈之瑜戴著眼鏡，身著藍色幹部服，隔著半米跟在楊淑慧身後。距楊淑慧為丈夫上李家送信已經過去了三十多年。如今街景天翻地覆，有時她會認定一棟房子，但隨後又確定不是李家。有一次，她在黃陂南路與興業路（原望志路）交叉口附近查看時，突然停下腳步，看到一棟兩層的白牆建築，上面寫著店號「恆福昌麵館」。她對沈之瑜說：「這裏有點像李家後門！」隨後幾天，楊女士獨自返回查看，沈之瑜也採訪了附近鄰居。他們從醬園老闆董正昌處得知，這棟房子是1920年代由一位陳姓女士建造的。李家兄弟租下了其中的兩個單元，打通隔牆，組成一家。1924年，陳女士將房子出租給自家人，他們也因此成為了二房東。後來這裏又改成當舖，1951年沈之瑜和楊淑慧尋到此處時，這裏是一家小麵條鋪，樓上住著兩戶人家。¹¹ 據沈之瑜的描述，當住戶們得知這棟樓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時，「大家拍手大笑說：『我們住的原來是一塊寶地。』」沈之瑜還表示，一聽說這裏即將改為紀念館，住戶必須搬遷時，他們欣然同意，並表示「這是應該的！」¹²

下一步必須對黨的一大會址進行核實。當時還沒有保證它可以被認定為一處紀念遺址。上海宣傳部在向上級中央宣傳部彙報之後，得到的答復是，如果《新青年》編輯部、博文女校和黨的一大會址確認無誤，則可加以保留，成為紀念遺址。¹³ 1951年9月，上海市委在核實遺址的同時，租下了這些房屋，並於次年5月買下了房產，呈交上級檢查。

11 同上註，頁355；葉永烈，〈中共之初的追尋〉，頁417–418；陳志強，《文博先驅》，頁102。關於這棟建築，有兩張拍攝於1951年的照片，收錄於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上海市文物局編，《中國共產黨早期在上海史跡》（同濟大學出版社，2013），頁12。

12 沈之瑜，〈一大會址是怎樣找到的〉，頁355。

13 〈中央關於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地址保存問題給上海市委的指示〉，1951年7月3日，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中央檔案館編研部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49–1956》（學習出版社，1996），頁249。

最初，上海市委在房間裏掛上了馬克思和列寧畫像以及毛澤東的書法作品作為裝飾。1952年冬，文物局的王冶秋到現場視察，下令將房間恢復原狀，他表示：「革命歷史紀念館的佈置應該完全恢復當年原狀，使來館景仰者能想像當時情景生肅然起敬之感。」¹⁴ 1953年，三個微縮模型送達北京的中共中央宣傳部。毛澤東查看了模型，並派遣另一位與會者、時任國務院參事的包惠僧前往上海。1954年3月，包惠僧和李書城夫人薛文淑核實了會議地點。薛文淑不僅對恢復房間原貌提供了指導，後來還捐贈了茶具、椅子等文物。¹⁵

研究人員對會議是在樓上或樓下舉行的問題爭論不休，令上海的修復工作陷入僵局。1956年，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董必武視察了會址，並最終確定了房間的安排。董必武表示，當時代表們在樓下開會，家中的女眷則留在樓上。因此，工作人員們在一樓放置了一張長方形餐桌，這一佈置仍保留至今。¹⁶ 整個1950年代，上海的工作人員努力遵循王冶秋關於恢復原貌的指示，這一原則甚至延伸到會址的周邊區域——為保持原有的歷史氛圍，相鄰的建築都被保留了下來。¹⁷ 自1958年起即在中共一大會址工作的陳沛存，在他的口述史中回憶了修復工作如何細緻入微：木匠們根據薛文淑的記憶複製傢具，茶具則委託景德鎮和宜興專門製作，國家還撥出黃金，為桌上的花瓶勾邊鍍金。¹⁸

14 葉永烈，〈中共之初的追尋〉，頁419。

15 沈之瑜，〈一大會址是怎樣找到的〉，頁356。亦請參見上海市檔案館B172-4-313，頁5-6。

16 關於官方機構對於部分事件的描述，可參見陳沛存、任銳，〈建館四十年之回顧〉，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編，《上海革命史資料與研究》，卷一（開明出版社，1992），頁236-238。檔案記錄還顯示，這些訪問與問答都有詳細記錄。其中一個例子是1964年董必武夫人來訪時，不僅提到了董必武之前的評價，還有電話交談的摘要。上海市檔案館B172-1-477，頁95-97。

17 同上註，頁26-31。

18 段煉等編，《往事與記憶：上海地區博物館、紀念館口述訪談錄》（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頁56。陳沛存的口述史中也描述了發現會址的過程，但並非一手資料。



圖 1.1. 一大會址外觀，無日期。上海市檔案館 H1-22-1-1。



圖 1.2. 一大會址會議室，無日期。上海市檔案館 H1-22-1-2。

在對遺址進行鑒定和恢復房間原貌時，中共一大會址的工作人員都強調了準確的重要性。回憶錄和個人記憶並不完全可靠，例如：周佛海的回憶錄記錯了街道名稱、有些說法錯把博文女校當做一大會址、沈之瑜待董必武核實後才將會議桌改放在一樓。黨史必須從一開始就以權威而連貫的方式呈現。畢竟，黨的崛起有賴於其對歷史的正確詮釋。¹⁹ 一大會址於1952年9月向部分內部參觀者開放，但在1954年2月，中宣部下令，在室內修復最終確定之前，一大會址不可全面開放。²⁰ 作為革命文物，中共一大會址是黨自我塑造的必要部分，它所代表的真實性支撐著黨的政治合法性。

中共一大會址在全國革命文物中首屈一指，也為上海贏得了政治和文化聲望。1961年，國家公佈了第一批全國「文物保護單位」名單，上海共有四處，均為革命遺址。²¹ 上海在更大範圍內展開了尋索標記革命遺址的工作，尋找中共一大會址正是其中之一。陳沛存的工作之一就是調查革命遺址的蹤跡，檔案文件中也記錄了許多尋找、保護毛時代革命遺址的事例。²² 例如，1960年代，為確定毛澤東在上海的故居，工作人員曾遍訪老幹部和曾與毛澤東共事的同志；²³ 文化局還曾召開會議，以

19 對於蘇聯的案例，歷史學家弗雷德里克·柯爾尼(Frederick Corney)認為，「黨史委員會(Istpart)的誕生是基於對穩定、連貫的需求……在內部保持一致的革命史和黨史將有助於為蘇維埃政權奠定一個穩定的歷史」。Frederick C. Corney, *Telling October: Memory and the Making of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111–125.

20 陳沛存、任銳，〈建館四十年之回顧〉，頁238。

21 文化部文物管理局編，《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第一批文物保護單位名單匯編》，頁10。其他三處為孫中山故居、《中國青年》編輯部舊址、魯迅墓。參見馬承源等編，《上海文物博物館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頁387。

22 段煉等編，《往事與記憶》，頁58–61。

23 上海市檔案館B172-1-477，頁107–115。

確認毛澤東是否參觀過一個即將拆除的花園。²⁴ 到1964年，中共一大會址的工作人員已記錄下4,600多次訪談。²⁵ 由此可見，一大會址所代表的，不僅是一大的歷史，還有整個上海的革命文物。這些革命文物被一一收集、研究、修復，證明了它們所背負著的政治任務——撰寫建黨史亦同等重要。

中共的建黨史

1950年10月，正當沈之瑜開始尋訪一大會址時，國家文物局的王冶秋發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他參觀考察蘇聯革命博物館的情形，供從事博物館工作的同事們參考。他在文章中介紹的陳列手法將在日後為中國的博物館廣泛採用：大幅油畫、今昔對比、文物古器以及大量歷史文獻。這次考察經歷讓他既深受教育，又觸景生情。令王冶秋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一套刑具，其中的一根皮鞭讓他想起了自己身為中共地下黨員被囚禁的經歷：「這對我是有些熟悉的，因為我曾挨過中國反動統治者的皮鞭。」²⁶ 王冶秋對蘇聯革命博物館深感欽佩，其收藏不斷成長發展，刻畫當代的故事。同樣，在中國，展示革命也是書寫正在被創造的歷史。

博物館是教育之所，文物是記憶的觸發器，收藏是進行中的作品——這些特點在民國時期(1912–1949)已有先例。1928年，國民政府成立委員會，負責在南京籌建革命博物館。²⁷ 如鄧騰克所言，國民黨

24 上海市檔案館B172-1-477，頁134–139。上海市文化局認定毛澤東從未到過這座沈家花園，因此批准上海南市發電廠將其夷為平地，用作儲油罐區。

25 上海市檔案館B172-1-477，頁9–11。

26 王冶秋，〈蘇聯國立革命博物館〉，頁71。

27 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13.

之所以紀念革命，正是為了展示其政權的合法性。例如，在1929年西湖國際博覽會的革命紀念館中，參觀者在國父孫中山的畫像前鞠躬，瞻仰烈士與革命歷史的文物，遵循一種發展前進的官方敘事。在此敘事中，國民黨不僅深受人民支持，更是中國的領導力量。²⁸ 沈艾娣認為，正是這些民族與歷史的象徵與儀式造就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共產黨不僅繼承了這些紀念遺跡，也繼承了圍繞這些遺跡的習俗與儀軌。最突出的例子或許當屬南京的中山陵，中國共產黨已將其納入了自己的政治儀式之中。²⁹ 同樣，上海的國家級革命文物之一是孫中山在上海的故居，最初中山故居在1945年捐給國家，以便市民學習孫中山的三民主義。³⁰

隨著國共內戰，兩黨都收集了各自的革命文物。在1929年西湖國際博覽會的同時，國民黨地方政府下令收集革命物品。儘管鄧騰克指出在1930年代革命話語被淡化，但在戰後，上海市博物館明確策劃了革命遺跡的展覽。³¹ 考古學家呂烈丹指早在1930年，共產黨就有計劃展出「具有革命意義的物品」，並於1933年決定建立中央革命博物館。³² 中共曾在革命根據地舉辦小型展覽，但直到內戰勝利後才建立了革命博物館。³³ 1959年，中國革命博物館在北京建立，其所在建築正是1949年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週年而興建的「十大建築」之一。正如洪

28 Kirk A. Denton, *Exhibiting the Past: Historical Memory and the Politics of Museums in Postsocialist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4), 46–52.

29 Delin Lai, “Searching for a Modern Chinese Monument: The Design of the Sun Yat-sen Mausoleum in Nanjing,”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64, no. 1 (March 2005): 22–54.

30 上海市檔案館 Q1-6-676。

31 〈江蘇革命博物館籌備處徵集細則〉，《上海特別市教育局教育週報》，第4期（1929），頁7–8；Denton, *Exhibiting the Past*, 52；上海市檔案館 Q235-2-3460，頁16–17；《上海市立博物館要覽》，頁5。

32 Lu, *Museums in China*, 114.

33 Denton, *Exhibiting the Past*, 52

長泰所言，中共需要書寫革命的總敘事 (master narrative)，北京的中國革命博物館對此至關重要，它是新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為 1950 年代的中共政權賦予了合法性。³⁴

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中共一大會址的歷史學家們在撰寫這一總敘事時借鑒了蘇聯的範例。不僅王冶秋等中國文化官員前往蘇聯考察，行業刊物《文物參考資料》也經常刊登有關蘇聯典範的文章，蘇聯博物館學的指導手冊也被譯成中文。³⁵ 1930 年代蘇聯手冊與指南中所描述的博物館，正是王冶秋等人即將參觀考察的對象，而這種博物館模式後來也將在中國廣泛推廣。在 1939 年由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蘇聯博物館》一書中，作者奧爾加·列奧諾娃 (Olga Leonova) 強調了蘇聯政府對歷史遺跡與收藏的保護，讚揚紅軍修復了普希金莊園的一座小屋，並將托爾斯泰 (Leo Tolstoy) 的生養之地亞斯納亞·波利亞納 (Yasnaya Polyana) 設為中立區。³⁶ 至於列寧博物館，列奧諾娃稱之為「新俄國奠基人」的紀念遺址，她寫道，「當參觀者從一個房間步入另一個房間時，彷彿翻開了一本厚重的史書，領略這位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領袖無與倫比的一生。」³⁷ 列寧博物館的確堪稱一部教科書，館中各個房間與斯大林《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的章節一一對應。³⁸ 最後，正如王冶秋在文章中所言，蘇聯革命博物館一直延伸至今日世界。借列奧諾娃的原話，博物

34 Hung, *Mao's New World*, 11–13, 21.

35 例如 1957 年，為慶祝十月革命，《文物參考資料》出版了幾期關於蘇聯博物館的特刊。同年，於 1955 年出版的《蘇聯博物館學基礎》(文物出版社，1957) 在中國翻譯付梓。

36 Olga Leonova, *Museums of the U.S.S.R.*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39), 5.

37 同上註，頁 8。

38 Marien van der Heijden, ed., *Museums in Revolution: Four Historical Museums in Moscow* (Stichting beheer IISG, 1998), 9. 參見 Joseph Stalin,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s): Short Course*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9)。

館最後一部分「專門介紹社會主義建設……這裏的展品向參觀者生動地展示了社會主義工業、集體農業和教育的進步」。³⁹ 借鑒蘇聯的展覽文化，中國博物館也被塑造成一部活生生的教科書。正如列寧博物館與斯大林的《黨史簡明教程》相呼應，中國革命博物館也沿用了毛澤東在1940年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的歷史分期。⁴⁰

儘管上海的中共一大會址將效法權威的北京革命博物館，但上海的一大會址並不是一塊等待被寫成活教科書的白板。它既是紀念遺址，也是博物館，作為革命文物的會議廳則是它的核心。一大會址的規劃幾經變遷。1951年10月，上海市委提出的最初計劃是建立一座革命歷史博物館，下設三個分館：會址展出黨史和毛澤東著作、《新青年》編輯部展示工人運動的歷史、博文女校則展示毛澤東的私人物品。⁴¹ 1952年1月，上海市文化局正式成立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籌備處，並於5月開始修繕。三年後，紀念館籌委會開始起草方案，計劃創建一座全新的博物館。1956年，籌委會向文化部提交了一份方案，提議在一大會址周圍建造一個巨大的建築群，其中包括一座博物館和一座花園。⁴² 據陳沛存口述，1959年，籌委會發出了徵集革命文物的號召，半年內就收集到文物兩萬多件。這一博物館建築群的計劃還在一次全國會議中詳加討論（建築歷史學家梁思成也曾與會），並得到了上海市委的批准。建築材料已經運到工地，不料卻因大躍進及其後的緊縮政策而被迫停工。⁴³ 中共一大會址的相關展覽仍在原有建築中進行，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的計劃卻最終落空，只在今天的新天地留下了些許印跡。

39 Leonova, *Museums of the U.S.S.R.*, 14–15. 參見 Verlagsgenossenschaft Ausländischer Arbeiter in der UdSSR, *Guide to the City of Moscow: A Handbook for Tourists, with Information on the City's Past, Present & Future; Descriptions of Its Museums and Points of Interest* (Co-operative Publishing Society of Foreign Workers in the U.S.S.R., 1937), 97–102.

40 Hung, *Mao's New World*, 119–122.

41 陳沛存、任銳，〈建館四十年之回顧〉，頁237。

42 同上註，頁238。

43 段煉等編，《往事與記憶》，頁57。

儘管失去了興建博物館建築群的資金，中共一大會址的工作人員仍鍥而不捨，繼續在會址舉辦現場展覽以及巡迴展覽。每逢節假日，博物館工作人員都會到文化宮、學校和街道居委會進行圖片展。他們確認了數十處其他革命遺址，並收集了各處遺址的歷史資料。中共一大會址還設計了許多研究項目，題目諸如「工人階級的成長」、「馬列主義的傳播」、「五四運動」、「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文化革命運動」等等。⁴⁴反過來，這些項目繼而又成為上海博物館、青少年宮和上海工人宮的展覽。⁴⁵借用科洛斯科瓦 (T. G. Koloskova) 對蘇聯博物館的描述，中共一大會址「被視為一種『新的紀念遺址』，它不是被動存放逝去記憶的儲藏室，而是無產階級文化的積極傳播者」，中共一大會址不僅僅是一座修復的建築或一批收藏的文物，⁴⁶它更是積極傳播黨史與革命史的宣傳機構。

在中共一大會址，參觀路線由會議室開始，接著是三間補充陳列室，最後是供討論、留言的接待處。⁴⁷正式的黨史部分則按時間順序展開，並以牆上或玻璃櫃中的圖片、照片與文件副本為輔。按照標準的歷史分期，展覽從鴉片戰爭、太平天國和辛亥革命開始，隨後重點介紹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⁴⁸展覽劃分為三部分，標題皆取自毛澤東語錄：「工人階級的成長」、「馬列主義的傳播」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⁴⁹此外，上海的地方歷史也盡可能融入宏大的國家敘事之中。例如，策展人精心展示出上海人民反對公共租界的會審公堂，以及上海工

44 陳沛存、任銳，〈建館四十年之回顧〉，頁241。

45 同上註，頁253。這類展覽有「列寧生平事跡展覽會」、「紀念五四運動35週年圖片展」、「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展覽」等。

46 T. G. Koloskova, "Central Museum of V. I. Lenin," in *Museums in Revolution: Four Historical Museums in Moscow*, ed. Marien van de Heijden (Stichting beheer IISG, 1998), 36.

47 上海市檔案館B172-5-240，頁20。

48 上海市檔案館B1-2-770，頁4；上海市檔案館B172-5-521，頁17。

49 上海市檔案館B172-5-240，頁5-9。

人參加五四愛國運動的情景。⁵⁰然而，儘管標題直白了當，更有〈新民主主義論〉作為指導文本，構建黨史敘事仍然困難重重。前有三年自然災害和大饑荒時期（1959–1961）對革命敘事的方向構成挑戰，後有中蘇分裂（1960）動搖了蘇聯的領導地位，而當代對理論與實踐的爭論更讓策展人深感不安。隨著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日益高漲，該如何遵循毛澤東思想的「紅線」？在此氛圍下，中共一大會址遠不只是一部黨史的活教材，它還需講述一個以建黨為偉大轉折、以毛澤東為中心的黨史故事。

講述革命與政治「紅線」

關於十月革命，歷史學家柯爾尼認為，講述十月革命「不是**描述**事件，而是**論證**對事件的特定表述」。作為蘇聯建國的基礎，十月革命的歷史必須統一、確定。有關十月革命的展覽與博物館則以直觀而形象的形式，為人們提供了對革命和黨的「正確認識」。⁵¹據鄧騰克和洪長泰對中國革命博物館的研究所示，其敘事也是對毛澤東之政治「紅線」的論證，利用他對歷史和政治的詮釋，編織出一個權威、一致的展覽。然而，儘管「紅線」被奉為指導原則，應如何遵循卻沒有明確的定義。⁵²一大會址作為核心的革命文物，同時兼具紀念豐碑、歷史遺址與博物館的性質，又該如何處之？

學者李克曼（Pierre Ryckmans）曾在文革期間參觀中共一大會址，他觀察到了一大會址工作人員所面臨的困境。雖然關於外賓的檔案紀錄通常只是客套一番，中國媒體也只報道外國友人的熱情洋溢，但李克曼卻體驗到了一座充斥著混亂與矛盾的荒誕博物館。在回憶錄中，他描述了尚有爭議的事實如何被權威掩飾，他看到會議室裏擺放了12把椅子，

50 上海市檔案館 B172-1-477，頁 72–75。

51 Corney, *Telling October*, 8–11, 111, 116–118.

52 Denton, *Exhibiting the Past*, 55; Hung, *Mao's New World*, 119–122.

並被告知中共一大於1921年7月1日召開。至於外國與會者、後來的叛黨分子以及一大的實際決議，諸如此類的不安要素則均被略去。李克曼認為，這場展覽是由博物館工作人員「從各種相互矛盾的事件敘述中自行揀選」而成。在他的描述中，嚮導與館長彷彿如傻瓜，嚮導的無知令本就簡短的講解顯得單薄膚淺，而不善言談的館長連一本關於黨史的書籍也無法推薦。⁵³然而，檔案證據表明，一大會址的工作人員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一清二楚。在博物館的幕後，工作人員對矛盾之處心知肚明，經常故意閃爍其辭，要麼奉命佯裝無知，要麼對某些問題答非所問。在革命歷史的「紅線」敘事之下，隱藏著不確定、矛盾與令人難安的真相。

在中共一大會址，革命歷史的敘述以兩類文本為載體，一是牆上的實體文本，另一個是講解員的口頭講稿。實體文本包括講解文字、插圖與圖片說明——儼如一部歷史教科書。在引導遊客參觀會址時，講解員則會背誦口述稿，一份針對中國遊客，另一份專為外賓而備。另有第三個文本，用以補充講解員的口述稿：一份問題清單以及經過認可的標準答案。這三個文本及其修訂版本揭示出詮釋、遵循「紅線」之難。1960年8月，一大會址的工作人員撰寫了一份報告，標明他們已仔細研究北京中國革命博物館的「紅線」，其政策可概括為：運用毛澤東對革命的分析來構架展覽的內容，強調毛澤東在黨的活動中的作用，並引用毛澤東著作以突出其思想的影響。⁵⁴

為強調毛澤東在革命中的作用，「紅線」著重行動、思想與領導。一大會址工作人員的報告指出，在建黨之初，毛澤東代表了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正確方向。為了突出毛澤東的思想和行動，博物館工作人員將毛澤東的革命活動貫穿始終，以毛澤東的分析詮釋五四運動，並強調他在組織湖南工人運動中的重要作用。展覽則突出展示毛澤東的著作，以表明相對於中共創始人陳獨秀以城市為重心的主張，毛澤

53 Simon Leys, *Chinese Shadows* (Penguin Books, 1974), 90–92.

54 上海市檔案館B172-5-240，頁104。

東提出的培養工人思想覺悟、強調農民運動才是正確的策略。⁵⁵ 中共一大會址原副館長兼黨支部書記任武雄回憶道：「以前，提到中共的締造者，只有毛澤東和李大釗，『文革』期間李大釗也不講了。」⁵⁶ 由此可見，一大會址堅持「紅線」的背景，是如裴宜理所言為了「革命傳統的構建」，而在此之下，地方歷史被改寫以烘托中共最高領導人的資歷形象。⁵⁷ 同時，魏格林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指出，1964和1965年撰寫的歷史文獻越來越以毛澤東為中心。據她的一位黨史知情人回憶：「我們當時怎麼編寫〔黨史〕？學習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時，黨史是一條『紅線』，毛澤東思想是中心，毛主席著作是『基本教材』。」⁵⁸

關於歷史事件，一大會址的工作人員反省道，他們過去的工作只是把各個事件相串聯。但為了遵循「紅線」，每一次農民運動都必須比前一次規模更大，更須表現出某種思想上的突破。他們表示，參觀北京的中國革命博物館令他們收穫良多。在描繪革命歷史時，每個事件都應代表毛澤東思想的特定方面，關鍵的歷史事件與問題也應體現毛澤東的正確決策。報告的後半部分還建議，展覽應根據事件的重要性排序，而不必嚴格按時間順序排列。⁵⁹

在1960年代，遵循「紅線」也是為了明確服務於當前的政治。一大會址的工作人員建議，要做到這一點，可以在展覽中加入適當的引文、

55 同上註，頁98–100。

56 段煉等編，《往事與記憶》，頁65。關於中共一大前的官方與非官方黨史，參見Vera Schwarcz, *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 Conversations with Zhang Shenfu*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97。舒衡哲 (Vera Schwarcz) 主張，「在1979年前，大多黨史研究都從1921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一大開始……〔這〕被視為『真正』黨史的開端。」

57 Perry, *Anyuan*, 153–204.

58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Party Historiography,” in *Using the Past to Serve the Present: Historiography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ed. Jonathan Unger (M. E. Sharpe, 1993), 166, 168.

59 上海市檔案館B172-5-240，頁100–103。

在講解員的口述中提及當前的情況，並在組織內容時暗示當代的政治。例如，策展人在描述統一戰線的歷史時應強調鬥爭；在討論〈新民主主義論〉時應提及持續革命的思想與革命的各個階段，以強調革命仍在進行中；此外，還需引用適當的語錄以服務於「當前的社會主義建設」。⁶⁰ 在1964年改動後的展覽中，工作人員繼續與當代政治保持步調一致，著重強調當時的「反帝反修鬥爭」。除了上海會審公堂和五四遊行的圖片外，一大會址還加入了一份1920年的《中國公報》，其中刊登了列寧宣佈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申明，以延續反對帝國主義的主題。為了強調持續的鬥爭與對修正主義的警惕，一大會址借鑒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做法，加入了李大釗的文章〈問題與主義〉，以證明馬克思理論戰勝了胡適的實用主義。⁶¹ 在文革前的那幾年，一大會址成了當時為數不多的活教材之一。正如陳小眉所述，另一部著名的活教材是1964年的歌舞史詩《東方紅》，它同樣將毛澤東刻畫為中國共產黨的奠基人，並頌揚其「正確路線」是革命勝利的指引。⁶²

中共一大會址展覽也在視覺上展現「紅線」：重要圖片被放大，特定部分用紅色標出，引文也用紅旗裝飾。⁶³ 展覽的視覺效果不斷修改，元素的增刪也反映著當代政治的需要。在1964年改動後的展覽中，多幅圖片遭到替換，其中包括一幅太平天國士兵的圖畫，畫面中一小群士兵背對觀眾，死氣沉沉。取而代之的是一幅天王洪秀全高舉拳頭「領導農民群眾」的新圖畫。在宣傳畫鮮艷的色彩中，農民群眾表情激昂，抬頭挺胸，分足而立，迎著旗幟招展，向洪秀全簇擁集結。⁶⁴ 正如董希文的

60 同上註，頁102。

61 上海市檔案館B172-1-477，頁73。

62 Xiaomei Chen, "Performing the 'Red Classics': From *The East is Red* to *The Road to Revival*," in *Red Legacies in China: Cultural Afterlives of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ed. Jie Li and Enhua Zhang (Asia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2016), 151–183.

63 上海市檔案館B172-5-240，頁103。

64 上海市檔案館B172-1-477，頁79。

《開國大典》曾幾經修改，數次抹除政治失勢的前任領導人，一大會址中被替換的圖像也反映出官方對歷史人物的標準解讀。⁶⁵ 例如，1962年，中宣部駁回了一大會址委託創作的一幅油畫。這幅油畫描繪了中共一大召開的場景，年輕的毛澤東站在畫面中央偏右，揮手而談，與會者圍桌而坐，凝神傾聽；一盞樸素的燈具把光聚焦到毛澤東身上，房間的牆壁上掛著列寧和馬克思的肖像以及7月1日的日曆。對此，宣傳部的王朝聞批評道，一大會址不應把所有與會者畫在其中，不該畫上後來的叛黨分子以及兩個外國人——其中一人後來成了托洛茨基分子，另一人則去向不明。王朝聞果斷表示，關於中共一大，只能描繪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何叔衡和王盡美「談話的場面」。他強調說，刻畫全體與會代表只會產生「副作用」，一旦在報刊或其他媒體上流傳，引發的問題將難以回答。⁶⁶ 為規避這一問題，乾脆不畫任何人物，一大會址在呈現會議室的場景時，正是遵循了這一方法。

為配合展覽中的實體文本，一大會址的工作人員為講解員編寫了兩份文稿。根據第一份文稿，講解員在介紹會議室時將說明，1921年7月1日，12名代表出席召開了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並只具名提及上文所述的幾名代表。接著，講解員將繼續講述，在會議被法租界巡捕打斷後，代表們前往附近的嘉興，在南湖上的一條船上重新召開會議，這一事跡表明黨從成立之初就與反革命勢力進行鬥爭。與會代表們的觀點或

65 Hung, *Mao's New World*, 127–129. 正如洪長泰所述，油畫《開國大典》在1953年首次繪製完成後經歷了多次修改。1954年，董希文抹掉了遭到清洗的高崗；1967年，又去掉了劉少奇；1972年，他的學生製作了一幅摹本，塗掉了林伯渠。這三幅畫都在1978年重新繪製。

66 上海市檔案館A22-1-66，頁36–39。王朝聞警告說，即使只畫這五人也有潛在的危險。檔案記錄沒有說明這幅畫的命運，但以毛澤東位於正中、只描繪五六人的版本曾在報紙和書籍中出現。參見《解放日報》，1977年8月29日，頁2；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編，《上海的光輝革命史跡》（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圖片說明「毛主席在中共一大會議席上」。第二幅畫中還有鄧恩銘。



圖 1.3. 蘇聯與土耳其的和平代表團在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合影，無日期。
上海市檔案館 H1-27-1-56。



圖 1.4. 馬拉維工人運動主席在那玉培、王正規、周良佐和陳華革的陪同下
參觀中共一大會址，無日期。上海市檔案館 C1-2-5169。

「右傾」或「左傾」，前者錯誤地認為黨應該著重鼓勵知識分子學習馬克思主義，後者則錯誤地提倡進行獨立的工人階級鬥爭。對此，講解員將接著說明，相較之下，毛澤東及其支持者主張為無產階級的壯大而鬥爭，並由此發展出黨的正確路線。最後，講解員將告訴參觀者，恢復原貌的會議室正是這一關鍵時刻的革命史跡。⁶⁷

至於李克曼等外賓，則備有另一份文稿。這份講稿更加完整，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歷史背景，不僅列出與會代表們的籍貫，還加入了兩名共產國際與會者的出席情況。不過，這份文稿雖然針對外賓，但同樣堅持政治「紅線」。文稿著重強調毛澤東在湖南的活動，並將會議遭法租界巡捕打斷的經歷詮釋為與敵人鬥爭的嚴峻考驗，而且點明中共一大是中國革命的轉折點。⁶⁸

在這份專為外賓編寫的文稿中，不少篇幅都是關於訪客可能提出的問題以及相應的回答，由此揭示出工作人員如何預判問題，又如何準備答案。一大會址的講解員們皆備有一份問題清單，問題分為三類：會議在誰家舉行、共產國際代表的身分以及未具名的中國代表。由於李漢俊已於1924年退黨，房子的所有權也成了問題。最初，講解員表示房子是從一位代表那裏借來的，後來答案被改為「從一位居民那裏借來的」，最後又被簡化為「不清楚」。共產國際代表的名字——馬林(Maring)和尼科爾斯基(Nikolsky)也經歷了類似的修改過程；起初講解員還會具名提及兩位出席的外國代表，但後來就不再提起。⁶⁹最後，講解員們的結論是，既然大多數外國人已經知道有共產國際代表出席，不妨提及他們

67 上海市檔案館B172-5-240，頁18-19。

68 同上註，頁22-23。

69 馬林是共產國際黨員、荷蘭活動家亨德里克斯·斯內弗利特(Hendricus Sneevliet)的化名。尼科爾斯基則是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特工弗拉基米爾·阿布拉莫維奇·內曼－尼科爾斯基(Vladimir Abramovich Neiman-Nikolsky)。參見Alexander V. Pantsov and Steven I. Levine, *Mao: The Real Story* (Simon & Schuster, 2012), 100-106。

的與會情況；但若問及名字，標準的回答則是「不清楚」。所有問題中最棘手的是那些未具名的中國代表。就如《開國大典》，最早的規範回答僅列舉了上述五位與會代表。講解員還可補充：「現在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有毛澤東同志和董必武同志。」如果訪客繼續追問，是否還有其他在世的與會者，或能否介紹其他與會代表，講解員則有兩種回答可供選擇：「還有李達同志，現在武漢大學的校長，有的代表早已病故，有的後來政治上有變化」，或者答「不清楚」。⁷⁰

中共一大會址的工作人員當然知道一些外賓對於照本宣科的標準答案並不滿意。據講解員稱，雖然有些人沒有追問，但他們「表情不甚愉快」。⁷¹ 儘管講解員擔心避而不答會損害中國與外賓的友誼，畢竟大家都是社會主義陣營的盟友，但他們仍然閃爍其詞。除了避之不談，講解員們還學會了一招轉移話題。如果問到房子的主人是誰，講解員應迅速回答房間是借來的，接著開始講述法租界巡捕的故事，「使外賓注意力換到另一方面」。如果外國遊客繼續追問，講解員則被勒令不得給出任何具體答案。⁷² 關於代表人數的問題，另一個解決辦法是擺放比與會者人數**更多**的椅子。⁷³ 最終，每一個問題的答案都變成了「不清楚」，這並非李克曼所說的混亂或無知，而是精心策劃的變通之法。

在中共一大會址歷史研究的幕後，這些問題與答案、史實與「紅線」的矛盾也同樣存在。陳沛存和任武雄都曾從事研究工作，陳沛存調查歷史遺址，任武雄整理文物藏品，數年來藏品數量已逾十萬件。任武雄尤其對黨史興趣深厚，在他就讀滬江大學和浙江大學期間，他曾成為一名地下黨員。1957年，他申請從上海文化局調到中共一大會址工作。但工作初年恰逢反右運動，任武雄感受到了政治上的制約。他的首個項目

70 上海市檔案館B172-5-240，頁24。

71 同上註。

72 同上註，頁23。

73 面對蘇聯貿易代表團關於只有12把椅子的質疑，一大會址後來放上了16把椅子。同上註，頁15-16。

是在一本介紹上海文化成就的書籍中，撰寫一章關於博物館學的章節，但由於上海文化局被批為「帝王將相部」，只關心故紙堆而罔顧勞動群眾的生活與精神，最終這本書未能獲准出版。在近期的一次口述歷史中，任武雄表明了他的理念：「我一向認為，黨史研究一定要尊重史實。如果時機不成熟，那就先做好史料積累工作，留待以後再進行研究。」⁷⁴ 檔案紀錄顯示，任武雄與同事們的確努力收集資料，追溯原始出處，並認真記錄其研究過程。他們面臨著一個尤其棘手的難題：毛澤東在一大中的實際角色是什麼？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曾嘗試回答這一問題，其過程突顯出在遵循「紅線」與一般歷史工作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個人回憶錄與官方歷史之間的矛盾、回憶錄中的代筆與官方歷史的缺失，以及一大會址研究員與中央檔案機構之間的政治壁壘。

在各類問題中，外國訪客不時會問到：「董必武同志回憶毛主席在中共『一大』當選中央委員；1961年你們做了報道，這事是否確實？」1964年11月，中共一大會址開始尋找答案。當董必武的秘書來參觀時，研究人員就此向他提問。秘書回答道，董必武這麼說不是憑記憶，而是依據中央檔案館的蘇聯文件。但當上海博物館向中央檔案館申請材料時，檔案館的工作人員卻答復說，此事尚未研究清楚，無法得出結論。上海的研究人員仍堅持不懈，前往北京請教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同事，但只得到了與中央檔案館相同的答案。於是，中共一大會址編寫了如下回答：

毛主席當時是湖南小組的領導人，「一大」以後擔任湖南黨的領導工作。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早期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他是黨的正確路線的傑出代表。⁷⁵

74 段煉等編，《往事與記憶》，頁62–63、66。

75 上海市檔案館B172-1-477，頁80。這一回答在1965年2月得到了宣傳部的批准。

與講稿中的諸多答案一樣，講解員給出的統一答復並未能回答問題。儘管研究人員進行了縝密的調查——如採訪、試圖查閱中央檔案、向中國革命博物館尋求幫助，但他們尋求真相的決心仍然倍受挫折。不僅難以獲准查閱檔案，資料來源的可靠性也同樣存疑。一大會址的工作人員終於意識到，那一段在媒體上刊登並被參觀者引用的董必武回憶錄其實並非由董必武親筆所寫。⁷⁶ 在詢問代筆的秘書時，研究人員指出，這本1961年出版的回憶錄與早期的黨史之間存在出入。此外，一大會址的工作人員也沒有最新的黨史可以參考；他們所能夠依據的，要麼是旁人代筆的回憶錄，要麼是已然過時的黨史。資料來源的第二個問題是，有關一大的文件材料數量有限。或許是因為文獻實在少得難堪，又或許是隨著中蘇分裂，蘇聯作為贊助共產黨召開一大的角色成為一處避之不及的細節；無論出於什麼原因，一大會址的研究人員都舉步難行，想要實事求是也有心無力。

事實上，只有最高級別的黨史研究人員——即為中共中央解讀文件撰寫報告的人員才能接觸到中央檔案；低級別的歷史研究員只能查閱宣傳材料。⁷⁷ 但一大會址工作人員不被允許查閱檔案可能另有原因，且比資料來源或蘇聯的問題更為重要。令人不安的沉默隱約暗示，毛澤東在中共一大上的角色沒有渲染中的那樣重要。共產國際檔案中的相關文件（存於中國的中央檔案館）並未提及任何名字，⁷⁸ 亦無任何資料可以證實毛澤東在中共一大上被任命為中央委員。董必武和媒體的錯誤固然尷尬

76 同上註，頁96。

77 Weigelin-Schwiedrzik, “Party Historiography,” 159–160.

78 方德萬 (Hans van de Ven) 解釋道，共產國際的報告稱有三個人被選入書記處，其他公開的資料和黨史都認為這三人分別是陳獨秀（主持書記處工作）、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和李達（負責宣傳工作）。Hans J. van de Ven, *From Friend to Comrade: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0–192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88。共產國際的文件收錄於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中央檔案館編研部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頁323–326。

尬，但更重要的是，此時正當展覽必須嚴守「紅線」以突出最高領袖與毛澤東思想的關鍵時期，關於毛澤東早期政治影響的說法卻出現了前後矛盾之處。實際上，毛澤東並不是中共一大的核心人物，中共一大也不是共產黨歷史上的決定性時刻。正如歷史學家方德萬所述，中國共產黨早期的特點是中央領導薄弱、中央與地方支部存在衝突，以及組織群眾運動的嘗試以失敗告終。1925年，中國共產黨按照列寧主義路線組織起來；1925至1927年，中共成為一個組織集中的群眾性政黨；1925年五卅運動後，中共吸收了大量不同背景的黨員。⁷⁹在中共成立之初，以及貫穿整個第一次統一戰線時期，中國共產黨都服從於國民黨，並受制於共產國際的派系鬥爭。⁸⁰儘管毛澤東將中共建黨稱為「開天闢地的大事變」，但中共一大其實並非「紅線」所要求展現的轉折點。⁸¹

也許，正如一大會址的研究人員知道董必武的回憶錄由人代筆，他們也可能已經猜到，他們被中央檔案館拒之門外，是因為裏面沒有正確答案。儘管任武雄立志收集史料，以待政治風暴平息，但展覽還是必辦不可。因此，策展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處理這些未決之處，希望「進一步的研究」能夠解決問題；與此同時，講解員則告訴參觀者毛澤東是「建黨的代表」，對於真正的問題則避而不答。⁸²在中共一大會址，一個看

79 Van de Ven, *From Friend to Comrade*, 240–241.

80 見 Bruce A. Elleman, *Diplomacy and Deception: The Secret History of Sino-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s, 1917–1927* (M. E. Sharpe, 1997)、*Moscow and the Emergence of Communist Power in China, 1925–30: The Nanchang Uprising and the Birth of the Red Army* (Routledge, 2009)。

81 近期流行的史著仍在用這句1949年的語錄。例如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等編，《毛澤東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頁14。

82 一份改革開放時期的黨校史著表示，「毛澤東雖然不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發起人……但他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為建立中國共產黨作出了它應有的貢獻。」參見華辛，〈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毛澤東在上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頁256。一份近期的史著承認，毛澤東是一大的「普通代表」，當時他還不是什麼大人物，只是一個學

似微不足道的提問反而突顯出毛時代下革命敘述的問題。歷史本應是權威的總敘事。畢竟，共產黨的歷史觀是其合法性與權力的體現。但在博物館的幕後，編寫一套顛撲不破的革命敘事，遠比收集和修復革命遺存更加困難。「紅線」化歷史為神話，在革命不斷的年代，革命敘事也將再次被修正。

文化大革命及其餘波

文革期間，在「紅線」的指導下，中共一大會址儼然成為毛澤東的紀念豐碑。雖然在文革的前三年（1966–1969），一大會址曾一度關閉，三間展覽室的陳列也被移除，但在1969年，一大會址重新開放，訪客人數大增。從1952年至1965年，一大會址共接待約十萬名幹部和外賓；但此時不同以往，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下令向工農兵團體開放，1966年至1976年期間，參觀人數超過四百萬。⁸³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的一幅文革後期宣傳畫（1974）描繪了前往會址瞻仰的參觀者。其中有身著工作服的工人、穿藍色幹部服的男子、一身戎裝的軍人，甚至還有身穿民族服飾的少數民族人士。這一時期，中共一大會址被視為革命聖地朝聖之旅的第一站。與傳統的名勝八景一樣，各革命聖地也都配上詩文，從中共一大會址開始，以北京的天安門廣場為終，囊括了從建黨到建國十週年的十大建築。⁸⁴

習馬列主義的年輕學生，見孟醒，《誰主沉浮：中共一大代表沉浮錄》（人民出版社，2009），頁150–151。

83 上海市檔案館B172-3-127，頁51；上海市檔案館B172-3-221，頁30。1966年，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籌備處更名為一大紀念館，見上海市檔案館B172-3-85，頁2。

84 聶兵、峭岩，〈人民戰士心向党〉，頁2。



圖 1.5. 《瞻仰黨的一大會址》。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74。圖片由上海宣傳畫藝術中心提供。

在文革期間參觀一大會址，「紅線」在街頭就已了然可見。整個街區的外牆都印有「共產黨萬歲！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的字樣。中央的毛澤東畫像讓人想起他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情景，《毛主席語錄》頁填滿了門扉之間的空隙，一路蔓延至鄰近街角的公告欄上。⁸⁵ 據《解放日報》報道，在中共一大會址門外，人們朗誦《毛主席語錄》的聲音不絕於耳。⁸⁶ 會議室裏的解說文字以毛澤東的行動為線索，將毛澤東對革命歷史的詮釋作為引導。伴隨著「毛主席說」或「毛主席教導我們」等文字，毛澤東語錄編織貫穿在文本之中，有時甚至並不署名，這不僅意味著毛

85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編，《上海的光輝革命史跡》，頁1；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上海市文物局編，《中國共產黨早期在上海史跡》，頁14。

86 金大陸，《非常與正常：上海「文革」時期的社會生活》，兩卷本（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頁77。

主席語錄早已眾所周知，而且表明將「紅線」貫徹到極致的做法早已抹去了毛主席語錄、黨的話語和革命敘事之間的一切邊界。與這一時期的其他話語一樣，文革文本最後也以歌頌毛主席萬歲的合唱作結。⁸⁷

如果說這一時期對「紅線」的呈現只是程度上的不同，那麼參觀者的整體體驗則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參觀者聽到的不再是講解員的口述，而是一段精心製作的錄音。錄音不再從鴉片戰爭開始講述，而是以更後來的十月革命作為開頭。在最後幾段中，錄音還談及了當下的形勢。此前，與北京的中國革命博物館一樣，中共一大會址的展覽也避開了社會主義時期，但在這一時期，錄音在結尾處對毛澤東在黨內的所有敵人一一抨擊，批評對象不僅有陳獨秀，也包括彭德懷、劉少奇等近期的反對分子。

檔案備忘錄表明，錄音經常更新；儘管林彪曾在敘述中舉足輕重，但隨著他的失勢，他被迅速列入機會主義者的名單中，一大會址還組織了一場特別展覽列舉林彪的種種罪行。⁸⁸ 由此可見，中共一大會址的敘述文本從革命教科書演變成了政治抨擊。這類隨政局而變的文本更新並不局限於錄音的最後幾段；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毛澤東的建黨功績又加上了反對孔孟一條。⁸⁹ 借助錄音這一媒介，一大會址掌握了一種切合政治動蕩時代的技術：人們可以迅速錄製一盤新磁帶，再沒有講解員會因說錯話而受到指責，也不再有參觀者提出任何問題。⁹⁰

除了恢復原貌的會議室外，其他展覽室一直處於關閉狀態。數年來，一大會址的領導層多次提議舉辦新展，但當時的上海市委領導張春

87 上海市檔案館B17-3-85，頁35-39。

88 同上註，頁34、38-39；上海市檔案館B172-3-127，頁7。林彪的早期畫像，參見上海市檔案館B244-3-143，頁19。

89 上海市檔案館B172-3-127，頁29。

90 外賓仍由專人接待，會址給講解員提供了一份詳實的正確答案清單，其中解釋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修正主義的含義、劉少奇所犯罪行的性質等等。上海市檔案館B244-3-143，頁22-30。

橋和姚文元以政治敏感為由拒絕了這些請求。⁹¹ 與此同時，隨著文化大革命的展開，中共一大會址繼續收集革命文物。一大會址與上海博物館一起合作，收藏了許多文革時期的文物，從文獻證據到殘存物件，甚至還有安亭事件中的上海工人用來給妻子寫便條的香煙盒。⁹² 可見，他們始終抱持著建立一座革命歷史博物館的想法，並持續補充藏品。正如任武雄的回憶，即使解讀歷史、展示歷史的時機尚未成熟，研究人員仍在堅定不移地收集藏品。⁹³

為順應文革的論調，中共一大會址利用出版物和巡迴展覽將革命文物帶到了群眾身邊。例如，上海人民出版社面向青少年讀者，出版了一本書，題為《看革命文物，學革命傳統》。書中充滿了關於革命文物的故事，不僅有湖南農民協會的印章，還有革命烈士的個人物品；這一體裁深受讀者歡迎，同名的圖書系列也相繼出版。⁹⁴ 在博物館之外，一大會址的講解員們還前往上海博物館、上海青年宮、浦東工人文化宮等地舉辦巡迴展覽，在1975至1976年的八個月間，參觀人數約達36萬。並非所有參觀者都來自團體組織；在上海青年宮某日的四千名參觀者中，有一千人是個人參觀者。⁹⁵ 在農村，中共一大會址組織了小型流動展覽，前往郊區工廠和農村公社，讓成千上萬無法來到上海的人們也有機

91 上海市檔案館B172-3-127，頁41。

92 來自2013年7月2日與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學家金大陸的訪談。《史林》曾刊登一張徵集小組的公章照片，見第136期（2012），頁31。有關此類活動的報道，參見上海市檔案館B172-3-176。1966年11月10日，安亭事件在上海爆發，當時一列載有工人造反派的火車企圖前往北京面見中央領導，但被國務院下令攔截，參見Elizabeth J. Perry and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estview Press, 1997), 34–36。

93 段煉等編，《往事與記憶》，頁66。

94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址紀念館編，《看革命文物，學革命傳統》（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這套叢書由地方宣傳部門或黨史辦公室所編寫，當中包括安源工人運動和淮海戰役等主題。

95 上海市檔案館B172-3-221，頁25、31。

會看到展覽。⁹⁶ 官方報道表示參觀者反響熱烈，此言雖不可盡信，但在博物館之外，講解員似乎確實可以更自由地與參觀者交流。例如，在周恩來逝世後的幾週內，上海人民不顧官方禁令，紛紛在手臂纏上黑紗，以示對總理的哀悼；參觀者也要求一大會址展出周總理生前的照片。經上海市文化局批准，會址展出了八張照片，短暫許可了群眾紀念自己歷史的權利。⁹⁷

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中共一大會址肩負了兩個新角色：悼念之地與政治糾偏之所。在此雙重屬性之下，參觀者們表達了他們對毛澤東和黨的忠誠。在毛澤東逝世後的幾天裏，人們紛紛前往上海哀悼瞻仰。⁹⁸ 在毛澤東逝世一週年之際，全國與地方報紙都報道了中共一大會址，重申這裏是偉大的舵手親自升起第一面紅旗的地方，是黨誕生的神聖之地。⁹⁹ 媒體的報道還加入了模範瞻仰者的感言，其中有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的姐妹、前往新疆的學生以及準備聽命的士兵，他們紛紛立志承擔責任，犧牲奉獻。報紙對外國訪客的描述與其對國內瞻仰者的描述如出一轍，稱他們不辭辛苦特地前來參觀，謄抄牆上的毛主席語錄，並在留言簿上留下「中國乃世界革命堡壘」的誇張評論。¹⁰⁰

在後毛時代的初期，中共一大會址在繼續肯定毛澤東和建黨記憶的同時，也成為糾正文革錯誤的舞台。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將工作受阻歸咎

96 同上註，頁30–38。

97 同上註，頁2–3。關於纏黑紗，參見John Kamm, “Shanghaied at the Feather and Down Minifair,” in *My First Trip to China: Scholars, Diplomats, and Journalists Reflect on their First Encounters with China*, ed. Kin-ming Liu (East Slope Publishing Limited, 2012), 220–227。

98 王金友，〈懷念毛主席，堅持學大寨〉，《浙江日報》，1976年9月21日，頁3。

99 〈紅旗舉處展徵程〉，《解放日報》，1977年8月29日，頁2；〈光輝旗幟指徵程〉，《文匯報》，1977年9月7日，頁2。

100 〈毛主席的光輝照寰宇〉，《解放日報》，1977年10月18日，頁3。文化大革命強調中國是世界革命的典範，關於這一點的詳細討論，參見Zachary A. Scarlett, “China After the Sino-Soviet Split: Maoist Politics, Global Narratives, an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World,” (PhD diss.,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2013)。

於四人幫，同時讚揚周恩來對革命文物展覽的推動。參觀者也利用一大會址完成自我平反，正如《解放日報》中所描述的一個事例：文革期間遭到關押的退伍軍人、前公安官員黃赤波在出獄後趕到黨的一大會址，他注視著會議室裏的椅子和茶具，對講解員說道：「這裏是毛主席締造黨的地方，一定要保護好啊！」¹⁰¹ 黨的一大會址代表了黨和黨的起源，保護會址則象徵著重新恢復涵蓋黃個人歷史的文革前革命敘事。就其物質性而言，一大會址是宗教意義上的遺跡聖物。

1980年，中共一大會址在翻新後舉辦了一場新展，對與會者名單進行了更加徹底的修正。雖然毛澤東仍被列為出席的第一人，但全部13位與會者的名字都赫然在列。¹⁰² 黨的創始人李大釗和陳獨秀的照片和文章也都被展出。在文革時期的錄音中備受污蔑的劉少奇也出現在有關勞工組織活動的展覽部分，並被描繪成領導安源罷工的領袖。博物館工作人員強調對史料的運用，特別是與會者的回憶錄和文章，並著重表示要有「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為此，他們在顯著位置展出了一大會議通過的文件，而這些文件正是1964年博物館工作人員未能獲准查閱的材料。¹⁰³ 魯迅紀念館的前館長姚慶雄今天回憶起這段時期，講述了一大會址拆除內牆上毛主席語錄的情形：「你可以讀〔那些標語〕，也可以把它們寫進解說詞，但你怎麼能把它們放到展室裏呢？你怎麼能說人們沒有參加呢？這與歷史不符！」¹⁰⁴

101 《解放日報》，1977年8月29日，頁2。

102 參見董庭芝、章祖蓉，〈關於中共「一大」代表人數的幾種說法〉，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編，《黨史研究資料：第一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頁157–162。

103 〈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調整陳列內容〉，《文匯報》，1980年7月1日，頁1。

104 來自2013年7月25日與姚慶雄的訪談。1955年，姚慶雄服完兵役後進入魯迅紀念館工作，曾任黨委副書記，並以館長身分退休。1982年，他開始在上海市文化局工作，並擔任上海歷史博物館臨時館長。他還記得文革期間，魯迅紀念館的牆壁都被塗成了紅色。1973年，他找到周總理的夫人鄧穎超，詢問如何處理展覽中的問題人物。他表示，後來人們的膽子逐漸變大，慢慢開始調整展覽。

新的展覽反映了歷史研究態度的普遍轉變。1979年，北京中國革命博物館的策展人表示，「反映歷史事實的文物、資料、照片，都不能任意修改」。¹⁰⁵ 他們以安源工人運動的一首歌謠為例，申明歷史不容編造。由此，中國革命博物館推翻了「紅線」的思想。不能從頭到尾按照毛澤東思想編寫黨史，不能將毛澤東思想描繪成一種完全成型的意識形態，也不能用毛澤東語錄代替歷史事件。此外，策展人還表示，不可根據現在來解讀過去，不可誇大個人（包括毛澤東本人）的作用，也不可利用博物館來評判個人的錯誤而罔顧其對歷史的總體貢獻。最後還有一條，不可修改或偽造文物或照片。¹⁰⁶ 至此，中國革命博物館列舉了「紅線」在實踐中的各項特點，摒棄了毛時代博物館學的反面教材。還原革命敘事的歷史真相，意味著重構了黨的政治合法性根基。

小結：紅色旅遊與愛國主義教育

如今，中共一大會址及其陳列已鮮有毛時代的明顯印記。蘇聯風格的敘事和史詩般的宏大油畫已不復存在，文革時期毛澤東語錄的公告牌也悄然消失。展覽文字不再對與會者姓名諱莫如深，策展人也無需再從會議室搬走椅子。館長倪興祥曾在2009年撰文批評會址長期以來對實物藏品的忽視。一大會址最近對常設展覽的擴充，遵循了全球博物館學的最新趨勢，「以實物表現歷史」。倪館長表示，紀念館的職責是利用情境和最新技術，「讓觀眾貼近文物，拉近文物與觀眾的距離，讓觀眾與文物進行面對面的對話和交流」。¹⁰⁷ 「以物言史」的原則改變了毛時代

105 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陳列部，〈黨史陳列的幾個問題〉，《黨史研究資料》，第6期（1979），頁123。

106 同上，頁122-129。

107 倪興祥，〈貫徹「以物代史」陳列指導思想的體會〉，《中國博物館通訊》，第9期（2000），頁6-8。

的要旨，今天的一大會址展覽不再將文物作為革命敘事的道具，而是以文物本身為中心。

但這並不意味著革命歷史展覽失去了其意識形態的屬性。正如毛澤東時代將一大會址定為上海首要革命遺址（並作為革命聖地朝聖之旅，亦即解放軍的革命教育路線首站），如今這一紀念地已成為改革開放時期兩大現象的中心：紅色旅遊產業與愛國主義教育。鄧騰克認為，紅色旅遊既是一項自上而下的計劃，也是一項由地方發起、利用革命遺址推動旅遊業的項目。¹⁰⁸ 根據紅色旅遊的五年計劃（2005–2010），作為「愛國主義教育」運動的一部分，紅色旅遊不僅要增進人民對國家的熱愛，還要激發人民對領導國家的黨的熱愛。天安門學生運動一年後，江澤民在北京的中國革命博物館指出，年輕人不了解歷史，博物館的任務是「加強愛國主義教育、愛國主義精神和社會主義教育」，¹⁰⁹ 政治宣教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1997年，中共一大會址被評為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如今會址的工作人員仍將青少年教育作為其中心任務。¹¹⁰

建築歷史學家梁允翔認為，現在中共一大會址的意識形態是一種「霸權結構」，其最初的革命含義——地下、反叛、激進已不復存在。梁允翔表示，如今這段革命歷史顯得格格不入，附近的居民區被拆毀，新天地娛樂購物中心拔地而起，革命的歷史也隨之埋葬。在他看來，一大會址與新天地是「一個虛假的留存和虛假的革命」，其中的政治革命與消費革命都並不真實。¹¹¹ 梁允翔的分析突出了社會主義中國展覽文化的兩大模式之一——當權國家的展覽模式，而非革命運動的展覽模

108 Denton, *Exhibiting the Past*, 219–225.

109 〈江澤民同志參觀「中國革命史陳列」結束時的講話〉，《黨史研究資料》，第9期（1990），頁2–3。注意「革命傳統」並不在博物館的重點任務之列。

110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上海市文物局編，《中國共產黨早期在上海史跡》，頁15；2007年6月13日與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展覽副主任信洪林的訪談。

111 Samuel Y. Liang, “Amnesiac Monument, Nostalgic Fashion: Shanghai’s New Heaven and Earth,” *Wasafiri* 23, no. 3 (2008): 47–55.

式。自一大會址創建以來，其陳列就一直以當權國家的模式為主，創造出一種符合政治合法性的黨史敘事。但這種敘事仍是革命的敘事，革命的真實性仍具有力量。

展出的實物仍被歸類為革命文物。這些展品有時被簡稱為文物，也有策展人更傾向於使用「近現代文物」這一更加科學的稱謂，但正是文物與革命的關聯，才使其具有保存的價值。¹¹² 今天，隨著「以物言史」成為展覽文化的指導思想，真實性對於正當性而言愈發重要。正如倪館長所言，如果展覽不能明確革命文物的真實性和來源，那麼「這些革命文物就不可能真正打動觀眾的心，觀眾對這些革命文物的真實性就產生懷疑，就會嚴重影響革命紀念館的文物品位和社會地位，直至影響革命紀念館社會效益的發揮」。¹¹³ 如果文物不真實，革命也就不真實。

黨史研究繼續影響著中共一大會址的展覽方式。雖然常設展覽以實物為主，但仍按單元組織，例如「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馬列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劃時代的偉大事件」。¹¹⁴ 毛澤東的身影也依然顯著。儘管展覽的講解文字將中共一大的召開日期更正為1921年7月23日，但建黨紀念日仍舊定為毛時代的7月1日——這背後反映了黨

112 2007年6月13日與信洪林的訪談。

113 倪興祥，〈貫徹「以物代史」陳列指導思想的體會〉，頁7。無獨有偶，舒喜樂也記錄了人們對真實性的關注。例如，1950年代的一位講解員以北京人化石是複製品為由猛烈抨擊帝國主義。更近期一點的例子是，由於地方博物館的化石原件被送到北京展覽，無法在當地展出，地方博物館對此表示不滿。參見Sigrid Schmalzer, *The People's Peking Man: Popular Science and Human Ident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102, 185。

114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紀念館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頁27、63、91。

對歷史的遺忘。¹¹⁵ 會議室裏陳列著真人大小的蠟像模型，其中毛澤東仍立於中央，在燈光的照耀下抬起右手。¹¹⁶

儘管七一建黨日未採納外界建議作出調整，但中共一大會址在許多方面都已擺脫了展覽革命的困境。不同於北京的中國革命博物館（2003年更名為中國國家博物館），一大會址從未展示過更長的革命軌跡，也無需為展示毛時代的悲劇而苦惱。中國國家博物館迴避了政治敏感的歷史，而一大會址的存在也僅僅是為了展示建黨當時的願景，而非未來。¹¹⁷ 在上海的另一處，新中國的故事又在另一場毛時代的展覽中上演。在第二章，我們將參觀另一處被定為革命文物的舊址。在蕃瓜弄的工人新村，借助於「舊社會」與「新社會」的素材，新中國的人民將親口講述一個變革的故事。

115 Ye Sang, *China Candid: The People on the People's Republic*, ed. Geremie R. Barmé and Miriam La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7. 1980年，一份宣傳通訊報的文章告知廣大讀者，中共一大的日期確定為7月23日至31日，因此應在7月23日慶祝黨的誕生日。但在最終決定之前，報紙仍應沿用以前的提法。參見〈關於黨的誕生日的公開宣傳〉，中共中央宣傳部編，《宣傳動態（選編）：1980》（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頁291–292。

116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紀念館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頁100–101。

117 Denton, *Exhibiting the Past*, 73.

第2章

展示新中國 蕃瓜弄今昔展覽會

1963年11月，一個薄霧瀰漫的早晨，費利克斯·比達·羅德里格斯（Félix Pita Rodríguez）與王蘭花並肩而行，在外人看來這對組合一定相當奇特。彼時，這位54歲的古巴詩人正在中國進行友好訪問，上海是其中一站，他的穿著與其中文譯作中的照片一樣——身著西裝，打著領帶，翻領以花飾點綴。他鼻樑高挺，頭髮後梳，與古巴作家和藝術家聯盟協會副主席的身分十分合襯；羅德里格斯之於古巴文學界，相當於沈之瑜在上海博物館的地位。¹ 王蘭花比羅德里格斯小七歲，是蕃瓜弄的居委會主任，也是他的嚮導。她身高一米七二，在同代中國婦女中算是高個子，她可能身穿專為特殊場合準備的衣服——棉大衣、黑褲子和布鞋，一頭短髮以兩根長髮夾固定。² 後來，羅德里格斯寫道，他受中

-
- 1 費利克斯·比達·羅德里格斯著、趙金平譯，《中國人民的手》（作家出版社，1964）。隨書附贈的書籤上有羅德里格斯的簡介與照片。感謝喬治·勒丁（George Ledin, Jr.）幫忙找到這首詩。
 - 2 Wing-Chung Ho, *The Transition Study of Postsocialist China: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a Model Community* (World Scientific, 2010), 89. 感謝何榮宗對蕃瓜弄社區的民族志研究。王蘭花是他的受訪者之一，他稱之為Q女士。2012年，我透過電話聯繫到了王女士的女兒，可惜那時王女士已95歲高齡，已經失聰，無法接受訪問。對於已經出版和公開資料中的人名，我都具名列出，但對於直接的受訪者則僅描述其年齡和職業。關於大致同一時期的王蘭花照片，參見Ho, *The Transition Study of Postsocialist China* 的圖2.8。

國「革命詩歌」的吸引而來，在上海之行中，他在蕃瓜弄與王蘭花的身上找到了他所尋覓的詩句。³

羅德里格斯曾為上海寫過一首詩，歌頌上海工廠向未來奮進，並紀念魯迅之不朽。如今他再次提筆，描繪過去的棚戶區如何為現代的公寓樓所取代，並記錄下無名敘述者的故事。他寫道，「在蕃瓜弄，我看見中國人民把舊日留下的一個角落埋葬。」一位「有著莊嚴、純潔面孔……像一尊石雕像」的婦女講述了過去在棚屋中的飢餓與貧苦，以及工人新村的新生活。作為當地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她訴說了自己以前在棚戶區乞討的苦難經歷，但也將目光投向了未來。羅德里格斯在詩歌結尾處將這位擁有「鋼鐵意志」的婦女比作她的祖國，「用自己的力量／把舊日葬埋／把新中國建設起來」。⁴ 不論在生活中抑或在詩中，王蘭花都是蕃瓜弄的縮影，而蕃瓜弄的人民又恰是中國工人階級的代表。⁵

1965年的一本故事書向讀者介紹說，要去蕃瓜弄，首先坐火車到閘北區的上海北站，然後沿天目路向東走，在天橋旁便會看到「有一幢幢、一排排陽光充足、整齊美觀的五層樓公寓式的住宅。在住宅前的花園周圍，一些沐浴在陽光下的兒童們，有的在跳橡皮筋，有的坐在老爺爺的周圍在聽講革命故事」。⁶ 蕃瓜弄之所以成為古巴詩人行程中的一站以及故事書中的專題之一，皆是出於同一個原因：蕃瓜弄從聲名狼藉的貧民窟到工人新村的蛻化，體現了工人生活在物質上的巨變。在羅德里格斯訪華前幾個月，蕃瓜弄的建設就已開始，最終建成了近兩千戶的社

3 費利克斯·比達·羅德里格斯著、趙金平譯，《中國人民的手》，頁1-3。

4 同上註，頁15-17。這兩首詩也轉載於《解放日報》，1963年11月13日，頁4。1963年11月26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羅德里格斯夫婦；會面期間，毛澤東與羅德里格斯討論了魯迅和他的詩歌。參見廣西壯族自治區檔案館X1-33-125，頁114-119。

5 雖然詩中並未明述這位女士的名字，但無疑她就是王蘭花。根據1998年的地方志，蕃瓜弄只有她具有如此地位。參見郭天成等編，《閘北區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頁725-729、1292。

6 靳邊，〈蕃瓜弄的今昔〉，上海人民出版社編，《上海的故事》，第四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頁61。



圖 2.1. 徐耀，《春滿蕃瓜弄》。上海教育出版社，1974年5月。圖片說明：「解放後，蕃瓜弄的勞動人民翻身作了主人，在黨的關懷下，搬進了明亮寬敞的新工房。」作者個人收藏的文宣材料。

區。蕃瓜弄配備了水、電、煤氣等設施，還包括幼兒園、小學、書店和食品店，它是展示上海的窗口，也是向外國遊客開放參觀的兩個社區之一。⁷ 圖2.1的蕃瓜弄鳥瞰圖是幼兒園教室裏的掛畫，象徵著新中國建國後的「新社會」。事實上，在毛時代的中國，作為新舊轉折點的1949年已被寫入日常用語中。賀蕭指出，使用「解放」一詞以及「解放前」和「解放後」等時間框架，則「意味著按照個人與集體的解放進步敘事組織自己的記憶」。⁸

7 馮梅春，〈蕃瓜弄的變遷〉，政協上海市閘北區委員會、政協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上海文史資料選輯：閘北卷》（上海政協文史資料編輯部，2004），頁239–242；郭天成等編，《閘北區志》，頁282。另一個向外國人開放的是位於普陀區的曹楊新村。1957年，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走訪了一處棚戶區，並由此開始撰寫關於上海的研究作品。見 Marie-Claire Bergère, *Shanghai: China's Gateway to Modernity*, trans. Janet Lloy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

8 Hershatter, *The Gender of Memory*, 25. 此處我將「解放」視作一種行為主體的類型（actor's category）。

與王蘭花一樣，講故事的老爺爺肯定會說，要理解蕃瓜弄裏「新社會」的生活，必須結合1949年前「舊社會」的背景。儘管閘北區在晚清及民國初期曾繁榮一時，但經歷了戰爭的炮轟與大火，此地被夷為一片焦土，1945年後，內戰難民大量湧入。⁹ 革命前夕，蕃瓜弄有三四千棚戶，居住著16,000多人，他們的生活充滿苦難與貧乏，今天的地方誌仍將其描述為名副其實的人間地獄。¹⁰ 1966年，閘北區人民委員會和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保留了18間草棚簡屋，在此背景下，老爺爺的「革命故事」方才顯得切實具體。¹¹ 為了突出新社會，舊社會化身為展示的對象。

在許多方面，蕃瓜弄都儼然是一場展覽。首先，蕃瓜弄社區鮮活地展現了上海的過去和現在。甚至在改造開始之前，這裏就接待了許多像羅德里格斯這樣的外國來賓。以1937年出版的《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而聞名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於1960年回訪中國，那時他來到蕃瓜弄，特別要求參觀閘北區的「窩棚森林」。在他的印象中，這裏比墨西哥城的貧民窟更加糟糕，與香港的九龍城寨不相上下。雖然斯諾來訪時新公寓樓還未建成，但他仍然認真記錄下整潔的街道和剩餘房屋的改善情況。他留意到新栽的柳樹、噴泉、衛生站和托兒所，以及「孩子滿臉笑容，不再衣衫襤褸、滿身瘡痍」。王蘭花向斯諾和他的同伴問好，臨走前他還順便參觀了一位老婦人整潔的家。她的三個孫子在做作業，收音機裏正放著音樂，爐子上燉著魚。斯諾後來寫道，除了一台縫紉機，她家什麼都不缺。¹²

9 Christian Henriot, "A Neighbourhood Under Storm: Zhabei and Shanghai Wars," *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9, no. 2 (2010): 292–296; 張笑川, 《近代上海閘北居民社會生活》(上海辭書出版社, 2009), 頁271–273。

10 馮梅春, 〈蕃瓜弄的變遷〉, 頁240–241。

11 上海市檔案館B3-2-199。

12 Edgar Snow, *Red China Today: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Penguin Books, 1970), 515–516. 斯諾將蕃瓜弄譯作「南瓜鎮」，儘管他沒有點明王蘭花的名字，但這位自稱為「居委會主席」、公事公辦的女士只可能是王蘭花。

改造後，蕃瓜弄仍保留了少數棚屋，以其原貌為展品，繼續喚起繼續喚起人們對過去的記憶。據報紙報道，保留18間棚屋的提議來自王蘭花，她主張利用棚戶教育下一代。¹³ 1977年12月，這些棚屋被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指定為革命文物。據地方誌記載，1979至1985年，來自68個國家（及港、澳、台地區）的628批團體、共計7,353人參觀了蕃瓜弄；1990至1993年，55個學校團體、共計15,122人到訪。¹⁴ 在蕃瓜弄參觀時，新舊社會的對照被居民們演繹得生動鮮活，他們不僅充當導遊、講述自己的故事，還與過去的老物件一起供人拍照，比如一位老人就和他破舊的人力車一起合影。¹⁵

除了這場活展覽，蕃瓜弄還在上海的歷史展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65年上海階級教育展覽中一個展區的立體模型就是蕃瓜弄。¹⁶ 文革前夕，閘北工人文化宮推出了題為「蕃瓜弄今昔展覽會」的獨立特展，充分展示蕃瓜弄社區的蛻變。正如1951年《街道里弄居民生活手冊》的建議，策展人採用了並列的方法，「使得舊的更顯得醜惡，新的好的更顯得可愛」。¹⁷ 蕃瓜弄今昔展覽會的導言宣稱，這種對比將激發人們的階級意識。¹⁸

13 王蘭花，〈遷新居，感黨恩〉，《文匯報》，1964年7月17日，頁2。我找到的唯一一條更早的提議來自一篇文章，該文章指出，廣東海陵島的幹部保留了一間漁民的棚屋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上海的幹部也效仿了這一做法。梅原，〈拆遷志喜〉，《人民日報》，1963年10月20日，頁6。

14 郭天成等編，《閘北區志》，頁1293。儘管這些統計數據並不完整，但它們有助補足傳聞消息。據傳聞，文化大革命期間學生和工人常常來訪，有時達到每週到訪三到五次；改革時期，也有組織的學校團體和外賓前來參觀蕃瓜弄。參見<http://wenda.google.com.hk/wenda/thread?tid=509bcae11597983b>，訪問於2014年2月16日。

15 在閘北區檔案館的一張照片中，一位老人在棚屋與他的人力車合影。我未能獲准複印引文，但文件在ZJ-30-E0##範圍內。

16 上海市檔案館B3-2-199，頁25。

17 《街道里弄居民生活手冊》，頁42-43。

18 上海市檔案館B3-2-199，頁22。

本章將探討這些互相交織的蕃瓜弄展覽。與中共一大會址一樣，支撐著蕃瓜弄敘事的是報紙、兒童讀物和學校課程中的故事，乃至上海講故事運動中的講稿。¹⁹ 如果說一大會址將建黨作為革命起源的故事來紀念，那麼，蕃瓜弄的革命歷史則是透過棚戶區與工人新村的並置、討飯瓢與勞模證書的對比、以及那些「站起來」的人們的故事來講述的。透過這些展覽，我們可以看到蕃瓜弄的敘事如何被毛時代的政治文化所塑造並為之服務。蕃瓜弄是「翻身」的象徵。此外，本章還將揭示蕃瓜弄展覽如何成為參與式的政治宣傳。蕃瓜弄展覽不僅以實物為載體，以居民故事為特色，這樣的現場展覽還要求人們積極參與，更是「回憶對比」、「憶苦思甜」等階級教育運動的環節之一。參觀者不僅聆聽親歷者講述的革命故事，思考今昔之物，有時甚至還體驗用樹葉、穀糠做成的「憶苦飯」。最後，蕃瓜弄也是一個樣板模範，它在各方面都有其特殊性，但又被作為普遍代表進行展示。在毛時代，蕃瓜弄是上海革命的實物教材，是對未來烏托邦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寫照。

作為敘事的蕃瓜弄

傳說，蕃瓜弄中長出了一個巨大無比的南瓜，不僅形狀如龍，更有莖蔓捲曲似龍鬚，蕃瓜弄因此得名。²⁰ 如今，上海居民對蕃瓜弄的記憶卻來自棚戶區的貧困，他們說，在上海話中蕃瓜弄被稱為「下隻角」，與以前法租界的徐匯區等高檔社區的「上隻角」相對應。雖然從鳥瞰圖

19 〈故事員準備春節進茶館〉，《人民日報》，1965年1月26日，頁6。講稿題為〈蕃瓜弄巨變〉。

20 馮梅春，〈蕃瓜弄的變遷〉，頁240；郭天成等編，《閘北區志》，頁1291；蔡豐明、張麗麗編，《民俗上海：閘北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頁152。何榮宗的一位受訪者表示，南瓜是她的公公種的。參見Ho, *The Transition Study of Postsocialist China*, 235–236。

上可以看到保留下來的各種棚屋頂，但蕃瓜弄卻成為了另一種臨時住房的代名詞——「滾地龍」。這是一種捲成半圓、插入土中的簡易窩棚，上面以草蓆覆蓋，狀似船篷，而蕃瓜弄的許多居民當初正是坐著這類簡易船隻來到上海的。一位1928年生的退休護士表示：「蕃瓜弄就是叫滾地龍，那時候很差很差的。滾地龍都是窮人，社會最底層的。」²¹許多受訪者強調，這種窩棚只及成人胸口高，他們在受訪時往往站起來比劃尺寸，或蹲身演示如何進入窩棚。²²用王蘭花的話說，「滾地龍」是舊中國勞動人民生活的象徵和寫照，正如一首歌謠所唱，在滾地龍裏也難遮風雨。²³蕃瓜弄還有句俗語——「走路一步三鞠躬」，與解放前人民卑躬屈膝的姿態相映照。²⁴但在解放後，滾地龍被拆除，工人們也站直了腰板。1960年，《人民日報》表示，蕃瓜弄是「舊社會」向「新社會」轉變的縮影。²⁵

但蕃瓜弄並非從一開始就是棚戶區。清末民初，閘北區是華人居住、管轄的重要地區，一片欣欣向榮。它與舊城以城牆相隔，東、南面與租界相接，隔蘇州河相望。作為多條鐵路線的終點站，閘北是連接上海與周邊城市的交通樞紐，發展迅速，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輕工業方興未艾，大型工廠相繼落戶。隨著工業發展，人口也相應激增，閘北一時成為上海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之一，吸引了來自周邊省份的商

21 2013年7月6日在上海的採訪。何榮宗的受訪者也常有同感。Ho, *The Transition Study of Postsocialist China*, 57。

22 2013年7月3日在上海的採訪，受訪者為一名鋼琴老師（1959年生於工人之家）；2013年7月5日在上海的採訪，受訪者為以前的一位居民（1948年生）。

23 王蘭花，〈蕃瓜弄裏說巨變〉，《文匯報》，1999年8月22日。關於滾地龍的歌謠這樣寫道：「外面落大雨，裏面就落小雨；外面雨停了，棚裏還滴滴答答地漏個不停」。這首歌謠收錄於靳邊，〈蕃瓜弄的今昔〉，頁62。

24 「蕃瓜弄是陰溝洞，走路三步一鞠躬」，見靳邊，〈蕃瓜弄的今昔〉，頁63。

25 金仲華，〈人民勝利的時代〉，《人民日報》，1960年10月1日，頁8。

人、工人以及來自廣東的外鄉人。²⁶ 1921年，當地的地方誌如此描繪經濟繁榮的景象：「廠肆林立／貨船雲集／水陸交通閘北繁衝之處」。²⁷

然而，令閘北經濟崛起的地理優勢卻在戰時成為了它的致命傷。正如歷史學家安克強 (Christian Henriot) 的記載，在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間，閘北曾三次遭戰火吞噬。戰亂導致居民流離失所，商業毀於一旦，難民人數劇增，安克強稱，閘北平民所遭受的暴行在歐洲聞所未聞。²⁸ 1927年，蔣介石的北伐軍攻佔上海，閘北首次遭到戰爭的破壞，火車站受雙方爭奪，居民區爆發激戰，連連大火導致許多人無家可歸。1932年，日軍對閘北的進攻再次使平民百姓陷入戰火之中。閘北與租界相隔，成為中方與日軍的戰場，也是半數以上日本空軍猛烈轟炸的目標。燃燒彈和中方撤退時引發的大火將房屋和工廠夷為平地，戰後亦未重建修復。1937年，閘北迎來了戰時的最後一擊，三個月的戰亂、轟炸和大火將上海變成一片焦土，95%的建築都變成了廢墟。²⁹ 正是此時，王蘭花和丈夫帶著一床棉被逃難到了上海。在上海，王蘭花撿菜皮充飢，並在滾地龍的泥地上生下了她的第二個孩子。³⁰

正如斯諾的回憶，飽受戰爭蹂躪的上海構成了外國對中國的一種想像。1930年代，蘇聯的新城市馬格尼托哥爾斯克 (Magnitogorsk；又譯「磁山城」) 依鐵礦山而建，被視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典範。這裏有以土屋構成的社區，其中最大的一個叫作「上海」。如斯蒂芬·考特金 (Stephen Kotkin) 所述，上海在「20世紀早期是資本主義城市所有弊病的代名詞：陰暗狹窄的街道上垃圾遍地、城市煤煙瀰漫、人群擠攘、環境髒亂、道德敗壞」。無論是在通俗用語中還是在小說中，土屋、黑暗和落後都代

26 Henriot, "A Neighbourhood Under Storm," 292–296.

27 郭天成等編，《閘北區志》，頁83。

28 Henriot, "A Neighbourhood Under Storm," 318. 安克強認為，「平民直接參與戰爭（情況更甚於歐洲），可能是現代東亞與東南亞戰爭的一個關鍵特徵。」

29 同上註，頁298–315。此文獻對我的寫作幫助極大。

30 上海市檔案館B3-2-199-18，頁28–29。

表了馬格尼托哥爾斯克的「上海」性。儘管地方當局頒佈了土屋法令，並且提供替代住房，試圖消除其「上海」性，但這些住房依然存在，地方當局只好將其正式更名為「工人定居點」。³¹

相比之下，在真正的上海，社會主義仍有待時日，當地狀況日益惡化。在閘北的焦土之上，第二波逃離內戰的難民紛紛湧入。從1945年到1948年，閘北的人口從21.6萬增加到54.8萬，以身無技能的移民為主，他們在鐵絲網拆除後在廢棄的無人區上搭建棚屋。³² 歷史學家盧漢超表示，蕃瓜弄是上海最大的棚戶區之一，「是典型的由戰爭造成的貧民窟」，居民其實無家可歸。³³ 最近的地方誌也說明了棚戶區的人口密度和居民生活的不穩定性：在不到100畝（17英畝）的土地上，估計居住著16,000人。³⁴ 這些人大多失業或打零工；根據一份針對202戶家庭的調查，45%的家庭沒有就業渠道，在404名16至45歲的居民中，只有19%的人有工作。³⁵ 這些粗活工人包括碼頭工人和三輪車夫，還有一些人像王蘭花一樣，靠乞討或撿垃圾為生。人類學家何榮宗在其2000至2001年的民族志著作中指出，半個多世紀之後，年邁的居民們仍然記得他們如何遭到當地豪強和國民黨士兵的盤剝，如何被強行徵召、凌辱欺壓，又如何被迫送禮行賄。³⁶ 解放前夕，當龍形南瓜在蕃瓜弄出現時，當地豪強在它周圍建造了一座寺廟，供人燒香禱祝，人們吞下香灰與龍鬚，祈求獲得傳說中的神力。³⁷

31 Stephen Kotkin, *Magnetic Mountain: Stalinism as a Civiliz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176–178.

32 Henriot, “A Neighbourhood Under Storm,” 316；郭天成等編，《閘北區志》，頁83。

33 Hanchao Lu, *Beyond the Neon Lights: 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122–123.

34 馮梅春，〈蕃瓜弄的變遷〉，頁241。

35 郭天成等編，《閘北區志》，頁1291。這份研究調查了大統路425弄，即蕃瓜弄的其中一條分支。

36 Ho, *The Transition Study of Postsocialist China*, 70–76.

37 在寺廟建成之前，當地人就開始向南瓜祈福，並在附近收集福水，見蔡豐

儘管官方敘事將1949年前的「舊社會」與解放後的「新社會」劃清界限，但1950年代初的蕃瓜弄卻恢復緩慢。在政治方面，中國共產黨組織蕃瓜弄居民開會，譴責當地豪強是反革命，並在全市範圍自下而上對居民進行政治動員，王蘭花參加居委會正是受到了這一倡議。³⁸ 在經濟上，國家開始著手解決勞動力的問題，並設立登記處，為失業者分配工作。蕃瓜弄的居民被派往鋼鐵廠、紡織廠、手工業和運輸業工作，也有人被分配到服務業和商店工作。到1954年11月，一項調查顯示，889戶家庭中的1,001人都找到了工作，還拿到了國家的現金補助和糧食補貼。³⁹ 自來水龍頭、公共廁所和垃圾桶等公共工程改善了居民的基本生活條件，儘管仍有約3,800間棚屋，但許多家庭進行了重建，或開始用木頭、竹子重新建房。⁴⁰ 雖然如斯諾的觀察，就業與衛生狀況都有所改善，但蕃瓜弄的生活水平仍然非常基本。1964年，據《建築學報》描述，蕃瓜弄是一個典型的棚戶區，居民以紡織工人和運輸工人為主，大多三代同堂，家裏只有簡陋的傢具，住房材料貧乏，居住條件擁擠不堪。⁴¹

明、張麗麗編，《民俗上海閘北卷》，頁152。據何榮宗的受訪者回憶，當地富戶大約在1947年建造了這座寺廟，並訛稱南瓜有滋養功效，強迫人們購買用香灰製成的藥物。Ho, *The Transition Study of Postsocialist China*, 73。

38 上海市檔案館B3-2-199-18，頁34。亦參見Frederic Wakeman, Jr., “‘Cleanup’: The New Order in Shanghai,” in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 Jeremy Brown and Paul G. Pickowicz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44。

39 郭天成等編，《閘北區志》，頁1291。1953至1954年的補貼總計6,891元，分配給999人；同一時期，283人收到了6,400斤糧食。

40 馮梅春，〈蕃瓜弄的變遷〉，頁242。到1963年，大多數人都住進了新屋，大多數人(63%)住在新建的棚屋裏，其餘人住在木屋或竹屋裏，極少數人(0.81%)住瓦房。

41 許漢輝等，〈上海市閘北區蕃瓜弄改建規劃設計介紹〉，《建築學報》，第2期(1964)，頁20。



圖 2.2. 蕃瓜弄俯瞰全景，1963 年 8 月 11 日。上海市檔案館 H1-11-6-41。



圖 2.3. 蕃瓜弄的搬家日，1964 年 7 月 19 日。上海市檔案館 H1-6-11-44。

1950 年代，蕃瓜弄是許多計劃改造的街區之一。然而，正如一大會址博物館群的建造計劃因大躍進而停工，蕃瓜弄的改造也同樣直到大躍進後的經濟調整時期才得以實施。⁴² 1961 年，上海市副市長曹荻秋和李幹成視察了蕃瓜弄；1963 年 1 月，上海市委通過了改造蕃瓜弄的指示，同年 10 月改造工程啟動；1964 年 7 月，第一批家庭搬進了新公寓，合共 45 戶。兩年後，工人新村的建設正式完工，建成共計 21 幢五

42 陳映芳編，《棚戶區：記憶中的生活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20；陳映芳，〈社會空間結構與城市貧困——1949 年後的上海棚戶區〉，中國城市與區域研究中心，香港浸會大學學術論文集，第 80 期（2008 年 2 月），頁 13-14。

層公寓樓，可為1,818戶家庭提供住房與水電煤氣。⁴³ 上海《解放日報》報道了居民集體返回蕃瓜弄的情況，照片上的居民們用木車載著自己的財產，遊行一般回到蕃瓜弄。⁴⁴ 其他居民則夾道歡迎他們的回歸，作為歷史的見證。⁴⁵

上海當地報紙不斷講述蕃瓜弄巨變的故事；今天的上海居民回憶說，他們年輕時知道蕃瓜弄，就是因為媒體報道。1960年，在大躍進之後，上海報紙開始圖文並茂地報道閘北區和蕃瓜弄在面貌上的蝶變。⁴⁶ 例如，一篇關於閘北建設項目的文章刊登了新公寓樓和大劇院的照片，並與兩張老棚屋的圖片並列對比。同版插頁中的一幅漫畫描繪了一位居民站在頂樓陽台上，沐浴陽光，向歸來的燕子獻花。一位名叫邊啟的作者還賦短詩一首，刻畫棚屋變瓦房，春燕歸來不識新居。⁴⁷ 在其他文章中，蕃瓜弄的面貌變化及其建設過程則被視為教育所有參與者的不二時機：不僅研究居民生活條件的社會科學家得到了改變，蕃瓜弄的建築師也表示他們的工作是一種階級教育。⁴⁸

-
- 43 馮梅春，〈蕃瓜弄的變遷〉，頁242；郭天成等編，《閘北區志》，頁282。1970年代，天目西路居民區又另外建造了一棟13層的居民樓和23棟五層居民樓。
- 44 〈蕃瓜弄居民喜氣洋洋遷入新居〉，《解放日報》，1964年7月17日，頁2。
- 45 王蘭花，〈遷新居，感黨恩〉，頁2；〈在難忘的幸福時刻裏〉，《文匯報》，1969年4月26日，頁4。何凱思 (Christian Hess) 描述了1946年大連工人們搬入日據時期所建民居的「搬遷日盛況」，見Christian Hess, “Revolutionary Real Estate: Envisioning Space in Communist Dalian,” in *Visualizing Modern China: Image, History, and Memory, 1750–Present*, ed. James A. Cook et al. (Lexington Books, 2014), 185–202.
- 46 凱倫·佩羅內指出，蘇聯在1936年組織了關於過去20年建設的展覽，她寫道：「蘇聯幹部利用了外在環境的變化，以代表蘇聯公民在生活上的改善」。見Karen Petrone, *Life Has Become More Joyous, Comrades: Celebrations in the Time of Stal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155。
- 47 邊啟，〈不認舊時房〉，《新聞日報》，1960年1月5日，頁2。
- 48 〈編寫階級鬥爭歷史 教育年輕一代〉，《光明日報》，1963年8月16日；〈蕃瓜弄住宅設計做到比較切合實際〉，《文匯報》，1964年4月10日，頁2。



圖 2.4. 蕃瓜弄的第一個春節，1964 年 2 月 2 日。上海市檔案館 H1-11-6-45。

最大的變化無疑在於蕃瓜弄居民的生活。最典型的蕃瓜弄報道往往先描述街區情況，然後結合居民的親身故事。春節為記者們提供了一個刻畫家庭團聚、歡慶佳節的機會，眼下的幸福總讓人回想起過去的苦澀。例如，1965 年，《文匯報》和《解放日報》都刊文描寫了蕃瓜弄家庭慶祝新年的情形。《解放日報》的文章以挨家挨戶走訪的形式，描繪親人團聚、長輩敘舊、全家齊聲高唱《蕃瓜弄變了樣》。每個家庭小故事都有其寓意。在一幅蕃瓜弄舊貌油畫和毛主席畫像前，孫秀珍表示，她已經拋開怪力亂神，現在歌頌革命。「革命母親」謝秀英講述了她的兒子在朝鮮戰爭中犧牲的事跡，她認為如今的生活條件是「革命先烈的鮮血」換來的，王蘭花也在一旁寬慰。⁴⁹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5 週年之

49 〈笑迎新居第一春：蕃瓜弄居民歡度除夕〉，《解放日報》，1965 年 2 月 2 日；〈蕃瓜弄迎春節〉，《文匯報》，1965 年 1 月 31 日。

際，一篇題為《蕃瓜弄的家家戶戶》的報道也描述了類似的故事，展示出各個模範家庭的情況：一個軍人家庭、一對在「解放前」失散的母女終於團聚，以及王蘭花給兒子上革命課的情形。《文匯報》表示，這些翻了身的蕃瓜弄家庭共同代表了「全國的勞動人民」！蕃瓜弄的家家戶戶都是一扇窗口，隨著他們的私人生活被公開展示，蕃瓜弄的居民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的代名詞。⁵⁰

在各種關於蕃瓜弄的報紙報道中，憶苦思甜被描述為一種統一的主要活動。所謂憶苦思甜，是以個人口述的方式，從當下出發，回憶過去的苦難，以突顯講述者的覺悟，啟迪聽眾。蕃瓜弄的歷史主要就是透過憶苦思甜來講述的，不僅由王蘭花或其他導遊向遊客介紹，也有年長的居民向他們的子孫講述。人們在搬入新居和新年期間都會憶苦思甜。《文匯報》介紹了蕃瓜弄的老媽媽們是如何「把講舊社會過年，作為自己過春節的一項重要工作之一」。曾經與女兒失散的母親孫林弟說，所到之處她都會給人講述自己的故事，或者她去學校分享，或讓老師到家裏來，或者帶客人來看滾地龍。⁵¹ 孫秀珍還特意要了一幅蕃瓜弄舊貌的水彩畫，和孩子們一起憶苦思甜，她在毛主席的畫像前說：「現在我懂得了，我過去不是命苦，是受剝削階級壓迫、剝削的緣故。如今我們翻了身，過好日子，也不是命變好了，那是因為有了共產黨、毛主席的領導。」⁵² 透過憶苦思甜，居住環境和勞動生活之變的雙重敘事又加上了第三個層面：政治意識的個人見證。

憶苦思甜作為一種政治手法，起源於「訴苦」的實踐。正如賀蕭所述，「訴苦往往由黨和國家幹部在公共集會上引導貧苦農民和婦女講述苦難，以打破地方精英的權力，為新國家爭取群眾支持」。在土地改革和解放過程中，隨著共產黨權力的日益鞏固，訴苦既譴責了舊社會的壓迫，也抨擊了受惠於舊社會的個人。賀蕭認為，「訴苦」為人們的自述

50 邵偉乾等，〈蕃瓜弄家家戶戶〉，《文匯報》，1964年9月28日。

51 〈蕃瓜弄迎春節〉，《文匯報》，1965年1月31日。

52 〈笑迎新居第一春：蕃瓜弄居民歡度除夕〉，《解放日報》，1965年2月2日。

提供了平台和語言，這些故事「融入了一個有力的解釋，並且表明〔解放〕是20世紀初期一切苦難的終點」。⁵³在共產黨接管上海後不久，警察便開始抓捕被定性為反革命分子的當地豪強，也正是此時蕃瓜弄的居民們第一次接觸到「訴苦」。何榮宗認為，在隨後的批鬥大會上，蕃瓜弄的居民學會了他們需要的政治詞彙，並自有史以來，他們第一次以無產者和工人的身分談論自己。⁵⁴

儘管憶苦思甜無疑受到了「訴苦」的影響，但其目的是憶昔日之苦、思今日之甜，這種形式與其說是為了證明革命的合理性，不如說是為了支持革命政權的合法性。⁵⁵從訴苦到憶苦的轉變始於1960年。丹尼爾·里斯在其對毛澤東崇拜的研究著作中指出，憶苦源於軍隊，因為來自農村的士兵從家信中得知了家鄉的饑荒與暴行。對此，解放軍發起了「兩憶三查」運動，在運動中，參與者「將他們目前的處境與過去的苦難進行比較……儘管現在困難重重，但仍對黨充滿感激之情」。到1961年，一場分三步進行的運動在全軍各部展開，隨著全軍讚頌「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正確領導是今日之甜的源泉」，這場運動也達到頂峰。⁵⁶

蕃瓜弄是三年困難時期之後唯一受到如此關注的棚戶區，蕃瓜弄的改造工程又恰逢上海政府發起回憶對比運動、組織憶苦思甜展覽之時。從1963年6月中旬開始，上海市委指示各工廠舉行回憶對比，到同年12月，有五百個局辦公室、三千多個工作單位、近百萬人參加。正如《內部參考》（僅在政府內部發行）所述，要組織一場優秀的「回憶對比」會，需培訓積極分子發表模範演講，培養老工人講述他們的故事，並利用實物和圖片在工廠內舉辦展覽。到1963年底，上海所有的青年宮和

53 Hershatter, *The Gender of Memory*, 34–37.

54 Ho, *The Transition Study of Postsocialist China*, 77–78.

55 伍國表示，憶苦不同於訴苦，因為訴苦是一種動員技術，「1960年代的憶苦運動旨在喚起集體記憶，以重現階級鬥爭，強化階級意識」。參見Wu, “Recalling Bitterness,” 247。

56 Leese, *Mao Cult*, 99, 101.

工人文化宮都在組織憶苦思甜展覽。⁵⁷ 隨著棚戶區的拆除和工人新村的興起，蕃瓜弄成為理想的憶苦思甜之地，其敘事意義在重述中倍增。

正如中共一大會址遵循毛澤東的「紅線」展示中國革命，蕃瓜弄在講述中國勞動人民的故事時，也將他們在當代的命運歸功於黨和毛主席的愛民恤民。安德訓問道：「國家在哪些方面與敘述『相似』？」她認為，訴苦「代表了黨的思想與『人民』意識相融合的過程，這為黨代民言賦予了合法性」。⁵⁸ 因此，為了展示蕃瓜弄的工人新村，對於那些獲准搬回新村的居民，就要確保其個人歷史必須與黨所代表的人民敘事相吻合。

王蘭花的一位同代人曾當過紡織工人(1919年生)，她回憶道，在接待外國遊客時，她的講述會「從自身經歷出發」。她生於青浦縣的一個農民之家，13歲當童工，19歲嫁給碼頭工人，最終在村子裏靠菜皮養育了八個孩子，八人都入了黨，兩個女兒還當上了地方法官。她回想起一位日本訪客曾評論道，新社會沒有那麼好，舊社會也沒那麼壞，對此，她回答說：「我們在舊社會過著怎樣的生活？過得簡直牛馬不如啊。在新社會，我們吃得飽穿得暖，哪個社會更好不是顯而易見嗎？」⁵⁹ 這位紡織工人的經歷勾勒出官方的解放軌跡，在她的發言中，敘述成為一種立論，並透過蕃瓜弄的展覽成為實質性的論據。

如果說五層公寓樓展示的是社會主義的現在與未來，那麼18間棚屋則保留了過去如同「牛馬」的舊生活。不同於上海其他的公共改造工程(如肇家浜路和藥水弄)，蕃瓜弄保留了憶苦思甜的文物遺跡。蕃瓜弄的改造或許是繼肇家浜路與北京龍鬚溝之後的續篇。龍鬚溝是北京落

57 〈上海市工廠企業大講階級鬥爭形勢，人人參加回憶對比〉，《內部參考》，1963年8月20日；〈上海市各行各業大搞回憶對比進行階級教育〉，《內部參考》，1963年12月6日。

58 Anagnost, *National Past-Times*, 2, 32.

59 2012年6月20日在蕃瓜弄的採訪。關於「牛馬」的比喻，參見Stephen A. Smith, *Like Cattle and Horses: Nationalism and Labor in Shanghai, 1895–1927*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他研究了工人日記、傳單和演講，並認為「牛馬」的比喻不僅被用於表達工人們的人格尊嚴，也將外國列強對中華民族的壓迫與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相聯繫。

後地區的一條臭水溝，它的治理與改造在老舍的名篇《龍鬚溝》中名留史冊。老舍表示，他首先「想出戲劇性的人物」，然後「才教他們與報告中的資料相聯繫」。⁶⁰ 柏右銘認為，分別於1951和1952年改編為話劇和電影的《龍鬚溝》「將實際的城市與其寓言式的視覺形象相聯接……重新構建了觀眾的想像」，憧憬出一個共產黨重建下的社會主義新城市。⁶¹ 同樣，蕃瓜弄的敘事及其展示也培養出一種看待新舊社會的方式。在《龍鬚溝》中，進步的中年婦女娘子建議，在人民政府變「臭溝」為大道的地方豎一塊石碑；無獨有偶，在因龍得名的蕃瓜弄，王蘭花則提議舉辦展覽，以博物館作為紀念的豐碑。⁶²

作為展覽的蕃瓜弄

在一首歌謠中，蕃瓜弄的基本生活條件被刻畫得宛然在目。每句歌詞都以動詞開頭——住、蓋、吃、穿，並以一個物件結束——一間茅草屋、一床破被子、一口土陶碗和幾塊舊碎布。然而奇怪的是，這些歌詞沒有主語，我們只能在最後一行略窺一斑，它打破了之前的模式，描寫了從鞋子破洞裏露出的腳跟。這首歌謠被收錄在蕃瓜弄今昔展覽會的展覽文本中，用於標記「舊社會」生活的物質要素，這些物件反過來又成為展示過去的一部分。⁶³ 歌謠中的主人公如此微不足道，只聞其歌而不見其人，但在「新社會」中，他成為了歷史的講解員，講述他個人的過去。

60 Lao Sheh, *Dragon Beard Ditch: A Play in Three Acts*, trans. Liao Hung-y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6), 96。

61 Braester, *Painting the City Red*, 27–29.

62 Lao Sheh, *Dragon Beard Ditch*, 89; 王蘭花，〈遷新居，感黨恩〉，頁2。

63 上海市檔案館B3-2-199-18，頁25–26。歌謠唱道：「住末住個棚棚頭，蓋末蓋條破被頭，吃末吃個鹽鉢頭，穿末穿些破布頭，鞋子露出後腳、腳趾頭！」



圖 2.5. 蕃瓜弄。克利夫頓·費斯收藏34-697。圖片獲奧克蘭圖書館喬治·格雷爵士特別館藏 (Sir George Grey Special Collections, Auckland Libraries) 惠允使用。

蕃瓜弄既是傳統的陳列展，又是一場活展覽。對於前者，蕃瓜弄是正式展覽的主體，展覽往往在大廳中舉行，以圖像和實物為主，輔以文字說明。其中最全面的一場展覽於1966年春在閘北工人宮舉辦，題為「蕃瓜弄今昔展覽會」。而對於後者，人們參觀蕃瓜弄就是為了參加一場活展覽。遊客不僅會參觀18間棚屋（其中兩間以舊時陳設裝飾），並會參觀特選居民的新公寓。外賓的訪問又不同於專為學童安排的參觀。學童參觀蕃瓜弄很可能是為接受「階級教育」，聽「老爺爺講革命故事」，而外賓則可能來到特選居民的家中，對他們進行採訪。如果說這場在閘北工人宮舉辦、專為上海工人策劃的傳統展覽明確了「今與昔」的區別，那麼「活展覽」的今昔對比雖然不那麼明顯，但具有同等的教

化意義。例如，1965年，當上海市委文化交流辦公室為新西蘭攝影師克利夫頓·費斯 (Clifton Firth) 的到訪進行準備時，辦公室指示道：「在宣傳我成就時要著重多看，用新舊對比的方式適當加以說明，以便使他從實地所見中，自己得出結論。」如要衡量活展覽的參觀之旅是否成功，最好的標準或許是看這位攝影師的拍攝視角是否與工人宮的陳列相吻合。⁶⁴ 費爾斯攝影收藏中唯一現存的蕃瓜弄照片表明，他確實在一幀中同時捕捉到了新與舊的畫面。⁶⁵

作為一部教科書，蕃瓜弄今昔展覽會將地方歷史融入民族革命敘事中。展覽序言寫道，蕃瓜弄是解放前工人生活的縮影，展覽的目的是喚醒人民的階級意識。⁶⁶ 展覽的前半部分——「解放前的蕃瓜弄」，遵循毛澤東思想的「紅線」，從1840年以來的近代史開始。在一系列照片中，上海被刻畫為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雙重壓迫的中心：被剝削的農民從農村逃到城市，但在外國工廠裏，他們再次受到壓迫，甚至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這些圖像將棚戶區與豪宅並列，彷彿建築本身亦能訴苦；據講解文字的描述，這種反差就是強烈的譴責，是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控訴。⁶⁷ 與這些照片相配套的，還有一件蕃瓜弄的模型、棚戶區地圖和就業數據表。展覽還引用了蕃瓜弄居民的原話，講述了他們在包工合同、傀儡政府和通貨膨脹下遭受的苦難。展品則包括前文歌謠中列舉的物件，以及各種破毯爛衣、乞丐賴以維生的豆殼菜皮，甚至還有一隻水桶和來自蘇州河的受污染水樣本。⁶⁸

64 上海市檔案館 C37-2-1223，頁 2-7。

65 克利夫頓·費爾斯 (1904-1980) 將他的收藏捐給了奧克蘭圖書館。雖然數碼收藏和冷藏保存的底片中都沒有蕃瓜弄的照片，但我有幸找到了一張 A3 大小的展示印刷品。感謝奧克蘭中央城市圖書館喬治·格雷爵士特別館藏的相片管理員基斯·吉爾斯 (Keith Giles) 先生。

66 上海市檔案館 B3-2-199，頁 22。

67 同上註，頁 24-25。

68 同上註，頁 26-27。盧漢超指出，儘管蘇州河水受到污染，但在1960年代，人們繼續使用蘇州河水作飲用、清洗、清潔夜壺之用。Lu, *Beyond the Neon Lights*, 121。

與上海報紙上的各類報道一樣，展覽的「昔日」單元專門講述個人的故事。參觀者首先看到的是王蘭花，她是「舊社會」中典型的無地農民。展覽文字解釋道，王蘭花來自一個乞丐家庭，雖然她的父親偶爾能找到一份臨工，但每年冬天她和兄弟姐妹都不得不乞討度日，有一次她還因為撿柴火而被地主毆打。1937年，她和丈夫來到上海，住進了棚戶區，為躲避租界警察，他們不得不每晚搭起窩棚，早上再拆掉。⁶⁹ 隨之展出了兩件文物——一隻討飯瓢和一條棉毯，展覽文字描繪了一片烏鴉飛過的灰暗天空，並反問道：「舊社會裏的窮人，在鄉下吃苦。到上海受罪，哪有出頭的日子？」⁷⁰

繼王蘭花的故事之後，還有不少類似的敘述。劉香子是內戰的難民，全家住在蕃瓜弄的一艘破船殼裏。雖然全家終於湊夠錢搭了一間滾地龍，但因為無力向當地幫派支付保護費，他們的家最終被拆毀了。另一位難民游約連在污水溝邊搭了一間滾地龍，和丈夫一起靠撿麻草、拾垃圾過活。由於沒錢給兩個兒子買藥，游約連的兩個兒子都因病夭折，她也最終被迫賣掉了兩個女兒。張金秀是絲綢廠的童工，常常遭到「拿摩溫」毆打。⁷¹ 劉日富是名人力車夫，不僅被美國士兵欺負，還被腐敗的警察罰款。龔招娣是名紡織廠的老工人，她的11個孩子中只有一人倖存，內戰結束後，工廠老闆逃往香港，她也被解僱了。與王蘭花的故事一樣，每段敘述都以圖片、文字拼接說明，並輔以各類實物：用來充飢的「觀音土」和草根、劉香子的船殼殘片，以及張金秀唯一的財

69 關於租界內的棚戶區政策，參見Janet Y. Chen, *Guilty of Indigence: The Urban Poor in China, 1900–1953*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120–124。

70 上海市檔案館B3-2-199，頁28–29。

71 關於上海棉紡廠的就業結構，參見Emily Honig,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尤其是第二章。編註：「拿摩溫」(Number One)源自英語俚語，意為「第一號」。這個稱呼最初用於外國在上海設立的工廠中的工頭，後來也被華商工廠廣泛採用，成為一種慣用的別稱。

產——一個木箱。此外，展覽還展示了人們可以如何利用舊社會的物品憶苦思甜。例如，劉香子用丈夫的舊補丁褲子作為實例，教育大兒子道：「如果哪一個孩子忘記了過去的苦，不聽黨的話，你就叫他穿這條褲子！」要了解舊社會，就得穿上舊衣服。⁷²

對於王蘭花直言不諱的質問，展覽的後半部分「解放後的巨大變化」給出了答案。這一部分以毛主席的一句語錄開始——中國的命運掌握在人民自己手中。觀眾首先看到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相，然後是上海外灘上的五星紅旗，最後目光聚焦於閘北區。⁷³ 蕃瓜弄過去的舊人們重新出現在工人新村；現在的王蘭花是上海的人大代表，第一個展品就是她的一份講稿。⁷⁴ 在「社會主義社會的蕃瓜弄的新面貌」單元，王蘭花成了王同志，她是居委會的領導，也是蕃瓜弄的黨委書記。如果說被黨收養、從孤兒成為好戰士的雷鋒是模範的革命之子，那麼王書記就是如母親般的黨之化身：她曾在暴風雨中堅守一條倒下的電線直到黎明，她還收養了一對孤兒兄弟。⁷⁵ 在展覽的陳列櫃中，過去的討飯瓢和破毯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國家頒發的證書和獎章。

同樣，蕃瓜弄的其他居民也有了新的身分，現在他們是勞模、女標兵和五好士兵。⁷⁶ 如今，人力車夫劉日富成了一名鋼鐵工人，張金秀是

72 上海市檔案館B3-2-199，頁29–33。利用實物進行今昔對比的例子，參見〈上海市各行各業大搞回憶對比進行階級教育〉，《內部參考》，1963年12月6日，頁1。

73 上海市檔案館B3-2-199，頁34。這句話出自1949年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籌備會議上的講話。

74 同上註，頁36。現在的居民說到此處都深感敬佩，由於王蘭花不識字，她必須背誦所有的演講稿，這也讓她的演講更令人印象深刻。2012年6月20日在蕃瓜弄的採訪。

75 上海市檔案館B3-2-199，頁37–38。報紙也報道了這個故事。參見池文，〈王蘭花守夜〉，《文匯報》，1964年3月8日，頁4。

76 「五好戰士」的評判標準為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風好、軍事技術好、完成任務好、鍛鍊身體好。

棉紡廠工人，龔招娣也回到了紡織廠，現在樂得退休，領取國家養老金，與其他退休老人一起憶苦思甜。報紙報道中重新出現的人物體現了某類典型，同樣，展覽中的人物也代表了特定的故事類型；例如童工張金秀，她的故事已成為她的別號，始終在她的名字之前出現。與報紙報道一樣，春節也是展覽敘事的一部分，新的家庭孕育出更多孩子，更好地彰顯出國家的慷慨。⁷⁷一方面，按照傳統習俗，展覽表現出多代同堂、兒孫環繞、歡慶春節的景象；另一方面，依循革命理想，展覽也呈現了年輕人在工廠工作，當選模範工人，並深受憶苦思甜的激勵。

此外，展覽還展示出模範居民的各類義舉，例如幹部們提供免費的理髮服務，居民們節約用水，一位尤其節儉的居民沈志友不僅關掉了自家的燈，還幫別人家關燈。⁷⁸在「共產主義新美德」的號召下，居民們互相幫助，爭先打掃巷弄，撿到的錢和商品票證也盡數上交。蕃瓜弄的年輕人自願建設社會主義，張金秀用憶苦思甜說服女兒去建設新疆，開發中國遙遠的西部地區。⁷⁹也許最鮮明的模範行為是龔招娣與一位匿名外賓之間的對話。當被問及美國時，這位退休的棉紡廠工人體現出讀報小組的影響，她宣稱：「美帝國主義現在侵略越南，屠殺越南人民。我們支援越南人民的鬥爭。」外賓又問她是否願意支援越南打仗時，龔奶奶回答：「去啊！只要為子孫後代的幸福，我就去。」在回答她對黨和毛澤東的看法時，龔招娣以她的親身經歷作為翻身的例證：「我從草棚搬進新樓房，這都是靠了共產黨和毛主席的福。」在對話結尾，龔奶奶宣稱

77 上海市檔案館B3-2-199，頁36-37、40-41。

78 同上註，頁43。當時的手冊列出了幹部需向居民提供的服務，例見上海市徐匯區組織人民經濟生活工作組編，《居民生活服務手冊》（上海文化出版社，1960）。

79 上海市檔案館B3-2-199，頁44。王蘭花也公開敦促知識青年下鄉，並用自己的兩個孩子作為範例。參見〈在難忘的幸福時刻裏〉，《文匯報》，1969年4月26日，頁4；王蘭花，〈毛主席恩情暖萬代〉，《文匯報》，1976年9月28日，頁3。

她立志活到共產主義到來的那一天，那時，全世界所有的工人都將享受像她這樣優渥的生活水準。⁸⁰ 展覽文字以問答的形式排列，作用堪比政治上的教義問答，是如何說話的典範。

蕃瓜弄今昔展覽會展示出蕃瓜弄的敘述如何利用個人故事，構建出一個工人階級的象徵性故事。保護、重述這一敘事是毛時代政治文化的核心，相應的展品也使用實物材料以代表階級與解放。討飯瓢和工人證書都是階級的標誌，同樣，從滾地龍到公寓樓的蛻變也是黨正確領導的證明。托尼·本尼特在談到19世紀歐洲展覽的興起時指出，博物館是傳播知識和權力的機構。本尼特所說的「展覽綜合體」(exhibitionary complex)將觀眾置於權力的一邊，讓觀者融為景觀(spectacle)的一部分，最終創造出一個符合完美展覽典範的、可自我管理的小社會。⁸¹ 與此類似，毛時代的展覽綜合體投射出對過去與現在的編排，理想的參觀者正是與展覽敘事有共鳴的工人們。本尼特進一步強調，展覽「將其合意的觀眾提升至其構建出的展覽秩序之巔，並為其預備了一個更加偉大的未來」。⁸² 同樣，毛時代展覽自我定位於新中國，正當社會主義建設之中，身處未來烏托邦的前哨。蕃瓜弄的居民是革命的先鋒，龔奶奶時刻警惕著，直到眾人同享幸福的那一天。

蕃瓜弄的第二種展示形式——實地活展覽，是一種進階的展覽綜合體。在參觀蕃瓜弄時，不單居民是展示品，參觀者更是現場展覽的一部分。隨著蕃瓜弄成為上海的重要象徵，當政要來訪時，其參觀路線不僅包括中共一大會址，也包括蕃瓜弄，沿途可能還參觀一家工廠或醫院。有時，蕃瓜弄也是媒體報道的少數幾處地點之一，彷彿參觀一次蕃瓜弄就足以統觀整個上海。例如，1964年，當海軍下士趙宗禮從台灣叛逃投誠大陸時，他受到了林彪的接待，並參觀了上海的工業展和蕃瓜

80 上海市檔案館B3-2-199，頁45。關於中國對於越南戰爭的描述，參見Scarlett, "China After the Sino-Soviet Split", 尤其是第二章。

81 Bennett, "The Exhibitionary Complex," 123–154.

82 同上，頁147。



圖 2.6. 智利訪問團的女代表們參觀蕃瓜弄，1966年4月18日。上海市檔案館 H1-13-8-86。



圖 2.7. 智利訪問團的女代表們參觀棚屋，1966年4月18日。上海市檔案館 H1-13-8-82。

弄。⁸³ 再例如，1978年，孟加拉國衛生部長率團訪問中國，媒體報道了他們在上海的旅程，並特別提到在蕃瓜弄的參觀。⁸⁴ 正如新西蘭攝影師費爾斯的筆記所示，這類外賓訪問經過了精心的編排。行程路線早已定位安排，所遇人事也事先佈置，訪客的問題與感言更要詳加記錄。⁸⁵ 從正式的陳列展，到現場走訪參觀，在這兩種形式的展示中，不論參觀者是中國人或外國人，蕃瓜弄都與中共一大會址一樣，為當權國家呈現出一個政權合法化的敘事。

83 〈駕艇起義的趙宗禮在上海參觀〉，《人民日報》，1964年10月26日，頁2。

84 〈外事往來〉，《人民日報》，1978年4月7日，頁4。

85 相關內容詳見檔案記錄，特別是上海市總工會（負責協調外國工人的行程）和上海市委文化聯絡辦公室（負責外國攝影師和電影製片人）的檔案記錄。例如上海市檔案館 C1-2-5177，頁18b；上海市檔案館 C37-3-367，頁4；上海市檔案館 C37-2-584，頁4；上海市檔案館 C37-2-1223，頁2-7。



圖 2.8. 智利訪問團的女代表們穿過新公寓樓，1966 年 4 月 18 日。王蘭花位於最左邊。上海市檔案館 H1-13-8-84。

今天，居民仍記得當時在接到通知後為迎接訪客而忙碌準備的情景。正如陳若曦在短篇小說〈尼克森的記者團〉中所描述的情景，事先一位居委會的老奶奶會挨家挨戶讓大家把晾曬的衣物收起來。⁸⁶ 接著選出幾個家庭接待訪客，一位居民（1930 年生）指出，只有家境較好、人口較少的家庭才會被選中。一位退休的理髮師（1943 年生）回憶說，居委會會提前來檢查，指示人們打掃衛生，換上體面衣服。⁸⁷ 前紡織工人（1919 年生）則表示，「只有階級好、政治可靠和歷史背景乾淨的，才能

86 〈臨街的窗〉，《光明日報》，1985 年 9 月 7 日；陳若曦的《尹縣長》，見 Ruoxi Chen, *The Execution of Mayor Yin and Other Stories from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trans. Nancy Ing and Howard Goldblatt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revised ed., 2004)。

87 來自 2012 年 6 月 17 日在蕃瓜弄的採訪。

接待客人」。⁸⁸ 與蕃瓜弄今昔展覽會一樣，實地活展覽不僅參觀要預先計劃，展示也是。

對於國內外遊客而言，現場走訪參觀是一種儀式化、參與式的宣傳。呈現在外賓眼前的是一場對比研究，他們與上海人的互動往往是照本宣科，例如前文中龔奶奶關於越南的對話。在學校裏已對「憶苦思甜」十分熟悉的小學生們，則坐在滾地龍前的小凳子上，聆聽蕃瓜弄的老人們講述翻身的故事。在文革期間，上海學生應軍訓要求前往革命地點，蕃瓜弄正是他們行軍的目的地之一。⁸⁹ 除了學生，各類工人、員工都來到了蕃瓜弄。例如，上海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在前往蕃瓜弄時高唱愛國歌曲。⁹⁰ 據《文匯報》另一篇報道，工人們首先參觀了蕃瓜弄今昔展覽會，聽老工人做回憶對比，然後一起吃糠殼窩頭的「憶苦飯」。280名工人一同含淚吃著憶苦飯，「想起父輩住過的茅草棚、吃過的豬狗食、幹過的牛馬活」。⁹¹ 在毛時代的中國，活展覽是參與式的政治宣傳。一切要素都有其儀式化的功能，展覽敘事不僅因文物而變得生動，更有憶苦飯讓人含淚下咽。

人們對蕃瓜弄的反響如何？今天的受訪者很難跳出現代的自我去回憶當年關於蕃瓜弄的教訓；更多時候，他們的記憶變成了說教，蕃瓜弄成為了一種宣傳形式、一場面向外賓的展演，以及棚戶區的代表——當時的棚戶區隨處可見，沒有必要特地造訪。一位退休幹部（1954年生）回憶道，當小學老師帶他到上海的「龍鬚溝」肇家浜路參觀後，他寫了一篇作文——「從前有個臭水溝……」。⁹²

88 來自2012年6月20日在蕃瓜弄的採訪。

89 來自2013年7月24日在上海的採訪，受訪者為一位退休的百貨商場員工（1957年生），亦參見〈在毛主席「7-21指示」的光輝照耀下勝利前進〉，《光明日報》，1975年6月22日；〈閘北區利用革命遺址和紀念地，對青少年進行革命傳統教育〉，《文匯報》，1990年1月15日，頁2。

90 〈唱革命歌，做革命人：博物館裏傳出嘹亮歌聲〉，《文匯報》，1966年1月25日，頁2。

91 〈吃憶苦飯，思幸福源〉，《文匯報》，1977年2月11日，頁3。

92 來自2013年7月20日在上海的採訪。他主要記得只有兩個學生拿了90分，他是其中之一。

另一位1952年出生的受訪者來自一個育有八個孩子的工人家庭，他記得在聽到蕃瓜弄的故事時，心想「還是社會主義好！比其他主義都好」。⁹³ 另一位退休幹部（1950年生）談到當年在學校聽勞模的演講，「全都是講舊社會怎麼苦，新社會怎麼好……所以我走在街上都會想，我生活在新社會，是多麼幸運。」⁹⁴ 除了少數例外，聽過憶苦思甜並成長於文革期間的那一代人，往往把蕃瓜弄看作一種宣傳避而不談，轉而談起自己的苦難、大躍進後飢貧的童年或青年下鄉的艱辛。

至於外國遊客，正如官媒的報道，他們的反應不出所料，既難以置信又欽佩不已。1960年，《人民日報》形容外國人對上海尤其感興趣，因為帝國主義者的建築現已讓位於工人的新村：「他們似乎看到了新中國在短短幾年間，跨過了上百年那樣大變化的一幅縮影圖。〔外國〕朋友們說，中國人民能夠做到的，為什麼別人不能夠呢？」⁹⁵ 就連外賓訪問的檔案報告也與計劃相差無幾。1959年，一位荷蘭攝影師訪問了上海郊區的閔行區，他表示工人住房堪比法國、義大利，參觀閔行區就像來到了美國。⁹⁶ 陪同新西蘭攝影師費爾斯的接待者報告說，費爾斯對蕃瓜弄的廚房印象深刻，儘管他無意間拍到了一個穿著破爛的路燈修理工，但接待者表示，工人的外表總體尚可接受。⁹⁷

然而，有一個案例表明，觀看之法也可以不受控制。在義大利電影大師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 (Michelangelo Antonioni) 的紀錄片《中國》(*Cina*) 中，據稱，有一個片段較少關注工人的新房，而更多聚焦於

93 來自2013年7月21日在上海的採訪。

94 來自2013年7月2日在上海的採訪。儘管他的父母分別是工人和老師，但因為他的爺爺開過商店，他家被貼上了「資本家」的標籤。

95 金仲華，〈人民勝利的時代〉，《人民日報》，1960年10月1日，頁8。

96 上海市檔案館C37-2-584，頁4。另外參見羅炳光，〈從設計圖上看新蕃瓜弄〉，《新民晚報》，1964年10月12日，頁3。

97 上海市檔案館C37-2-1223，頁2-7。

蕃瓜弄展覽本身，並將保留的棚屋稱為「殖民時期的恐怖博物館」。⁹⁸ 他的鏡頭在老棚屋上徘徊，並因此被扣上了反革命的罪名，在蕃瓜弄黨支部和革命委員會召開的公開批評會上，71歲的王福清要求安東尼奧尼返回，聽聽他對新舊社會的看法，再好好拍攝滾地龍和新公寓樓。⁹⁹ 儘管安東尼奧尼的鏡頭的確曾短暫拍到了工人的公寓樓，但他的拍攝顯然偏離了計劃的劇本。

王福清過去當過乞丐、拉過人力車，他因為人生經歷而憤慨，這也提醒我們關注另一個視角，即蕃瓜弄的居民自身。在毛時代中國的展覽綜合體中，居民們成為歷史學家、敘述者、講解員和東道主。但是進入改革時期，王福清和王蘭花等人還繼續講述蕃瓜弄的故事，因為他們和許多被選中入住新公寓的居民一樣，在舊社會吃了苦，在新中國翻了身。正如何榮宗和吳日嵐所述，蕃瓜弄的老一輩居民「有一種強烈的榮譽感」，因為住在蕃瓜弄「暗示了一個人的革命背景」。¹⁰⁰ 蕃瓜弄被塑造成一個社會轉型的展品，其階級屬性既來自、同時也賦予其特殊的居住者。作為模範社區，蕃瓜弄的居民成為新社會的楷模，更有勞模證書佐證。隨著時代演進，蕃瓜弄的現場展覽無意中成為解讀社會主義與後社會主義時期中國模範治理的教材。

98 Michelangelo Antonioni, dir., *Cina* (Rai Trade, 2007). 紀錄片裏提到：「在上海這個工人階級的社區裏，保存著一個怪異的過去的遺跡，就像是殖民時期的恐怖博物館。直到25年前，數百萬人都還住在這些棚屋土房裏。」感謝瑪麗亞·西保 (Maria Sibau) 女士提供的英文翻譯。

99 〈蕃瓜弄的巨大變化不容抹煞〉，《解放日報》，1974年2月8日，以及《人民日報》，1974年2月15日，頁3。王福清當了27年的人力車夫，也常在展覽做講解員。1977年，他獲選參加上海人民政協會議。郭天成等編，《閘北區志》，頁1292。

100 Wing-Chung Ho and Petrus Ng, "Public Amnesia and Multiple Modernities in Shanghai: Narrating the Socialist Future in a Former Socialist 'Model Communit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7, no. 4 (August 2008): 401–403.

作為模範的蕃瓜弄

當時，蕃瓜弄不僅是「模範」，用一位前居民的話說，它更是「模範中的模範」。¹⁰¹ 在毛時代，成為模範就是在政壇中佔據一個特定的位置。李海燕將這種模範比作封建時代的文人：「在社會主義世界裏，人們相信，模範的道德魅力一旦公開，就會產生一種不可抗力，召喚所有人沐浴在其光芒之下，效仿他們的光輝榜樣。」¹⁰² 孟旦 (Donald Munro) 主張，模範作為一種教學工具，可追溯至儒家傳統，在中國對馬克思主義的詮釋中亦有跡可循，儘管對模範的利用並非中國一家獨有，但「模範在中國社會中所發揮的功能、所取得的地位、遴選的數量以及受重視程度，都有其獨特性」。¹⁰³ 從1930年代開始，黨就開始利用、獎勵模範，毛澤東本人認為，只有與模範比較，革命人民才能得到改變，並就此提出了模範與模仿者之間的辯證關係。¹⁰⁴ 從模範工人到模範村，從革命戰士雷鋒到社會主義的大寨公社，模範都是政治運動的核心特徵。作為卓越的模範社區，蕃瓜弄充滿了模範個人，他們既是榜樣，同時也效仿榜樣。

但在模範和模仿者之間的辯證關係中，成其為模範的正是其不凡之處。孟旦指出，雖然模範被稱為典型，但其特質或許難以做到，非但無法激勵模仿者，更反而構成阻力。孟旦在對毛時代教育體系的研究中表

101 來自2013年7月5日在上海的採訪，受訪者為以前的一名住戶(1948年生)。

102 Haiyan Lee, *The Stranger and the Chinese Moral Imagin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18.

103 Donald J. Munro, *The Concept of Man in Contemporary China*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0), 135.

104 Norma Diamond, "Model Villages and Village Realities," *Modern China* 9, no. 2 (April 1983): 163; Munro, *The Concept of Man*, 139.

明，模範的存在創造出一個高等階級，與平等主義的思想自相矛盾。¹⁰⁵ 其他學者也指出，模範村往往能夠獲得額外的資源，並因其成功事跡而進入政治關係網中。¹⁰⁶ 賀蕭對女性勞動模範的研究也證實，在個人中也存在類似的模式，個人敘述與演說技巧也在此過程中得以培養。¹⁰⁷ 此外，模範的地位也可能得益於某位權重位高的贊助者，正如周傑榮在研究小靳莊時發現，小靳莊作為天津北部的一個村莊，它是在毛澤東妻子江青的要求下，成為中國文化烏托邦的象徵的。周傑榮揭示了城鎮官員如何出於政治目的將小靳莊打造為全國模範，在1975年迎接了十萬名遊客前來參觀。¹⁰⁸ 儘管模範地位出眾、品質卓越，但賀蕭提醒我們，不該忽視模範的真實性或創造模範的過程。¹⁰⁹ 按照設計，模範應既具代表性，又不失真實。

那麼蕃瓜弄是何種類型的模範？它不是普遍的勞動模範，即工作、創造和生產的典型。如果說，令模範村大受讚揚的往往是其自身成就而非國家的幫扶，1960年代國家對蕃瓜弄的投入卻得到了公開的報道；不僅報紙媒體稱這是人民政府工作的成果，蕃瓜弄居民也感謝黨和毛主席，連面向海外華人的出版物也對上海市或「當局」表示盛讚。¹¹⁰ 相對

105 Munro, *The Concept of Man*, 156–157; Donald J. Munro, “Egalitarian Ideal and Educational Fact in Communist China,” in *China: Management of a Revolutionary Society*, ed. John M. H. Lindbeck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1), 256–301.

106 Diamond, “Model Villages and Village Realities,” 177; Edward Friedman et al., *Revolution, 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Village China*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07 Hershatter, *The Gender of Memory*, 220.

108 Jeremy Brown, *City Versus Countryside in Mao's China: Negotiating the Divi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200–228.

109 Hershatter, *The Gender of Memory*, 216.

110 〈逐步消除草棚矮房，改善人民居住條件：上海拆遷改建蕃瓜弄〉，《人民日報》，1963年10月16日，頁2；阿勵編，《上海的故事》（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3），頁27–40。王蘭花認為對蕃瓜弄的投入應歸功於閘北區政府，參見王蘭花，〈蕃瓜弄裏說巨變〉，《文匯報》，1999年8月22日，頁1。

於勞動模範，蕃瓜弄應該被視為一個具有模範敘事的模範社會。作為新中國的縮影，蕃瓜弄的識字條幅上有陳毅市長的話語，蕃瓜弄不僅榮獲大量藝術和文化證書，還連續多年被評為衛生模範單位。¹¹¹ 正如蕃瓜弄的展覽所示，居民中的模範人數多得不勝枚舉。孟丹指出，最關鍵的是，模範們「演示了統治者希望群眾學習的美德或態度」，並理解「其工作的意義」；就蕃瓜弄的居民而言，他們十分清楚社區新面貌和自身的地位意味著什麼。¹¹² 蕃瓜弄是展演台，其居民是代言人，只有符合理想標準，才能確保其模範地位。

然而，早在1949年之前，蕃瓜弄已然是個特例。戰時，蕃瓜弄經歷了毀滅性的打擊，在被夷為焦土的土地上搭建出巨大的棚戶區，充斥著粗活工人和難民。1953年，閘北區被選為實驗區，蕃瓜弄更是成為大躍進後唯一獲得改造資金的社區，不論在過去還是現在，蕃瓜弄都獨一無二——它本身就是一項巨大的對比研究。¹¹³ 此外，蕃瓜弄的新居民也經過特別遴選。一位退休的煤氣公司工人（1933年生）是第一批入住新公寓樓的居民之一，他表示他家之所以有此特權，是因為他的母親是居委會的領導，「只有幹部和勞模才能被分到蕃瓜弄」。¹¹⁴ 報紙報道暗示，蕃瓜弄的住房無法容納所有人，因此，當個人犧牲自己的配額讓給更亟需住房的家庭時，往往大受讚揚。雖然地方史表明，蕃瓜弄改造前後的住戶數量大致相等，但何榮宗發現，原來的1,964戶家庭中只有502戶能夠入住，付不起房租的窮人、殘疾人和精神病患者都不在內。

111 上海市檔案館B3-2-199，頁41–42。

112 Munro, *The Concept of Man*, 140–142.

113 上海市檔案館B3-2-199，頁34；陳映芳編，《棚戶區》，頁20；陳映芳，〈社會空間結構與城市貧困〉，頁13–14。韓起瀾 (Emily Honig) 也在1963年上海第二棉紡廠的一場展覽中觀察到類似現象，她紀錄了在最為困難的日據時期下的貧苦婦女，被用來代表解放前所有勞動婦女的經歷。參見Honig, *Sisters and Strangers*, 132–135。

114 2012年6月20日在蕃瓜弄的採訪。

何榮宗認為，透過這種方式，「『革命的人民』被有力地『創造』出來了」。¹¹⁵

作為精心打造的新中國模範社區，蕃瓜弄的居民受到號召成為工人階級的代言人。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他們都在政治運動中慷慨陳詞。王蘭花批評一切，從戲劇到日本軍國主義不一而足。在文革最激烈之時，她攻擊鄧拓和劉少奇；在文革的最後，她又成為毛主席在蕃瓜弄的主祭人。同樣，蕃瓜弄居民集體也根據時勢抨擊相應的政治敵人，從劉少奇到安東尼奧尼，指責他們企圖倒退回過去的黑暗中。在「批林批孔」運動中，蕃瓜弄小學的孩子們也向「工人叔叔」學習，對詩歌大加批判。¹¹⁶除了代言人，居民也是模範觀眾，會在觀看戲劇和電影後自發討論舊社會之苦。¹¹⁷在此角色下，蕃瓜弄的展覽也參與了革命運動的展覽文化，作為革命的受益者動員起來加入政治運動。當時，人們堅信修正主義的威脅必然導致向過去的倒退，在此時代下，誰能比有實物可訴苦的人們更擅長憶苦思甜？

但無論是蕃瓜弄的建設，還是它的居民們，都絲毫沒有削弱蕃瓜弄之於新中國的象徵。此處我們不妨了解下大衛·福克斯 (Michael David-Fox) 對1921年至1941年前往蘇聯的西方遊客的研究。他描述了一個專為接待遊客而精心設計的系統，其中不僅包括卓越的典範，還有將過去的沙俄與現在的蘇聯進行對比的展覽。但他表示，這種展示與其他形式

115 例如，《文史資料》對於蕃瓜弄的記載表示，1963年有1,965戶家庭，1965年有1,818戶家庭。參見馮梅春，〈蕃瓜弄的變遷〉，頁239–242。何榮宗使用了閩北檔案館的數據，參見Ho, *The Transition Study of Postsocialist China*, 43。

116 〈以批林批孔為中心過好暑期生活〉，《光明日報》，1974年8月9日；〈蕃瓜弄的巨大變化不容抹煞〉，《人民日報》，1974年2月15日，頁3。

117 李村，〈在新居中憶舊恨：蕃瓜弄居民看電影《不忘階級苦，永記血海仇》〉，《文匯報》，1965年11月13日，頁2。

的文學和文化生產一樣，是在將「理想中的生活拉近現實」。¹¹⁸ 大衛－福克斯反對將模範場所視為弄虛作假、專騙外國人的波將金村（Potemkin village），相反，他認為這類參觀其實是表明主張的一種，借此「灌輸一種看待過去歷史與未來前景的模式，這對共產黨和蘇聯公民而言，不僅切身相關，甚至成敗攸關」。¹¹⁹ 從麥卡錫時代的美國，到1970年代初科學代表團開始訪問中國，不少人都將中國的模範點視為裝點門面的波將金村。¹²⁰ 但正如舒喜樂所述，許多遊客明白他們看到的只是模範，並不代表了任何平均或全面的生活水平。¹²¹ 與蘇聯的展示一樣，蕃瓜弄旨在展示中國正逐漸成真的現實。

蕃瓜弄的案例突出了模範如何在時間的維度上發揮作用。如果蕃瓜弄是在此刻對一小部分未來的展示，那麼它作為一個未來的希望，其時效是有限的。雖然蕃瓜弄的居民承認「我們住上了洋房，還有許多階級弟兄還沒有住上」，但其他社區不可能籌集到五百萬元來進行類似蕃瓜弄的改造，而這筆費用在毛時代的文件紀錄中隻字未提。¹²² 再沒有一個棚戶區能享有同樣的命運。正如社會學家陳映芳的發現，在同一時

118 Michael David-Fox, *Showcasing the Great Experiment: Cultural Diplomacy and Western Visitors to the Soviet Union, 1921–194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13–114, 155, 172, 203.

119 同上註，頁26。關於組織外賓訪華，參見Anne-Marie Brady, *Making the Foreign Serve China: Managing Foreigner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120。

120 關於前者，參見United States Congress, *How the Chinese Reds Hoodwink Visiting Foreigners: Consultation with Mr. Robert Loh*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0)。

121 Sigrid Schmalzer, “Speaking About China, Learning from China: Amateur China Experts in 1970s America,”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16, no. 4 (Winter 2009): 342–343.

122 〈蕃瓜弄迎春節〉，《文匯報》，1965年1月31日。

期，官員們接到指示要嚴厲打壓個人搭建新棚屋的現象；幹部們只可改善現有棚屋的消防安全和衛生條件，或協助個人加固現有棚屋。¹²³ 今天，一位前工廠工人（1947年生）表示，根本沒必要關注蕃瓜弄相關的宣傳：

有多少人能享受到那種待遇？那是給先進、勞模那樣的人的。一般人根本享受不到的，根本無關的。如果輪不到你，那就不用去關心。你沒有政府背景的條件，根本沒機會。¹²⁴

事實上，安克強曾表明，棚屋的絕對數量在1960年代不降反升，到了1979年，上海的棚屋數量更超過了1949年的數字。¹²⁵ 當被問及如何看待蕃瓜弄成為了對外展示的窗口時，一位前工人（1957年生）笑道：「房子裏還有人，那當然不能給你看！」¹²⁶ 由此可見，這18間棚屋的獨特之處就在於，它們已儼然成為一處空洞的、過去的、博物館化的空間。

與上海和中國其他地區相比，蕃瓜弄是一個敘事的典範。然而，在蕃瓜弄內部，顯然並非每個人的行為都符合模範。在蕃瓜弄今昔展覽會中，展覽文本中甚至透露出不滿的跡象。例如，展覽描述了王蘭花身為組織者的艱難之處，「解放後，她就參加里弄工作，碰到許多困難，甚至有些人背後議論，心裏很亂。」還有其他一些不那麼合乎模範的行為跡象，例如，居委會不得不說服居民入住不太理想的樓層，或者說服年輕人前往中國內陸開發建設。劉香子不得不用丈夫的補丁褲子教育兒

123 上海市檔案館B11-2-81，引用於陳映芳編，《棚戶區》，頁14。

124 2013年7月21日在上海的採訪。

125 Christian Henriot, "Slums, Squats, or Hutments? Constructing and Deconstructing an In-Between Space in Modern Shanghai (1926–65),"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7, no. 4 (2012): 520–524; 陳映芳編，《棚戶區》，頁21。

126 2013年7月15日在上海的採訪。

子，也表明一些人的確已經忘記了過去。¹²⁷《內部參考》中的報道也有跡可循，從看香港電影到拒絕支援新疆，許多上海年輕人確實需要一堂這樣的實物教育課。¹²⁸最後，身為蕃瓜弄活展覽的居民，並非所有居民都願意參與其中，一位受訪者表示她在參觀期間故意閉門不出，還有人回憶道，每當聽到成群的學生湧入社區，他們就會急忙把門關上。¹²⁹

實際上，在蕃瓜弄的模範社會中也存在階級。能夠入住新公寓樓的居民必須擁有良好的政治背景和充分的經濟實力；受訪者曾表示，之所以有人讓出配額，可能就是因為無力支付租金。這種差異也影響了公寓的分配；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公寓分配取決於每戶的人數，但在房屋面積、樓層高低以及社區本身的空間佈局等方面仍存在差異。¹³⁰甚至在社區內部還出現了分化。例如，上海警備區司令部的退役軍屬都集中在蕃瓜弄41號附近。據一位博主回憶，軍人家庭的孩子只互相玩耍，也很少講上海話：「北方人居多，都講北方話。他們好像和我們有點隔閡，他們有一點優越感，也許他們不知道，我們卻能感受得到。」¹³¹宣傳中也不曾提到共用廚房、廁所引起的種種問題。雖然展覽讚揚了蕃瓜弄的居民解約水電，但共用水電錶導致爭執不斷，最終每戶不得不各自安裝水電錶。¹³²在文革期間，蕃瓜弄也難免衝突：據說，蕃瓜弄裏的年輕人曾和外面的年輕人打架鬥毆，富人也和窮人鬥。¹³³

127 上海市檔案館B3-2-199，頁29-30、37、44、47。

128 《內部參考》，1963年1月22日、1963年3月22日、1964年5月12日和1964年7月22日。

129 2012年6月17日在蕃瓜弄的採訪。參見<http://wenda.google.com.hk/wenda/thread?tid=509bcae11597983b>，訪問於2014年2月16日。

130 Ho, *The Transition Study of Postsocialist China*, 124.

131 陸建雲，〈鄰居聚會〉，2012年2月25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27a6cc01011dqp.html，訪問於2014年3月9日。

132 上海市檔案館B3-2-199，頁43。

133 來自2013年7月2日在上海與歷史學家金大陸的訪談。



圖 2.9. 蕃瓜弄一間公寓牆上掛著的裝飾物，2012 年 6 月 20 日。左邊是一幅相片，右邊是一張「光榮退休」的證書。由作者拍攝。

在後毛時代，蕃瓜弄已經從憧憬未來走向了描繪過去。現在的閘北區是上海窮人的聚集地，其住戶要麼是被經濟浪潮拋下的一代下鄉知青，要麼是農村進城打工的農民工。如今，五層公寓樓是格格不入的社會主義遺跡，與摩天大樓相形見绌，並被商業樓盤所取代。蕃瓜弄公寓樓坐落於閘北區政府對面，雖然建築外立面得到了妥善維護，但就我所走訪的公寓而言，其內部都年久失修，佈滿油漬的牆壁上仍然掛著裝裱的證書。我還遇到了一位在公共廚房做飯的中年婦女，她對眼下的生活環境忿忿不平。她 1981 年嫁入蕃瓜弄，如今就像「生活在舊社會」，她建議我給政府寫信，請求拆除蕃瓜弄。¹³⁴ 蕃瓜弄，曾經是社會主義全明星的模範社會，今天卻淪為後社會主義棄子的聚集地。53 歲的鐵路

134 來自 2012 年 6 月 17 日在蕃瓜弄的採訪。

維修工人李存榮還提到一戶蜷縮在51平方米的八口之家，他表示蕃瓜弄的所有公寓都「又亂又擠又髒」。儘管如此，不同於公共廚房的那位中年婦女，李存榮和其他人寧願留下來，因為不確定自己是否有足夠財力搬到別處。李存榮說，他們不可能買房，「即使賣血，也買不起兩萬一平米的房子！」¹³⁵ 蕃瓜弄再次成為貧窮的代名詞，2012年一位女士在網上發帖詢問是否應該嫁入蕃瓜弄，她的對象相貌堂堂、收入中等，父母有一人患病，對此，網友紛紛表示斷不可行，蕃瓜弄如今破敗不堪，奉勸她再覓良緣。¹³⁶ 隨著貧困與不安在居民中再次出現，工人新村已經成為一處不合時宜之地，一個中國舊夢的過時之物。

然而，有一人直至改革時期仍在講述蕃瓜弄的故事。王蘭花的最後一篇文章出現在1999年的《文匯報》頭版，當時距離她為羅德里格斯擔任嚮導已經過去了超過35年。儘管王蘭花的敘事概要和對滾地龍的描述仍保持不變，但相比羅德里格斯當初所描述的「鋼鐵意志」、1966年展覽中「管理國家大事」的模範「革命戰士」以及文革中「紅色戰鬥力量」的一分子，王蘭花的自我描述此時發生了巨大的轉變。¹³⁷ 1999年，王蘭花將自己稱為眾多家庭主婦中的一員，是代表蕃瓜弄工作的「大姐」之一。她很少提及自己的苦難，只說到她丈夫當街道清潔工的工資太低。王蘭花坦言，與新的商業住宅相比，蕃瓜弄的公寓似乎相形失色。但她表示，儘管孩子們再三勸說，她仍不忍離開，仍想帶隊參觀蕃瓜弄，「把蕃瓜弄的歷史多多介紹給來自四面八方的客人朋友，讓大家都知道，新中國為我們勞動人民做了一件多好的事！」她的記憶停留在1964年的蕃瓜弄，最令人回味的一幕是她走在新鋪的道路上，一面欣

135 丁裕國，〈上海貧富差距調查報告〉，2011年8月29日，<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100-480892.html>，訪問於2014年3月9日。

136 參見 www.douban.com/group/topic/29877528，訪問於2014年2月16日。

137 例如，參見王蘭花，〈住進新工房，不忘滾地龍〉，《文匯報》，1967年9月24日，頁6。

賞綠樹鮮花，一面聽到蕃瓜弄小學裏飄出孩子們的歌聲。¹³⁸那時，蕃瓜弄的改造尚未完成，這座模範的工人新村仍包蘊著一個對完美未來的許諾。

小結：蕃瓜弄的經驗教訓

十八間棚屋的舊址，如今變成了一家經濟型連鎖酒店和一座行政大樓。雖然棚屋舊址在1977年被定為官方文物遺產，但保存下來的棚屋和三間滾地龍都在1992年被拆除。其中四間棚屋被遷至一處緊鎖的展館，但連這些最後的遺存也在1996年被徹底拆除。2012年，我在當地走訪時，沒有人清楚記得展覽何時結束，只說它已不合乎時代了。¹³⁹在其他地方，蕃瓜弄的敘事也已逐漸消失。在地產網頁上，銷售人員既不提及其社會主義的改造史，也不談棚戶區的衰落史，而是詳細描述蕃瓜弄在民國初期的繁榮盛況。¹⁴⁰書籍對蕃瓜弄的描述也避免政治術語，而是採取學術用語。例如，一本關於舊上海的圖冊將蕃瓜弄的棚戶區描述為一種「民居建築」，儘管文中仍然保留了毛時代的做法，將蕃瓜弄與「上海中上層階級的住宅」相對比。¹⁴¹在官方文件中，蕃瓜弄的敘事也被略去；雖然地方史著和閘北區地方誌都描述了1990年代的蕃瓜弄，但在一套慶祝上海改革開放二十週年的叢書中，其閘北卷卻對蕃瓜弄的過去避而不提。唯有在一張前上海市長、國家總理朱鎔基的照片

138 王蘭花，〈蕃瓜弄裏說巨變〉，頁1。

139 郭天成等編，《閘北區志》，頁1029；2013年7月5日在上海與一位以前住戶的採訪。亦參見Ho, *The Transition Study of Postsocialist China*, 116–117。據《閘北區志》記載，拆除的第二步發生於1992年，何榮宗則認為是在1995至1996年間。

140 上海房價網，<http://sh.fangjia.com/xiaoqu/%E9%97%B8%E5%8C%97/%E7%95%AA%E7%93%9C%E5%BC%84>，訪問於2014年2月16日。

141 上海圖書館編，《老上海風情錄：建築尋夢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



圖 2.10. 上海城市歷史發展陳列館中的棚屋模型，2013 年 6 月 12 日。由作者拍攝。

中，仍保留了一絲棚戶區的蹤影。照片中，朱鎔基正在走訪一個不知名的社區，顯然，總理到訪的光輝榮耀超過了公寓樓淪為當代貧民窟的負面形象。¹⁴²

不過，關於棚戶區的展覽仍在一個地方繼續存在。上海城市歷史發展陳列館位於上海地標明珠電視塔的底層，陳列館的蠟像廳中展出了棚屋和滾地龍的立體模型。一個衣衫襤褸的男子人像正佝僂在半人高的茅草頂下，其他人物則要麼背著孩子，要麼撿拾柴草，肩上扛著沉重的擔子。模型既沒有標記，也沒有註解，怪異地置身於大華飯店的翩翩舞者和哈同花園的微縮模型之間。參觀者只有閱讀紀念冊，才會明白這些

142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市閘北區委員會編，《上海改革開放二十年系列叢書：閘北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8）。

都是舊時的情景和空間，是「過去的足跡」。冊子還介紹上海是一座追尋「上海夢」的移民城市，並且列出1949年棚戶區的數量，最後總結道，在過去的十年間，棚戶區均被清除，取而代之以高樓與綠植。在展覽的介紹中，大華飯店是蔣介石與宋美齡舉辦盛大婚禮之地，哈同花園則是哈同 (Silas Aaron Hardoon) 邀請中國學者共研甲骨文的地方。¹⁴³ 在毛時代的蕃瓜弄展覽中，類似場景的標題則截然不同——前者想必會被稱為反動分子蔣介石腐朽的生活場景，後者則是帝國主義的遊樂園；當這類場景與棚戶區相並列時，富裕的景象則必是對「舊社會」的譴責。¹⁴⁴ 儘管如此，毛時代的遺風一絲尚存：雖然人力車夫已不復存在，代之以搬運工人的蠟像，但棚戶區依然且必須被刻畫為過去的遺跡。

毛時代的第二個遺存在於對家庭內飾的展覽，透過表現家裝隨時間的物質變化，展現出社會向現代化的邁進。從改革時代開始，生活將越來越好的信念一直是國家合法性的核心。儘管不再以今昔的鮮明對比作為框架，不再以解放前後作為界限，衡量標準也從住房和就業變成了如今的消費品，但展望未來繁榮昌盛的敘事依舊存在。在2010年的上海世博會上，參觀者在中國館看到的第一件展品就是一系列立體模型，分別展示了1978年、1988年、1998年和2008年的家庭空間。1978年和1988年的家庭仍然掛著紅旗獎狀，傢具則從保溫瓶和柳條蒸籠變成了冰箱和電視。然而，到了2008年，參觀者眼前是一間寬敞的客廳，配有宜家風格的現代沙發和仿明式木椅，牆上掛著抽象藝術畫，桌上擺著仿青銅器皿。儘管中國館的展覽僅從1978年開始，但日常生活的材料仍被看作社會轉型的證明，而今日的特例——正如當時的蕃瓜弄——也依然被視為普遍的代表。

143 上海城市歷史發展陳列館有限公司編，《百年回味：上海城市歷史發展陳列館巡禮》（上海遠東出版社，2003），頁108–111。

144 上海市檔案館B3-2-199，頁24。裴宜理同樣注意到這場展覽中沒有了政治元素。參見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s Politicized Skyline,” in *Shanghai: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for Modern China*, ed. Peter G. Rowe and Seng Kuan (Prestel, 2004), 107。



圖 2.11. 1978 年的家裝內飾。上海世博會，2010。由作者拍攝。



圖 2.12. 2008 年的家裝內飾。上海世博會，2010。由作者拍攝。

世博會中國館的1978年家裝與蕃瓜弄的工人新村有一個相通之處——毛主席像。在閘北區檔案館的蕃瓜弄公寓照片中，毛主席像隨處可見。¹⁴⁵懸掛毛主席像是一種模範行為。據《解放日報》報道，在1964年的蕃瓜弄喬遷日，花在福和陳冬英夫婦率先掛上了毛主席像，這是他們的女兒——一名模範工人用自己的獎金買的。以前，陳冬英會在牆上貼紙神，但現在她宣佈，「讓〔神像〕和舊屋一起拆掉吧」。¹⁴⁶1965年春節，孫秀珍在毛主席像前憶苦思甜，發誓絕不再迷信，不再拜神燒香了。¹⁴⁷雖然新聞報道了居民們摒棄迷信的所言所行，但蕃瓜弄今昔展覽會只展示出這種信仰轉變的外在表現。在後毛時代的改革時期，人們對蕃瓜弄龍神的崇拜又捲土重來。非物質與超自然的信仰世界究竟有何變化？在第三章中，我們將探討上海官員如何利用展覽塑造信仰，教育「生在紅旗下」的一代人熱愛科學、破除迷信。

145 閘北區檔案館 ZJ-30-E0##。

146 〈蕃瓜弄居民喜氣洋洋遷入新居〉，《解放日報》，1964年7月17日，頁2。

147 〈笑迎新居第一春：蕃瓜弄居民歡度除夕〉，《解放日報》，1965年2月2日。

第3章

策展信仰

少先隊員的迷信與科學之爭

小駱根妹的奶奶常常見到異象，由此編織成一則警世實錄。1963年，駱根妹還是一名初二學生，資歷幾乎無可挑剔：她來自工人家庭，是上海的少先隊員，也是同學們的榜樣。唯有一點不足之處，她家充斥著鬼故事，這類「迷信」邪說不僅可用來反對共產黨的政策，也威脅著「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的年輕一代。¹駱根妹還在上小學時，有一次她在寫作業，奶奶卻突然「發作」了——她口吐白沫，直翻白眼，用鄰村已故地主的聲音說話，斥責村民們沒給他燒紙錢在陰間使用。駱根妹還告訴少先隊員們，前一年，她的奶奶曾夢見自己被村裏的廟神和上海城隍神反復拉扯。村廟神勸她回家，但城隍神堅持要羅奶奶供奉祭品，如果她回到農村，上海冥界的所有鬼魂都會身無分文，流離失所。對此，駱根妹的科學老師表示，沒有所謂的鬼神靈怪，但駱根妹反駁道：「有的，我也看到的。」²

1 我將「迷信」當作一種行為主體的類型，「迷信」是國家強加的負面標籤，更準確地說，這類習俗應該稱為本地宗教的一部分。關於對行為主體類型的使用，參見Schmalzer, *The People's Peking Man*, xviii。

2 上海市檔案館C27-1-51，頁144。關於紙錢，參見C. Fred Blake, *Burning Money: The Material Spirit of the Chinese Lifeworld*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1)。

駱根妹作為共產黨最小的代理人之一，強調她的故事有多重原因。其一，羅奶奶的異象被解讀為對共產黨政策的反抗：駱根妹故事的記錄者評論道，羅奶奶是農業戶口，但她不想回到鄉下。當時，農村剛經歷饑荒，政策要求人們返回農村，因此，羅奶奶的夢境是利用迷信來抵制國家的遷散政策。同時，駱根妹固執地堅持鬼魂的存在，正是老一輩的迷信思想腐蝕革命青年的例證。雖然沒有明說，但駱根妹的話和奶奶的夢境表明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行為和想法：羅奶奶不僅罔顧國家禁令，繼續燒紙錢，她還任由鬼魂附體，讓地主的靈魂越出墳墓，鼓勵焚燒紙紮的「封建」行為。雖然這份報告在不經意間採信了地主鬼魂的說法，但報告的結論是有階級敵人利用迷信威脅新社會。³即使是過去地主的鬼魂，也可能對革命構成威脅。

為了掌握年輕人鬼神迷信的情況，上海市少年科學技術指導站向少先隊員們收集了許多類似駱根妹這樣的故事，旨在舉辦展覽，教導中小學生「熱愛科學、破除迷信」。展覽組織者採用了調查的方法，遵循了1960年代在中國進行定向宣傳展示的既定模式：首先到群眾中去，分析他們的思想；然後收集材料，重新加工，以便針對群眾的思想；接著將展覽作為教學的課堂；最後研究參觀者的反響，確定展覽的成效。⁴根據這個流程，科技指導站基於研究發現的資料籌辦展覽，展期自1963年12月5日持續至1964年1月11日。每週三至週六下午以及每週日上午，老師都會帶領學生，前往舊法租界教眾集中的岳陽路參觀展覽，參觀學生總計13,405人。⁵講解員先帶領訪客參觀五個房間，房間內張貼著宣傳畫和其他展覽材料，隨後學生們則在三個活動室裏自行探

3 上海市檔案館C27-1-51，頁144。

4 上海市檔案館C1-2-3596，頁46-53。這份報告的作者姓名有部分已難以辨別，但殘存的信息表明，它是1961年12月9日由紡織廠黨委宣傳部撰寫的。

5 上海市檔案館C27-1-51，頁1、156。此處只說信眾，但由於徐匯區相對富裕，有眾多外國學校和教堂，因此很可能指代基督教徒。

索，其中包括天文學課程、演示電力運作的遊戲和一間微型電話局。⁶ 這些科學課旨在破除迷信思想，在駱根妹這一代人中培養革命的主體。

1963至1964年，上海舉辦了眾多科普活動，「熱愛科學、破除迷信」只是其中之一。這場展覽後來又在靜安區、黃浦區和南市區的其他學校巡迴展出，總計有31,700名參觀者。⁷ 但就一般的科學展覽，尤其是科技指導站的活動而言，這場展覽的規模仍然相當小。它從未像其他展覽那樣在《科學大眾》雜誌上獲廣泛報道，而只是面向上海青少年開放的數百場展覽之一，參加人數只佔1963年科技指導站所覆蓋的學生總人數的16%左右。⁸ 相對於一大會址或蕃瓜弄，這是一場臨時展，少有人知。那麼，「熱愛科學、破除迷信」展覽對我們了解毛時代的展覽文化有何啟示？

雖然規模不大，但這場展覽代表了從社區到學校再到工廠的地方臨時展覽，而這些展覽構成了毛時代中國日常生活的一個特徵。在科學教育或衛生運動的背景下，高敏 (Miriam Gross) 指出，展覽被視為最受群眾歡迎、最行之有效的手法之一。⁹ 作為一場事先研究、事後跟進的宣傳展覽，「熱愛科學、破除迷信」的組織過程既揭示出在新中國繼續存在的迷信信仰，也體現出以科學知識取代迷信的重重困難。儘管科技指導站在官方報告中宣稱，迷信鬼神的學生如今已經理解這些想像只是大腦的產物，相信鬼魂顯靈的人們現在也知道了這類現象的「科學邏輯」，但展覽背後的工作表明，這場展覽並未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熱愛科學、破除迷信」的展覽文字不僅表明了宣傳者希望人們相信的思想，同

6 同上註，頁123–125。

7 上海市檔案館C27-1-58，頁1。

8 同上註；上海市檔案館C42-1-140，頁18a–20b；見1950年10月號的《科學大眾》，頁51、1952年6月號，頁172–174，以及1952年11月號。

9 Miriam Gross, *Farewell to the God of Plague: Chairman Mao's Campaign to Deworm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 95–96. 舒喜樂同樣指出，關於人類進化的展覽廣受歡迎，參見Schmalzer, *The People's Peking Man*, 68。

時也揭露出人們仍然持有的信仰。展覽採用了教義問答的形式，只有科學是唯一正確的答案，這不僅暗示出展覽的局限性，也解釋了為何一些學生最終只是口服心不服。

反迷信運動

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國家為遏制迷信採取了兩種方式：限制迷信行為、開展宣傳活動。宣傳的勸導工作，旨在警告群眾迷信的危險，並說服人們相信科學的真理和優越性。科學宣傳往往伴隨著展覽。1952年，電影《一貫害人道》抨擊了1949年後中國最大的民間救世團體「一貫道」，還播出了一場反迷信展。¹⁰ 電影中，北京的參觀者在展覽前列隊經過，展覽列舉了各類罪行，批評其「披著迷信的外衣」進行反革命活動。之後，參觀者坐在舞台前，三位女士上台演示一貫道的儀式；隨後，一人拿起話筒對一貫道進行「揭露」與「譴責」，斥其應對她父親之死負責。在這個倒敘的故事中，展覽提供了講述的框架；結尾，這位女士對共產黨和毛主席深表感謝，最終三名一貫道成員被繩之以法，此時，展覽的參觀者變成了判決的群眾。¹¹ 這場影視化的展覽既強調了新政權的合法性，同時也警示了革命的敵人。

10 李恩傑、王光彥導演，《一貫害人道》（中央電影局北京電影製片廠，1952）。特別感謝鄧騰克向我推薦了這部電影。關於一貫道的歷史，參見Stephen A. Smith, “Redemptive Religious Societies and the Communist State, 1949 to the 1980s,” in *Maoism at the Grassroots: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Era of High Socialism*, ed. Jeremy Brown and Matthew D. Johns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340–364。

11 留意故事中被沒收的物品——美國國旗和國民黨旗、手槍、徽章等物品在審判庭上再次出現，讓人想起電影開頭的展示品。



圖 3.1. 《一貫害人道》的電影劇照，1952。

另一種形式的反迷信展覽則利用科學駁斥民間信仰。例如，1951年，上海科普協會在中秋節期間為工人們舉辦了一場以月亮為主題的展覽。展覽不僅勸阻人們不要對月祈福，還解釋了月食並非由天狗食月造成，此外更給工人們上了一堂政治課：在對月球科學有所認識，並了解到過去的迷信是一種階級壓迫的形式之後，工人們會更加熱愛人民政府與共產黨。¹² 此外，迷信事件的發生地也可能舉辦臨時展覽。以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研究的神水為例，由於民眾謠傳神水可以治病，中共工作隊趕到神水地，向前來朝聖的群眾解釋飲用神水的危險。對於1953年上海附近的這場新涇案，史密斯稱之為「對神水事件最協調有序的官方干預」，並將工作人員的應對稱為「教科書式的壓制行動」。工作隊最初試圖填滿泉眼，不料引發暴力，工作隊便適時地改為勸誡，並在神水旁舉辦了一場關於細菌的展覽，讓人們用放大鏡看清水中的生物體。¹³

12 羅定江，〈介紹月亮展覽會〉，《科學大眾》，第6期(1952)，頁172-175。

13 Smith, "Local Cadres Confront the Supernatural," 155, 157, 163-164. 史密斯指

但十年後，「熱愛科學、破除迷信」展覽的組織者表示，舊社會的迷信信仰仍繼續影響年輕人的思想。因此，科學宣傳的批評對象是多方面的——迷信、「封建迷信」、「異聞傳說」或「宗教迷信」，這些名稱往往混用。唯一一位留下姓名的展覽組織者顧鏡清強調道，由於年輕人缺乏科學知識，導致他們相信靈魂、夢兆以及鬼神的存在。顧鏡清認為，假如沒有科學，孩子們就會沿用家長的做法，向神靈祈禱或參加彌撒。為此，這場展覽旨在傳播科學知識，宣揚無神論，樹立唯物主義與階級鬥爭的世界觀。展覽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否定靈界的存在，第二部分強調迷信思想的危害，第三部分讚頌科學及其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¹⁴

這種科學與迷信、現代與宗教的對立並非一個新現象。在近期的一部研究著作中，高萬桑 (Vincent Goossaert) 和宗樹人 (David Palmer) 展示出各類宗教和迷信如何構成了現代化工程與革命項目的組成部分。他們寫道，從1900年代的晚清開始，中國掀起了一場「辨風正俗」的運動，將宗教與所謂的迷信區分開來。¹⁵ 後來的國民黨政權繼承了這種觀點，將迷信視為現代性的障礙。張倩雯研究了政治改革家梁啟超的著作，她指出，時人主張宗教中的迷信元素可被清除，這一觀點正是20世紀文化改革的核心。¹⁶ 然而，國民政府的現代化項目創造出張倩雯所稱的「情感制度」(affective regime)，以國民黨自己的紀年法、儀軌與紀念取代了宗教。¹⁷ 中國共產黨也反對迷信，但以階級敘事來解釋：在舊

出，儘管有些人因為細菌望而卻步，另外一些人則認為這是「天蟲」，還有人只是在飲用前將水煮沸。

14 上海市檔案館 C27-1-51，頁12。

15 Vincent Goossaert and David A. Palmer,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52.

16 Rebecca Nedostup, *Superstitious Regimes: Relig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Modernity* (Asia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2009), 8.

17 同上註，頁23，尤見第七章。

社會中，迷信被用作壓迫的工具，因此必須清除其殘餘，為新的平等主義讓路。此外，如舒喜樂所述，共產黨不僅傳播科學知識、反對迷信，還利用科學支持其政治意識形態：「宣傳者之所以關心科學，是因為科學乃是將政治真理轉化為『自然』真理的有效手段。」¹⁸

甚至在1949年掌權之前，共產黨就一直在努力限制其所認定的迷信行為。在共產黨根據地，官員們開展宣傳運動，鼓勵沒收寺廟，破壞節日活動，不僅對宗教節日發起世俗化改革，還對過去製作禮祭用品的作坊進行改造。¹⁹ 儘管新成立的中國承認佛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和道教五大宗教，並將其納入制度之內，但仍嚴格限制宗教活動的範圍。其中一個主要方法是控制宗教活動的物質文化，例如監管、規範「迷信產品」或香火紙錢等禮祭商品的市場。官員們還對宗教的建築環境做出調整，將某些寺廟重新刻字，並作為歷史文化遺址加以保護。1954年，龍華寺中的宋塔成為上海最早修復的遺址之一，對此，有報道解釋稱，在蘇聯修復歷史古跡也是一項廣受讚揚的成就。²⁰ 城隍廟則由上海文化局和上海文物委員會共同修復，並於1961年重新開放，深受群眾歡迎。²¹ 至於徐家匯天主堂，儘管對其意義仍存在一些爭議，但上海市文化局黨委最終表示認可，它既是一處文化場所，也是外國帝國主義的證明。²²

儘管官方將宗教建築重新定義為文化遺址，但信徒們仍將寺廟和教堂作為禮拜的場所。據駱根妹所述，她的奶奶繼續燒紙錢，還夢見了上海的城隍神。今天，上海的受訪者們仍然記得在五六十年代跟隨祖父母前去寺廟或教堂的情景：一位國民黨官員的兒子（1949年生）記得他四

18 Schmalzer, *The People's Peking Man*, 57.

19 Goossaert and Palmer,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 149–151.

20 黃碧，〈龍華古塔的青春〉，頁20–21。

21 黃浦區檔案館N92-8-868；韓英傑，〈上海老城隍廟〉，《旅行家》，第11期（1959），頁34–36。

22 上海市檔案館B172-1-363，頁26–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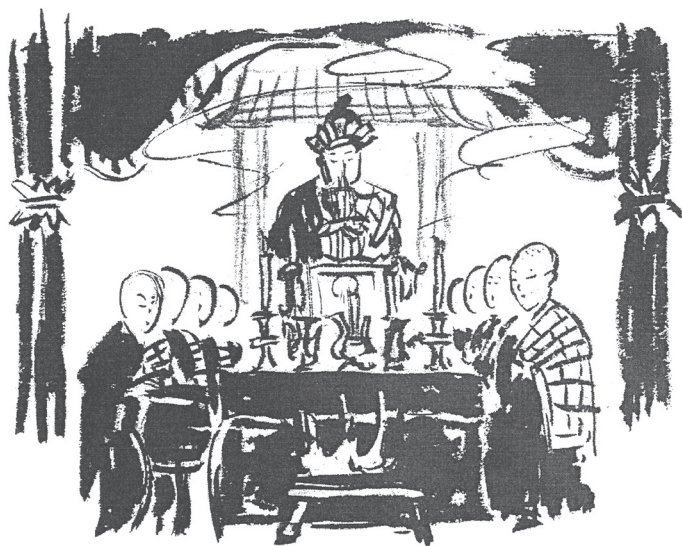


圖 3.2. 「熱愛科學、破除迷信」展覽中的寺廟插畫，1963。上海市檔案館 C27-1-51。

五歲時在城隍廟算過命；一個工人家庭的女兒（1949年生）也在八九歲時跟奶奶一起去過城隍廟；一位工廠負責人的女兒（1957年生）仍記得週日跟奶奶在教堂裏聆聽美妙的音樂。²³ 即使沒有去過寺廟或教堂，他們也還記得家裏的種種宗教習俗：有人在家中供奉神龕，有人晚上偷偷燒香，有樓上的鄰居請僧人做法事，還有奶奶輕聲背誦禱文等等。²⁴ 地區檔案也證明宗教場所大受歡迎。例如1956年，據南市區的官員報告，城隍廟是全上海參觀人數排名第二的寺廟，每週日接待超過五萬名訪客。²⁵ 一位工人的女兒也對拜寺的人群印象深刻：「那時候可害怕了。佛像跟我差不多大，一進去就看到燒香，整個廟裏都是煙。所有人都在拜神，可嚴肅了……跟其他地方完全不同。」²⁶

23 2013年7月9日和7月15日在上海的採訪。

24 2013年7月9日、7月10日、7月21日和7月24日在上海的採訪。

25 黃浦區檔案館N41-1-45。

26 2013年7月9日在上海的採訪。

對此，政府發起了一系列針對宗教領袖的政治運動，隨後將矛頭指向了迷信活動，皆卓有成效。大躍進期間，牧師被下放參加勞動，上海的教堂數量從兩百個銳減至八個。²⁷ 儘管大躍進之後宗教活動有所反彈，但在1964年，緊接著「熱愛科學、破除迷信」展覽，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命令南市區人民委員會「減少城隍廟對群眾的影響」。為了勸阻訪客，政府對廟門進行了遮擋。通往城隍廟的拱門被拆除，南面正門被木板封住，西門也被磚塊覆蓋，只有東面的小側門獲准開放。²⁸ 即便已從外部景觀中抹去了城隍廟的存在感，但人委會仍未停手，更仔細徹查了廟中的物品。在上海文物委員會的協助下，人委會建議拆除十王殿和星宿殿，並指定邑廟董事會移除部分菩薩像，存放於他處，其餘菩薩像則僅以照片形式保存。此外計劃移除的還包括：衙役塑像、「儘量多」的寺廟石碑、任何寫有「封建迷信」內容的物品，以及一扇畫著神鬼圖案的大門。²⁹ 檔案紀錄顯示，這些指示最終得到了貫徹執行，類似的手段也用於整治附近的其他寺廟。³⁰

與此同時，在南市區72間宗教場所中，區委勒令關閉其中50間，其餘場所禁止兒童進入，嚴禁銷售香燭，並縮短開放時間，有時在節假日期間寺廟也完全關閉。³¹ 除了限制手段，宣傳也不可少。南市區委不僅組織講述革命故事，而且在整頓城隍廟的同時，也對附近居民進行思想改造。一方面，當地居民接受了居委會黨委的「教育」，另一方面，上海市宗教局也對寺廟工作人員和宗教領袖進行了「思想教育」。³² 為了

27 Goossaert and Palmer,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 162.

28 黃浦區檔案館N92-1-235，頁22-25。

29 同上註。

30 上海市檔案館B3-2-139，頁28-30；黃浦區檔案館N92-1-194，頁9。凡是帶有「城隍廟」、「孔廟」等字樣的政府辦公部門均在這一時期更換了名稱。參見上海市檔案館B3-2-139，頁27-29；黃浦區檔案館N92-1-194，頁1。

31 黃浦區檔案館N92-1-235，頁24。城隍廟在1966年4月正式關閉。參見黃浦區檔案館N92-1-266，頁2。

32 黃浦區檔案館N92-1-235，頁22-25。資料中並未收錄這類思想改造的具體內容。

說明上述政策的功效，黨委記錄了群眾行為與思想轉變的實例。1963年春節，共計有47,975人來到城隍廟，但在1964年同期，訪客數量降至只有13,746名。³³ 在思想改造之後，官員們引述了居民對反迷信運動的認可：「這些封建迷信的東西確實是有害無益，它們應當被盡快移除」、「這麼好的建築，卻要擺滿佛像，真是可惜！」在官員們大告成功的同時，他們也談及即將於1965年發起的運動，其中就包括一場「打倒迷信展」。³⁴

上海地方官員採取措施限制人們進入寺廟，同時開展反宗教宣傳，其實是在參與一場更大規模的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場政治運動主要旨在打擊幹部腐敗、強化思想教育，也呼應了毛澤東在1963年對「三大革命運動」的定義。隨著科學實驗與階級鬥爭、生產鬥爭並列成為革命的三大運動，科學普及與對迷信的攻擊都隨之增加。³⁵ 在上海以南的浙江省，官員們開始了為期一年的展覽活動，所有展覽均題為「反對封建迷信」。1964年10月，主展在杭州開幕，吸引了超過五萬人參觀，後續展覽在全省巡迴展出，參觀人數估計達到了一千萬人。展覽不僅解釋科學現象，也旨在批駁迷信行為，利用算命先生、風水大師等真實人物，將各地的「真人真事」納入展覽之中。浙江的「反對封建迷信」展大獲成功：展覽現場就有參觀者譴責封建陋習、上交佛像，並留言感謝黨將他們從迷信思想中解放出來。³⁶ 在這類媒體報道中，展覽參觀者、電影《一貫害人道》的主人公，以及上海城隍廟附近居民在思想改造之後的反應都如出一轍。在浙江省外，即使窮鄉僻壤也可以舉辦「反

33 黃浦區檔案館N92-1-194，頁22。

34 黃浦區檔案館N92-1-235，頁24。

35 Sigrid Schmalzer, *Red Revolution, Green Revolution: Scientific Farming in Socialist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39–40.

36 中共中央宣傳部編，《宣傳動態（選編）：1983》，頁62–64。這份報告撰寫於近二十年後，當時發起了反對「精神污染」的運動，以響應胡喬木在1982年號召學習這類科學展覽的指示。胡喬木是親自督辦了1964至1965年展覽的三位領導人之一。

大家起来破除迷信



举办破除迷信展览会，揭露迷信活动的危害，提高思想认识和阶级觉悟。



疏除通信挂图

大家起來破壞迷信

圖 3.3. 「破除迷信」展覽掛圖。科技普及出版社，1965。這張掛圖教育群眾人人都可以反對迷信。圖中最上方描繪了正在參觀展覽的觀眾們。裝掛圖的紙信封上警誡道，掛圖不可向外賓展示、出售或贈予。圖片由上海宣傳書藝術中心惠允提供。

對封建迷信」展；1965年，一套35張彩色掛圖被巡迴展出，內容包括從「迷信的起源」到「學習科學知識、消除迷信思想」等各類教導。³⁷

但究竟什麼是迷信，展覽官員又如何評判當地信仰？了解宣傳過程的一個方法，是將「熱愛科學破除迷信」展覽作為文本進行研究。畢竟，在組織過程中，組織者要深入群眾中間（本文中即直言不諱的孩子們），並列舉出大量他們所認為的迷信信仰。學生們有無數的問題，有些源於對大自然的好奇，例如蘭花如何繁殖？為什麼仙人掌有刺？為什麼含羞草一碰就捲起葉子？³⁸ 有些問題則關於超自然現象，例如為什麼水鬼會把泥巴塞進溺水者的耳朵？為什麼人會做夢？如果神真的不存在，為什麼還有那麼多寺廟？³⁹ 在學生們對神鬼的各種看法中，記錄者不僅記下了他們的疑問，還有他們自己的解釋。對於水鬼，四年級學生崔自英表示死者被人忽視就會干擾活著的人；另一名學生說，水鬼必須每隔三年找到替身才能轉世；還有人堅持說，當城隍神放出黑白無常捉拿活人時，有人聽到午夜的鎖鏈嘎嘎作響。為緩解恐懼，學生們早已預備了遇到鬼魂時的應對之法。如果在夜裏聽到有人喊你的名字，千萬不要應答；如果遇到吸血鬼，要沿直線逃跑；如果遇到鬼，給他買一頂帽子，但千萬不要給他買鞋。⁴⁰ 從駱根妹等少先隊員的經歷中，不難看出其世界觀形成的背景：他們在祖父母和父母的信仰習俗下耳濡目染，熱衷於互相算命、講鬼故事，一些學生或與父母一同祈禱，或依照信仰將星期日視為安息日。⁴¹ 在深入群眾之後，「熱愛科學、破除迷信」展覽多方出擊：不僅回應了問題與信仰，還提出了一種敘述方式，從階級角度詮釋迷信的起源，並將科學作為解藥，以科學思想取代迷信。科學，就是迷信的對立面。

37 科學普及出版社編繪，《破除迷信掛圖》（科學普及出版社，1965）。

38 上海市檔案館C27-1-51，頁120b。

39 同上註，頁148。

40 同上註，頁146-148。

41 同上註，頁150-155。

修辭與敘事

作為一場科學展示，「熱愛科學、破除迷信」展覽包括兩個實驗。第一個實驗回答了人死後如何的問題：人有靈魂嗎？死後屍體會怎樣？為什麼人死後手腳還能動？為了回答這些問題，展覽展示了一隻剛被殺死的青蛙，刺激它的大腦，使四肢活動，由此證明青蛙之所以還能動，既非因為鬼神，也不是靈魂在作怪。⁴²第二個實驗則意在反駁天火之說或火神之火。為了演示自燃現象，講解人舉起一張紙，浸入白磷和硫化碳的溶液中，然後取出——紙著火了，藉此，講解人強調這只是一種自然現象。⁴³可見，除了展覽的文物、圖畫和文字，「熱愛科學、破除迷信」展還加入了實驗作為證據。

科技指導站強調以實物為主文字為補，這符合以實物證據將感知轉化為理性認知的展覽理念。然而「熱愛科學、破除迷信」展覽卻恰恰相反，它主要依賴修辭和敘事。展覽提出並回答問題，為支持科學、反對迷信據理力爭；在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果時，也只看他們能否復述所學。此外，在敘述的背後，展覽還追溯了迷信思想從古代到階級社會、再到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歷史軌跡。其發展歷程大致如下：在古代，人們知之甚少，便將無法解釋的現象歸因於超自然；他們相信日食是某種預兆，天災霍亂都是上天的懲誡；他們聽天由命，祈求來世。此後，統治階級便利用迷信思想作為控制的工具，一方面，壓迫者利用天命之說，自封為天子，鼓吹君權神授；另一方面，他們強化宿命論，從而迫使人們屈服於他們的意志。因此，迷信的存續是一種階級威脅，不僅威脅革命，也威脅著作為革命繼承者的少先隊員們。⁴⁴與1960年代的反迷信手冊一

42 同上註，頁77。

43 同上註，頁90。

44 同上註，頁6-7、19。

樣，「熱愛科學、破除迷信」展覽也從這一總敘述開始。⁴⁵ 階級衝突的歷史，就是展覽的第一課。

展覽的前三分之一專門駁斥任何神鬼相關的概念，將一系列迷信思想的示例以事實陳述或提問的形式交替展示。講解員首先否定了靈魂的存在，表示人類行為是大腦活動的結果，而人體是由物質構成，而不是肉體與靈魂。透過大腦模型、發光板上的神經系統示意圖，以及上文那隻可憐的青蛙，展覽解釋了做夢只是大腦運作的結果（而不是靈魂的表現）、當部分大腦無法休息時為何會發生夢遊、發燒如何干擾大腦（而不是因為遇到了鬼才出現譫妄）。對於「死後會發生什麼」的問題，講解員宣稱人沒有靈魂，也並非由神創造，而構成人體的物質會在死後分解。⁴⁶

展覽第一部分用了很大篇幅討論關於鬼魂的迷信，根據對學生信仰的調查，鬼神之說在學生之間佔主導地位。對此，展覽將教育內容以問題的形式提出：「真的有『鬼打牆』嗎？」、「有水鬼嗎？」等等。對於「鬼打牆」，講解員解答道，人在黑暗中行走之所以容易繞圈，是因為人的雙腿長度不完全一樣；至於「水鬼」，人們溺水並非水鬼作祟，而是因為漩渦、腿腳抽筋或被海草纏住。其中一塊展板專門展示了「磷火」或「鬼火」現象，證明不是鬼在點火、點燈籠，而是腐爛產生的磷光；而火跟人走，也不是鬼魂在追，而是因為磷化氫非常輕，常被吹到路人的腳邊。半個世紀後，一位退休幹部（1954年生）仍然記得這堂科普課，似乎可以證明「磷火」科普是科學戰勝迷信的典型案列。⁴⁷ 對於其他問題展覽也一一解釋：狗不能看到鬼魂，狐狸不會變成狐妖，貓頭鷹也並非

45 參見例如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破除迷信問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頁3-6；孫武編，《談天說地破迷信》（天津人民出版社，1964），頁1；肖鳴等編，《講科學破迷信》（山東人民出版社，1963），頁1-3；長庚，《講科學破迷信》（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64），頁1-2。

46 上海市檔案館 C27-1-51，頁73-78。

47 2013年7月20日在上海的採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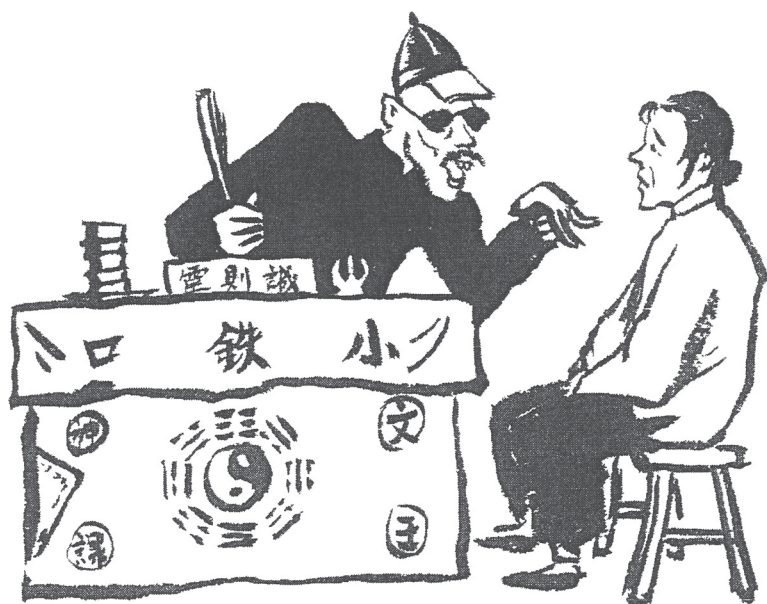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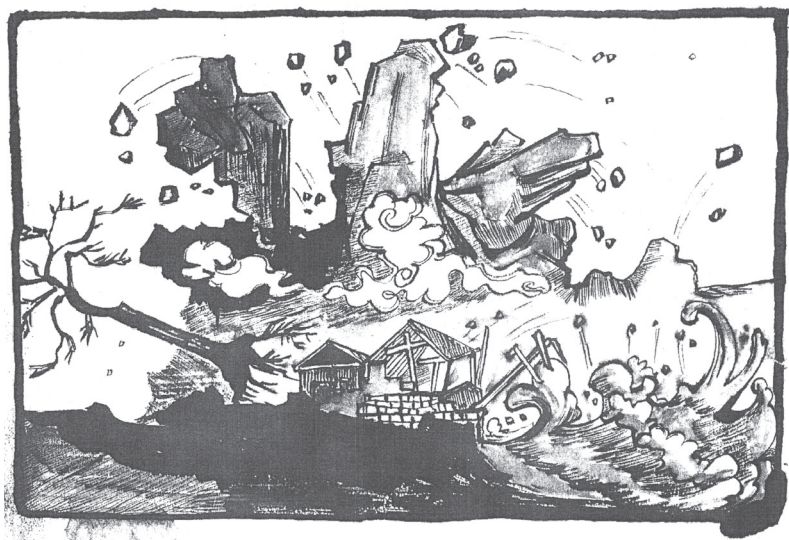


圖 3.4. 及 3.5. 「熱愛科學、破除迷信」展覽上關於自然災害和算命先生的插圖，1963。上海市檔案館 C27-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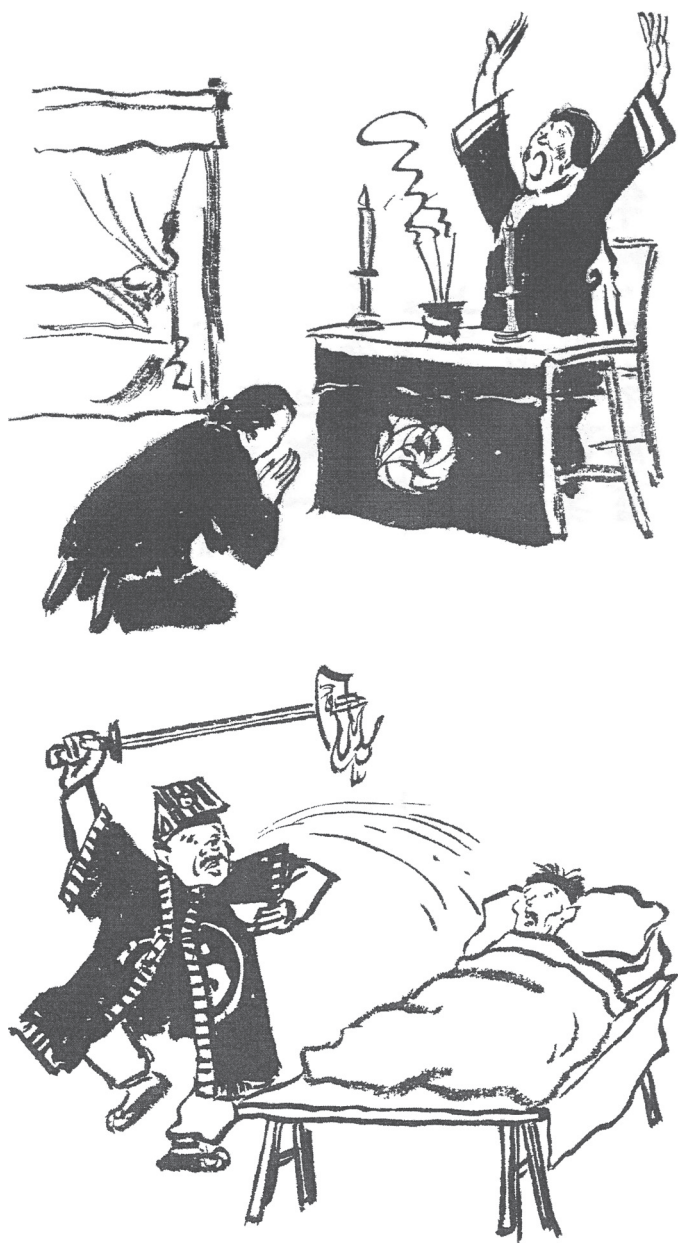


圖 3.6.及 3.7.「熱愛科學、破除迷信」展覽上關於靈媒和驅魔道士的插圖，
1963。上海市檔案館 C27-1-51。

不祥之物。講解員的敘述提供了豐富的語彙庫，幫助年輕的參觀者們消除恐懼，並指出鬼神的存在只是迷信思想的結果。⁴⁸

展覽的第一部分還包括關於自然現象的教育內容。展覽指出，地震不是山神暴怒，而是地殼自然運動的結果。同樣，洪水和乾旱也不是龍王顯靈，現在都可以進行科學的預測和控制。講解文字還奚落了古人對日月食的恐懼，過去每逢日月食，人們都會敲鑼打鼓放鞭炮，企圖嚇退「天狗」放出太陽。瘟疫不是瘟神的作為，龍捲風不是龍王發怒，被雷劈死也不是罪有應得的天譴。自始至終，展覽都依據自然現象來解釋世間萬物，最後講解員總結道，地球是浩瀚宇宙的一部分，既無天堂，也無地獄，它不由神靈開闢，也不由天主創造。⁴⁹ 隨著展覽向第二部分過渡，講解文字批駁了算命先生和靈媒的神力。也許是為了針對不老藥和神水的長盛不衰，講解員駁斥了包治百病的謠傳，聲稱這只是騙人的話術。⁵⁰

展覽的第二部分詳細闡述了「迷信思想的危險」，迷信不僅愚昧無知、浪費錢財，而且是對革命的實際威脅。從反駁鬼神的抽象問答開始，展覽文本列舉了一系列過去與現在的案例分析。透過向學生們展示的三個故事，展覽將迷信（包括宗教）與帝國主義和國家革命相關聯。展覽的第二部分從龔品梅樞機案開始，他被指控為美帝國主義和天主教會進行反革命活動。對龔樞機案的展示如同一場歷史展覽，作為證據一併展出的還有：威脅將愛黨教徒開除教籍的文件、破譯間諜代碼的工

48 上海市檔案館 C27-1-51，頁 79–85。

49 同上註，頁 86–93。

50 同上註，頁 95。斯蒂芬·史密斯認為，神水或聖水是「這一時期共產黨當局所謂的『封建迷信活動』最普遍的形式之一」。見 Stephen A. Smith, “Local Cadres Confront the Supernatural: The Politics of Holy Water (Shenshui) in the PRC, 1949–1966,” in *The History of the PRC (1949–1976)*, ed. Julia Strau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46。

具，以及據說是龔樞機為破壞政權而藏匿的槍枝子彈。⁵¹ 前來參觀的孩子們從小聽間諜故事長大，並從新聞中知道了龔樞機，對他們而言，展覽的文物想必相當令人信服。一位退休幹部（1950年生）回憶起1950年代的一場關於反革命的教堂展覽，他仍記得走進教堂地下室時的恐懼，記得展台和玻璃櫃裏的金條和槍枝，記得展覽如何強調這些東西都曾被藏匿起來，「那時，我們通常看不到美金，一看到美金，我們就認定這些絕對是壞東西……我真是害怕得很。」⁵²

至於當代反革命的案例，講解員講述了如皋縣某公社的故事，告誡參觀者警誡「壞分子」。在如皋縣某公社，有一人名叫姚生，自他死後謠言四起，說他哭泣的鬼魂在村莊之間四處遊蕩。村民們害怕他在田裏的哭聲和半夜推車的吱呀聲，嚇得晚上閉門不出，連生產隊長的命令也不顧，不肯出門看守熟麥。民兵宋廣林不信這套鬼魂之說，於是自行著手解決。一天晚上，他抓住了一個人影，發現是個名叫姚金的「壞分子」，曾在1940年代給日本傀儡政權當過兵。根據講解員所述的「真實故事」，正是這個利用迷信進行破壞的階級敵人姚金，一直假扮鬼魂，偷竊利馬豆。⁵³ 而宋廣林懷疑、揭露「鬼魂」的過程正是一場教科書式的演示，參觀學生還在觀後感中表示，宋廣林的事跡與作家魯迅的經歷遙相呼應。⁵⁴

51 上海市檔案館 C27-1051，頁98；Paul P. Mariani, *Church Militant: Bishop Kung and Catholic Resistance in Communist Shanghai*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92, 196。1960年上海中級人民法院對龔樞機的審判展示出多張房地契、金子、62面國民黨旗、六枝步槍、1,382枚子彈以及兩個無線電發射機。在1979年的上訴書中，龔樞機表示他的住處沒有無線電或任何武器。

52 2013年7月2日在上海的採訪。

53 上海市檔案館 C27-1-51，頁99。

54 同上註，頁151。「魯迅踢鬼」的反迷信故事至今仍為人熟知。據說有一回，著名作家、科學人士魯迅走小路經過一片墳地，看見一個身影狀似鬼魂，他心下懷疑，向鬼影靠近，大聲呼喝，飛起一腳，這才發現原來是一個盜墓賊。2013年7月20日在上海的採訪。

第三個故事跳回1949年前，講述了上海徐匯區一所法國學校的案例，並稱之為「披著宗教的外衣，進行文化侵略」。講解員表示，在徐匯中學，學習外語是為了讓中國學生忘記自己是中國人，所謂的宗教組織其實是反革命團體，禁止學生參加愛國活動的規定也是反動做法。以宗教掩蓋罪行的最後一個案例與傳教士相關——那些死於外國育嬰堂的中國兒童。在展出的照片中，有上海徐家匯育嬰堂太平間的照片，還有一張1949年後的照片，相片中的父母正為育嬰堂裏的孩子們報仇。在講解照片時，講解員動情地說：「同學們，大家看一看，這就是帝國主義借宗教慈善為名殺害我們無數少年兒童的罪證。」⁵⁵在這些案例中，宗教與迷信、過去與現在的敵人、歷史的傷害與當下的威脅，其間的界限都模糊不清，唯一的共通之處在於，信仰都被刻畫成了反革命、反人民的工具。

此外，展覽第二部分也包括迷信對身心的威脅，這些均被歸在「迷信思想的危險」之下。展覽講述了另一件神水案。1958年，寶山縣的一個牧童發現了一個洞口，洞口處有泉水，水冒氣泡。據傳，洞口曾出現「神桃」的字樣，桃仙下凡，神馬過泉，因此泉水包治百病。聽到傳聞，人們從上海郊區蜂擁而至，焚香燒紙，但據報道，喝過泉水的人反而生了病。⁵⁶在展覽的另一個案例中，一名患有肺結核的工人請來靈媒，祈求佛祖為他治病。他花費了120元、一隻雞和三斤菜，但求得的丹藥反而讓病情惡化，最後只有一位龍華療養院的醫生救了他。⁵⁷然而，相比

55 上海市檔案館 C27-1-51，頁101。沈艾娣表示，中國的反傳教運動還包括圍繞著死去兒童骸骨的示威活動。展覽展出的這張照片很可能就是沈艾娣所引用的武昌育嬰堂的照片，這家育嬰堂也是展覽中列舉的育嬰堂之一。參見Henrietta Harrison, "A Penny for the Little Chinese: The French Holy Childhood Association in China, 1843–1951,"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3, no. 1 (February 2008): 91。

56 上海市檔案館 C27-1-51，頁102。講解員解釋說，泉中氣泡是沼氣或甲烷。

57 同上註，頁103。

對健康的威脅，迷信對人的思想與革命意志的侵蝕卻更加危險。講解員回顧了迷信的歷史，並提醒學生們，自古以來迷信都是統治階級的工具，讓窮人們相信命由天定。有鑒於此，講解員鞭策學生們「相信科學，相信真理，培養精神，敢於思考，敢於說話，敢於鬥爭。」⁵⁸

展覽的最後部分題為「掌握科學，征服自然」，這反映了夏竹麗 (Judith Shapiro) 所描述的「毛主義的意識形態，鼓動人民與自然環境作鬥爭」，最終引發了「對自然的戰爭」。⁵⁹ 舒喜樂進一步指出，與其他地方一樣，在毛時代的中國，科學與政治背景密不可分，在科普教育中，迷信「指代任何看似違背科學或阻礙中國進入現代世界的思想或實踐」。⁶⁰ 因此，展覽文字將人們對科學的掌握歸功於毛主席和共產黨的領導。按照毛澤東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指示，人們修建了大型灌溉工程，人民公社也「自由發揮集體力量」。講解員將自然擬人，呼籲人們「與旱澇作鬥爭」，並且斷言「只有依靠我們人的勞動，才能真正征服自然」。接著，透過一系列當代的照片以及來自一個氣象站 (由少先隊管理) 的物品展示，展覽對黨的領導大頌讚歌，是黨在荒蕪的土地上開闢了農業綠洲，發展了預測天氣規律的大氣科學，甚至指派解放軍到空中人工降雨。借用毛主席的話，正是因為科學，我們才有可能探索地球上廣闊的礦藏，用勞動「開山劈地，讓高山低頭……叫河水讓路」。⁶¹

「熱愛科學、破除迷信」展最後教導學生，一旦掌握科學，人們就可以實現甚至超越古時的想像。迷信認為閻王主宰生死，但現代醫學能

58 同上註，頁104–105。

59 Judith Shapiro, *Mao's War Against Nature: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4.

60 Schmalzer, *The People's Peking Man*, 28.

61 上海市檔案館C27-1-51，頁109–112。這句話來自1958年毛澤東的發言：「『讓高山低頭，叫河水讓路』這句話很好。高山麼，我要你低頭，你還敢不低頭！河水麼，我要你讓路，你還不讓路！」。引自Shapiro, *Mao's War Against Nature*, 68。



圖 3.8. 張瑞恆，《乘飛船，探索外太空》。河北人民出版社，1979。圖片由上海宣傳畫藝術中心惠允提供。

夠創造更偉大的奇跡：不僅可以重接斷手，甚至還有人工心臟、人造肺。古人曾想像的千里眼和順風耳，也因望遠鏡和麥克風而成為可能。即使是算命先生對未來的預言，也不及神機妙算的電腦算力。科學還帶領人類在古人只可一夢的世界裏遨遊：前有深海科學家探秘「龍宮」，後有火箭和衛星尋訪「月殿」。最後，講解員指向兩張海報，一幅是孩子們在祖國風光和四個現代化的畫面下學習數學，另一幅是孩子們在科學畫報和《毛澤東選集》的背景下傳播科學知識；講解員藉此鼓勵學生們，只要刻苦學習，有朝一日也可能飛向太空。⁶²

62 上海市檔案館 C27-1-51，頁 113-117、122。

「熱愛科學、破除迷信」展覽堪稱一部活教材；它借鑒了當時的反迷信指導手冊，將問題與答案一併呈現。⁶³ 同樣，展覽敘述也是一堂歷史階級課，它將迷信歸咎於無知和階級壓迫，正是黨將人民從這雙重邪惡中解放出來。敘述堅持反對迷信，支持科學，並用科學的解釋反駁了每一種迷信信仰。然而，儘管展覽以科學為主題，其中卻有諸多不科學之處。科學的陳述被作為正確的既成事實，只因它們是科學的，而迷信信仰必然錯誤，因為它們不是科學。每個論題都遵循如下結構：首先由一個「科學」的主張開篇，如「狐狸不會變狐妖」，然後斥責迷信是「捏造的糟粕」，最後總結「千年狐妖」純屬無稽之談。⁶⁴ 同樣，按照首要原則，迷信是反革命的產物和工具，因此任何與迷信或壞分子有關的東西都必定是反革命。那個扮鬼偷豆的公社成員姚金，既然已是公開的投敵者、壞分子，那麼他對迷信的利用則必然屬於反革命活動。除了少數例外，如對磷火或龍捲風成因的解釋等，講解文本更多依賴「科學本身即科學」的修辭，而並非立基於科學的探究。

最終，展覽以科學的意識形態代替了迷信的意識形態，未能將科學呈現為一種認知方法或質疑方法。如此一來，共產黨就走上了一條（在張倩雯看來）由國民黨開闢的老路，即提出一種新的國家意識形態來代替舊的迷信思想。1963年，即「熱愛科學、破除迷信」展覽的同年，精神病學家羅伯特·利夫頓（Robert Jay Lifton）指出，在毛時代的中國，科學是「意識形態極權主義」的一部分，任何其他思想均遭到否定，「首先揭露……〔它們〕『不科學』，然後證明在真正『科學的環境』中這些思想

63 除了這類反迷信指導手冊外，一套名為《十萬個為什麼》（少年兒童出版社）的叢書從1962年起推出。這套叢書採取問答形式，部分主題與反迷信指導手冊相重疊，尤以以下主題關聯最為密切：動物（第10部，1974年）、夢境（第13部，1974年）、天文（第20部，1977年）和地球科學（第21部，1978年）。不過，這套叢書並未將提出的問題視為迷信思想。

64 上海市檔案館 C27-1-51，頁83。

再無存在的必要」。⁶⁵ 科學本身就是一個無懈可擊的真理，這一理念並非中國獨有，後來也遭到了中國觀察家的批評。1995年，張行在討論博物館與科普時，援引了黨和國務院的文件，強調「過去的科普主要是傳播科學知識，而忽視了科學方法和科學思維」。⁶⁶ 在毛時代的展覽中，學生們被教導要「相信科學」，科學是不容爭辯的事實和不可動搖的第一原則。展覽在最後部分突出展現了科學與迷信的互不相容：因為有神經系統，所以不存在靈魂；因為有大氣層，所以不存在天堂。或許正因為科學的修辭並不科學，所以老師們難以傳達出科學的訊息，一些學生也只是「口服心不服」。正如學生們應該相信革命，他們也奉命相信科學。

展覽之後，信仰之堅

滬肥船民子弟學校的學生大多來自船民家庭。據學校的少先隊報告，在目睹溺水事件後，許多船民孩子都相信水妖。他們出身無產階級，卻極易受到這類故事影響，是「熱愛科學、破除迷信」展覽的理想對象。在兩週的時間裏，學校的全部課程都以展覽為中心。1964年3月20日至4月4日，正值清明節期間，學校組織學生參觀展覽、閱讀報刊和反迷信手冊、參加晨會講座、提問答疑、講故事、做實驗，並進行討論。老師和學生都帶頭示範。就如為了破除學校附近茅草屋有狐妖的傳言，教師帶領學生實地調查，證明狐狸只是普通動物。據說此舉最終破除了學生迷信思想，不再相信狐妖之說。少先隊員將反迷信宣傳成果上報科技指導站，部分教師家屬甚至立即丟棄了家中供奉的香爐。⁶⁷

65 Robert Jay Lifton, *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 (W. W. Norton, 1963), 459–460.

66 張行，〈博物館科普教育功能探討〉，《絲綢之路》，第6期（1995），頁54–55。強調由作者所加。

67 上海市檔案館C27-1-51，頁150–152。

參觀結束後立即發表的觀後感，大多只是形式上的認可狀。⁶⁸ 後來的報告才更能反映參觀者從展覽中學到的內容，例如前文浙江「反對封建迷信」展所收到的反響。對於統治者利用迷信作為階級壓迫工具的歷史教訓，滬肥學校的學生對「舊社會的反動封建統治者」感到十分憤慨。一些四年級、六年級的學生宣稱，由於過去的迷信思想，船夫槳夫甚至不敢看水，只能用被子蓋頭，但是「今後再也不相信迷信，不上敵人壞蛋的當，要做勇敢的共產主義接班人」。⁶⁹ 對於神鬼並不存在的問題，船民孩子們也已對答案熟稔於心，可以背誦出為何沒有水妖、何為磷火與日月食，以及為何狗吠並非因為看到了鬼。隨著思想的啟蒙，他們的行為也發生改變。一位少先隊幹部宣稱，過去學生會在晚上講鬼故事，而「現在沒有人講了……從前我晚上在大隊部值班室內，日光燈燈絲響，走廊一片漆黑，心裏很害怕，現在膽子大起來了」。學生郭來順不僅談到了迷信的危害，還講述了他如何向父母宣傳科普：「〔我〕回家後也要叫爸爸媽媽不相信鬼神，再不要燒紙錢了，不要浪費錢了。」一位名叫劉茂廣的五年級學生斷言：「科學道理是非常正確的，今後要熱愛科學。」⁷⁰ 其他孩子的反饋也與滬肥學生的回答如出一轍，他們的感想往往逐字引用展覽文本，可能還被科技指導站選為範本。⁷¹

時至今日，當年報告中學生們給出的正確答案，在今天上海人的記憶中仍有跡可循。許多人表示，童年所謂的迷信其實是指宗教，他們對迷信的理解就是「誦經念佛」、「燒香拜佛」或「相信鬼魂」。⁷² 一位退休的英語教授（1945年生）回憶說：「當我們還是學生時，宗教是一個禁忌話題……如果你信仰共產黨，那就不能信仰別的宗教。馬克思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如果一個年輕人走進寺廟道觀，人們就會盯著你看。」

68 關於對展覽的評價，參見同上註，頁139–142。

69 同上註，頁151。

70 同上註，頁150–152。

71 同上註，頁156。

72 2013年7月9日、10日、20日和21日在上海的採訪。

太危險了，也很不好。所以沒人去。」⁷³還有一位1957年生的受訪者，生於工人家庭，如今當上了幹部，比當時報告中的少先隊員略年輕一些，他指出當時人們都要上交香爐，「學校裏可不敢談論宗教！那不成了反革命？如果被發現，可不得了！」⁷⁴然而，即使有些學生不敢談論宗教，滬肥的老師們也表示，有些學生只是假裝對反迷信課心悅誠服，仍有學生不由自主地保留了迷信的觀念，而教師本身也缺乏科學知識來駁斥迷信的說法。他們總結道，迷信思想確實根深蒂固，正如階級鬥爭一樣，根除迷信思想將是一個「長期而複雜」的過程。⁷⁵

由「熱愛科學、破除迷信」的展覽文本可見，儘管國家開展了反迷信運動，但毛時代的中國仍然存在各種行為和信仰。據展覽前後科技指導站所收到與提交的報告來看，「迷信思想」繼續影響著人們看待周圍世界的方式。不論他們是否是少先隊員，也不論是徐匯區的城市孩子抑或生活在社會邊緣的船家子女，展覽所批評的思想仍然存在，儘管原因可能各不相同。學生們傾向於相信靈魂，也相信人鬼共存，也許不僅因為老師的解釋無法完全消除他們的信仰，也因為鬼故事和玄學迷信相當有趣。一個工人家庭的女兒（1949年生）回憶說：「奶奶們當然喜歡講鬼故事，我們小孩可愛聽了，越害怕越好聽！這種講故事，沒人管得了。」⁷⁶科技指導站調查的學生們能說出五花八門的鬼怪：吊死鬼、水鬼、吸血鬼、大頭鬼、小頭鬼、無頭鬼……各種生動故事也信手拈來：一個自殺鬼頭戴綠帽、以扇遮面，在武康大樓的電梯裏出沒；三所學校的學生都聲稱，紅星戲院會隨著戲劇吟唱閃爍紅綠燈光；住在城隍廟旁的孩子們還說，他們曾在午夜聽到鐵鏈作響、鑼聲鏗鏘。⁷⁷

73 2013年7月8日在上海的採訪。

74 2013年7月24日在上海的採訪。這位受訪人自豪地表示，他出生於工人之家，屬於紅五類。事實上，他的父親曾受到雙重壓迫——先是在江蘇農村做工被地主壓迫，後來又成為上海一家工廠的工人。雖然他的家人曾住在滾地龍，但他說他「生在紅旗下」，不可能住過滾地龍。

75 上海市檔案館C27-1-51，頁152。

76 2013年7月9日在上海的採訪。

77 上海市檔案館C27-1-51，頁153。

迷信故事之所以吸引學生，也因其能夠解釋各類靈異事件。楊浦區第二小學四年級學生崔自英表示，如果不迷信，不給離世的鄰居上供、祭祀，就會「鬧鬼」，害親人生病。崔自英堅定地說：「補做『梗飯』後，他父親的病很快就好了。這說明鬼是有的。」⁷⁸ 在老師們看來，迷信等同於宿命論，而令他們苦惱的是，學生們也對算命頗有興致。在與駱根妹的同場訪問中，少先隊隊長張如玉講述了她父親的預言能力。他曾給一個老人卜算何時作古、給一個食道癌患者算過何時病逝——並且精確到月日。父親如此鐵口直斷，張如玉也讓他給自己算命，他預言她中考大捷，果真她順利考上了上海市市西中學。⁷⁹ 正如科技指導站的報告，「少數」學生仍在城隍寺求神拜佛，為他們的入學考試許願祈福。⁸⁰

學校工作人員承認，由於學生家庭的信仰，迷信觀念仍然屢禁不止。因此，雖然官方路線——同時也是「熱愛科學、破除迷信」展覽的前提——是讓革命的一代不受迷信思想污染，但科技指導站的報告卻表示，兒童「深受家庭封建迷信思想的影響。少年兒童相信鬼神是與家長信仰各種宗教有直接的關係」。學生楊萬里來自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家庭，面對逆境，他曾誦經祈福渡過難關。向陽中學初二學生林德遠奉行基督教信仰與實踐，不顧老師的一再敦促，拒絕在安息日上學。在徐匯中學，初一學生周德國經常去徐家匯天主堂做彌撒，他虔心立志長大後成為一名牧師。⁸¹ 科技指導站的報告可能有意將這些學生刻畫成少數的異類，但的確反映出未能完全根除「迷信」。

78 同上註。

79 同上註，頁144。

80 同上註，頁154。升學的競爭非常激烈，據魏昂德 (Andrew Walder) 計算，在1965年入讀小學的學生中，只有9%有望升入初中，其中又僅有15%有望升入高中：「總體而言，1965年入讀小學的學生升入高中的機率為1.2%，上大學的機率不到0.5%。」參見Andrew G.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0。

81 上海市檔案館C27-1-51，頁155。

機密期刊《內部參考》上常常刊載關於迷信和宗教習俗的報道，可以說明上海人仍繼續參加相關活動。1950年代，公安局對仍活躍在新中國的算命先生採取了嚴厲手段。在延安東路的某區，公安局制裁了四位算命先生和兩家命相館，其下員工共計24人。公安機關譴責算命先生是「壞分子」，妨礙人們工作或求醫治病，但不得不承認，命相館的生意很好，甚至有足夠的營收聘用僱工。⁸² 公安也追蹤了祭祀用品的市場動向，以打擊迷信。1956年春節期間，香燭香火的銷量比上一年增長了45%，蠟燭完全售罄，人們只得清早排隊購買錫紙作為供奉；上海的市場甚至吸引了來自安徽、吉林和大連的買家。次年，城隍廟的工作人員預計1957年會賣得更好，於是計劃增加三萬串紙錠、五百斤蠟燭，還另外僱用了二十名臨時工。在城隍廟熙熙攘攘的朝拜者中，不僅有許多老太太和家庭主婦，也不乏幹部和工人。工作人員認為，出現這種變化可能是因為工資上漲，或者人們因百花運動而放鬆了警惕。但不管出於何種原因，據說上海的寺廟禪院總是人潮如湧，「香火旺盛」。⁸³

如果說，在經濟繁榮與政治開放的時期，拜寺的人數會增加，那麼頻繁的政治運動和嚴重的饑荒也可能導致同樣的結果。根據歷史學家周遜發表的文件顯示，雖然隨著集體化的推廣，人們抨擊宗教是「封建迷信」，但隨後幾年的「自然災害」卻在部分農村地區引發了宗教復興，農民們因對黨的政策和地方幹部感到失望，轉而投向了信仰。無論是真耶穌教會祈求奇跡，還是千禧年信徒對地方當局的反抗，這類抵抗行為都帶上了宗教色彩。在大躍進之後，雲南的基督徒仍然秘密去教堂集會；四川的天主教徒則靜靜禱告，「如今生活如此艱難，讓我們的靈魂做好準備，等待上帝」；在雲川兩省的其他地方，幹部也報告說超自然治療法重新復甦，還有人向龍王祈雨，四川西昌地區的農民甚至批評地方官

82 〈上海市命相館測字攤：宣揚迷信危害社會生產和人民生命的現象嚴重〉，《內部參考》，1955年5月18日。

83 〈上海市迷信品銷路大增〉，《內部參考》，1957年1月29日；〈今年上海市迷信品和壽衣壽材銷路大增〉，《內部參考》，1957年10月25日。

員未能提供宗教上的救助：「過去，地方官還會在政府辦公樓外上供祈雨，如今縣長們什麼都不做。」⁸⁴

但在其他情況下，官員們的**確**與人民站在一起。關於迷信的報道傳達出一種潛在的不安——國家的代理人本身也是迷信的信徒，這點從上海城隍廟的幹部們和接受採訪的少先隊員身上可見一斑。據《內部參考》報道，在1953年的新涇神水案中，趕到現場用瓶子接神水的人裏也不乏黨員、團員和幹部。⁸⁵ 上海和其他地方的幹部也和家人一起去城隍廟拜謁，更為父母舉辦隆重的葬禮，被人批評言行不一——「黨員還講迷信哩！」⁸⁶ 在1960年代初的饑荒之後，隨著經濟好轉，一些官員不僅允許甚至還自己參與祭拜以感天恩。1962年，南京附近的生產隊修建了祭壇，並舉行宗教慶典，祈求豐收。⁸⁷ 同年晚些時候，廣東農村的農民集資修繕廟宇、建造祭壇，公社也在豐收後收集捐款供奉祭拜，更有數百人穿越縣鄉、公社為先人掃墓。雖然一些幹部曾試圖阻止這類迷信行為，但群眾堅持認為他們擁有「信仰自由，不得干涉」。甚至在某個公社裏，不止群眾，連幹部也一起將豐收歸功於神靈的祝福。⁸⁸

不論是針對信仰本身，還是針對迷信活動，反迷信運動都收效甚微，原因為何？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上海一位退休的公安局官員（1942年生）表示：「這些信仰老百姓已經信了幾千年！從國家的角度來

84 Xun Zhou, ed., *The Great Famine in China, 1958–1962: A Documentary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90–113.

85 〈江蘇各地流傳著取仙水治百病的迷信風氣〉，《內部參考》，1953年5月26日。

86 〈北京市採取措施制止殯葬的迷信活動〉，《內部參考》，1963年12月10日。為防止厚葬，北京市政府成立了一家殯葬服務公司，並動員公安局，打擊那些在葬禮上賺錢的假和尚。之後的「五反」運動也包括反迷信宣傳。最後，如果人們仍不同意火化遺體，那麼棺木和墓地的價格就會相應抬高。

87 〈有些公社出現各種迷信活動〉，《內部參考》，1962年1月24日。據報道，有66個「拜懺、做道場」的案例、168例公社道觀，以及213例建造祭壇。

88 〈農村迷信活動的發展影響生產和社會治安〉，《內部參考》，1962年12月25日。

看，即使他們想消滅這些，也行不通。這些想法就在人們的腦子裏的，每個人想信什麼就信什麼。」⁸⁹ 信仰依然存在，而且比宣傳所界定的遠更複雜。1963年夏，即「熱愛科學、破除迷信」展覽的同年，吉林省的一份報告顯示，農民對官方僵化刻板的攻擊嗤之以鼻。群眾被迫拆除他們的小廟，砸碎他們的神像，但他們不滿地回答：「繼續扒吧，扒了以後我們再建。」這一案例說明官員們「不了解情況的複雜性」。⁹⁰ 也許正是因為群眾的反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才抨擊迷信，限制寺廟活動，加強政治宣傳。

最後，「熱愛科學、破除迷信」的展覽文本或許能為反迷信論述的失敗提供些許線索。該展覽反映了總體的反迷信宣傳，創造出一個與科學對立的迷信類別。其敘述向人們教授了一種新的歷史與語彙，但「迷信思想」只是被一種科學的意識形態與信仰所取代，致使科學淪為了一套事實或原則，失去了它作為質疑之法的用途。此外，儘管策展人建議使用實物證明，但展覽的絕大多數內容都只是寫在展板上的文字；健康展覽可以在顯微鏡下展示細菌，但要如何演示超自然並不存在，無疑更加棘手。難怪科技指導站所採訪的行政人員、教師和助教都感到茫然無措。報告顯示，「有些學校老師感到無神論教育很難進行，有些問題連我們自己也講不清楚，說服力不強，不敢主動進行工作。」⁹¹ 雖然展覽文本以問答形式呈現，但幾乎沒有跡象表明學生們曾自發在現場提問。不過，他們肯定在學校裏提過問題，而老師們並不總是知道答案。

展覽將科學和迷信對立起來，互相排斥。比如，因為存在大氣層，所以不存在天堂。然而，從傳統上而言，中國的宗教是相互融合的，所以人們可能信奉多種信仰而互不衝突。這一時期的報道採訪了身為基督教徒的共青團員，從中可以看出他們如何將宗教信仰與新的國家

89 2013年7月21日在上海的採訪。

90 〈制止封建迷信活動不能採取簡單急躁方法〉，《內部參考》，1963年8月15日。

91 上海市檔案館C27-1-51，頁155。

政治意識形態相調合。1963年，《內部參考》上的一篇文章報道，在四川的天主教縣城中，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共青團員周元英表示：「入團是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奉教是為了死後『靈魂』得救，所以我是黨的話也聽，教會的話也聽。」共青團的另一位領導人李玉英對此表示贊同：「信仰了天主教，可以不做惡事，不犯罪，信教不是迷信。」⁹² 在天津，前往教堂的青少年人數增加，少先隊員們認為他們的宗教與毛主席並不衝突。「毛主席叫人學好，天主也讓人學好」、「毛主席關心我們進步，天主也關心我們進步」、「天主和毛主席一樣關心我們」。⁹³ 不少孩子不太願意用展覽中非黑即白的措辭來看待已知與未知的世界，對他們而言，科學或許只是另一種信仰方式。

最後，「熱愛科學、破除迷信」展覽中的宣傳之所以並不完全有效，是因為它沒有認識到人們堅持信仰的原因之一是共產黨在諸多方面辜負了人民，人民不得不訴諸於比共產黨更高的力量。從1953年上海農村的新涇神水案開始，迷信行為的出現與人們對國家的批判同時存在。正如斯蒂芬·史密斯所述，據幹部報告，農民聲稱負擔不起醫療費用，所以靠聖水治病。⁹⁴ 但史密斯未曾提到的是，群眾還對地方幹部和人民政府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但當這些評論在官僚系統中層層上傳時，卻都被塗黑，從紀錄中刪除了。⁹⁵ 貫穿整個毛時代，人們的宗教活動始終屢禁

92 〈有些地區宗教對青少年的毒害很深〉，《內部參考》，1963年3月8日。這項研究調查了四川的廣元、眉山、新繁等地，這些地區的天主教徒比例很高。在廣元的榮山公社，超過83%的25歲以下社員經常參加天主教活動，包括與父母一起每天兩次閱讀聖經，以及背誦經文、唱誦聖歌。在容昌的河包公社，23名共青團員中有20人都參加了天主教活動。

93 〈天主教用各種陰謀詭計和我們爭奪少年兒童〉，《內部參考》，1963年5月28日。

94 Smith, "Local Cadres Confront the Supernatural," 148–149.

95 上海市檔案館A22-2-137，頁60。在數字化之前，讀者可將檔案放在光線下閱覽這些評論。評論包括：指責幹部保護人民醫院的經濟利益、批評幹部只會欺凌羞辱勞動人民。向神水朝聖的群眾還指責人民政府過於官僚，

不止，因為信仰是他們理解周圍世界的方式——1956年漲工資，人們在上海的城隍廟裏拜謝神明；豐收時，人們又在農村燒香。在經歷了大躍進引發的饑荒後，地方官員和當地群眾都向神社供奉祭品。而諷刺的是，大躍進正是建立在政治意識形態的「科學」之上，建立在以人的革命意志實現農業豐產的信念之上的。與其他運動一樣，在大躍進中，人們被教育要相信共產黨，相信政策。隨著大躍進毀滅性的失敗，其「科學」與政治的意識形態都威信掃地，正如「熱愛科學、破除迷信」展覽所述，為了理解國家所謂的這場「自然」災難，群眾只好向宗教尋求答案。⁹⁶或許小駱根妹太過年輕、太過都市化，無法理解奶奶的幻象，但羅奶奶之所以夢見了村廟神，可能正是因為她不願回到那個她曾目睹了太多餓死鬼的傷心地。

小結：迷信與科學之爭的遺響

隨著毛澤東的逝世與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南市區官員驚愕地發現，信徒們重新出現了在上鎖的城隍廟門外。1980年代初，人們就開始在春節期間來到城隍廟，由於廟門禁止開放，他們就在門外燒香。來訪人數逐年增加，據南市區報告，到1993年，大約有三四千人聚眾上供。⁹⁷雖然報道沒有區分老人和年輕人，但1980年代中期的其他內部文件顯

揚言不繳糧稅，邊罵幹部邊燒香。

96 關於近年科學家對大躍進的反思，參見Shapiro, *Mao's War Against Nature*。在對浙江瑞安研究中，汪小烜主張，毛時代國家之所以未能有效控制宗教，是因為「政令不一致」以及「宗教政策的說法和類別缺乏穩定性、確定性」，參見Xiaoxuan Wang, “The Dilemma of Implementation: The State and Relig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90,” in *Maoism at the Grassroots: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Era of High Socialism*, ed. Jeremy Brown and Matthew D. Johns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260–261。

97 黃浦區檔案館N92-1-637，頁14。

示，年輕人的宗教信仰有所增加。1986年，據說上海的年輕佛教徒人數不斷上升，總計約兩萬至兩萬五千人，另有三萬名年輕人表現出某種「宗教意識」。在農曆正月初一前往玉佛寺的四萬多人中，年輕人約佔54%。新華社寫道，「這是上海解放以來未曾有過的現象。」在改革初期，這些只比1963年的少先隊一代稍晚出生的青年們，面對日新月異的變革時代，向宗教尋求慰藉：單位只管生活，黨只關心收稅，他們信奉佛教是為了做一個誠實善良的人。⁹⁸

然而，儘管宗教信仰與活動重現復興，但直到數年之後，在內外施壓的情況下，上海才再次恢復各處宗教場所。1986年，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訪問上海，參觀了依然緊閉的城隍廟。她的那句「有廟無神」被上海道教協會和上海市宗教事務局所引用，力爭寺廟重新開放。⁹⁹ 然而，直到1991年，上海黨報《解放日報》與當地道教徒之間爆發論戰，才最終促成了城隍廟的回歸。1991年4月19日，《解放日報》社論借用迷信之論，主張無需恢復城隍廟。文章寫道：「別的寺廟，有些是有文化價值的，有的屬宗教史跡，唯有城隍廟，既非釋也非道，它只是個『陰間』的政權象徵。」¹⁰⁰ 這篇社論在道教圈裏引起了軒然大波，不僅上海道教協會接到大量來電來信，人們還給中國的其他道教協會寫信抗議，最後終於得到了全國道教協會的支持，由全國道教協會向解放日報發出了一封抗議書。上海道教協會會長、上海市政協委員陳蓮笙大師發表報告，宣稱這篇社論是對所有宗教的侮辱。¹⁰¹ 5月3日，《解放日報》終於撤回社論，為污蔑這處「宗教文化遺址」道歉。¹⁰² 1992年，南市區人民政府建議重新開放該處遺址。1994年，城隍廟正式恢復為寺廟。¹⁰³

98 《內參選編》，第32期（1986），頁10–11。這篇文章並未對青年做出嚴格定義，但指出年輕的佛教徒主要介於25歲至30歲之間。

99 黃浦區檔案館N92-1-637，頁14。

100 〈復寺？〉，《解放日報》，1991年4月19日，頁1。

101 〈上海市道教協會第二屆第二次理事會決議〉，《上海道教》，第2期（1991），頁1–2。

102 〈復寺未嘗不可〉，《解放日報》，1991年5月3日，頁3。

103 馬承源等編，《上海文物博物館志》，頁177；黃浦區檔案館N92-1-637，頁

儘管恢復了宗教的合法性，但關於迷信的官方論述仍然存在。自毛時代以來，反迷信的指導手冊從未消失。就「熱愛科學、破除迷信」展覽而言，它不僅反映了當時反迷信指導手冊的內容，而且按照博物館學實踐，它本身就是一部「教科書」；而從其他的反迷信手冊也可以看出，在不同時期下，每個文本在反對迷信的同時，也都會對當前的國家議程表態支持。因此，1950年東北人民政府衛生廳出版的一本反迷信手冊提出了反對迷信、支持現代公共衛生的觀點。¹⁰⁴ 1960年代的反迷信手冊，正如本章所示，則呼籲反對迷信、支持科學，反對階級壓迫、支持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之後，四人幫背離了所謂的真正的科學——即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因此被扣上了「現代迷信」的罪名。¹⁰⁵ 今天，反迷信手冊仍然存在，繼續解答是否存在鬼神、為何會有日食等等問題。然而，新的迷信也隨之出現：電腦——曾經是展覽中命相學的剋星，如今卻成為「科學」算命的源頭；此外，法輪功的氣功法也成為當今最危險的迷信。與毛時代政府對一貫道等救世團體的處理方式一樣，國家也給法輪功貼上了異端邪教的標籤。現在中國仍有反迷信展覽，在關於反法輪功展覽的照片中，我們看到大量警察的身影，這表明反迷信展覽對國家的代理人與人民來說同等重要。¹⁰⁶ 反迷信展覽繼續被當權國家所用，以定義科學上乃至政治上的正統與異端。

「熱愛科學、破除迷信」的展覽敘事，讓我們得以一窺毛時代人們所堅持的信仰。中國從未企及蘇聯的極端程度——到1930年，蘇聯的戰鬥無神論者同盟 (League of the Militant Godless) 已將舊教堂改造為四十多座反宗教博物館。¹⁰⁷ 相反，中國共產黨正式允許宗教信仰，但大

16–20。

104 東北人民政府衛生部編，《打破迷信》(1950年9月)。

105 《破除林彪，「四人幫」的現代迷信》(人民出版社，1978)。

106 建平等，〈讓科學的光輝驅散「陰霾」〉，《黨建雜誌》，第5期(2000)，頁37–38。此處，法輪功是一種現代迷信。另外一部同時代的學術分析也論及法輪功，見黃龍保、顏曉峰編，《中國歷代反對迷信縱橫談》(學習出版社，1999)。

107 Adam Jolles, “Stalin’s Talking Museums,” *Oxford Art Journal* 28, no. 3 (October

力打擊迷信，並將迷信視為科學的對立面、階級敵人的武器與對革命的威脅。然而，正如展覽所示以及組織者對學生信仰的分析，宗教與迷信之間的界限十分微妙，對於即將到來的政治運動而言，這並不一個好兆頭。短短幾年後，在反迷信運動成長下的一代青少年們即將搖身一變，成為將一切舊事物視為革命毒瘤的紅衛兵。然後，在新的信仰下，他們利用所熟習的教訓，轉向了那些必須與之鬥爭的階級敵人。至於如何認定階級敵人，文革前的一種新展覽類型——階級教育展覽，簡稱「階展」，將對此一一闡明。在下一章中，本章的不少人物，如羅奶奶的房東、上海的龔樞機和反革命破壞分子姚金，都將被打成同一類人。階級敵人的幽靈，並不在夢中，而是透過展覽潛入了中國。

2005): 432. 史密斯還指出，儘管國民黨政府關閉了寺廟（受官方批准的孔廟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將重要寺廟改造為博物館，但「這些博物館都不是蘇聯式的反宗教博物館」，見Stephen A. Smith, “Contentious Heritage: The Preservation of Churches and Temples in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Russia and China,” *Past and Present* 226, supplement 10 (2015): 194, 196。

第4章

培養意識 階級教育展覽

李泳炎心存懷疑。他和上海東方中學的同學們一起看完「憶苦思甜」畫展回到家，問父親李金洪：「解放前工人的生活真的那麼苦嗎？」李金洪怔然無言，從櫃子裏拿出幾樣東西：一份舊勞動合同、一張工人身分證和一件沾滿油污的工作服。睹物憶往昔，他回顧了自己「做牛做馬」的生活，講述他如何從早上五點工作到晚上九點，每天的米飯裏總是摻著砂石，自己又多麼擔心丟掉這份工作。這次輪到兒子無言以對，淚水奪眶而出。與探訪蕃瓜弄一樣，李泳炎在1964年的「憶苦思甜」的班級之行達到了預期的效果。雖然出生在「紅旗下」，但李泳炎還是明白了自己工人家庭出身的重要意義。他的獲獎作文〈我要記住「入廠保證書」〉被兩次轉載，先是在上海《文匯報》上刊登，後來又成為學校展覽的展品之一，與父親送給他的三件禮物一同展出：工人身分證、工作服和一套《毛澤東選集》。¹

李泳炎在意識上的轉變代表了政治宣傳的理想效果，次年由作曲家于會泳指導首演的樣板戲《海港》也呼應了這一主題。² 在第六幕中，上

1 〈現身說法，教育兒女記住過去過去難苦，以身作則，培養孩子艱苦樸素作風〉，《文匯報》，1964年1月4日，頁2。

2 Yawen Ludden, “Making Politics Serve Music: Yu Huiyong, Composer and Minister of Culture,” *TDR: The Drama Review* 56, no. 2 (Summer 2012): 1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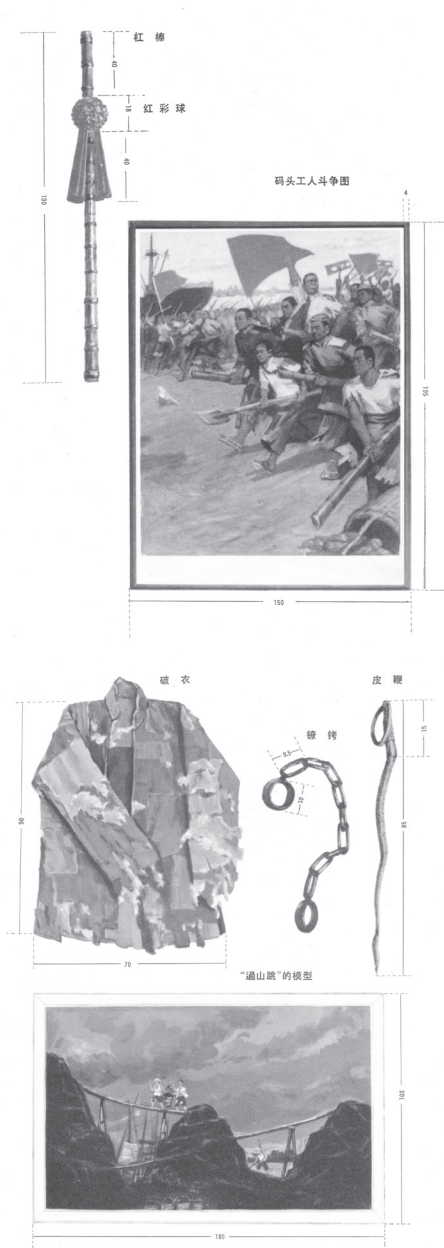


圖 4.1. 及 4.2. 階級教育展覽道具設計。上海京劇團《海港》劇組編，《海港》，頁 324、325。



圖 4.3. 《收租院》展覽場景之一，2016。由作者拍攝。

海碼頭的年輕工人韓小強站在展覽館裏，手舉工人身分證，為革命覺醒而高歌。³這場展覽是階級教育展覽，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期（1962–1966）盛行的一種展覽形式，從農村到城市、從學校到工廠，各個單位爭相舉辦。藝術源於生活，《海港》的舞台說明中有一張佈景圖，列出了需要展示的物品：舊社會工人的生活寫生、工人起義時使用的竹竿、破棉衣、鐐銬和皮鞭、毛澤東語錄「將革命進行到底！」，以及一幅碼頭工人鬥爭圖。不論是虛構角色韓小強，還是真實人物李泳炎，對於他們而言，展覽都是一個展示真實文物、講述辛酸故事的場所，在此，年輕人從懷疑到感動落淚，再到最終宣誓永遠緊跟毛主席。正是物品本身——工人身分證、勞動合同，以及它們所代表的故事創造了階級意識。

階級教育展覽作為一種類型，借鑒了之前的展覽技術。這類展覽以群眾為對象，內容以說教為主，參觀也具儀式性——階展是階級教

3 上海京劇團《海港》劇組編，《海港》，頁48–58、167–209。

育的課堂。階級教育展覽讓群眾參與策展，採用大家熟悉的「憶苦思甜」模式，以實物為教材，滿足了政治宣傳必須鮮活生動的要求。與大躍進時期無處不在的歷史陳列一樣，階級教育展覽也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最有名的階展是四川的「收租院」，它將安仁鎮地主劉文彩的家宅變成了展示舊社會之惡的場所，搭配一系列真人大小的雕塑，描繪了地主向農民收租的情景。⁴ 儘管階展起源於早期的展覽文化，二者也有許多共同主題，但階展是為配合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而專門發展起來的，尤其強調階級鬥爭。因此，透過對階展的研究，可以了解文革前夕階級意識形態在基層的表現形式。

本章將首先介紹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及毛澤東的階級復辟論述，⁵ 為階級教育展覽鋪墊背景。其後，本章將討論階級教育以及教師如何將階級意識形態融入教學的各個方面，不僅邀請老工人講故事，而且發動參與式宣傳，鼓勵學生進行採訪、舉辦展覽、講解展覽等。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人們組織階展以宣傳毛澤東對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詮釋。本章以上海階展（1965–1966）為例，追溯其策劃和展示過程，並探討展覽對資本主義的關注，以及反對「和平演變」、反對修正主義的論點。階展與全國範圍內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相輔相成，輔以當地的實例對運動作出詮釋，並為參觀者提供了一個了解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發展的模板。最後，本章將探討階展引起的反響，其中包括紅衛兵的攻擊，他們曾翻閱展覽紀錄，撰寫批評文章。對於參與了上海階展的相關人士而言，不論是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和四人幫成員張春橋等領導人，還是資本家參觀者，又或是紅衛兵，這場展覽都明確表達了一種階級的意識形態，為文化大革命的階級鬥爭拉開序幕。

4 Denise Y. Ho and Jie Li, “From Landlord Manor to Red Memorabilia: Reincarnations of a Chinese Museum Town,” *Modern China* 42, no. 1 (2016): 3–37.

5 Yiching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46–50。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階級教育和階級教育展覽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通常被視為文化大革命的預演。克勞斯 (Richard Kraus) 將毛澤東重談階級的時間定為 1962 年，當時毛澤東「將階級問題明確提上了黨的議事日程」。⁶ 在 1962 年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

那麼，社會主義國家有沒有階級存在？有沒有階級鬥爭？現在可以肯定，社會主義國家有階級存在，階級鬥爭肯定是存在的。……我們這個國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認識，好好研究這個問題。要承認階級長期存在，承認階級與階級鬥爭，反動階級可能復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中層和基層幹部。⁷

在這篇講話中，毛澤東闡述了階級意識的兩個方面，這將構成階級教育與階級教育展覽的核心。首先，社會主義中仍然存在階級。1949 年以前，階級的界定取決於個人與財產的關係，即使 1950 年代已經實現了農業集體化和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階級標籤仍然存在，並繼續決定個人的地位。其次，新中國的階級鬥爭依然存在，階級敵人可能捲土重來，復辟資本主義，重回昔日的地位。此外，階級意識形態還有第三個組成部分——階級敵人不僅是被貼上負面階級標籤的地主或資本家，還包括中共官僚機構中的新精英，他們的地位來源於其權力。吳一慶指出，新舊階級標準「在共同的政治框架內相結合」，臆想中的新舊階級敵人聯盟造成了許多「文革群眾政治的致命後果」。⁸

6 Richard Curt Kraus, *Class Conflict in Chinese Soci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78.

7 同上註，頁 79；Stuart R. Schram, ed., *Chairman Mao Talks to the People: Talks and Letters, 1956–1971* (Pantheon, 1974), 189。

8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包瑞嘉 (Richard Baum) 主張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起源可追溯至八屆十中全會。正是這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暴露出當權幹部中的修正主義威脅。⁹ 這場運動在農村被稱為「四清」，在城市有時稱為「五反」，從根本而言，這是一場針對地方和基層幹部的整風運動。¹⁰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範圍具體明確，但在意識形態上又很寬泛：它既針對特定類型的幹部腐敗和有失廉潔的工作作風，同時也將大躍進之後個體農業的復興歸咎於社會主義所遭到的侵蝕。馬若德認為，這場運動「與之前的農村運動一樣嚴酷」，任何企圖修正的努力只會導致更多的暴力。¹¹ 包瑞嘉估計，在後期階段，有125萬至250萬基層幹部遭到清洗，這可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對農村黨員幹部最猛烈的一次清洗」。¹² 1965年發表的《二十三條》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最後一個重要指示，它重新定義了運動的目標，即解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以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鬥爭。¹³

-
- 9 包瑞嘉認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起源於1962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馬若德 (Roderick MacFarquhar) 則指出，儘管全會並未提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在1962年底，福建、黑龍江、山東和四川已經「採取措施……糾正〔腐敗〕等不良行為，並根據八屆十中全會的決議，對農民展開了社會主義理想的再教育」。參見Richard Baum, *Prelude to Revolution: Mao, the Party, and the Peasant Question, 1962–66*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1；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334–335。
 - 10 例如，參見Anita Chan et al., *Chen Village: 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ty in Mao's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Ezra F. Vogel,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cie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注意此處的「五反」有別於之前的「五反運動」。
 - 11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43–346.
 - 12 Baum, *Prelude to Revolution*, 104–105.
 - 13 Richard Baum and Frederick C. Teiwes, *Ssu-Ch'ing: The Socialist Education*

雖然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表面上關注的是官員腐敗問題，它卻導致了對新老階級敵人的共同攻擊。周傑榮指出，這場運動在農村最重要的環節之一就是審查、重劃階級標籤。1964年，一項被稱為「清理階級隊伍」的政策開始施行，以調查各戶農村家庭，據此重新劃分階級。階級地位或可改善，或可惡化，進而導致了嚴重的社會不穩，以及對原地主和富農的公開進攻。¹⁴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各地的表現都是突出強化階級宣傳。例如，1963年上海開展五反運動時，上海市黨委表示，其主要目標是「搞好階級教育、回憶對比，激發階級感情，提高政治覺悟」。在談到工廠的五反運動時，上海市黨委建議召開憶苦會，並將階級教育展覽或「憶苦思甜」展覽作為「宣傳的戰場」。¹⁵ 在此氛圍下，文章開頭那位借勞動合同與兒子「憶苦思甜」的父親——工人李金洪很可能已經在自己的工廠經歷過這場運動。

他的兒子李泳炎又在學校經歷了怎樣的階級教育？《上海教育》在1963年刊登的一些文章表明，強化階級教育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同時並行。¹⁶ 其中一些文章收錄於同年出版的《加強對青少年的階級教育》一書。書中的文章由共青團和各中學代表撰寫，既有精英學校（如復興中學），也有縣級農民子弟學校（如松江縣第二中學），皆著重強調培養革

Movement of 1962–1966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8), 35, 118–126.

- 14 參見Jeremy Brown, “Moving Targets: Changing Class Labels in Rural Hebei and Henan, 1960–1979,” in *Maoism at the Grassroots: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Era of High Socialism*, ed. Jeremy Brown and Matthew D. Johns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51–76；亦參見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49。
- 15 〈上海市工廠企業大講階級鬥爭形式，人人參加回憶對比〉，《內部參考》，1963年8月20日。
- 16 參見《上海教育》，第4期（1963），頁3–6；第5期（1963），頁20；第6期（1963），頁9–12。1965年後續各期的《上海教育》都充斥著類似有關思想教育、思想教育生活化、階級教育、毛澤東思想、無產階級階級思想和階級意識的文章。文化大革命期間雜誌停刊。

命接班人的必要性。¹⁷ 例如，上海共青團的潘文錚強調，必須傳授共產主義知識，「要使青少年懂得，什麼是階級，什麼是剝削，什麼是階級鬥爭；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資本主義」。¹⁸ 上海的教師發出警示，連工人子弟都不知道父母過去的苦難，他們的生活充斥著消費品，貪圖享受，缺乏「無產階級立場」。控江中學的許爾音和潘順霖兩位老師則建議引導學生觀察身邊的外在變化：新建了哪些工廠和學校？新鋪了哪些道路？有多少學生的家庭搬進了工人新村？兩位老師寫道，進行此類物質生活改善的問答，可以「教育學生堅信黨的正確領導，堅信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¹⁹

為了培養無產階級立場，共青團的潘文錚認為，階級教育不應局限於共青團的活動。相反，它應該滲透到一切活動中，從政治課到參與勞動，從高唱革命歌曲到慶祝革命節日，「要逐步建立一套階級教育的做法和制度」。²⁰ 在這種「活的階級教育」的整體化體系中，學生們學會看到階級就在他們周圍，並在人們身上體現出來。復興中學的兩個事例最為突出。一次去虹口公園參加勞動時，復興中學的學生撿到了幾個高爾夫球。公園的工人解釋說，這是外國人打球後落下的：「外國人打球的時候，僱了中國孩子為他們撿球，拾不到就要挨打。」第二個例子是徐雲老師講述自己在舊社會的苦難生活，她先在地主家當丫鬟，後來到孤兒院當工人。當她展示自己被鴉片煙槍戳傷的傷疤時，學生們驚嘆道：「想不到她過去的生活真像白毛女一樣。」高爾夫球的故事讓上海本身成為課堂，這裏曾經是「三大敵人反動統治的堡壘」，永安百貨是奢侈品進口的倉庫，佘山天主教堂是帝國主義侵略的紀念碑。²¹ 徐老師的故事

17 上海教育出版社編，《加強對青少年的階級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63）。

18 同上註，頁6-10。

19 同上註，頁15-16。

20 同上註，頁6-10。

21 同上註，頁25-29、42。

則說明，在階級教育中，個人與傷痕均可成為舊社會之惡的證據。可見，人也可以是物質的。

「活的階級教育」要求學生積極參與。通過訪談發現，這些當年仍是兒童的受訪者均對「憶苦思甜」印象深刻。一位父母都是工人的受訪者（1959年生）仍記得去聽貧下中農講故事的情景：「他們給我們看打滿補丁的衣服，還說我們應該感激新社會。我們怎麼想？我們覺得那很光榮——破衣服代表窮，窮就是好的嘛。」²²大多數受訪者強調，他們從未想過質疑這些故事，並解釋說：「大家當時都很單純，不像現在。」這只是「教育的一部分」，只有那些出身不好的人可能會有一絲懷疑。一位歷史學家（1949年生）在描述中學的「憶苦思甜」時，記得高喊口號：「牢記階級苦，不忘血淚仇，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但是我家成分不好，不是紅五類，所以很緊張，很壓抑，也不敢說什麼。」²³受訪者記憶最深刻的普遍是吃「憶苦飯」，學生們集體吃粗麵窩頭或菜葉拌米糠。儘管少數人覺得各種憶苦飯味道不錯，還可以偷偷添油改善口味，但許多人都感到難以下嚥。一位退休的工廠技術員（1944年生）表示：「你把它攔到嘴裏嚼，從嘴的一邊嚼到另一邊，太想吐出去了。那些東西只配給豬吃！」²⁴

「活的階級教育」的最高境界是讓學生成為宣傳的積極參與者。學生可以像李泳炎一樣寫文章，甚至搬演話劇。控江中學的兩位老師還建議學生舉辦展覽，成為展覽的講解員。他們認為，舉辦展覽的好處在於，學生可以透過採訪來確定哪些材料最具典範意義；要把單獨的故事整合為一，就要求學生從階級的角度看問題。²⁵一位來自工人家庭的受訪者（1949年生）回憶了自己寫作文的經歷：

22 2013年7月3日在上海的採訪。

23 2013年7月2日在上海的採訪。

24 2013年7月20日在上海的採訪。

25 上海教育出版社編，《加強對青少年的階級教育》，頁14。

我們相信，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窮人才能翻身當家作主。甚至有一首歌就叫《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真的非常好聽。我們小時候，就想像舊社會肯定是萬惡的。因為在學校上了課，我會問父親，他在日佔時期當學徒時舊社會是什麼樣的。然後（笑），我必須給學校寫一篇作文，一篇憶苦思甜的作文，對吧？老師說，我們必須把家史和課堂結合起來。總之，我父親在做學徒時，一根手指頭被削掉了一點……我問他是怎麼受傷的、怎麼去醫院的……這樣作文的素材就有了！於是我回到學校，用我父親手指的故事講萬惡的舊社會！（笑）很多事情都是真的。老師出了題，你就要想，對吧？你就想，舊社會之所以會這樣，當然是因為老闆太惡了……你再添點油，說是因為他們沒有好好維修機器。接著我再渲染一下，說老闆不修機器是因為他想剝削工人階級，要用工人的血汗賺更多的錢。我把這些都加進去。我們都是這麼做的……只要我們順著這條線，就不會出錯。²⁶

從一位父親的勞動合同到另一位父親的斷指，從海港碼頭到復興中學學生參觀的百貨商場，活的階級教育告訴人們，物品、身體和景觀環境都是階級的體現。

在階級言論普遍高漲的背景下，學校的階級教育既是其中一環，也是對青少年不滿情緒的回應。在《加強對青少年的階級教育》一書中，若干文章指出上海的學生普遍對過去一無所知，而對現狀感到不滿。有幾位教師透露，由於大躍進導致農村連年饑荒、城市物資貧乏，他們的學生也受到了大躍進餘波的影響。復興中學的楊世昌老師表示，他的學生沒有經歷過「嚴重的自然災害」，他們必須明白，與「過去勞動人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情況」相比，現在的困難不值一提。許老師和潘老師將「大躍進」中的饑荒稱為「連年的自然災害」，認為他們的學生「產生了一些模糊認識」，只顧優先考慮自己或家人的利益，沒有意識到黨的

26 2013年7月9日在上海的採訪。



圖 4.4. 憶苦思甜展覽上的工人們，無日期。上海市檔案館 H1-23-24-8。

政策「是代表勞動人民最根本的利益的」。²⁷ 1963至1964年的機密報告不僅記錄了上海青少年的不滿情緒和影響他們的「資產階級分子」，也提到青少年不願為社會主義建設犧牲個人利益。²⁸ 許老師和潘老師宣稱，透過階級教育，學生必將變得無私，乃至甘願支援新疆。²⁹

早在1961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的內部通訊中就曾提到類似的「糊塗混亂」，而「憶苦思甜」運動也正是從解放軍開始的。在「兩憶

27 上海教育出版社編，《加強對青少年的階級教育》，頁15–16、26。

28 參見《內部參考》，1963年3月22日、1964年5月12日和1964年7月22日。請留意此時上海仍然食物短缺，一位受訪者（1957年生）稱，他的三個姐姐把食物留給了他，她們自己只吃蘿蔔皮充飢；另一位體育老師（1942年生）表示，學生們為了節省體力，常常不鍛鍊。來自2013年7月20日和2013年7月24日在上海的採訪。

29 上海教育出版社編，《加強對青少年的階級教育》，頁21–22。

三查」運動中，戰士們展開的各項活動後來成為憶苦思甜的標準劇目：在大會上訴苦、借「算賬」對比今昔、吃憶苦飯，以及透過書籍、電影和展覽接受政治宣傳。其中一項命令值得注意：如果士兵家住「自然災害嚴重」的地區或「非正常死亡」「比例較高」的地區，不得對這類士兵開展「兩憶三查」運動。³⁰ 在五花八門的宣傳手段中，易秋廷建議將家書作為實物教材。他指出士兵們正是透過家書了解農村的情況，並讚揚7352部隊做出了榜樣，在連隊會堂展出了24封報告喜訊的信件。他還鼓勵其他士兵將提及家庭困難或經濟拮据的信件一律上交，以便軍隊指導他們如何回信。易秋廷宣稱，私人家書與「家書展覽」都是「活生生的教材」。³¹ 由此，階級教育成為了對饑荒的直接回應。但並不只有士兵在農村有親友：上海工廠工人的階級教育展覽也開始於1961年，這同樣是為了回應「連續受到嚴重的自然災害」帶來的「一些暫時的困難和不方便」以及「不少新的思想」。³²

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展之時，各地都已經舉辦了階級主題的展覽。在1963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上海工人宮至少舉辦了四場展覽：階級教育展、雷鋒標兵展、五好行業展、五好工人展。³³ 1964年，為慶祝春節，上海博物館舉辦了「上海社會生活今昔對比」展覽，棚屋也在展覽之列。³⁴ 西康中學高二學生採訪了舊日棚戶區藥水弄的居民，並利用採訪材料舉辦了一場階級教育展，用他們自己的聲音控訴舊社會

30 《工作通訊》，第4期（1961年1月11日），頁9-11。解放軍報告道，軍中仍有一些人「有意見」，需要對他們進行說服工作，也不允許他們與他人爭辯或發表意見。這份公告只在武裝部隊內部流傳，與《內部參考》一樣不對外流通。

31 《工作通訊》，第17期（1961年4月26日），頁16-18。

32 上海市檔案館C1-2-3596，頁46-53。

33 〈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文匯報》，1963年2月16日，頁2。

34 〈今昔對比激發階級感情〉，《文匯報》，1964年2月16日，頁2。

的罪惡。³⁵ 在上海各地，基層與地方的宣傳活動和展覽都利用過去的舊物，與如今改善的物質條件形成對照。

上海的情況反映了整個中國的階級教育。從1963年到1966年文革爆發之前，黨委為支持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舉辦了多場展覽。級別再小的地方也有自己的展覽——很可能是緊接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批鬥大會之後，而更高級別的地區則會從這些地方展覽中遴選、收集文物，以舉辦大型的市級和省級展覽。³⁶ 四川安仁鎮的「收租院」大概是其中最著名的展覽，但其他地方也獲得了模範的表彰。天津的三條石歷史博物館展示了天津工人階級的歷史，博物館建於1958年大躍進期間，由周恩來題寫館名，1964年陳伯達也來館參觀。³⁷ 在雲南箇舊，錫礦場紛紛開展實地的階級教育，這一範例還在雲南省階級教育展覽館展出。³⁸

各省級展覽內容豐富，兼具深度。山東的多媒體展覽運用電影和幻燈片，成為典範。³⁹ 湖南的省展佔地4,000平方米，包括6,200件文物、1,800張照片、150幅圖表和雕塑。1964年春，展覽在長沙的省展覽館開幕，一千多人出席了開幕儀式，新翻修的大樓周圍紅旗迎風飄揚，湖南省委書記王延春宣佈，這場展覽是一部「活的階級鬥爭的教科書」，是「向廣大幹部和群眾進行一次生動具體的階級教育和社會主義教育……國內外，目前都存在著嚴重的、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這些

35 〈以里弄史對師生進行階級教育〉，《文匯報》，1964年10月27日，頁1。

36 李振盛的照片記錄了1965年5月黑龍江省阿城區阿什河公社的一個案例，公社先舉行批鬥大會，接著揭發告發，然後把個人財產變成一場階級教育展。參見Zhensheng Li, *Red-Color News Soldier: A Chinese Photographer's Odyssey Throug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haidon Press, 2003), 44–53。

37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天津市紅橋區三條石歷史博物館階級教育展覽》（無日期），血淚史部分簡介。

38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雲南省階級教育展覽館內容簡介》（1966年1月），頁22。

39 《山東省階級教育展覽會會刊》（1964年10月），頁5。關於展覽中1965年電影的介紹，請參見Wu, “Recalling Bitterness,” 259。

展出的展品證明瞭一條真理：『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於滅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在展覽館、省博物館和中蘇友好宮，黨員幹部們高懸歡迎橫幅，為展覽剪彩，正如王延春所說，相比以往的展覽，這些展覽內容更豐富，意義更重大。⁴⁰

展示當前的階級鬥爭並不排斥展示過去；事實上，對舊社會的非難可令人們切身感到階級復辟的威脅。雖然階級教育展覽因地而異，但從展覽手冊和文宣品可以看到，這些展覽都從實物著手，展出了解放前階級鬥爭中代表了帝國主義、資本家和地主的物品。對帝國主義，武漢的展覽利用紙幣和股票進行實物教學，雲南的展覽則講述了美國飛虎隊和外國傳教士的故事。⁴¹ 資本主義剝削最常見的表現形式是監管類文件：勞動合同、身分證和工人通行證。一些展覽將鐘錶作為壓迫的象徵，在「奪魂鐘」下，工人遲到三分鐘就可能丟掉工作。⁴² 天津博物館的工作人員還製作了一個微型砲樓，即工廠的中央監控室，與邊沁 (Jeremy Bentham) 的全景敞視監獄一樣，主管們可從四面八方看到工廠入口、車間、庫房甚至廁所。⁴³ 為展示地主的剝削，階級教育展覽中陳列了各類壓迫工具——從肉體壓迫的刀槍，到經濟壓迫的脫粒機和打穀工具。

除了展示相似的文物，這些描繪過去的展覽都運用了至少三種共同的策展技巧。首先是「並置」。蕃瓜弄的展覽是將過去工人階級的生活

40 《湖南省社會主義階級教育展覽會簡介》(1964年3月)，頁1-2。請注意此處王延春對比的是一場1952年的土改展覽。當時據說展覽面積最大的是河南，達一萬多平方米。在省級展覽中，有人認為山西和湖南的展覽選擇的模範恰到好處，形式最優，因此最為成功，參見上海市檔案館C4-2-1，頁76。

41 《武漢社會主義階級教育展覽會會刊》(1964年6月1日)，頁1；《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雲南省階級教育展覽館內容簡介》，頁2。

42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雲南省階級教育展覽館內容簡介》，頁21。山東的展覽上也有鐘錶，參見《山東省階級教育展覽會會刊》，頁17。

43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天津市紅橋區三條石歷史博物館階級教育展覽》，頁7-8。參見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2nd ed. (Vintage Books, 1995), 195-228。

與現在相對比，而階級教育展覽則將解放前富人與窮人的財產相並列，它借鑒了土地改革對階級的定義，將階級與財產和剝削聯繫起來，物質對比所帶來的視覺衝擊讓展覽收效顯著。第二個策展重點是突出受傷的身體。正如上海工廠展覽的講解所述，「這些老工人始終是我們最好的活教材，因為在他的身上比較集中地體現了我們工人階級的優秀品質。」⁴⁴ 無論是透過照片還是實物標本，階級教育展覽中反復出現的一種手法，就是利用殘體作為舊社會之殘暴的見證，例如傷疤和殘手、罐中保存的器官和身體部位，或者頭骨和骨架。最後，展覽還化身為參觀者「憶苦思甜」的場所。正如《內部參考》的報道，衡量展覽成功與否的最佳標準，一是參觀者能否在展覽中看到自己——有時真的能看到本人的事例，二是透過策展鼓動參觀者訴說苦衷。⁴⁵

展示過去的階級鬥爭可以遵循標準敘事和話術套路，然而，展示當代的階級鬥爭就不那麼顯而易見了。除了引用文本確定階級鬥爭的存在，並將新舊階級敵人相關聯，階級教育展覽如何才能刻畫出隱蔽的敵人，又有哪些文物展品可以傳達出階級敵人的復辟野心？一些展覽對階級敵人的理解僅流於表面。例如，江蘇省的展覽刻畫了國民黨間諜的形象，山東省的策展人則展示了成堆的美國武器和軍事裝備。⁴⁶ 正面的展覽案例往往表現出個人為階級鬥爭時刻準備的形象，例如山東就展出了一位老人的三枚手榴彈和一把大刀。老人時年67歲，在生產大隊負責安保工作。這些武器放在玻璃櫃中，不再具有實際功用，但展品目錄仍描述了老人指著文物，慨然道：「我們一拿起來，地主、富農和壞蛋們就得害怕。」⁴⁷ 一些階展為了描繪當代的階級鬥爭，聚焦於社會主義教

44 上海市檔案館 C1-2-3596，頁 47。

45 〈山東省階級教育展覽會的特點〉，《內部參考》，1964 年 11 月 27 日。亦參見《山東省階級教育展覽會會刊》，頁 30–31。

46 《江蘇省階級教育展覽會說明書》（1965），頁 6；《山東省階級教育展覽會會刊》，頁 8。

47 山東省階級教育展覽會編，《不可忘記階級鬥爭：介紹山東省階級教育展覽會》（無日期），頁 538。

育運動期間最先開展的各類活動。雲南的展覽借鑒反迷信展覽，刻畫了散佈反革命謠言、假造「仙藥」的江湖騙子形象，將迷信與反革命畫上等號。⁴⁸ 在湖南和江蘇，展覽在「階級鬥爭」單元描繪了私人的地下作坊，並用微縮立體模型展示了幹部腐敗的場景。⁴⁹

但要表現隱蔽的階級敵人，最具標誌性的實物要數「變天圖」或「變天賬」，即為「變天」準備而秘密保存的地圖和賬簿。在階級教育展覽的敘述中，過去那些沒有改過自新的階級敵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將地契、貸款借據、地租簿和房產圖都保留下來，以待復辟時能夠收回財產、恢復權力。展覽顯示，雖然沒有原始文件，但階級敵人將「變天賬」刻在瓦片上，塗在破布上，與武器彈藥埋在一起。⁵⁰ 隨著毛重提階級言論，那些曾經決定了階級劃分的財產物證，在變天賬中借屍還魂。解放軍戰士邢書第在參觀了山東的階級教育展覽後，如此描述了這種可怖的危險：

展覽會上看一看，
階級敵人沒睡覺。
黑手在寫「變天賬」，
咬著牙根磨鋼刀。
舊傷疤呵仍作痛，
新仇恨呵更難消。
舊仇新恨集心頭，
心頭怒火衝天燒。⁵¹

48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雲南省階級教育展覽館內容簡介》，頁35。

49 《湖南省社會主義階級教育展覽會簡介》，頁6；《江蘇省階級教育展覽會說明書》，頁7-8。

50 例如，參見《湖南省社會主義階級教育展覽會簡介》，頁6、11、15；《山東省階級教育展覽會會刊》，頁8、21；《江蘇省階級教育展覽會說明書》，頁6-7。

51 山東省階級教育展覽會編，《不可忘記階級鬥爭：介紹山東省階級教育展覽會》，頁552-5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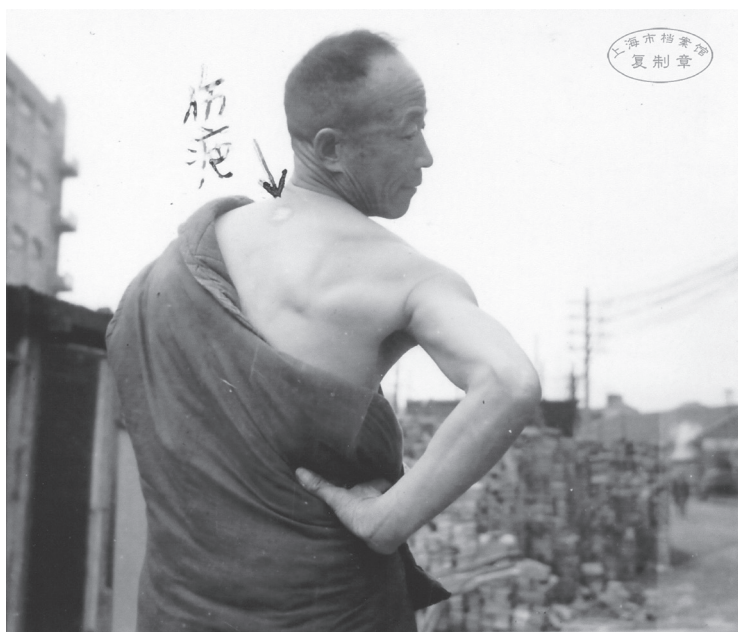


圖 4.5. 上海階級教育展的照片，無日期。照片展示出一名工人後背中間的疤痕（見圖中標記），從背景中低矮的房屋可以看出，拍攝地點很可能位於一處棚户区。上海市檔案館 H1-23-29-18。

透過打油詩，這位士兵開始回憶階級的苦難，這正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理想效果。變天賬與尖刀象徵著復辟的野心，過去的傷痛煥發出新的仇恨，階級敵人暗中踱步，待旦不眠。

打造上海的階級教育展覽

上海階級教育展覽的籌辦工作於1964年12月開始。借黨委宣傳部之語，展覽的目的是配合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為階級教育提供一個「固定的戰場」。為此，宣傳部專門成立了階級教育籌備委員會，由時任上

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後來成為四人幫成員之一的張春橋領導。⁵² 籌委會的四個小組分別負責收集材料、創辦展覽、行政宣傳和秘書工作，小組幹部來自上海市文化局、作家協會、藝術家協會和出版社。⁵³ 與其他展覽和各地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相比，上海開始得較晚，因此有機會學習其他地方的經驗。例如，次年二月，上海代表團訪問山東，考察其階級教育展覽。上海代表的評價是，山東的展覽內容過多，讓人眼花繚亂。展覽共展出八九十個人物事跡與上千件文物展品，需要一整天才能仔細看完。同時，他們稱讚山東的展覽可以打動農民，主辦方「如果對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強烈的階級感情，展覽會是辦不好的」。代表們總結道，選擇得當的案例是那些「和〔自己〕受剝削受壓迫的遭遇相似的材料」，越是吻合參觀者的經歷，展覽就越可能「激起階級共鳴」。⁵⁴

上海代表團在造訪山東的同一月，還學習了上海郊區平湖縣的例子。平湖縣的官員們把一位舊地主的宅邸改造成展覽館，向上海代表團分享了他們收集材料的經驗——例如從檔案館查找有關土地改革的文件、利用地方圖書館和博物館了解背景歷史，並向公安局或法院借用文物和照片。⁵⁵ 類似於受黨委派去評估政治狀況的工作組，或是體驗農民生活的藝術家和作家，展覽的工作人員也深入基層研究過去的歷史。這些採訪人員甚至還有一份步驟清單：

問一問：解放前後家庭生活、生產情況；

聽一聽：地主收租和逼租情況；

看一看：苦主翻身情況與保存的實物情況；

52 江怡、邵有民編，《中共上海黨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頁61。張春橋的職務負責宣傳與文化。

53 上海市檔案館A22-2-1241，頁1-10。後來，其他單位也參與進來，其中包括經濟研究所和上海博物館。宣傳部還從油畫工作室、雕塑工作室、製片廠、歌劇院和上海手工業局等單位調來了畫家、設計師、攝影師和模型師。參見上海市檔案館C4-2-1，頁49-51，以及上海市檔案館C4-2-30，頁35b。

54 上海市檔案館C4-2-1，頁117-118。

55 同上註。

幫一幫：啟發階級覺悟，提高思想認識，做一些日常生活和生產工作；

記一記：苦主對地主的控訴和翻身後深刻體會。⁵⁶

同樣，上海展覽館的工作人員也進行了研究調查，他們向公安局詢問反革命分子的案例，尋找在事故中受傷的工人，並根據指示收集物證，為傷者的身體拍攝照片。⁵⁷

不過，正如圖中工人的身體所示，上海階級教育展覽的目的並非講述地主、農民的農村故事，而是訴說資本家和工人的城市故事。1965年5月，展覽方案的初稿接受審查，宣傳部表示展覽應「以反對資本主義為中心，突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著重突出上海的資本主義歷史，可以「反映上海的特色」。⁵⁸修改後的展覽以反資本主義為主旨，在上海黨校展出，並借用附近向明中學的禮堂作額外展示。展覽共佔地1,240平方米，展品包括237塊展板、228幅插圖、164張照片、926件文物和21個縮比模型。⁵⁹講解員或解說員代表了展覽的公眾形象，必須具備良好的階級背景和正確的政治行為與思想。優中選優的講解員們站在指定的展板（長1.5米、寬1米）前，「就如親臨其境，一講到階級兄弟的仇和苦，就是自己的仇和苦。有的講解員講一次要激動一次，甚至激動地落下了眼淚。正如有的講解員講：一講到工人受剝削受壓迫的版面，我聲音就低不下來，心就平靜不下來」。⁶⁰

56 上海市檔案館C4-2-1，頁121。

57 同上註，頁4b；上海市檔案館C4-2-8，頁7-8。

58 上海市檔案館A22-2-1241，頁28-29。

59 上海市檔案館C4-2-1，頁5、41。上海市委計劃最後將展覽遷到中蘇友誼宮，作為由上海市文化局管理的常設展覽，但我沒有看到任何證據表明展覽曾變遷過。

60 同上註，頁93、111。約有一百名講解員和二十名安保人員。

參觀者在展覽上的停留時間預計為兩小時，遠遠短於山東、江蘇長達六七個小時的參觀時間。一份早期的報告指出，在七小時的展覽中，參觀者最多只能記住七個案例；報告作者向張春橋和其他領導提出，上海的展覽應力爭做到「少而精」。⁶¹這場展覽原本只是針對開展四清運動的單位，但除了這類幹部、工人和部分群眾之外，展覽受眾最終擴大到其他幹部、工廠工人、解放軍官兵、教師學生以及民主黨派代表人士。⁶²階展被定為內部展覽，既不對外宣傳，也不向外賓開放，因此官方報紙上沒有任何相關紀錄。儘管如此，還是有許多外地人前來參觀，包括宣傳官員、新聞記者和其他階級教育展覽的工作人員。上海階展委員會每兩週作一次報告，詳細記錄參觀者的情況，包括任何知名人士、訪客在參觀期間的發言以及他們在隨後討論中的參與情況。每天的參觀者數以千計，到1966年8月，估計共有逾七十萬人參觀了展覽。⁶³

文革期間，外地的紅衛兵也前來參觀，但在此之前，參觀者往往都是有組織的團體。但即使是被迫參觀的個人，也會積極主動地關注、記憶展覽的內容。在許多方面，展覽的功能都等同於最新的意識形態文本。與中共一大會址和幾經修改的革命歷史一樣，階級教育展覽是一幅最新、最應時的毛語錄大報，也是一張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快照。上海的階級教育展覽聚焦於資本主義及其殘餘問題，對「和平演變」的概念做出解釋和批駁。所謂「和平演變」，指的是美國國務卿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 在1953年提出的一項戰略，並在後來被艾森豪 (Dwight D. Eisenhower) 政府所採納，這項戰略聲稱社會主義國家將從內部被和平顛

61 同上註，頁2、76。初稿計劃參觀用時三小時，但後來削減至兩小時。工作人員計算到，看完每個展板需要一分到一分半鐘，因此參觀者可以在三小時內看完180個展板。已經去過多場階展的參觀者表示越少越好。亦參見上海市檔案館A22-2-1241，頁29。

62 上海市檔案館A22-2-1401，頁10；上海市檔案館C4-2-1，頁25。

63 上海市檔案館C4-2-1，頁94。這一估值(711,675人)來自1966年8月4日，到1966年底，共有近一百萬人參觀了展覽。1966年10月，每日的參觀人數可能達到六千人，凌晨四點即開始排起長隊。為了參觀展覽，來自平湖縣的一行人甚至不惜坐船十小時。上海市檔案館C4-2-16，頁1。

覆，共產主義將自行轉變。毛澤東在讀過杜勒斯關於「和平演變」的講話後，於1959年在領導層中傳閱了他的評論。據副總理薄一波的回憶錄所述，毛澤東將修正主義和「和平演變」視為一體兩面。歷史學家翟強指出，隨著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的召開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開始，「反對『修正主義』和防止『和平演變』的鬥爭在國內加速進行」。⁶⁴

上海階級教育展在一張張展板上表達了對「和平演變」的抨擊，成千上萬的參觀者透過故事和文物看到了「和平演變」的顯現。正如展覽的序言所述，展覽的目的是「為了配合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揭露資產階級的剝削本質和當前階級敵人企圖用『和平演變』的方式恢復資本主義的陰謀，使我們提高覺悟，積極投入興無滅資的革命鬥爭」。⁶⁵

在選擇正反面典型以及尋找文物時，階級教育的策展人先從思想論點入手，再尋找證據。從1965年2月階級教育委員會剛剛著手工作時，就提出要先選事例再「提煉」。⁶⁶ 1965年11月，中華全國總工會的代表就如何選擇與階級敵人對抗的正面典型提出了建議，他們表示，如果單獨的個人無法體現全部的理想特徵，策展人應該進行綜合。⁶⁷ 這一策略恰好遵從了作家魯迅早期關於以人為「模特」的教誨：「看的多了，湊合起來的。」⁶⁸ 1966年2月，市委書記陳丕顯宣佈：「今後擬主要通過各社教工作團去了解線索，再重點地聯繫收集。」在展覽中，階級教育從尋找文物開始。⁶⁹

64 Qiang Zhai, "Mao Zedong and Dulles's 'Peaceful Evolution' Strategy: Revelations from Bo Yibo's Memoir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Bulletin*, nos. 6/7 (Winter 1995/1996): 228–331.

65 上海市檔案館 C4-2-8，頁 151。

66 上海市檔案館 C4-2-1，頁 118。

67 同上註，頁 64b–69。在一場會議上，張春橋明確指示不要列出名字：「我們可以考慮只講某廠，某某某，不提具體姓名，也不點廠名，而事實是真的，可以對群眾進行教育。」上海市檔案館 C4-2-11，頁 8b。

68 Boyd Compton, trans., *Mao's China: Party Reform Documents, 1942–44*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2), 252–253.

69 關於收集材料的指示，參見上海市檔案館 C4-2-16，頁 1–2。



圖 4.6. 上海階級教育展中申新九廠（見圍裙上的字樣）工人的照片，無日期，表現出「舊社會」中造成的傷害。該廠曾在 1948 年爆發過一次大罷工，1949 年後，工廠女工們因此受到了表彰。上海市檔案館 H1-23-29-13。

展覽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認識資本主義固有的剝削性」大家已相當熟悉。與蕃瓜弄的展覽如出一轍，階展在開頭部分即以教科書式的陳述，將上海描繪成「是剝削階級的天堂，勞動人民的地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的一個縮影」。⁷⁰ 講解員首先闡明帝國主義和外國資本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並將戰時的通貨膨脹歸咎於官僚資本和買辦資本。上海勞動人民的苦難與資本家的奢靡在此形成了鮮明對比。與其他地區的階展一樣，策展人利用股票稅票、僱傭合同、工人服，甚至棚戶區模型來講述「舊社會」的生活。第一部分的重點是上海最大的棉紡廠——申新紡織公司。展品包括勞動合同和傭工契約、合同工周阿大

70 上海市檔案館 C4-2-8，頁 152。

的工裝，也許還有一張紡織女工的照片（見圖4.6）。與憶苦思甜的敘述一樣，照片中的她正指著過去的傷處。與工人的舊衣並排陳列的是一對銜亮的金馬，這是榮氏兄弟之一、申新紡織廠和麵粉廠的掌權人榮宗敬在六十大壽時的其中一件壽禮。⁷¹

儘管這次展覽的歷史概貌並不陌生，但有兩處不同——一是重點不同，二是程度不同。就重點而言，蕃瓜弄的展覽將工人的過去與現在並列展出，而這場階展則是將工人與資本家的過去相對照。透過比較，階級教育展覽提請人們注意兩者之間的鴻溝，並將「和平演變」的威脅具像化呈現。至於程度上的差異，階展對資本主義的表現，並不僅限於像榮宗敬這樣一條大魚的故事，更是囊括各類自私自利的行為或所得。展覽提出的論點彷彿已是不證自明的證據：「資本家都是靠剝削起家。」對於資本家勤勞致富或勤儉致富的說法，展覽也提出了批駁，並透過大量案例分析重申，無論資本家是大是小，無論是天生富貴或後天打拼，每個資本家的成功都離不開剝削。⁷² 這一論點顯然針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批判對象，旨在徹底否定將資本主義定性為程度問題的可能性。

第二和第三部分都以「和平演變」為主題，分別題為「打退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和「粉碎階級敵人用『和平演變』的方式恢復資本主義的陰謀」。第二部分篇幅較短，以1950年代的「五反」運動為例，指出一些資本家雖然將產業上交國家，但卻秘密保存了契據、股東名單等變天賬，以待蔣介石捲土重來。⁷³ 第三部分逐一介紹了當代上海「和平演變」的案例。其中一些案例譴責了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腐朽影響。例如，一位名叫翁華玉的婦女在工廠的工作台存放糖果和化妝品。講解員指著這些

71 同上註，頁162。請注意，展覽並未點明榮宗敬的名字，但展出的生日日期與他的六十大壽相吻合。另外，這對金馬其實是複製品，但講解文本中並未提及。關於申新九廠的大罷工，參見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13–214。

72 上海市檔案館C4-2-8，頁157–158；講解文本參見本註頁88–89。

73 參見例如同上註，頁185。

物品宣稱，「有些工人不知不覺地受到了腐蝕，也跟著講究起吃穿來了。」⁷⁴ 其他案例則記錄了四清運動攻擊的腐敗和投機行為。上海手錶廠的一名工人張汝榮被指控偷竊手錶和零部件，用來給自己開商店。至於私人放貸的案例，展覽中展示了一位程女士的許多收據，她放高利貸導致一個生病的男孩沒錢買藥，最終失明。關於投機倒把，展覽講述了金祖蔭的故事，他利用他在永安百貨的關係購買相機，然後轉手倒賣，謀取私利。而最誇張的莫過於資產階級分子陳慧秀的投機故事，其中涉及的價值七萬元的鑽石無疑讓人目眩。⁷⁵ 透過這些大大小小的案例，上海階級教育展覽揭示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目標。

然而，相比抽屜裏的糖果或偷來的鐘錶部件，資本主義的渴求和復辟野心更難刻畫。為此，上海階級教育展覽將視線投向了資本家自己的文字，展示他們的日記和自白。資本家、家族建築公司老闆陳榮璇的日記就因此陳列在案。這八本日記在「四清」期間繳獲，記錄了陳榮璇在1962至1964年的生活。他在日記中抒發了對庭院空寥的傷感，對失去家族企業的羞愧、為父親祭墳時的悲痛，以及失去兩輛汽車的遺憾。日記以文言文書寫，但凡參觀者在閱讀時遇到困難，講解員都會給出一個正確的結論：「這流露了他對社會主義改造的不滿。」⁷⁶ 展覽上的另一類罪證是懺悔書，其中最長的是由唐毓曼所寫。他曾在上海南市區福佑路開了一家糖果店。在「四清」期間，唐毓曼做出以下懺悔：

74 同上註，頁128。

75 同上註，頁205–219。

76 同上註，頁127、203–204。遺憾的是，檔案中沒有關於這部日記的進一步信息。關於毛時代最著名的日記——模範標兵雷鋒日記的真偽討論，參見 Xiaofei Tian, “The Making of a Hero: Lei Feng and Some Issues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60: An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ed. William C. Kirby (Asia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2011), 293–305。

解放後，直至今日，我家始終保留著一份變天賬。這主要由於我們的階級本性，對在舊社會時，我們所過的不勞而獲的、舒適的生活仍抱有強烈的希望。總希望有一天社會的歷史會回復到過去的樣子。那麼，這些變天賬就能成為我們重創舊業的依據和資本。

唐毓曼接著講述了他如何不甘於為糖果店店長工作，又如何假裝成積極分子取得店長信任。他一邊在每天下班路上分享糖果生意的建議，一邊進行暗中破壞。展覽並沒有具體解釋唐毓曼最終如何「奪權」，只是講到因為他與店長的友誼，他的一些朋友得到了提拔。⁷⁷ 不論如何，階級教育展覽的參觀者往往認為，在所有展品中，這封懺悔書最令人印象深刻。懺悔的供詞被視為一級證據，與其他引述或傳言無異。⁷⁸ 在帝制時期，供詞依據罪行而寫，如今，這份供詞則隨著展覽一同示眾。⁷⁹

除了資本家的自證其罪之外，展覽也展出了受害者的譴責。因此，「憶苦思甜」也成為上海階級教育展覽會的一環。上海無線電六廠生產隊的一位年輕隊長陳敏生，聲稱曾受資本家葉秀蘭的腐蝕，直到他的母親親自對他進行「家史教育」。他的父親曾給日本人做苦力，後來又當碼頭工人，陳敏生聽了父親的故事，決定與葉秀蘭「劃清界限」，把他收到的各種禮物盡數上交。⁸⁰ 在政治運動中，被告所送的禮物往往被當做受賄或貪污的證據，而在展覽的玻璃櫃中，工人們也將葉秀蘭的禮物堆在一起作為證據。⁸¹ 陳榮璇、唐毓曼、葉秀蘭等人的例子皆說明

77 上海市檔案館 C4-2-8，頁196–198。雖然其他展覽中也有對懺悔書的節選，但將懺悔書作為展品的似乎只有這場展覽。

78 上海市檔案館 C4-2-1，頁64。翁華玉關於糖果的供詞也被用來攻擊她。參見上海市檔案館 C4-2-8，頁128。

79 Susan Naquin, “True Confessions: Criminal Interrogations as Sources for Ch’ing History,” *National Palace Museum Bulletin* [Taipei], vol. 11, no. 1 (March–April 1976), 1–17.

80 上海市檔案館 C4-2-8，頁208。

81 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期間使用禮物作為證據的事例，參見 Denise Y. Ho,

了一場展覽如何反映出政治運動的每個步驟：先施加壓力讓被告上交日記或寫懺悔書，再以實物和文字作為物證，最後將證據展出，讓成千上萬的群眾眼見為實。

然而在幕後，策展人仍苦苦掙扎，思索著應如何表現毛澤東對「和平演變」的解讀，如何確切描繪一場正在進行的運動。核心矛盾在於，如何刻畫潛藏的階級敵人，同時表現其危險性及其注定失敗的下場。同樣，又該如何描繪階級受害者？如何表現他們雖然受到威脅，卻終將取得勝利？在宣傳中，過去與現在的界限本該黑白分明，但實際上卻很模糊，極易造成誤解。在1965年10月的一組會議紀錄中，和張春橋一樣同任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的楊西光，建議不要使用「短工」這樣的詞語，以免人們將它與新中國的勞務活動相比較。楊西光的考慮極有先見之明；裴宜理和李遜指出，1960年至1962年間，成千上萬的上海工人下崗失業，他們心懷不滿，只能以臨時工的身分回到工廠，後來成為文革造反派的積極分子。⁸² 至於過去的資本主義之惡與現在相比如何，市委書記陳丕顯批評策展人把1949年後的資本家刻畫得比以前更壞，「實際上最大的罪惡還是在解放前，早期，最黑暗。」⁸³ 最後，「和平演變」發生的前提是資產階級分子暗中滲透社會主義社會，那麼又該如何刻畫他們？張春橋在與插圖畫家開會時回答，要儘量寫實：

把反面人物、資本家醜化特別到這一部分，感覺很突出，這不好。如果反面人物和資本家全像畫上的這樣，那麼和平演變就演變不了，群眾一眼就可以看穿了。是什麼就畫什麼。你說榮毅仁

“Reforming Connoisseurship: State and Collectors in Shanghai in the 1950s and 1960s,”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7, no. 4 (2012): 627。

82 Perry and Li, *Proletarian Power*, 100–107. 亦參見Yiching Wu, “Revolutionary Alchemy: Economism and the Making of Shanghai’s January Revolution,” in Yiching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95–141。

83 上海市檔案館 C4-2-11，頁13b。

醜嗎？他是個漂亮的小夥子，醜在哪裏？你硬說他醜，我們要反映他的本質。⁸⁴

比起階級教育的口號，階級與歷史都更加錯綜複雜。在此背景下，該如何展示潛藏的威脅和虛榮的欲望，這一困難從未得到徹底的解決。隨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演變為文化大革命，階級教育展覽的教科書也在不斷改寫。

展覽的反響

參觀上海階級教育展絕非兒戲。參觀者必須先提出申請，來到現場後，許多人開始認真學習。工作人員留意到，「有的同志在場內抄錄資料，主要是準備回去作報告和教學備課用的」。⁸⁵ 從標語到毛澤東語錄，從「憶苦思甜」到被沒收的日記，各工作單位都在透過這些展品了解市裏其他單位如何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甚至連外地幹部也把參觀階展作為一種了解上海運動進展的辦法。⁸⁶ 展覽負責人同樣重視參觀者的反饋意見。在1965年底的試展期間，每天有多達四千人到場參觀，並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裏，工作人員便收集了三千多條意見，召開了近二十次重點小組會議。⁸⁷ 相比其他階展手冊，這些材料反映的意見五花八門，後來還被紅衛兵收集起來用於批鬥。官方報告顯示，與反迷信展覽的學生們一樣，普通訪客的確從階展中學到了階級教育的一課，但有些參觀者的反應就不那麼模範了：被迫觀看展覽的走資派表現出深切的不安，而1966年底到場參觀的紅衛兵則攻擊階展是「黑展覽」。

84 同上註，頁8b。這些會議記錄並未標註日期。

85 上海市檔案館C4-2-1，頁65。

86 同上註，頁70。1966年3月，在目前已經參觀的430,749人中，各有3萬人來自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工作組和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工作組，21萬人來自正在進行四清運動的單位，見同上註，頁90。

87 上海市檔案館C4-2-1，頁41。

衡量上海階級教育展覽成功與否，既看情感，也看宣教。黨委書記陳丕顯在1966年2月的一次會議上表示：「現在你們只有受苦人自己看了哭。那還不行，要所有人都看了流著淚離開。多搞點模型，把藝術家動員起來。」⁸⁸ 展覽對1949年前工人階級的刻畫非常寫實，備受讚譽，一位工廠老工人表示：「展覽會裏的展品和自己在舊社會中經過的生活一模一樣。」⁸⁹ 與其他階展一樣，工人們聲淚俱下地譴責過去。上運五場的工人馬士超看到自己解放前的補丁衣服出現在展覽中，「哭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一些女工還在展覽中看到被資本家打殘雙手的婦女，她們「緊握著曾經被扎過的左手，一邊流淚一邊看〔展覽〕」。⁹⁰ 感性表達與理性認識相結合，表明這堂階級教育課已經被參觀者所吸收。

參觀者還感到展覽的「反資本主義」主題與上海非常契合。來自農村的士兵們雖然不知道資本家，但宣稱他們跟地主或富農一樣。一位來自閔行電具廠的工人陳玉輝說，展覽教會了他「怎樣去識別敵人」。⁹¹ 從參觀者的評論可以看出，他們還能複述展覽的內容，例如所有資本家都靠剝削發家，資本家無論大小都一樣，所有資本家都有復辟的野心。⁹² 根據反饋，參觀者受展覽的激勵，返回工作單位積極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位來自上海駁船公司的工人感嘆道，他曾去別人家聽「黃色」（淫穢）音樂，因此被勒令檢討個人行為。一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工作組的成員表示，在他看到展出的反面案例時，會與「我一邊看一邊對照我們單位開展運動的情況」。還有人深感這場政治運動正確且及時，他們相信，假如不是這場運動，「〔我們〕就真的有變色的危險」。⁹³

88 同上註，頁14。

89 同上註，頁90。

90 同上註，頁44。

91 上海市檔案館A22-2-1401，頁10-13；上海市檔案館C4-2-1，頁41-42。

92 上海市檔案館A22-2-1401，頁11-12。

93 上海市檔案館C4-2-1，頁46-47。

從展覽紀錄來看，反饋中也不乏批評的聲音。展覽存在一些後勤問題，如過於擁擠。有人認為第二、第三部分有失均衡，有人不喜歡以城市為重點，也有不少人認為文字太多而實物太少。⁹⁴還有參觀者批評展出的資本家不夠狡猾或不夠隱蔽，接二連三的案例研究也顯得單調無聊，缺乏情節。⁹⁵此外還出現了一些棘手的問題，展覽負責人雖然看到，卻沒有回答。「和平演變」一定和平嗎？如果資本家果真這樣惡劣，無法改過自新，那麼新社會為什麼要僱用他們？在試展期間，還有參觀者指出有些故事「未加點名」。⁹⁶不過，儘管存在批評和質疑，絕大多數評論都充滿熱情。《新民晚報》的編輯評價展覽「新鮮、突出、鮮明、簡練」，工人們認為展覽比電影更好看，交大學生則宣稱一次展覽勝過十堂政治課。⁹⁷在階級教育的全面化體系中，參觀者建議在各處復現展覽：在工人宮裏、巡迴展覽的照片和幻燈片中，甚至是兒童、工人和農民的課本或連環畫中。⁹⁸

在階展的所有參觀者中，資本家的反應受到了最密切的觀察。1965年12月23日，上海市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約八十人參觀了展覽。展覽工作人員密切注視著他們。據其報告，一些參觀者只是匆匆掃了一眼展品，似乎並沒有細聽講解員的講述。一位名叫朱鴻儀的市工商聯副主任「一進展覽場地就東張西望，看一下大標題就走過場了……事後從座談會上的發言來看，他可能最關心的是展覽會上有沒有點到他的名字」。雖然朱鴻儀倖免於難，但普陀區商業聯合會副會長榮漱仁的確在展覽中看到了自己的榮氏家族。據工作人員報告，她先是躲在其他參觀者後面，後來看到申新九廠剝削工人的描述時，她憤然埋怨道，她已經

94 同上註，頁48；上海市檔案館A22-2-1401，頁13。

95 上海市檔案館C4-2-1，頁74。

96 同上註，頁69；上海市檔案館A22-2-1401，頁13。

97 上海市檔案館C4-2-1，頁25。

98 同上註，頁47、69。山東等地的展覽被拍成了電影，上海市檔案館C4-2-11，頁5b。還有一部1966年的電影以收租院雕塑為主題。

在電影裏看過了。在展示其父六十大壽的奢華宴會前，她輕描淡寫地說：「這是民國廿一年（1932）的事情……再隔兩年……境況就差了。我那時只有兩歲，什麼事都不懂。」參觀結束後，他們參加了一場討論會，會上一些人顯然有意轉移人們對自己的關注：一些人宣稱自己只是小老闆；另一些人對自己隻字不提；榮漱仁則表示她與棉紡廠無關，只經營過麵粉廠。展覽的工作人員還設法了解到榮漱仁回家後的談話：她向丈夫總結了展覽中有關榮氏家族的部分，兩人都極力撇清他們與榮家的關係。榮漱仁的丈夫辯駁道：「我是榮家的女婿，榮家的事和我搭界。」榮漱仁本人也保持距離：「我是榮家的女兒。嫁出門的女兒，潑出去的水，申新的剝削和我沒關係。」⁹⁹

但討論會中也有人甘願接受展覽的教訓，對他們而言，討論會成了自我批評的舞台。如果說，工人們在展覽中看到自己的身影會「憶苦思甜」，那麼理想的資本家參觀者則會反思自己過去的生活。幾位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借此機會細數自己過去的錯誤：剝削、欺詐工人，購買外匯、抬高利率，利用戰時的通貨膨脹獲取私利等。另外也有人將展覽視為一種激勵。上海城市建設局局長徐以枋形容這場展覽是一面鏡子，他「看清了自己醜惡的本質」。上海市出版局的徐鑄成在看到榮宗敬大壽的剪報後表示，記者竟為剝削階級服務，「看了以後覺得驚心動魄」。與榮漱仁的情況一樣，展覽工作人員也記錄了一些人在參觀結束後的表現：一位資本家的媳婦在聽到女工翁華玉私藏糖果的故事後，心感慚愧，不發一語，不再反駁別人對她腐敗的譴責。¹⁰⁰

99 上海市檔案館 C4-2-1，頁 45、78。榮漱仁對申新財務狀況的描述是正確的。柯博文 (Parks Coble) 研究指出，到 1934 年，申新受到了全球經濟大蕭條的影響，同時面臨與日本的競爭。儘管榮宗敬有政治關係，而且如柯博文所言，前幾年榮宗敬共繳納一千萬元的稅款，但他還是未能申請到貸款以維持申新的運營。參見 Parks M. Coble Jr.,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0), 154-155。

100 上海市檔案館 C4-2-1，頁 80。

除了這些特殊的參觀團外，具有資產階級背景的個體參觀者也被記錄下來，以顯示展覽的影響力。大隆機器廠廠長的兒子支仰泰向展覽工作人員訴說了他的苦楚：「過去認為父親技術好、聽話才從學徒提為廠長，現在知道他也在壓迫工人。」虹口青少年宮的工作人員、資本家的兒子丁訓祥在參觀後寫下了一封懺悔書：「天下烏鴉一般黑，我父親也和所有資本家一樣，靠剝削工人而生存的。我也不是由工人的血汗養大的嗎？我要做無產階級的接班人，徹底改造思想。」¹⁰¹ 報道指出，正是受到了這場階展的鞭策，支仰泰、丁訓祥才跟父母「劃清界限」。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無產階級接班人——紅衛兵成群結隊地來到展覽現場。1966年9月，總計約有兩千人，或每日約一至兩百名紅衛兵，帶著學生證或大學介紹信前來觀展。¹⁰² 起初，策展人只是把文革當作階級鬥爭的下一階段來展示；自1966年5月以後，他們爭分奪秒地更新展覽，以表現文革的最新進展：姚文元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對「三家村」的攻擊，以及中共中央委員會發表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¹⁰³ 夏末，隨著紅衛兵運動的開始，策展人迅速展出了「破四舊」和紅衛兵揪鬥群眾的照片。¹⁰⁴ 展覽會工作人員成立了自己的團體，自稱「紅衛宣傳員」和「紅保衛員」。展覽會的紅衛兵們利用他們在工廠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工作組中的關係，挑選案例、收集文物、給沒收財物拍照，從而增加了新的案例。¹⁰⁵ 阜豐麵粉廠的龔旭人就是一個典型的補充案例。龔旭人出生地主家庭，靠經營麵粉廠發家，他的一生都濃縮在紅衛兵繳獲的物品當中：槍枝、子彈、火藥等武器，包括房契在內的變天賬，以及金銀珠寶、藝術古董各類珍寶。¹⁰⁶ 1966年11月大

101 同上註，頁77。其他例子請參見上海市檔案館A22-2-1401，頁11-12。

102 上海市檔案館C4-2-1，頁105。

103 同上註，頁54；上海市檔案館C4-2-8，頁4-5、146-148。

104 上海市檔案館C4-2-8，頁5、149。

105 上海市檔案館C4-2-1，頁102-103。關於更新文革部分的計劃，參見上海市檔案館A22-2-1401，頁3-5。

106 上海市檔案館C4-2-8，頁11-12、65。

部分時候，前來參觀的紅衛兵都像對待過去其他的展覽一樣，將這場階級展視為一張即時的大傳單，宣告著一場正在進行中的政治運動。¹⁰⁷

然而到了11月下旬，隨著政治局勢急轉直下，代表了階級敘事以及策展方上海市委的上海階級教育展覽開始受到攻擊，被抨擊為「黑展覽」、「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反動學術權威」的作品，正是這些反動權威「讓資產階級登上展覽會的寶座」。¹⁰⁸ 出言指責的不下七個組織，都來自上海和外地的大学和博物館。其中包括：北京農業大學的紅衛兵（八一戰鬥隊）、北京鋼鐵學院的東方紅公社、北京輕工業學院的小紅軍（長征隊）、山東大學的紅衛兵（向陽戰鬥組）、嘉興（浙江）博物館的星星之火戰鬥隊、上海階級教育展覽的魯迅精神戰鬥隊，以及上海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造反有理戰鬥隊）。¹⁰⁹ 從指責的內容中可以看出，紅衛兵做了詳盡的調查：他們多次參觀展覽，翻閱展覽的文件資料，甚至審訊宣傳官員。上海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譴責上海市委委員依靠資產階級學者進行策展，並質問道：「你們為什麼不請老工人、老貧農一起來搞呢？」¹¹⁰ 北京輕工業學院的長征隊更在上海宣傳部外安營紮寨，要求副部長蔣文煥宣佈展覽是「大毒草」。¹¹¹

在紅衛兵揪出「雜草」的決心下，展覽的內容可能全都不合格。畢竟，階級教育的目的是防範階級敵人，而文革的特權是公開鬥爭。在充滿謾罵的攻擊中，展出的內容無一不被詆毀，省去的部分又都遭到惡意責難。展覽對資本主義的關注，一度曾因其簡明扼要而受到讚揚，如今

107 上海市檔案館 C4-2-1，頁 109–110。

108 上海市檔案館 C4-2-30，頁 21a–b、23、33、38b。關於這些「學者權威」的名字，參見本註頁 34b。其中也包括來自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和經濟研究所）、復旦大學、哲學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和上海市委黨校（政治經濟學和黨史）等單位的個人。關於上海黨委的關係，參見本註頁 38b。

109 同上註。

110 同上註，頁 27b、34b。

111 同上註，頁 27b。

卻被批評成無視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相對立。北京農業大學的紅衛兵指責策展人「為帝國主義塗脂抹粉，開脫罪行」。¹¹²此外，上海階展還被批評內容有遺漏或強調不足：毛澤東語錄不夠、黨史太少、沒有刻畫1949年前的階級鬥爭。雖然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本意是突出當代的階級鬥爭，但紅衛兵卻抨擊展覽沒有歌頌社會主義下的今天。¹¹³在一連串令人頭暈目眩的指責中，「和平演變」部分格外引發眾怒。紅衛兵認為，展覽只刻畫了資本主義的威脅，忽視了群眾的抵抗；他們聲稱，展覽的敘述暗示著「上海再也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上海了，而是籠罩著一片白色恐怖的『美國』了！上海不是新中國的繁榮都市，而是修正主義蘇聯的『莫斯科』。這明明是對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誣衊！」¹¹⁴此外還有幾個紅衛兵組織譴責展覽沒有包括黨的一大，是對過去與當前革命的蔑視。¹¹⁵

展覽中的視覺元素也遭到了紅衛兵的批判。張春橋曾對如何畫榮毅仁提過意見，山東的紅衛兵在此發現了問題；他們和北京的紅衛兵一起，將張春橋的指示解讀為對工人階級的醜化與對資本家的美化。¹¹⁶此外，照片也未能倖免。展覽展出了一張工人和資本家坐在一起的照片，題為「勞資合作」。上海紅衛兵嗤之以鼻：「呸！一派胡言！」¹¹⁷另一張照片刻畫了資本家被捕的畫面，但也遭到非難，因為照片中的資本家衣冠楚楚、鎮定自若。「這哪裏有一是像犯人的樣子！簡直像我們的革命先烈們那樣臨危不懼。照片裏的公安人員和另一個群眾，不但不憤

112 同上註，頁1b。

113 同上註，頁34。

114 同上註，頁33。

115 同上註，頁26b、32、37。

116 同上註，頁1b、37b。紅衛兵在此處引述「上海市委書記張某某」，引文與之前的記錄吻合。

117 同上註，頁32b。

恨敵人，反而在笑！這是在作地地道道的反動宣傳！」¹¹⁸ 就連偶然拍到的一隻貓（與「毛」同音），也被解讀為反毛行徑。北京輕工業學院的紅衛兵宣稱：「誰要反對毛主席，我們就砸爛它的狗頭！」¹¹⁹ 一張歷史照片、一個戴著眼鏡、頭髮光潔的資本家形象，以及一隻在照片邊緣拍到的貓，這些無一不表明：階級教育展覽作為一堂經過核查批准的意識形態課，其原本的敘事腳本，如今已在紅衛兵的批判中被文化大革命的語言和謾罵所取代。紅衛兵們從參觀者的評論中摘詞截句，用以攻擊展覽，保衛群眾意見，甚至將禁忌言論曲解為策展人用心險惡的證據。為證明他們的觀點，山東紅衛兵引用了一名學生看到榮宗敬祝壽金馬時的反應：「天哪！太漂亮了！太漂亮了！」¹²⁰ 紅衛兵認為，這些話清楚表明展品具有腐化作用，負責選品的策展人本該揭露資產階級分子，如今卻跟他們同流合污。上海紅衛兵誓言：「一反到底，直到造出一個紅彤彤的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階級教育展覽會出來不可！」¹²¹ 但是，他們的指控充斥著口號，卻從未定義這樣的展覽應該是什麼。

小結：階級展覽與大字報

在文革前夕展出的上海階級教育展覽，反映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一種宣傳體裁。與中共一大會址和蕃瓜弄一樣，上海階級教育展覽用階級的詞彙既展示了上海的歷史故事，也講述了工人階級在黨的領導下取得勝利的故事。但不同於蕃瓜弄對新中國生活的讚美，階級教育提醒人們警惕新生活的危險。不獨過去的信仰阻礙了科學的認知（如反迷信展

118 同上註，頁26。

119 同上註，頁26b。

120 同上註，頁38b。紅衛兵引用參觀者評論的其他例子，請參見同上註，頁24b。

121 同上註，頁22b、35b。

覽所示)，而且階級敵人也潛伏在新中國之中，威脅著新中國的復興。上海階級教育展覽透過故事、文物和個人事例，教導參觀者從人事物中看到階級，以鏡自照同時照人。正如市委書記陳丕顯所述，策展人利用視覺和物質文化，將感官與理性認知相連通。¹²² 但就紅衛兵的攻擊事件來看，或許在階級鬥爭的熔爐中，情感本身也成為了一種理性。

與前幾章中的展覽相比，上海階級教育展覽更是政治運動的組成部分。階展的案例不僅為了教授工作組如何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旨在向普通民眾解釋運動的意義與思想基礎。從始至終，展覽都得到上海市委的批准，隨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發展，上海階展也成為運動的最新解讀。無論參觀者是否務必參加，也無論展覽是否真正有趣，了解最新的政治路線都對自己有利無害。因此，有人一字不差地謄抄展板，有人要求再次參觀，並在1966年夏，越來越多的參觀者爭先恐後地要看文革後的修訂版。展板的快速更新突顯出展覽作為革命教科書的功能。策展人緊跟時事，隨時增加展板，更新後的展覽解釋了紅衛兵「破四舊」的行動，展示了一張南京路上搗毀永安百貨招牌的照片，還有一幅上海海關大樓的圖片，如今它的塔鐘為「東方紅」而鳴。¹²³

但是，上海階級教育展覽並不僅限於解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起源，及其演變為文革的結果。展覽與政治運動同步進行，教導參觀者應如何行動，又如何自主開展階級鬥爭。由此可見，階級教育展覽代表了展覽文化的革命模式。展板在人們孜孜不倦的抄錄中，成為了攻擊階級敵人的模板。1966年8月，來自工業、貿易和交通單位的參觀者向展覽工作人員反映道：

122 上海市檔案館C4-2-1，頁88。關於圖像、情感與理性的關係，參見《湖南省社會主義階級教育展覽會簡介》，頁4；上海市檔案館A22-2-1241，頁9；上海市檔案館C4-2-1，頁5、93；上海市檔案館C4-2-11，頁15b。

123 上海市檔案館C4-2-8，頁4-5、148。

他們單位這次文化革命運動中大字報揭發出的問題，與展覽會第三部分內容差不多，所以展覽會對啟發、推動群眾投入文化革命與寫大字報，有一定作用。¹²⁴

無疑，毛時代中國的宣傳體制還有其他靈感來源，但來自工作單位的這條評論很能說明問題：不論在形式或內容上，展板都已然化身為大字報。¹²⁵ 階級教育展覽本身就是一部革命手冊。

早在展板啟發文革大字報之前，參觀者就已經認識到展覽的批判力量。1966年夏，一個工廠主管小組的成員表示：「展覽會講解員控訴資產階級罪惡，就像在控訴我一樣，幾個塑像就像指著我，看了使人心驚肉跳。」¹²⁶ 隨著政治套路在群眾中的培養與應用，一個參觀者的階級課堂就是另一人的不祥之兆。當紅衛兵開始闖入民宅搜查反革命證據時，他們可能想到了階展中的文物：金馬、變天賬與日記。在下一章中，我們將看到革命行動的一種形式，正是將他們發現的物品進行展示。在對沒收物品的展覽中，紅衛兵找到了文化大革命階級鬥爭的舞台。

124 上海市檔案館 C4-2-1，頁 94。

125 伍國引用了一本紅衛兵回憶錄，其中講到了紅衛兵借憶苦思甜鼓勵群眾毆打階級敵人的做法，因此伍國認為憶苦思甜助長了紅衛兵的暴力行為。參見 Wu, "Recalling Bitterness," 264。

126 上海市檔案館 C4-2-1，頁 92。

文化大革命的實物教育 紅衛兵功勳展

隨著郭琳爽的罪行陳述達到高潮，群眾中響起了一片喊聲：「我以紅衛兵的名義，判他死刑！」¹ 此前，郭琳爽的家族企業永安百貨的一名職工，講述了他悲慘的一生。他說，解放前，這個反動資本家勾結帝國主義和國民黨軍閥，剝削勞工，從中牟利；1949年後，郭琳爽從未改過自新，繼續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藏匿資產和文件，以待復辟。這位職工指著永安公司以前的外國執照照片以及陳列示眾的華麗服飾和進口食品，讓觀眾的視線集中到一串厚重的鑰匙上。² 他用熟練的聲音喊道：「這串鑰匙是郭琳爽家裏經常用的，淨重達12斤半。同志們，他這每一個鑰匙都浸滿了我們勞動人民的血汗！」聽到這裏，充滿階級感情的群眾發出了怒吼。³

1 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36，頁15。

2 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40，頁20-21b、32-40。在未標頁碼的一頁上（可能是頁31），刊登了三張批鬥會的照片，其中在「走資派」橫幅下的人物貌似郭琳爽。

3 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34，頁2；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36，頁15；12斤半等於13.78磅。由上海市商務局主辦的這次展覽從9月底開始籌備，歷時兩週，展覽於10月17日正式開幕。

這一幕讓人想起文革中紅衛兵在群眾面前控訴所謂階級敵人的批鬥會，但顯然少了一個要素：郭琳爽本人並不在場。相反，對郭琳爽的批鬥發生在一次展覽上，展出的是紅衛兵查抄淮海中路1375號郭家豪宅時沒收的物品。⁴ 這些物品作為紅衛兵的一部分「功勳」，由上海市商務局舉辦展覽，從1966年10月展至11月。展覽由永安百貨（後更名為「國營東方紅百貨商店」）的職工策劃，呈現了郭琳爽生活的各個方面，這也是「紅衛兵功勳展」中最主要的反面教材。職工們與上海商務局召集的講解員共同撰寫並完善了敘述的文本。講解員一邊評估聽眾的反應，一邊不斷修改關於郭家鑰匙的台詞。他們總結道，強調「經常」一詞可以「激發自己的階級感情」，加上最後一句話則更能刺激觀眾謾罵嘲辱。他們的敘述，加上展覽實物作為罪證，揭示了階級敵人的面目。⁵

參觀紅衛兵功勳展的人數約在每天一至兩千人之間；開幕後的最初兩週就吸引了19,900人，其中15,300人來自上海商務局的各個工作單位，其餘參觀者則來自兩百多個其他單位。除了本市工人和職員外，參觀者還有解放軍戰士、人民公社的農民，以及遠自廣州、哈爾濱和西藏等地的紅衛兵。⁶ 所有參觀者都對展覽的形式感到熟悉，而本地參觀者或許更對展覽的部分內容並不陌生。中共一大會址、棚戶區展覽以及最近無處不在的階級教育展，都講述了上海的歷史及其資本主義的過去。在蕃瓜弄，策展人用滾地龍和討飯瓢來表現過去的苦難，而在紅衛兵功勳展中，憶苦的手法透過實物再次重現，例如人力車夫打滿千層補丁的褲子，或煤炭工人被機器軋傷的手臂照片。⁷ 如果對個別階級敵人的刻畫讓人想起階級教育展覽中的類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紅衛兵講

4 上海市檔案館C48-1-146-49；上海市檔案館C48-1-176-142。登記文件記錄了郭琳爽的地址，郭宅估價為228,672元。

5 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36，頁15。

6 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34，頁11-14。據報道，展覽大受歡迎，每天都有幾百人被拒之門外，到10月29日，排隊看展的人數達到8,800人，來自70個單位。

7 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40，頁14b。

解員在反復參觀階展的過程中得到了訓練。⁸不過，雖然紅衛兵展覽的類型在形式上與階展如出一轍，並且照搬了一部分內容，但它提出了一個新觀點：是紅衛兵揭露了隱藏的階級敵人。紅衛兵展覽上成堆的「反革命文件」和絲襪，證實了文化大革命的正當性。

文革肇始的紅衛兵運動被形容為「紅色恐怖」，在炎炎夏日掀起了持續數週的動盪混亂。馬若德和沈麥克 (Michael Schoenhals) 在描述這段暴力時期時表示：「通常，來自黨的暴力行動都受到密切的控制和校正，但現在，規則被廢止了。」⁹丹尼爾·里斯在研究毛崇拜時指出，毛澤東在天安門的群眾大會上接見紅衛兵是一種無政府的狀態，革命的形式五花八門，北京一所中學甚至列出了「破舊立新」的一百種辦法。¹⁰與此同時，紅衛兵們沿用了階級鬥爭的套路，從搗毀帶有封建色彩的路標，到強迫敵人頭戴高帽、掛著標牌遊街示眾。隨著這種稱為「批鬥」的批判形式在中國各地照搬上演，紅衛兵展也同樣在全國普及，從北京展覽館到最小的縣城校舍隨處可見。本章將聚焦於上海的「紅衛兵功勳展」，它自詡是展覽工作的一場革命，但其實卻汲取了持續已久的政治文化。¹¹紅衛兵功勳展是對文革的論證，在策展人和講解員眼中，他們的工作屬於革命行動，如其所說，「在展覽會裏做講解工作也是幹革命」。¹²

文革抄家與「戰果」

對於郭琳爽的生活或家庭，上海遊客與永安職工的第一印象並非來自紅衛兵功勳展。上海永安最初是香港永安的子公司，1918年在上海

8 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34，頁5。

9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31.

10 Leese, *Mao Cult*, 133–135.

11 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34，頁6。

12 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36，頁11。

開業，郭琳爽作為上海永安的總經理早已家喻戶曉。據歷史學家葉文心描述，郭琳爽又名 Leon Kwok，是民國時期上海自封的元老之一，1937年，南京路的永安百貨遭到轟炸，他積極捐錢捐物，並在戰時鼓勵愛國捐款。¹³ 解放前夕，郭琳爽沒有隨家人飛往香港，而是投身新中國，並在1956年負責了永安百貨的公私合營轉型。¹⁴ 郭琳爽既是永安公司的經理，在1956年當選上海市人大代表，因此常常成為新聞人物。1949年永安公司第一個工會成立時，郭琳爽就在現場；在緬懷民國時期國貨運動中犧牲的永安職工時，他為職工捐獻花圈；當永安公司進行社會主義的公私合營改造時，他的賀詞遍佈本地報紙。¹⁵ 隨著郭琳爽公開宣揚社會主義改造的成效及其給消費者的好處，關於他家庭生活的描述也見諸報端。¹⁶ 1957年，《新聞日報》向讀者描述了他的花園洋房，「遠遠地就聽見一陣悅耳的琴音蕩漾在寂靜的冬夜裏」。《新聞日報》的這篇文章還配了一張照片，郭琳爽夫婦坐在吊燈下的雅緻房間裏，聽兩個女兒彈鋼琴、拉小提琴。¹⁷ 春節期間，郭琳爽在寬敞精緻的房間裏接待永安的新

-
- 13 Wen-hsin Yeh, *Shanghai Splendor: Economic Sentiment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1843–1949*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57–63, 162–163, 170, 176. 葉文心還指出，偶爾也有人批評這種慈善事業其實只是為自己服務。
 - 14 Xiaocai Feng, “Rushing Toward Soci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ath of Private Business Enterprises in Shanghai, 1949–1956,”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60: An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ed. William C. Kirby (Asia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2011), 240–258.
 - 15 〈永安公司分會昨晚正式成立〉，《文匯報》，1949年11月24日，頁2；〈上海集會紀念梁仁達〉，《文匯報》，1957年2月10日，頁1。關於郭琳爽的賀詞，參見《解放日報》，1956年8月16日；《新民晚報》，1955年11月22日、1955年11月23日、1956年1月14日、1956年1月20日、1956年1月21日。
 - 16 上海市檔案館C48-2-2676，頁11–12；《新聞日報》，1957年1月13日；《新民晚報》，1957年6月19日、1957年8月31日、1958年1月20日；《人民日報》，1960年4月9日。
 - 17 〈郭琳爽這一年來〉，《新聞日報》，1957年1月13日，頁1。

老職工，桌上擺滿了來自他家鄉廣東的美食，其間點綴著他親手栽培的鮮花。¹⁸

和蕃瓜弄的王蘭花一樣，郭琳爽成了新中國生活的代言人。外國記者和領導人應邀到他家用餐，欣賞他家養的雞和鮮花。晚餐結束後，客人須在小冊子上留言，如同參觀展覽一樣。郭琳爽身著西服，面帶微笑，帶著外國朋友參觀永安百貨，在那裏，玻璃陳列櫃的上方高懸著毛主席的畫像。上海一家報紙甚至轉載了蘇聯雜誌《火花》(Iskra)對他的採訪。¹⁹ 郭琳爽在講話中給出了一種標準的自我檢討的說法：他和家人都是海外僑胞，他們錯誤地以為工業可以救國。在永安百貨面臨外國企業打壓的同時，它還與帝國主義勾結，為他們註冊執照；在永安百貨出售奢侈品為富人服務的同時，它也在剝削工人。郭琳爽表示，解放後，他留在了上海，上海就是他的故土。雖然他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但他認識到自己仍需改造資本主義思想。²⁰ 在永安公司的社會主義改造之後，郭琳爽在講話中表示，永安的成功要歸功於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平價的國產商品庫存、高效的營業周轉率，以及大量的顧客——如今，顧客們也受到了新的服務，「一切從消費者利益出發」。²¹

郭琳爽不停講述著這個消費品改善物質生活的故事，從上海到周邊農村，甚至在大躍進期間他的講述仍未停歇，他的公眾形象從未透露出他在政審中的疑慮。²² 然而，在懺悔錄中，郭琳爽坦承了他面對政治運

18 〈一件值得告慰的喜事：郭琳爽代表的發言〉，《解放日報》，1956年8月16日，頁6；上海市檔案館C48-2-2368，頁158-162。

19 〈郭琳爽這一年來〉，《新聞日報》，1957年1月13日，頁1。

20 上海市檔案館C48-2-1013，頁201-202。關於毛時代對階級的討論，參見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38-46。郭琳爽屬於工業資本家，是資本家的一種。見上海市檔案館B52-2-81，頁133。

21 上海市檔案館C48-2-2676，頁11-12。參見《新聞日報》，1957年1月13日；《新民晚報》，1957年6月19日、1957年8月31日、1958年1月20日；《人民日報》，1960年4月9日。

22 1960年，郭琳爽受命彙報上海周邊公社的情況。在報告中，他盤點了自

動時的焦慮，解放後的苦難令他頭髮花白，胰腺病惡化，他的工資也減少了四分之三，難以維持生計。他承認，與年輕一代相比，自己非常落後，「一看到自己的名字就緊張」。²³但面對外界，郭琳爽卻表示他正處在自己的「黃金時代」，並對自己過往迷信算命的行為嗤之以鼻：「經過幾年學習，我覺得這種看法是唯心的。只有認識了社會發展規律，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²⁴本著這樣的精神，郭琳爽成為上海舊資本家的模範代言人。²⁵在郭琳爽的推動下，永安公司成為第一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百貨公司。在公司慶典上，他登上粵劇舞台，紀念永安的新生。²⁶進入1960年代，郭琳爽繼續接待外賓，宣傳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一次全家訪問香港時，他向父親保證自己的社會地位無虞，並翻開畫報中關於他的報道，向父親展示他坐在辦公桌前、發表演講、餵雞、做園藝的照片。²⁷關於郭琳爽的政治表現，內部文件做出了評價：他很好地扮演了他的角色。郭琳爽並未參加上海的階級教育展覽。

1958年大躍進開始以來人民公社的商品種類，列舉了羊毛大衣、鞋子、鋼筆、毛衣等商品的增加情況。〈努力學習，為社會主義多出一份力量：郭琳爽委員的發言〉，《人民日報》，1960年4月9日，頁17。

- 23 上海市檔案館C48-1-153-69，頁69-70。關於各種運動對郭琳爽這類個人的影響，參見Karl Gerth, "Wu Yunchu and the Fate of the Bourgeoisie and Bourgeois Lifestyles Under Communism," in *The Capitalist Dilemma in China's Communist Revolution*, ed. Sherman Cochran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2014), 175-201。
- 24 〈堅持不渝地團結在黨的旗幟下，為發展科學文教事業貢獻力量〉，《文匯報》，1961年7月25日，頁1。
- 25 其他模範資本家的例子，參見Christopher R. Leighton, *The Revolutionary Rich: Political Fortune and Red Capitalism in China, 1949-1979*, forthcoming。
- 26 〈永安公司正式申請公私合營〉，《新民晚報》，1955年11月22日。關於這齣粵劇，見《新民晚報》，1956年1月14日、1956年1月20日、1956年1月21日。所有當時的記錄都顯示這齣粵劇是《金馬鞍》。
- 27 洪宏，〈郭琳爽和上海永安公司〉，柳渝編，《中國百年商業鉅子》（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272-274。

但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永安百貨是紅衛兵最早、最顯眼的目標之一。據《人民日報》報道，從8月23日拂曉開始，上海紅衛兵宣佈批判舊世界，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紅衛兵聚集在著名的南京路商業街上，這裏象徵著上海資本主義的過去。他們在永安百貨的櫥窗上貼滿大字報，要求將店名改為「永紅」、「永鬥」或「紅衛」。紅衛兵宣告：「『永安』是舊社會大老闆企圖永遠安穩剝削勞動人民而定的名……今天我們決不允許『永安』這個臭招牌繼續掛下去！」²⁸於是，「永安百貨」的招牌被「東方紅百貨」取代。隨著「破四舊」的蔓延，紅衛兵們在公開場合和私下裏都進行了革命。在大街上，他們抨擊帶有封建色彩的店名，當面斥責燙髮的人；在居民家中，他們翻遍每個角落，搜查反革命的證據。「抄家」對上海的影響超過了中國任何其他城市，沒收的物品數量也最多。1966年8月23日至9月8日期間，上海共有84,222戶人家遭到搜查。²⁹1967年4月一份呈交上海市革委會的報告顯示，截至當時，抄家共搜出30噸黃金、240萬銀元、400份反革命文件、598支槍和11.7萬發子彈等等。³⁰

所謂「舊社會大老闆」，無疑是指郭琳爽，他家多次遭到查抄，先是東方紅百貨的紅衛兵，接著是財經學院的紅衛兵，甚至還有當地中學的

28 〈上海天津革命小將和商業職工向剝削階級「四舊」發動總攻：揮起革命鐵掃帚，橫掃一切舊習俗〉，《人民日報》，1966年8月25日，頁2。

29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54。對比之下，北京有33,695戶家庭被抄。據檔案文件記載，到文革結束，上海有超過25萬戶家庭遭到搜查。參見上海市檔案館B1-9-228-74，頁74。

30 裴宜理和李遜引用了1986年的一份中國銀行報告，其中有些數目與當時的記錄相吻合，有些則不一致。相符的數目包括美元、外幣、銀元、現金和債券的數量。黃金數量與當時的報告不符——報告稱有30噸，而裴、李的引文則表示有65盎司。由於北京紅衛兵報告的黃金數量為5.7噸，黃金可能是透過其他渠道運送的。見Perry and Li, *Proletarian Power*, 12；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55。我所依據的是一份於1967年4月15日提交上海市革委會的報告，會議在四川省安仁鎮建川博物館聚落舉辦。關於上海市商務局報告的金額，見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35，頁16。

紅衛兵。各個組織的「革命行動」一波接一波，郭家成了他們的行動總部，郭琳爽被關在沒有窗戶的車庫「牛棚」裏。只有當他要被批鬥時（如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和市長曹荻秋の批鬥會），他才獲准放出來。有一次，一群北京的紅衛兵衝進車庫毆打郭琳爽，幾乎將他打死，東方紅百貨的紅衛兵上前圍住：「你們這樣打不行，我們還要留著他當反面教員哩！」³¹ 在紅衛兵功勳展中，郭琳爽成了「反面教員」的重頭戲，他的財產代表了他與他所在的階級，抄家搜出的一切物件都證明了造反有理。

紅衛兵功勳展的想法從何而來？裴宜理和李遜指出，「上海早期的紅衛兵活動以北京模式為藍本」，起初只是異地效仿，到1966年8月至10月，成千上萬的北京紅衛兵來到上海，直接對上海紅衛兵進行指示。³² 據歷史學家金大陸估計，1966年下半年有四百多萬外地紅衛兵來到上海，其中北京學生發揮了重要作用。³³ 在上海爆發「破四舊」運動後不到一週，《人民日報》向紅衛兵致敬，對其行動表示支持，並在揭露階級敵人與隨後的反革命文件與武器展覽之間建立了直接的關聯。1966年8月29日的社論如此寫道：

這些吸血蟲，這些人民的仇敵，正在一個一個地被紅衛兵揪了出來。他們隱藏的金銀財寶，被紅衛兵拿出來展覽了。他們隱藏的

31 這一段記述來自洪宏，〈郭琳爽和上海永安公司〉，頁274–275。洪宏表示，接著郭琳爽被分配住進了永安公司附近一家賓館的兩個房間，受到警衛人員的看守；他和妻子也被指派到食堂洗碗擦桌。

32 Perry and Li, *Proletarian Power*, 9–12.

33 金大陸，《非常與正常》，頁64–88。李遜還詳細介紹了北京紅衛兵在上海發揮的作用，並指出他們如何以北京為參照對上海運動提出批評，見李遜，《文革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兩卷本（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頁121–162。時任黨委書記的陳丕顯也在回憶錄中描述了上海紅衛兵模仿北京紅衛兵的情況，以及北京紅衛兵對上海紅衛兵的影響，參見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三聯書店，2005），頁58–61。

各種變天賬，各種殺人武器，也被紅衛兵拿出來示眾了。這是我們紅衛兵的功勳。紅衛兵的行動，真是好得很！³⁴

上海與外地的紅衛兵對《人民日報》做出了響應，直接運用了社論的措辭。例如，1966年10月14日，上海同濟大學的紅衛兵宣佈追隨北京紅衛兵，並一字不差地借用了《人民日報》社論中的語言。³⁵大約在同一時期，上海的英國外教索菲亞·奈特 (Sophia Knight) 寫信給她的母親說：「在資本家的宅邸裏發現了更多罪證，例如金條之類；顯然還發現了間諜組織。北京舉辦了一場展覽，我敢肯定，上海也會舉辦展覽，希望到時能允許外國人參觀。」自9月14日以來，奈特一直記錄著上海抄家的新聞，而她終於在11月30日如願以償，參觀了位於前波蘭領事館的抄家展，展品比她預想的更多：日記和信件、曾用來對付工人的日本刀和皮鞭、無線電發射器和一枝發射毒氣的鋼筆。³⁶

舉辦展覽成了各地紅衛兵的拿手好戲。³⁷樂黛雲後來寫道，在北京，北大文革籌委會在一間教室裏舉辦了一場沒收物品展覽會。她描述說，她和系裏的工作人員一起參觀了展覽，一位她認識的小學生擔任講解員，為他們講解展出的物品：書籍和繪畫、照片和國民黨文件，甚至還有一串從校園各處收集來的高跟鞋跟。樂黛雲在回憶錄中指出，展覽的目的是「揭露北大階級鬥爭的嚴重性，表明工農兵的苦難，揭露教員

34 〈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人民日報》，1966年8月29日，頁1，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CD-ROM。

35 〈同濟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6年10月14日，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36 Sophia Knight, *Window on Shanghai: Letters from China, 1965–67* (Deutsch, 1967), 219–227.

37 批鬥會上的非正式「展覽」可能先於下文中有組織的展覽。1966年9月12日對黑龍江省省長李范五的批鬥會在哈爾濱舉行，關於批鬥會上展出的物品，參見Li, *Red-Color News Soldier*, 114–115。

和幹部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她還表示，展覽是北大紅衛兵領袖聶元梓給批鬥對象定罪的一種方式。³⁸ 在北京的其他地方，紅衛兵舉辦了階級教育展覽和「破四舊」展覽；北京師範大學還在教師食堂裏展出了裘皮大衣和皮包。³⁹ 知識分子們被冠上牛鬼蛇神的罪名，被迫在田裏除草，一名紅衛兵舉起相機給他們拍照，作展覽之用。所有人都背對鏡頭，除了研究魯迅的學者李何林。他抬起「陰陽頭」，面對鏡頭，等待咔嚓一聲，甚至請求留一張照片作為紀念。⁴⁰

在上海和北京之外，其他紅衛兵也紛紛效仿。廣州舉辦了一場展覽，其中既有紅衛兵運動史，也有對個人的控訴，還有對抄家的記述。除了列舉沒收的財物外，廣州還統計了變更的街道名、商店名，遭到「炮轟」的教堂以及被驅逐出城的個人。⁴¹ 在重慶，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在市博物館舉辦了「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展」，聲名遠播，吸引了大批群眾前來參觀。負責展覽的「紅小兵」楊耀健回憶說：「〔大家都〕想親眼看看地主資產階級過的啥生活。他們邊看邊議論，設想天天吃山珍海味會不會上火，睡在精雕細刻的大木床上是啥滋味。」除了驚嘆於未知的腐朽生活，楊耀健表示，參觀者「更加相信……在我們身邊還有夢想變天復辟的黑五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因而交口讚譽『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挖出了一大批『定時炸彈』，做了一件大好事」。⁴²

這類展覽是紅衛兵的套路之一，也蔓延到了農村。高原在回憶錄中描述道，在河北，他所在的中學舉辦了「階級鬥爭的震驚現實展」，

38 Daiyun Yue and Carolyn Wakeman, *To the Storm: The Odyssey of a Revolutionary Chinese Wom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171.

39 北京市檔案館 2-18-123，頁 40；北京市檔案館 147-2-128，頁 1。

40 光勤，〈洗後望贈我一張〉，《魯迅研究動態》，第 1 期（1989），頁 24。

41 《廣州地區紅衛兵革命造反戰果展覽會》（1966 年 12 月）。

42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重慶市委員會學習及文史委員會編，《重慶文史資料》，第二輯（重慶出版社，1999），頁 218–219。

其中成堆的糧票成為展覽中最生動的展品。⁴³ 展覽成了各個派系互相爭勝的舞台；在廣西，一個派系把敵人關在鐵籠子裏作「禽獸展覽」並以此聞名。⁴⁴ 一些展覽館，例如重慶展覽館，遭到了敵對派系成員的攻擊，不僅成為階級鬥爭的手段，也變成各派自相殘殺的場所。

雖然展覽的動機一部分來自北京發出的信號，但各級紅衛兵展覽都帶有黨直接組織的印記。在河北中學，正是工作組幫助造反學生舉辦展覽，展示了教師們被沒收的財產。⁴⁵ 在重慶，市、區兩級的黨委負責協調了各單位的參觀活動。⁴⁶ 北京則組織了最大規模、最集中的一場展覽——「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展覽會」。⁴⁷ 在林彪辦公室的指導下，這場展覽從1966年10月開始動員軍隊，最終聚集了來自造反派、軍隊、博物館和公安機關等不同單位的兩百多名工作人員。「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展覽會」擁有強大的資源支持，展覽橫跨北京展覽館的四個展廳，甚至出版了自己的手冊。展覽工作人員配搭軍徽，在倉庫中暢行無阻。每天都有一輛部級私家車負責運送四件屬於一級國寶的宋代瓷盆；展覽還得到了江青、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和北京紅衛兵領袖的親自批准。⁴⁸ 不只林彪強調各地都應舉辦紅衛兵功勳展，從外交部長陳毅到中

43 Yuan Gao, *Born Red: A Chronicl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73.

44 李果河，〈我成了「活人展覽」的展品〉，《炎黃春秋》，第1期（2012），頁58–60。

45 Yuan Gao, *Born Red*, 72.

46 楊耀健，〈守衛造反展覽〉，《紅岩春秋》，第1期（1968），頁41。

47 《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展覽會》（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1967）。一些回憶錄使用的名稱略有不同，但此處使用官方手冊上的名稱。

48 丁大華，〈世所罕見的紅衛兵抄家戰果展覽會〉，《文史精華》，第1期（2008），頁25–31。參與策劃和執行的單位包括：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聯盟、北京軍區、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中國革命博物館和歷史博物館。出席最後批准會的有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康生、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以及聶元梓、蒯大富、譚厚

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等其他高層領導，也都表達了類似的建議。正是林彪提出了「紅衛兵的功勳」一詞，陳伯達則多次主張有必要展示「戰果」。⁴⁹ 上海的「紅衛兵功勳展」正是對這些建議的回應。⁵⁰

紅衛兵展覽的類型五花八門，有以幾位特定教師為對象的教室展覽，也有志在「震動全世界」的首都紅衛兵展覽會。⁵¹ 在所有展覽中，後者或許最煞費苦心，展覽佔地四個展廳，有精緻的展亭，還有各類雕塑：戴著紅衛兵袖章的毛澤東像、被紅衛兵簇擁著的毛澤東像，甚至還有批鬥會的雕塑。⁵² 四個展廳分別題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橫掃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和「偉大的紅衛兵運動震動了全世界」。這場展覽遠比教室裏的臨時展覽更加正式、全面。前兩個展廳介紹了北京紅衛兵運動的發展歷程，包括聶元梓等紅衛兵領袖親手寫的大字報，甚至還有一張毛主席的大字報。⁵³ 最引人注意的是第三

蘭等紅衛兵領袖。丁大華的回憶在官方手冊中得到了證實，林彪、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和解放軍都是展覽的支持者。見《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展覽會》，導言。據北京市檔案館記錄，階級教育展覽也有類似的先例，公安局、五反辦公室和北京市檔案館也曾幫助搜集歷史材料。參見北京市檔案館 101-189，頁 10。

49 林彪，〈在中央工作會議小組會上的講話〉，1966年10月12日；〈陳毅在外文出版局全體職工大會上的講話〉，1966年9月14日；陳伯達，〈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10月16日；陳伯達，〈陳伯達對兩個月運動的總結〉，1966年10月24日；陳伯達、王力，〈陳伯達王力同福建惠安一中二十五名戰士座談紀要〉，1966年10月29日，均收錄於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50 甚至在第二年，上海革委會還援引了陳伯達的一次講話，以支持繼續開展紅衛兵運動。上海市檔案館 B244-2-36，頁 11-12。

51 丁大華，〈世所罕見的紅衛兵抄家戰果展覽會〉，頁 26。

52 《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展覽會》，頁碼不詳。

53 據馬若德和沈麥克所述，毛澤東在一份舊《北京日報》上寫下了文字，然後由他的秘書抄寫在一張白紙上。見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90。

展廳的抄家展。⁵⁴《人民日報》對於如何展示財產、文件和武器都有規定，因此紅衛兵展覽無論規模大小，都按照要求包括了各種關於這些主題的展示。

透過展出抄家的沒收物品，紅衛兵展覽發揮了不同的作用。在最基本的層面上，策展是一種清點工作，對運抵展覽現場的物品進行記錄。例如，上海的展覽就將清點戰果的圖表做成了展覽的背景。在另一個層面上，展覽將抄家公之於眾，讓成千上萬的觀眾持續觀看整個過程，並在展覽中回顧抄家的結果。時年27歲的軍隊政工幹部丁大華被分配到首都紅衛兵展覽會工作，他後來回憶說，「一些重大抄家事件大都能反映到展覽會中來了」。丁大華的同事們觀看了抄家和批鬥會的紀錄原片，在影像中重溫了抄家的情景。他寫道：「記得前後大約連續看了一個星期，每天上下午都連續觀看好幾個小時……到後來也見怪不怪了，一天下來，看得人頭暈腦脹的。」⁵⁵最重要的是，紅衛兵展覽是一種審判形式，根據罪行界定敵人，使對個人的批鬥成為更大運動的組成部分。但在政治命運起伏不定的環境中，策辦展覽是危險的。丁大華仍然記得當時籠罩著所有工作人員的恐懼，並寫道：「心驚膽戰，人人自危，『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⁵⁶與中共一大會址的講解員一樣，紅衛兵展覽館的工作人員也身處政治動盪之中。

作為一種政治行動，紅衛兵展覽重現了1940年代的土改套路，尤其是「清算鬥爭」，即剝奪地主財產，重新分配給農民。正如韓丁

54 丁大華，〈世所罕見的紅衛兵抄家戰果展覽會〉，頁29–30；杜興，〈「破四舊」展覽記〉，《時代教育》，2010年1月，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iqing/xiaohua/detail_2012_07/04/15759320_0.shtml，訪問於2016年9月30日。哈佛大學馮漢柱圖書館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所收藏的一部錄像中，包含了一些抄家的珍貴影像。見*Decade in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ca. 1978), DVD (VHS Tape Transfer)。感謝南茜·赫斯特幫我找到了原始錄像帶。

55 丁大華，〈世所罕見的紅衛兵抄家戰果展覽會〉，頁28–29。

56 同上註，頁26。



圖 5.1.及 5.2. 抄家影像，無日期。出自文化大革命影像典藏 (Cultural Revolution Video Collection)，哈佛大學馮漢柱圖書館，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

(William Hinton) 對山西長弓村的描述，富人的財產在寺廟的院子裏一一擺開，從農具到家具，從華服到鮮亮的棉被，所有這些都是「鬥爭果實」。⁵⁷ 其他地方的報告顯示，這些戰果並沒有被立即分發。相反，連續數日，這些「勝利果實」都公開展出，顯然是為了培養階級仇恨。1947年，甄林風在《東北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逐步解釋了如何「展覽勝利財物，啟發階級覺悟」。他列舉了應該展出的物品，並說明如何利用解說員、向群眾提出哪些問題等。甄林風強調，把一件物品當作一堂課來展示，這樣才能讓參觀者發洩不滿。在長新鄉，「當把地主隋風樓的手槍放到桌子上讓大家看時，農民們都很氣憤的很快的就變成了訴苦大會」。隨著人們一個接一個地吐露苦衷，「又發現了很多新的積極分子」。同年，吉林省報道了一種「新型展覽」，將階級敵人也納入展覽之列：手執陽傘的小妾；身穿軍裝、頭戴「美國」帽的國名黨「特務」；穿著長袍、手拿稅糧量斗的地主。在極具畫面感的展覽中，如此裝扮的地主不得不做自我陳述，反省他過去如何壓迫、毆打窮人。⁵⁸ 由此，土地改革的新展覽開啟了社會主義中國展覽文化的第二種模式——革命運動的展覽模式。紅衛兵功勳展展示了自己的「戰果」，用紅衛兵講解員代替了地主敘述者，用物品代替了物品的主人，延續了革命傳統的策展方式。

在上海策展文革

上海「紅衛兵功勳展」中最具象徵意義的展品，不是鏗亮的武器、璀璨的珠寶，也不是郭琳爽浴室的照片，儘管照片上貼著標籤，表明這

57 William Hinton,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Vintage Books, 1966), 147–151.

58 中國革命博物館編，《解放區展覽會資料》，頁254、363–366。關於上海郊區的一場土改展覽案例，參見上海市檔案館B14-1-172-66。

些光潔的設備都是美國進口。相反，最具標誌性的是一個普通的金屬茶壺，打開壺蓋，方能看到一個假底。它是在石油煤炭公司的姚石峰家中發現的，講解員講述了紅衛兵闖入姚家時那戲劇般的過程。他們從二樓窗戶爬進屋中，並威脅企圖阻攔他們的姚家女兒。他們在垃圾中發現了茶壺，因重量不同尋常而生疑。紅衛兵測量了茶壺，發現內部很淺，於是撬開茶壺，這才發現了用厚棉絮包裹的金條。帶著同樣的敏銳，他們還觀察到，時值夏天，妻子和四個孩子卻穿著兩層衣服，彎腰站立，原來他們身上還藏著四十多枚金戒指，孩子們的鞋跟裏都有藏贓。「但是，」講解員斷言，「最後還是逃不脫我們紅衛兵銳利的眼睛」。⁵⁹

茶壺作為實物教學，同時表現出三條教訓。其一，黃金是剝削的證據，是地主姚石峰逃避政治改革的象徵。這一指控意味著，他和其他被展覽點名的人都拒絕接受他們在新中國的身分，而黃金則證明了他們過去的罪行與現在的陰謀。黃金具有一種神聖的力量，即使在今天，舉報人也依然感受到這種力量。一位參加過抄家的退休工人（1947年生）還記得，她以前工廠的經理曾給她一個很重的袋子，裏面的金條正是犯罪的證據。⁶⁰一位老紅衛兵（1952年生）則講述了上海附近真如鄉一座寺廟裏舉辦的「四舊」展覽：「那些老百姓、普通人，從來沒見過金條啊……金條是哪來的？你就會想，哦，肯定是靠剝削來的。」⁶¹文革初期，作家葉兆言剛剛九歲，他寫道，在紅衛兵展的各種展品中，孩子們的眼裏只看到黃金。當時人們深切相信，「壞人家裏肯定有金子」、「哪裏藏著金子，哪裏就有壞人」，當葉兆言看到自己的父母遭到搜查時，他確信家裏的書櫃會滾出金子來。⁶²

假底茶壺揭示出的第二個事實是，黃金是被藏起來的。五十年後，葉兆言描述了他參觀過的一場紅衛兵展覽，其中就有一整個房間被

59 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40，頁18；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35，頁33。

60 來自2013年7月21日在上海的採訪。

61 來自2013年7月15日在上海的採訪。

62 葉兆言，〈黃金不是黃金〉，《新民晚報》，2013年7月7日。

安排作演示藏匿黃金的各種方式——藏在廁所裏、縫在鞋子裏、藏在爐子下、砌進牆磚中。藏匿黃金代表著一脈相連的兩條線索：黃金的主人一方面暗藏著資本主義的物欲和反革命的企圖，另一方面把黃金保存起來以圖東山再起。於是，茶壺引出的第三點就是，紅衛兵發現茶壺有功，讓茶壺和金條一起成為紅衛兵鬥爭的「戰果」之一。但正如葉兆言所寫，在那個「黃金不是黃金」的年代，展出的財寶代表了革命的勝利，卻掩蓋了主人的悲劇。在上海的一次抄家行動中，一個資本家的兒子試圖與父母劃清界限，向紅衛兵揭露家裏的黃金藏在哪裏，他的母親無法忍受紅衛兵的指控和兒子的背叛，最終跳樓自殺。⁶³ 另一個男孩（1957年生）還記得，他看到過一個上吊自殺的女人，遺體上戴著她所有的黃金和珠寶。⁶⁴ 一個孩子的痴迷之物，又令另一個孩子良知有愧，它是許多家庭恐懼的焦點，也成為一些人的毀滅之源。

藏金茶壺是紅衛兵功勳展上的眾多展品之一，展出的展櫃分為兩部分，前半部分展出實物，後半部分則集中介紹郭琳爽、姚石峰等人的案例。參觀開始時，參觀者站在前廳，注視著毛主席的白色半身像。他們舉起手中的「紅寶書」，在講解員的帶領下誦讀毛主席語錄選段。⁶⁵ 展覽的第一部分從一張表格開始，其中列出了陳列的展品，按照《人民日報》列舉的三類物品分類：武器、變天賬和財寶（即金銀珠寶）。在表格左側一欄，武器和變天賬分別包括14支槍、11台發報機、329面反革命旗幟或徽章，以及1,020份地契。在表格右側一欄，紅衛兵記錄了28,330兩（即141.65萬克）黃金、2,102枚鑽戒、2,180塊手錶和87,525米精美布料。⁶⁶

63 來自2013年7月9日在上海的採訪。

64 來自2013年7月24日在上海的採訪。

65 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40，頁3。

66 同上註，頁4；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35，頁16。為便對比，北京的「首都紅衛兵展覽會」列出了268支槍、19,676件其他武器、14,398個反革命徽章和文件、41,294份地契和103,131兩黃金。其他類別還包括6,820本反革

看完表格後，參觀者走到長桌前，桌上蓋著布，密密麻麻地擺放著各類展品的樣品。在桌子後面的牆上，從上到下貼滿了文革標語、毛語錄、大標籤（即「復關工具」）和解說文字。其他的沒收物品被固定在背景牆上，例如裝在盒子或珍奇櫃中的蝴蝶標本。在武器一類中，軍刀沿著牆壁排列，子彈則仔細地成行展示：「這些是階級敵人殺害共產黨員和革命人民的槍和屠刀。」垂墜的國民黨旗和美國國旗是「反動證據」，但更令人震驚的是，參觀者還看到了被褻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枕頭上隱藏的蔣介石像。背景牆上堆放地契，營造了彷彿是從畫中溢出的錯覺。最後，在深色布料的映襯下，一件件精緻的首飾璀璨耀目，價值不菲：一件價值2,800元的鉑金首飾、一枚4,800元的鑽石戒指、一條一萬多元的鑽石手鏈，還有一塊價值15萬的玉石。在展示武器、地契和珍寶的同時，展覽還以個人案例與其財產的故事作為補充，但需要注意的是，對於一些罪大惡極的罪行，當事人的名字均被略去，取而代之以「階級敵人」。⁶⁷ 三類展品均設置了補充展覽以突出其罪惡；在封建主義部分，展覽則抨擊宗派宗教與反革命同流合污，除了珍寶之外，還展出了其他奢侈用品，如異域藥材、裘皮大衣等。⁶⁸

在展覽中加入裘皮大衣，為並列對比的策展方法提供了契機。與蕃瓜弄的今昔對比類似，紅衛兵展覽與階展一樣，將資本家與工人、地

命日記和詩詞，以及613,618件文物和玉器。見《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展覽會》；這些數目與王年一的估計吻合，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55。當然，北京統計的是整個城市，上海的只是一個單位。為了更有可比性，李遜指出上海沒收的黃金共計48萬兩，是北京沒收黃金的十倍多，見李遜，《文革造反年代》，頁113。作為相比，廣州的統計如下：31枝手槍、15枝步槍、500多把軍刀、5個發報機、850張反革命證件和76面反革命旗幟、3.5萬份變天賬和930多斤黃金，見《廣州地區紅衛兵革命造反戰果展覽會》，頁4。

67 關於受褻瀆的國旗和隱藏蔣介石像的枕頭，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35在頁7提到了當事人的名字。然而，在B123-6-1540的頁6，犯案人被稱為「階級敵人」或者「官僚地主階級分子」。

68 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40，頁4-16。



圖 5.3. 紅衛兵功勳展上嚴紀常的裘皮大衣

主與農民並列展示。據介紹，這件裘皮大衣屬於銀行經理嚴紀常的小老婆，價值六千元，這筆錢可供 120 名職工生活一年。不管這種說法是否屬實，這件裘皮大衣為紅衛兵功勳展中其他奢侈品的展示確立了一種模式：在描述展品時，先列出它們本身的價值，再折成大米，算出這筆錢能讓多少工人填飽肚子。為了強調這些對比，策展人還在展覽中加入了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不僅展示了人力車夫打滿補丁的褲子，還附上了一個煤球廠工人陸孝根的照片——資本家為了吝嗇成本，疏於機器維護，結果陸的手臂被捲進了一台快速運轉的機器中。⁶⁹

展覽第一部分以陸孝根殘缺身軀的深刻影像收尾，第二部分則按照專題和對象對階級敵人進行逐一介紹。除郭琳爽和姚石峰以外，還有六個打擊對象。第一個是汪誠德，他的代表展品是成堆的食物：一筐筐大米、年糕、麵條和豆子，從魚肉罐頭到嬰兒奶粉，從各種酒水到各類食

69 同上註，頁 14b–17。目前尚不清楚紅衛兵如何計算出這些財產的價值。有一張印刷品顯示了文革期間沒收財產的清算價格，以此為參考，一件上等狐狸毛皮衣的價格為 163 元（各等皮衣的平均價格為 94 元），一件貂毛皮衣的平均價格為 48 元。見四川省安仁鎮建川博物館聚落，〈處理查抄物質價格參考表〉。

用油；還有裝滿蔬菜的罐子，連糖都有四種。展覽傳達出一條訊息，汪誠德的食物貯藏間不僅表現了食物的富足和浪費（對此講解員描述了食物腐爛的詳情），更突顯出他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囤積居奇、操縱市場的行為。在郭琳爽和姚石峰的案例之後，是姚石峰在石油煤炭公司的同事羅懷鏈，他也被指控囤積居奇，還保留了各種變天賬的照片。在羅懷鏈的部分，出現了關於「藥材」的說法，他的一根人參相當於一個工人二十年的工資。以「工人的身體」和「工人的血汗」為藥材，羅懷鏈被扣上了吃人肉、喝人血的罪名。接下來的兩個打擊對象是封建主義和復辟野心的代表。謝鼎藩的展品是他祖父身著官袍的畫像和一副康有為親筆書寫的對聯，瞿烈堃的展品則是在他女兒家中發現的藥劑，他們從國家財產中私藏藥劑以待資本主義復辟。最後，展覽展出了反革命分子和間諜的代表——溫鴻昌和陳青華，他們的收音機、照相機和望遠鏡都在展品之列。⁷⁰

如果說這些對象各自只代表階級敵人與革命威脅的某些方面，那麼郭琳爽則是最核心、最全面的對象。曾將他從北京紅衛兵的毆打中解救出來的東方紅百貨紅衛兵，此時則不遺餘力地為展覽搜集各種證據，從永安公司的紀錄，到郭家花園裏的珍稀花卉，不一而足。關於郭琳爽的展覽單元從1949年前的歷史開始講起，展出了印有蔣介石題詞的家譜、由其父郭泉簽名的憲法副本，甚至還有一張粵劇條幅，其中透露出他與財政部長孔祥熙過從甚密，以上種種證據都坐實了郭琳爽與國民黨領導人的關係。從永安公司的執照中還可看出，永安公司的確先與英方註冊，後註冊為一家美國公司，接著又在汪精衛傀儡政府治下註冊為中國公司。⁷¹ 在反革命以及與帝國主義勾結的罪名基礎上，策展人為了給

70 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35，頁20-46。此處的資料來源是1966年11月19日講解員的講解文本，其中輔以照片說明。請注意，這兩段說明並不完全相同，但其差異並不改變整體的敘述軌跡。

71 Parks M. Coble, Jr., *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n's New Order: The Occupied Lower Yangzi, 1937-194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147-149.

郭琳爽加上一條剝削罪，又展出了一名職工的破舊衣物和解僱單；有了這些解僱單，講解員所列舉的永安公司紀律規定，以及據傳出自郭琳爽之口的工人可有可無，也都得到了印證。⁷² 除此之外，展覽還展示了郭琳爽家中的物品。成堆的食物上標明了它們的原產國；衣服雜亂地堆在一個角落，上面手寫標註：「這是老吸血鬼的部分穿著的東西，一共有八十多箱。」紅衛兵可能看過郭琳爽的房間，為了讓參觀者也得一窺，展覽最後以照片展示了他家的洋派風格：配備抽水馬桶的浴室、獨立的西式廚房和花園，花園的花卉從前到後一一標註，各產自德國、日本、美國和英國。為了突出郭家的巨富，也為表明沒收財產名正言順，展覽還展出了他家的鑰匙，重達12斤半。⁷³

展示抄家成果意味著什麼？首先，它將實物變成了實證，將**物品**與**人**及其受指控的**階級罪行**劃上等號。奢侈品既是資本主義欲望的象徵，也是衡量剝削的實際標準；面對一件珠寶，首先確定其價值，然後轉換成一定數量的糧食或勞動時間。在新中國的政治宣傳下，任何被認定為涉及反革命的物品，則必然是有反革命意圖的證據；例如人們不可能為了家族記憶而保留一份舊文件，也不可能僅僅因為物資匱乏而保留一塊印著蔣介石像的布料。在紅色恐怖的時代，展覽的講述才是物件之意涵唯一正確的闡釋。雖然背景牆上的漫畫描繪的可能是個人，但展覽依賴實物，而實物又是物品所有者、所在階級及其罪行的代名詞。

階級教育展覽已經將物品與階級地位緊密關聯，使紅衛兵知道抄家時要尋找什麼。不止孩童時期的葉兆言曾想像自己的父母一定藏有黃金，其他受訪者也表示，他們在抄家時會有目標地預設一些特定的物

72 Yeh, *Shanghai Splendor*, 170, 180. 葉文心指出，職工對紀律條例感到不滿，但戰時勞動力過剩，永安的管理層可以隨意解僱員工。

73 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35，頁24-32；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40，頁20-21、32-35、38-40。12斤半約等於13.78磅。請注意，前一份文件按照時間順序敘述，本文亦然；但在後一份文件中，照片（有些頁面未標明頁碼）並未按順序排列，不清楚此舉是否有意為之。

品。一位男性受訪者（1956年生）當時十歲，在浙江農村，他坦承：「當時我們主要是在搜變天賬。在那個年紀，我們就覺得地主老想變天。我們也搜武器，還有無線電，因為我們也懷疑他們是間諜。」⁷⁴ 另一位參加過抄家的受訪者（1952年生）仍特別記得一棟房子，紅衛兵撬開紅木椅、劃破皮沙發，還「以為地板底下可能藏了槍或劍，所以把地板也給拆了」。⁷⁵

另一方面，在文革期間，不少人因為害怕被人舉報自己保留了這類階級標誌，因而先發制人自行銷毀。許多受訪者仍清楚記得他們匆忙燒毀、處理的東西：書籍、照片、刀劍、古董、西服，甚至自己的日記。⁷⁶ 一位出身資本主義家庭的退休幹部（1950年生）回憶說：「我們都很怕，因為即使家裏不富裕，誰都多少有些這樣的舊東西……當時，那些東西我們根本連看都不敢看。有人說應該燒掉，我們就燒掉。要是被人發現有那些東西，打成走資派，該怎麼辦？」⁷⁷ 在階級出身等同於階級地位的年代，過去的財產可被引為口實，其危險性足以讓人們付之一炬。

在紅衛兵展覽中，實物是階級罪行的證據，也是毛澤東思想正確性的印證。在講解員的敘述語言中，自始至終都充斥著將物品等同於證據的詞彙。例如，展示的物品被稱為「罪證」或「鐵證」。對於金銀首飾、絲綢、尼龍絲襪等奢侈品，展覽則稱之為「活生生的事實」。反過來，「罪證會說話」，變天賬會「作證」。總而言之，展覽的物品一概被視為「真實紀錄」。⁷⁸ 即使在描述抄家的語言中，也暗含著非法佔有、沒收罪犯財產的思想。正如葉兆言等著父母的金子被發現，罪責已然被假定，物品無非只為確認。有了與物品配套的文字，連講解員的文稿也成為對毛澤東思想的簡要驗證。關於郭琳爽的解說詞以一段毛澤東語錄開頭：

74 來自2013年7月1日在上海的採訪。

75 來自2013年7月15日在上海的採訪。

76 來自2013年7月2日、7月7日、7月8日、7月15日、7月18日在上海的採訪。

77 來自2013年7月2日在上海的採訪。

78 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35，頁7；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36，頁20。

同志們，毛主席說：「敵人是不会自行消滅的。無論是中國的反動派，或是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都不會自行退出歷史舞台。」同志們，我們這裏展示的是反動資本家陰謀復辟的部分罪證。⁷⁹

與其他部分一樣，對於郭琳爽的展覽也以毛澤東的另一段教導作為結尾。由此可見，紅衛兵功勳展是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工具，無論是策劃過程，還是參觀體驗，都是名副其實的課堂。⁸⁰

以實物證明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性，當然效仿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階級教育展覽，二者都起到了揭露和批判的作用。紅衛兵展覽的新穎之處在於，所展示的物品不僅是文化大革命的論據，也證明了紅衛兵是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詮釋者。因此，展覽展示了發現證據的過程，例如搜出姚石峰的假底茶壺的經歷。講解員還特別使用了「我們紅衛兵」的稱呼，強調了物品如何被隱藏，又如何被揭露的過程。對於紅衛兵功勳展，雖然東方紅百貨的其他職工除了表示贊同不能發出其他聲音，但從他們的反饋可以看出，展覽取得了預期的反應。一位名叫陳寬的職工表示：「看了展覽會感到文化革命來得適時」，幾位職工則表示他們必須繼續與郭琳爽做鬥爭，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職工也表達了見到實物的影響，彷彿他也參與了抄家一樣：「如果沒有親自看過，就更加不知道。」⁸¹ 另一位參觀者朱龍妹表示，「我們青年人過去對階級敵人的罪惡缺乏切身感受，有時只在書本上看到也是體會不深。」⁸² 一位王姓講解員稱，看到郭琳爽的財產等同於「看到郭琳爽」本人，展覽的證據眼見為實。⁸³

但是，策劃文革展覽並不是簡單地表達勝利。雖然展出的物品被用於證明紅衛兵運動的正當性，但展覽策劃的宗旨在於推動政治行動。

79 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35，頁24。

80 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34。

81 同上註，頁47-49。

82 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36，頁20。

83 同上註，頁29。

展覽向所有參觀者揭示出抄家的行動與成果，並為理解這些行動與物品提供了共同的敘事。在一個不斷革命的時代，展覽讓人們倍感仇恨，擦亮雙眼，認識到郭琳爽之流仍安坐於私家車中，「這些都是剝削勞動人民的血汗而來」。⁸⁴ 沈麥克曾寫到「在中國政治中用文字行事」，同樣，展覽也可以被看作是在中國政治中以物品行事。⁸⁵ 在這裏，關於階級、敵人和革命的形式化、公式化語言被應用於物質，抄家的展示也因此成為個人鬥爭的延伸。

作為階級鬥爭的敘述

紅衛兵功勳展的年輕講解員們沒有博物館的工作經驗，他們從上海商務局下屬各單位抽調過來，共約 50 人，根據主題或對象分成若干小組，比如，東方紅百貨公司的職工就被安排講解郭琳爽的故事。在展覽後的工作總結中，講解員們承認，有些人並不願意參加。起初，有人認為原單位的文革鬥爭最大，有人則相信抄家已經打倒了人民的敵人。但到最後，講解員們都表示自己也接受了一次階級教育。多個小組描述了他們與參觀者一起痛哭的情景；幾個小組報告說，他們秉持著毛澤東思想，克服了喉嚨酸痛充血的痛苦。講解員們自稱是紅色宣傳員，他們的工作就是戰鬥前線。用他們自己的話說，講解就是階級鬥爭，展覽就是革命行動。⁸⁶

相比參觀者，對於講解員而言，舉辦展覽更是一種參與式宣傳。在自己的思想轉變過程中，講解員們努力解決一些文革前的問題，以及展覽之外的問題。例如，該如何培養自己的階級感情？如何說話才能吸引聽眾的注意力，讓自己的階級情感觸動他人的心靈？如何透過講述激

84 上海市檔案館 B123-6-1534，頁 47-48、52。

85 Michael Schoenhals, *Doing Things with Words in Chinese Politics*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2).

86 上海市檔案館 B123-6-1536，頁 11。

發對階級敵人的仇恨？儘管講解員們的報告必然經過調整、撰寫以展示最終的成功，但手寫報告反映出他們將感受轉化為文字、將文字轉化為情感的努力，而這一切的基礎都是對毛澤東思想之真理與力量的信仰。⁸⁷ 正如裴宜理所言，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情感工作」，而這一傳統也由1949年後的政治運動繼承，例如文化大革命。⁸⁸ 紅衛兵功勳展與土改批鬥會上的地主財產展覽相呼應，提供了一個以展覽館為情感表演舞台的研究案例。

準備工作從研究上海階展開始，這些展覽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來仍在展出。至少在上海，這兩類展覽在時間上具有雙向的聯繫；階展為紅衛兵的大字報提供了範本，而在確定如何展示紅衛兵打擊對象的罪行時，新手策展人和解說員又回到階展中尋找範本。作為第一步，紅衛兵們分散到其他11個展覽學習、提問，按要求對每件關鍵文物進行記錄。他們討論了自己的展覽範圍，包括各部分的主題和人物，然後分成小組收集文物、草擬文稿、佈置展覽，三天之內就完成了初步大綱。⁸⁹ 這種分工與畫家李斌（1949年生）的回憶相吻合，他講到了自己下放做知青時在黑龍江負責展覽的經歷：「他們會給你一個腳本、一個故事，或者什麼事件，就像連環畫一樣……我們要一個場景一個場景地畫出來。分不同的組，有的能畫，有的能寫……我們可喜歡畫了，拿起顏料就開始畫。」⁹⁰

為了編寫自己的講解文稿，紅衛兵講解員從文物和故事入手。他們借鑒階展的做法，採訪了資本主義罪行的受害者。例如，負責陳青華展覽的第八小組採訪了陳青華的受害者林康蓮。在展覽中，陳青華被斥為反革命分子，更有一系列間諜裝備作為佐證，他還被指控毆打、折磨

87 參見 Nicole Eustace et al., "AHR Conversation: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Emotion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7, no. 5 (December 2012): 1487–1531.

88 Elizabeth J. Perry, "Moving the Masses: Emotion Work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bilization* 7, no. 2 (June 2002): 111–128.

89 上海市檔案館 B123-6-1534，頁2–6。

90 2013年7月10日在上海的採訪。

家中的女傭。⁹¹聽了林康蓮的辛酸訴說，第八小組的全體成員不禁潸然淚下。解說員們表示，看到她滿身的傷痕，「使我們更激起了對階級兄妹的愛和同情，對階級敵人無比憤怒。這次訪問對我們教育是很深刻的，真正使自己對陳青華的恨，在講解時，內心會激動得要流淚」。第八小組總結說，只有把對階級的熱愛與對敵人的仇恨相結合，才能「愛階級兄妹，仇恨敵人，才能激發觀眾的感情與我們融合在一起，所以當觀眾聽了陳青華的罪行，就說『要槍斃他』」。他們寫道，透過這種方式，「既教育了自己，又教育了觀眾」。⁹²如果說第八小組的經歷代表了一種模範的發展軌跡，那麼解說員的作用就是深入群眾，傳播他們的故事，將情感轉化為共同的階級感情。

雖然採訪提供了背景，但展覽的核心重點是抄家本身。透過陳列抄家戰利品、描述發現的過程，講解員們再現了當時的抄家過程。聽著講解員的講述，參觀者們彷彿跟著紅衛兵跳進姚石峰家的窗戶，一起打開了茶壺。當瞿烈堃被指控將金子丟進廢紙簍，「搞破壞」時，觀眾們紛紛上前斥責。⁹³反革命罪行展區的講解員還講述了紅衛兵如何發現藏有蔣介石像的枕頭，「英勇的紅衛兵把枕頭套一層一層撕下來，在第四層上露出這個畫像，說明階級敵人日日夜夜，夢想蔣該死，想復辟」。⁹⁴透過實物和文字，展覽不僅重現了抄家的過程，更使之成為一種儀式。

在展覽中，講解員們可以藉助沒收的財物，繼續與個人進行鬥爭。從一開始，各小組就根據打擊對象進行了分工，展覽與批鬥會緊密相連，第六小組的一個成員甚至「因為熟悉一個對象，不敢打硬仗」。⁹⁵如上所述，敘述的每一部分都是對毛澤東思想的論證。當講解員呼籲進一步展開階級鬥爭時，論證達到了高潮。例如，東方紅百貨公司的講述者

91 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35，頁45。

92 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36，頁25。

93 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35，頁40。

94 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40，頁4。

95 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36，頁18。

在冗長的譴責之後終於高呼：「我們一定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把反動資本家郭琳爽鬥臭、鬥垮、鬥倒，使他永世不得翻身。」⁹⁶ 講解員稱，他們的工作就是階級鬥爭；一位講解員表示，解說是他的戰場，「是〔我〕揭露敵人的〔戰場〕……我一定要揭露他們的反動本質，得到批判……只有這樣才能使他們看透了敵人的醜惡面目，對敵人恨」。⁹⁷ 與中共一大會址的工作人員一樣，紅衛兵講解員們也談到了毛澤東思想的紅線。但一大會址的展品是國家政權的象徵，紅衛兵展的展品是革命運動的結果。在一大會址，「紅線」是對歷史的解讀，而在紅衛兵展，「紅線」是對戰鬥的號召。

在展覽成為階級鬥爭場所的同時，敘述者依然在著力解決如何喚起階級感情的問題。這一過程包括兩個步驟。首先，他們必須培養自己的感情。正如一位小組成員所說：「我們要使觀眾感動，就必須自己首先動起來，自己不動，何以使觀眾動？」⁹⁸ 為感動自己，他們可以回憶採訪過的受害者，或從展品思考開去：女傭的傷疤、破爛的衣服等等。講解員們認為，個人自身的階級仇恨是做好講解工作的關鍵，反過來又會激發出其他人的階級仇恨。另一位小組成員問道：「自己恨起來了，怎樣叫觀眾與我們一起產生共鳴也恨起來呢？我們看除了實物和罪證以外，主要是我們的講解過程中帶著階級感情的問題。」⁹⁹ 以物動情，文字不可或缺。

因此，第二步是打磨完善根據講稿的表演。那位將講解工作視為戰場的講解員寫道：「我要把我的階級感情，用語言的輕重，面部表情來表達出來。」¹⁰⁰ 還有人說起講解就如同表演一般：

96 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35，頁32。

97 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34，頁44。

98 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36，頁12。

99 同上註，頁15。根據其他報告的解釋，「感動」是說話者的感情（「感」）與聽者受到觸動（「動」）的共同結果。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34，頁8。

100 同上註，頁44。

熟讀講解詞，要一通精於一通，最後變成自己心裏要說的話……我們在講解過程當中，講解員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在觀眾裏都會引起反映，既然我們上場的時候一定要嚴肅。¹⁰¹

講解員們非常關注參觀者的反應，他們努力確保小組各成員的敘述都保持統一，如果觀眾的反應不夠理想，他們則歸咎於敘述不夠一致。他們爭論著何時應提高或降低聲音，以便「充分發揮了群眾的智慧和創造力」。¹⁰²在展後報告中，講解員喉嚨嘶啞流血的紀錄隨處可見；痛苦是忠誠的徽章，須用毛澤東思想來克服。講述的表演也是階級的表演。例如，第六小組報告道，在小組成員意識到講述是「是一個階級感情有沒有的問題」後，他們便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克服了困難」。¹⁰³一份報告反問：「在血淋淋的事實面前，我們怎能不恨呢？對萬惡的資本家恨不起來，就意味著忘本。」¹⁰⁴展出的材料反過來又體現了這些事實。一位講解員寫道：「當我一接觸這些展品，心裏就憤恨起來。」¹⁰⁵

講述成功與否的最終評判是觀眾的反應。可以肯定，紅衛兵功勳展對參觀者階級感情的報告經過了兩重過濾。首先，大多數參觀者都和講解員一樣，對自己的情緒高度敏感。他們可能以前在學校、工廠或展覽館參觀過類似的展覽，知道哪些情緒符合時宜。第二道過濾在於，為了表明展覽的敘述確實引發了共鳴，報告所摘取、記錄的內容都有選擇性。因此，東方紅百貨的小組報告寫道，其他紅衛兵參觀者「氣得咬牙切齒地說：『揍死他們！』」解放軍同志看了以後，握緊了拳頭，問我們：『你們把他們掃地出門了嗎？』」老年職工看了回憶對比後，流下了熱淚，

101 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36，頁15。

102 同上註，頁11、18、25。

103 同上註，頁17。

104 同上註，頁14-16、18、24。

105 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34，頁43-44。在同一篇文章中，講解員還描述了他如何將展品與自己的想法感受融合在一起。

有的說：『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這階級的血淚仇！』。¹⁰⁶ 報告中的其他反饋也表明，紅衛兵展呈現了一堂階級教育課，證實了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性，表明了文化大革命適逢其時，紅衛兵勝券在握。從反饋來看，展覽以實物為主的特點非常重要；親眼看到走資派的財產比簡單在書本上讀到更有意義，而看得見摸得著的刀槍更是一種「活生生的教育」。¹⁰⁷ 講解員和參觀者都表示，紅衛兵功勳展給了他們一雙新的眼睛：中國百貨公司的一位參觀者徐琦表示，當他看到藏有蔣介石畫像的枕頭和所有的黃金時，他「使我回想起我們原來搜得還不夠仔細，應以極大的仇恨性來搜查」。¹⁰⁸ 一位講解員在看完展覽的其餘部分後說：「還有更兇惡階級敵人」。¹⁰⁹

雖然展覽報告的主要內容是對實物教育的總結，但報告也在邊角處承認人們對展覽的反響存在差異。小組總結顯示，有些講解員對待工作並不認真，他們的外表不夠樸素，或在應該鄭重嚴肅的場合聊天、開玩笑。¹¹⁰ 據報告紀錄，一些講解員還因為參觀者注意力不集中而感到灰心喪氣；既有看展三小時後請求再次參觀的模範參觀者，但也有在講解途中就不再聽講甚至離開的反面教材。¹¹¹ 此外，報告也暗示了引導參觀者帶著階級感情觀看展品的困難之處。在預展期間，有幾位觀眾呼籲更多的貧富對比，一位觀眾強調，講解員不應該「把生活用品佈置得像商品展覽會一樣，把封建迷信品擺得像廟宇裏的菩薩一樣」。¹¹² 儘管沒有說明原因，但講解員們坦言，最難講述的部分是「金銀財寶」主題的展區。一次，有一個形跡可疑的年輕人圍著金銀珠寶的桌子繞圈，引發

106 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36，頁12。

107 同上註，頁28-29。

108 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34，頁52。

109 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36，頁24。

110 上海市檔案館B123-6-1636，頁19。

111 同上註，頁11、16、19；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34，頁11。

112 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34，頁9。

了警報。¹¹³ 山東紅衛兵在評論上海階級教育展覽時記錄到，一名中學生按捺不住地感嘆：「這些東西給我一個，就夠我用一輩子的了！」¹¹⁴ 從報告的字裏行間中可以看出，一些參觀者關注的不是階級教育，而是令人眼花繚亂的珍寶，甚至可能想順手牽羊。正如一個小組在強調敘述的重要性時所說，「深厚的階級感情不是天生的」。¹¹⁵

如今，人們對參觀紅衛兵展覽的記憶各不相同。一些人的記憶已逐漸模糊，他們還能說出一些典型的物品——金條、槍枝，也許還有一本《聖經》，而另一些人只記得有過這類展覽。一位曾就讀於復興中學的男子（1950年生）回憶道，在校長等人的家被抄之後舉辦了紅衛兵展，針對兩個校長的敵對派別分別收集罪證並進行展出，甚至還到其中一個校長的舊宅去尋找材料。¹¹⁶ 在被問及紅衛兵展覽時，一位高中體育教師（1942年生）苦笑道：「他們也這樣對待我的東西！在校門把我的鞋掛起來，說是走資派的皮鞋。他們還掛個牌子，說這是某某老師的鞋。你能怎麼辦？」¹¹⁷ 有些人仍然記得某個物品所激發的憤怒或恐懼。傳記作家高原講述了他看到黨支部書記的糧票被沒收時的感受：「難道他有那麼多水果和肉吃，連糧食都吃不完嗎？……我越想到小食堂，心裏就越憤怒。」¹¹⁸ 一位受訪者（1954年生）回憶說，他看到展出的人頭骨時，仍然記得他孩子般的恐懼，多年後才明白，復旦醫學院的醫生有一顆人頭骨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¹¹⁹ 與看到黃金驚異不已的參觀者一樣，其他人仍對那些非同尋常的展品記憶猶新。原復興中學的學生表示：「那些清朝的長袍給我印象最深，因為之前從來沒親眼見過，只在

113 同上註，頁38。

114 上海市檔案館C4-2-30，頁38b。

115 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36，頁12。

116 2013年7月3日在上海的採訪。

117 2013年7月20日在上海的採訪。

118 Gao, *Born Red*, 73.

119 2013年7月20日在上海的採訪。

電影裏看到過，真的太神奇了。」¹²⁰ 除此之外，最近還出現了更多的回憶紀錄：著迷於被沒收的佛教圖片的重慶孩子、擔心出現策展錯誤的北京政工幹部，還有前文中那位請求留存一張展覽照片的魯迅研究學者。

但在當時，紅衛兵功勳展並不允許其他敘述的存在。它為抄家提供了一個範本，展示了紅衛兵應該找到的罪大惡極的例證。它示範了如何將這些材料用於階級鬥爭，如何描述「戰果」。正如講解員們的理解，策劃和講述展覽的經歷本身就是一種階級教育，與土改「活展覽」培養積極分子的方式如出一轍。儘管董國強和魏昂德在最近對文革派別的研究中，對於用階級類別來分析人們如何或為何如此行事的可行性提出了質疑，但面對持續存在的階級語言，我們有必要關注其表述方式。¹²¹

因為階級語言可能帶來真實而悲慘的後果。儘管紅衛兵功勳展以實體物品為中心，但它似乎是一場語言而非實體的鬥爭。但是，如果在尋找階級敵人的過程中沒有發現任何黃金，或者只找到一本日記——而沒有展覽所暗示的第二本私人日記，那麼情況又會如何？物品——或者說物品之缺失，與文字相結合，才會產生恐怖的力量。紅衛兵展覽煽動階級仇恨，引導參觀者從階級的角度尋找、解讀材料，並展示出最「兇惡階級敵人」案例，這一過程可能也加劇了暴力。¹²² 廣州紅衛兵展覽的結

120 2013年7月3日在上海的採訪。

121 Guoqiang Dong and Andrew G. Walder, “Local Politic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anjing Under Military Contro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0, no. 2 (May 2011): 425–447;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122 在胡杰的紀錄片《我雖死去》中，一位受訪者（當時為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的學生）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幾個紅衛兵牽涉了一樁命案，但人們發現被害的老婦人身上有一張地契，紅衛兵因此免罪；據說江青和公安部部長謝富治一致認為，有了這些證據，紅衛兵就無罪了。我未能找到相關的文字記錄，但李遜指出，在謝富治的講話中，他默許了毆打「壞人」的行為，並強調紅衛兵打死人不應受到懲罰，因為他們的行為是出於特殊情況。儘管如此，這些傳言的存在突顯了物證支持暴力的作用。見胡杰導演，《我雖死去》（dGenerateFilms, 2007），DVD；李遜，《文革造反年代》，頁107。

語題為「未結束的結束語」，在此主辦方宣佈：「紅衛兵戰士們，革命同志們！我們這個展覽會到此結束了。但是，階級鬥爭沒有結束。」¹²³

小結：實物教育

與紅衛兵運動一樣，紅衛兵展覽也不持久。紅衛兵運動於1968年7月結束，此後數百萬青年作為「下鄉知青」被下放到農村。¹²⁴ 1969年初，規模最大、最為正式的北京紅衛兵展覽也隨之解散。¹²⁵ 在上海，儘管一些出版物仍保留了展覽的形式，展示了繳獲槍枝彈藥的照片、國民黨徽章和反革命文件，但紅衛兵展覽只稍縱即逝。¹²⁶ 隨著1967年上海爆發一月革命，上海革命委員會恢復秩序，一場附帶宣傳冊的正式展覽也相應推出，以紀念這場「震撼世界的一月革命風暴」。在這次展覽中，沒有出現紅衛兵功勳展中的任何物品；只有在幾張照片和一本小紅衛兵的匿名日記中，尚可窺見紅衛兵的身影。¹²⁷

抄家沒收的物件下落如何？在最高領導層，似乎從一開始就有人追蹤著某些物品。2015年，中央文革小組中的最後一位在世成員戚本禹，在他的回憶文章中描述了1966年8月周恩來總理分發的一本小冊子。手冊題為《紅衛兵「破四舊」的戰果》，其中包括沒收財產的照片。當時，周恩來只說查抄物品「由專人看管」，但戚本禹後來發現，所有東西都交給了一個直接向周恩來彙報的「首都工作組」。¹²⁸ 我們不清楚

123 《廣州地區紅衛兵革命造反戰果展覽會》，頁11。

124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251–252.

125 丁大華，〈世所罕見的紅衛兵抄家戰果展覽會〉，頁31。

126 例如參見《工人造反報》，1967年12月12日，頁2。

127 《偉大的一月革命勝利萬歲展覽會》（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1968年8月）。

128 戚本禹，〈回憶江青同志〉，復興網，2015年7月30日，www.mzfxw.com/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18&id=44595，訪問於2016年6月2日。戚本禹表示，首都工作組是一個由葉劍英元帥領導的秘密組織，其具體活動連陳

首都工作組與首都紅衛兵展覽會之間有何交集，也不清楚此後首都工作組是否對這些物品的去向負責。至於其他紅衛兵展覽，一些展品歸還給了原工作單位，一些展品在給所有者判定階級身分時被扣留了下來，剩下的就被當作二手物品清算處理了。¹²⁹ 那個來自重慶的小紅衛兵還記得，他拿著母親的票證，來到存放展品的倉庫，裏面「亂七八糟地堆著各種日用品，人們憑票可以廉價購買一兩種東西」。在李潔的《上海人家》中，一位受訪者回憶說，她的母親在二手店買了一件羊毛衫和兩條絲巾，雖然不能在外面穿，但能擁有這麼漂亮的東西也是一種享受。¹³⁰ 在上海，被沒收的現金、外匯和黃金被上繳銀行，並在1970年按照國家規定的匯率兌換成貨幣。¹³¹ 文革結束後，政府下令歸還物品，在重慶和其他各地，只要能找到合法所有者，一些較為貴重的物品如古董、書籍和家具也都物歸原主。¹³² 然而，大多數物品都沒有留下任何紀錄，也再未出現。

郭琳爽沒能活到財產被歸還的那天。1974年10月27日，他因突發心臟病去世，上海第十百貨（東方紅百貨的新名稱）只為他舉行了簡單

伯達和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高級成員都不知道。戚本禹在另一篇更長的描述中將手冊的日期追溯至1966年第四季度，參見戚本禹，《戚本禹回憶錄》（中國文革歷史出版有限公司，2016），頁474–476。戚本禹於2016年4月去世。一些參與抄家的人士也在回憶錄中表明，使用公安局名單的人員必須登記並上交他們查抄的物品。見李遜，《文革造反年代》，頁110。

129 Denise Y. Ho, “From Confiscation to Collection: The Objects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History and Material Culture*, ed. Sarah Carter and Ivan Gaskel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355–375. 杜興稱，北京展覽會結束後，公安局收走了槍枝，財政局接管了黃金珠寶，古董文物則被送往博物館，見杜興，〈「破四舊」展覽記〉，頁93。

130 Jie Li, *Shanghai Homes: Palimpsests of Private Lif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120–121.

131 李遜，《文革造反年代》，頁64。

132 楊耀健，〈守衛造反展覽〉，頁42。關於歸還民族資本家財產的檔案文件，見上海市檔案館B112-6-205。

的葬禮，悼詞中刪去了「愛國」一詞。¹³³ 與許多其他文革中的批鬥對象一樣，郭琳爽於1978年11月獲得平反。1980年代，他的後代從海外回國投資，共同創造了中國經濟騰飛的奇跡。他的兒子郭志楷（加拿大籍）拆除了位於淮海路1375號的花園洋房，並在原址上建造了一棟25層的高樓。¹³⁴ 2005年，百貨公司更名永安百貨，換上了新的招牌和霓虹燈。如今，永安百貨的職工們被灌輸了一種新說法，以解釋永安百貨在革命中的地位：南京路解放時，第一個插上五星紅旗的就是永安公司。¹³⁵ 在被問及郭琳爽時，一位在永安負責職工教育的幹部（1957年生）表示：「郭琳爽是個民族資本家，捐過飛機和好多其他東西。永安是第一個公私合營的商家。他是1933到1955年在這邊，1955年走的。後來就不知道了。也許他回香港了吧。」當問到文革期間郭琳爽是否受到影響時，這位幹部回答：「我不清楚，我當時不在這。也沒有什麼記載吧，我們也只能依靠口口相傳。」¹³⁶

1986年，曾恰巧與郭琳爽一同出席上海人大的作家巴金呼籲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館。¹³⁷ 2016年，在文革十年動亂五十週年之際，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活動家們發出疑問：為什麼還沒有一座文革博物館？如本章所示，其實他們並不完全正確：從紅衛兵運動爆發開始，文革展覽實際上就已存在。當然，紅衛兵展覽與巴金的設想完全相反。這些展覽不是回顧與警示的紀念，而是攻擊與煽動的宣展。那個時代的展覽是政治

133 洪宏，〈郭琳爽和上海永安公司〉，頁275–276。

134 同上註，頁276；《文匯報》，1978年12月2日、1985年7月7日、1996年5月8日；《新民晚報》，1985年8月5日。

135 這一描述也收錄於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上海永安公司的產生、發展和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頁235。

136 2013年7月24日在上海的採訪。這位幹部於1986年加入永安公司。

137 《文匯報》1965年11月30日，頁1；Ba Jin, “A Cultrev Museum,” in *Seeds of Fire: Chinese Voices of Conscience*, ed. Geremie Barmé and John Minford (Hill and Wang, 1988), 381–384。

行動的一環：它被用於揭示紅衛兵的「功勳」，展示抄家的家產，以論證毛澤東思想和文革的正確性，展覽本身也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

即使在紅衛兵運動結束後，展覽仍被用於譴責階級敵人。社會學家蘇陽在對文革期間集體屠殺的研究中，記錄了1968年在廣西、廣東兩省舉辦的一系列此類展覽。廣西共舉辦四場展覽，分別在政府、軍隊機關和廣西大學進行，將政治敵人捆在籠子裏示眾。這類受害者數以萬計，他們被貼上叛徒和戰犯的標記，在現場遭受酷刑，連續數日向兩百多萬人展出。廣東也舉辦了類似的展覽，有的是控訴敵對派別犯下的暴行並加以展示。¹³⁸ 上海的紅衛兵功勳展沒有使用活人，但在其他地方「活人展覽」的現象非常普遍，1984年，媒體報道了這類展覽並引發爭論，探討哪些文革做法應被否定。¹³⁹ 大約25年後，一些人在寫到這場爭論時表示，所有形式的公開羞辱——從戴高帽到遊街示眾——都將人視為展覽品，因此應被稱為「活展覽」。¹⁴⁰

將所有這類文革實踐都稱為展覽可能言之過甚，因為宗教、戲劇等其他因素也留下了影響的印記。以郭琳爽本人對粵劇的熱愛，很可能會選擇粵劇的舞台；據說他曾對其他演員說：「人生等於戲劇，世界一切，都是戲劇化而已。」¹⁴¹ 對郭琳爽而言，紅衛兵功勳展改變了他人生之戲的敘事走向。在文革之前，不管受到多少限制，至少他可以講述自己的故事：他發表演講，敘說自己的個人經歷；他在當地報紙上發表詩

138 Yang Su, *Collective Killings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04–205. 其中他引用了一份關於廣州的研究報告，報告將這些展覽稱為「群眾專政展覽」。參見海楓，《廣州地區文革歷程述略》（友聯研究所，1971），頁401–404。

139 盧良、葉輝，〈文革中在杭州大學搞「活人展覽」的個別人至今仍堅持極左的錯誤觀點不改〉，《光明日報》，1984年4月3日，頁1。

140 例如參見杜學峰，〈「文革」的「活人展覽」〉，《鐘山風雨》，第2期（2010），頁49；衛東風，〈另類的展示：文革時期展覽活動案例分析〉，《大眾文藝》，第9期（2009），頁98–100。

141 久一，〈郭琳爽的一則舊聞〉，《新民晚報》，1985年8月5日，頁6。

歌，也為自己喜愛的戲劇寫劇評。¹⁴²但東方紅百貨的紅衛兵們卻講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甚至篡改了劇名。1956年，為慶祝永安公司的社會主義改造，郭琳爽曾親自主演粵劇《金馬鞍》，但展覽的講解員卻聲稱他唱的是《山東騎匪》，譴責他攻擊社會主義改造，諷刺改造是攔路搶劫。¹⁴³

在這種違背史實的花招之下，其重點在於郭琳爽的財產，這才是紅衛兵展覽的重頭戲。此類展覽是文革政治行動的有力組成部分，因為它們將物質財產與階級畫上等號。紅衛兵展覽向觀眾暗示了抄家應該找到什麼。如此一來，展覽既加重了人們對自身財產的恐懼，或許也助長了紅衛兵批鬥會的殘酷，他們堅信階級敵人一定藏有證據，而一旦發現證物，就驗證了紅衛兵的革命膽識。紅衛兵功勳展教育人們在實物中看到階級性，進而在實物中看到罪行。透過有形的物品，展覽教導人們不斷革命。不過，在從郭家中查抄的物件中，至少有兩件珍品沒有進入展覽：一尊金佛像、一件玉如意。¹⁴⁴這兩件文物本可以因其材質而列為珍寶展出，或因其與佛教的關聯而作為迷信物品展出，但它們就這樣消失了。在下一章中，我們將關注文物的命運以及收藏文物的上海博物館的命運。如果文物沒有被當作「四舊」遭到毀壞，也沒有作為典型「戰果」被納入紅衛兵展覽，那麼它們在革命中的地位如何？

142 鍾惺，〈郭琳爽生日吟詩〉，《新民晚報》，1957年3月22日，頁6；郭琳爽，〈我看粵劇《搜書院》的演出〉，《新民晚報》，1956年6月6日，頁5。

143 關於原始報道，參見《新民晚報》，1956年1月14日、1956年1月20日、1956年1月21日。關於講解員的文稿，見B123-6-1535，頁27–28。

144 洪宏，〈郭琳爽和上海永安公司〉，頁274。

第6章

革命中的文物 上海博物館

龍華塔位於上海西南角，高七層，遭到了繩索和人群的雙重包圍。龍華塔始建於宋代，被譽為上海八景之一，長期以來，龍華塔與毗鄰的龍華寺一直都是遊人的熱門景點，也是每年春節全家出遊的好去處。¹然而1966年8月23日，文化大革命在上海爆發。當天上午，紅衛兵以毛澤東號召「破四舊」為名，在龍華寺大肆破壞。寺中佛像被砸毀，僧人被批鬥，經書被付之一炬。²紅衛兵自稱「燒塔指揮部」，用繩索捆住塔基。³但是，隨著毀塔的傳言不脛而走，一群大學生與紅衛兵發生了衝突，龍華塔被人群團團圍住。上海博物館的鍾銀蘭回憶道：「我們跟

1 黃碧，〈龍華古塔的青春〉，《旅行家》，第3期（1956），頁20–21。現今的塔身結構可追溯到宋代，明清時期修復完成。1953年，上海建設局聘用了多代建築工匠，開始了新一輪的修繕工作，其中包括對南京和蘇州類似佛塔的研究。該工程於1955年竣工。

2 金鼎，〈不倒的龍華塔〉，陳鵬舉編，《收藏歷史》（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頁235–237。

3 據金鼎敘述，鄰近衛校的師生聽到傳言，六名學生趕到現場，先是被毆打，然後被「燒塔指揮部」遊街示眾。公眾的同情引發了人群的聚集。據上海博物館的說法，這些學生是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專業的學生。來自2011年7月20日在上海與李俊傑的採訪。參見陳志強，《文博先驅》，頁203。



圖 6.1. 龍華塔明信片，約1930年代。圖片由雷內·安托萬·努斯 (René Antoine Nus) 拍攝，獲東方研究所虛擬城市項目 (Virtual Cities Project, Institut d'Asie Orientale) 惠允使用。

他們宣傳解釋說，這是文物，你們是不能敲的。」⁴ 在「不要燒！」的呼喊聲中，更多上海老百姓手拉手，圍成層層圓環。龍華塔屹立未倒。⁵

1966年夏末，紅衛兵「破四舊」運動席捲上海。當時，鍾銀蘭還是上海博物館繪畫部的年輕成員，這是她參與的眾多搶救任務之一。這場剷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運動是鬧革命的一部分：剷除舊的，為新的讓路。紅衛兵出言猖狂，胡作非為，當面斥責衣著時尚的人，拆毀帶有封建色彩的路牌，摧毀舊社會的殘餘——正如他們對龍

4 來自2009年12月25日在上海與鍾銀蘭的採訪。根據我與李俊傑、鍾銀蘭的訪談，對龍華塔的保護是有組織的，並非完全自發。上海文物保管委員會和上海博物館派出了工作人員，地方官員也動員了居民。

5 這一事件稱為「8·23龍華塔事件」。此後不久，上海文物保管委員會和上海博物館派領導向學生表示感謝。1966年12月19日，周恩來總理接見了學生。見金鼎，〈不倒的龍華塔〉，頁236。

華塔和龍華寺的攻擊。為了防止紅衛兵的破壞，上海博物館整理了展廳中的物品，封鎖大門。在門後，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時刻準備，因為在「破四舊」運動中，上海的藝術收藏者受到雙重威脅，他們很可能因為資本主義的背景出身而被抄家，而且他們的家中還堆滿了文物。上海博物館擔心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於是開通了24小時熱線電話，由青年學生陳佩芬組織工作人員，她主修青銅專業，階級背景無可挑剔。和她一起輪流值班的還有鍾銀蘭，她仍記得「破四舊」運動期間在博物館臨時搭床睡覺：「比方我們聽到了，某某家裏今天要抄家了，造反派紅衛兵今天晚上12點鐘到他家裏去破四舊，你們有人快快來。12點鐘、1點鐘、2點鐘，無論什麼時候，只要這個收藏家是書畫的，我就馬上要去配合，都不回家的。」⁶ 尋找一大會址的上海博物館館長沈之瑜也一直守在博物館。從上海文化局借來的一小隊卡車則在館外等候。⁷

上海博物館成立於1952年，是新中國最早的博物館之一，至今仍是中國最著名的藝術收藏館之一。⁸ 本章將首先介紹上海博物館的機構史。上海博物館與姊妹機構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共同收藏、策展了上海的文物，當中既有鍾銀蘭研究的繪畫，也有蕃瓜弄留下的棚屋。收藏即策展，上海博物館從一開始就計劃建立一個涵蓋中國古代文物的收藏體系，書寫一個中國的藝術史敘事。1952年，上海博物館出版了第一本圖錄，並在序言中宣佈其指導原則如下：讓大眾了解中國是世界上最

6 來自2009年12月25日在上海與鍾銀蘭的採訪。

7 陳志強，《文博先驅》，頁206。

8 有關上海博物館的重要中文書籍，參見鄭重，《博物館與收藏家》（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鄭重曾為《文匯報》撰寫專欄，長期報道博物館事宜，並為收藏家撰寫傳記，同時能夠查閱上海博物館的檔案。近年盧笛音進行了一篇關於上海博物館的開創性研究，當中採用了大量上海話的口述歷史和嚴謹的統計分析，論證了上海博物館是建立在對私人文物有計劃的侵佔之上，而這種侵佔行為正是文革促成的，見Di Yin Lu, “Seizing Civilization: Antiquities in Shanghai’s Custody, 1949–1996,”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2012), 7, 171–172。

古老的文明之一，中華文明是勞動的偉大成果；讓工人和學生批判地吸收中國古代文化的精髓，發展新文化；並且培養愛國主義精神，培植為中國而奮鬥的志願。這些寄語來自毛澤東的著作，博物館圖錄在卷首的顯著位置引錄了原文。〈新民主主義論〉是毛澤東在1942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也是博物館的一塊試金石，該文主張古代文化兼具民主性和革命性，因此是發展新民族文化的必要條件。⁹ 建設上海博物館的故事展示出舊中國的代表如何培育新中國——是老一代鑒賞家向陳佩芬和鍾銀蘭傳授了古典訓練，是1949年之前的中國將文物留給了新的社會主義博物館。

當鍾銀蘭等人在龍華塔前勸說紅衛兵，稱龍華塔是文物而非「四舊」時，她借鑒了將文物定義為國家遺產的悠久傳統。儘管五四時期的反傳統分子曾批評博物館只是儲存「舊工具、舊物品和舊經典」的倉庫，¹⁰ 但國民黨人、共產黨人，甚至親日派都支持保護中國的物質文化。在蔣介石和汪精衛於1934年發出的一份電報中，兩位國民黨領導人解釋了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的工作，他們表示：「溫故乃能知新，承先所以啟後……如欲闡揚文化，須認識此種固有之文化，如欲復興民族，必須認識此種民族之歷史。」¹¹ 七年後，汪精衛的傀儡政府成立了自己的文物委員會，感謝日本人在「吾國文物保管人士欠缺」之時介入，並承諾保護中國文化，「即將來東洋文化發揚之基礎」。¹² 在抗日戰爭和隨後的國共內戰期間，中國知識分子也為保護文化發聲；圖書館員寫道，自由中國的文化項目將服務於未來的中國博物館學；工程師也表示，他們有責

9 上海博物館編，《上海博物館陳列品說明書》（上海博物館，1952），卷首插畫、頁4。

10 陳端志編，《博物館學通論》，頁27。

11 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編，《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議實錄》（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1935），頁39。

12 諸民誼，《行政院文物保管委員會年刊》（行政院文物保管委員會，1941），前言、頁6-7。

任保護戰區的歷史遺跡。¹³ 在內戰的最後一年，歷史學家向達呼籲保護文物，他指出文化保護是所有文明和現代國家的慣例，並且強調儘管國共意識形態鬥爭正酣，但「對於先民的文化遺存，應該知所愛護」。¹⁴ 1949年共產黨當權後，也利用文物彰顯政權的合法性，同時留意將自己與之前的政權區分開來。1950年代中期，政府對上海的龍華塔進行了修繕，此舉參考了蘇聯的文物工作，被稱為復興民族歷史的光輝一頁。¹⁵

但是，僅僅為國家策展文物仍然不夠。從「破四舊」可以看到，古代文物在新中國的地位遠未得到保證。本章聚焦於文革期間的上海博物館，文革十年可謂是中國傳統文化在20世紀受到的最嚴重威脅之一。¹⁶ 在此期間，上海博物館的新一代工作人員透過收藏和策展，為古代文物賦予了當代革命的意義。在他們的老師被打進牛棚、沈之瑜等領導者遭到排擠的情況下，新一代的博物館人發起了一場文物保衛戰，立志在制度和意識形態上實現文物保護的合法性，將中國過去的物質文化歸還給創造它的人民大眾。以這種方式，上海博物館完成了對古代文化的革命，不僅以革命的名義捍衛了文物，更宣稱保護文物一直是文革的使命。雖然今天的上海博物館將文物還原為一種國家敘事，但它的收藏卻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文革時期以文物促革命的做法。

13 袁同禮，〈抗戰期中我國博物館之動態與前途〉，頁2-4；沈怡，〈工程師與地方古跡〉，《工程：中國工程師學會會刊》，第16卷，第2期（1943），頁23-24。

14 向達，〈為文物請命〉，《中建》，第1卷，第3期（1948），頁8。

15 黃碧，〈龍華古塔的青春〉，頁21。

16 近期的一個例外是Mobo Gao, *The Battle for China's Past: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luto Press, 2008)。

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博物館

1952年，梳著長辮、一臉靦腆、渾身書卷氣的鍾銀蘭第一次走進上海博物館的大門，當時館內只有七千件藏品，珍藏在這座舊時的跑馬總會大樓中。¹⁷ 別具象徵意義的是，1949年5月5日，在陳毅將軍的示意下，他的副手李亞農將近三千件文物用兩輛卡車從戰場運抵上海，為上海博物館貢獻了最早的一批館藏。¹⁸ 1949年9月17日，即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上海四個月後，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了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擔任主任的正是李亞農。¹⁹ 1950年，上海市政府成立了上海市文化局，上海博物館和中共一大會址都是文化局的下屬單位。²⁰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和上海市文化局都分管文化保護工作，但前者是統戰專家組，後者是市級行政單位。

上海的文化政治機構工作有賴於陳毅的支持，他是新政權下上海的第一任市長。1950年，陳毅市長公告了國務院關於保護古代文化的全國性法規，並為保護城隍廟附近的豫園而專門加上了補充說明。²¹ 解放初期，上海博物館獲得的文教經費佔市級財政預算的三分之一，陳毅市

17 張凌，〈看畫一輩子，只求是真偽：記國家級書畫鑒定家鍾銀蘭〉，《新民晚報》，2002年11月27日，頁3。

18 沈之瑜，〈懷念陳毅同志對文博事業的巨大關懷〉，頁362。

19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的名稱幾經變更。最初稱為上海市古代文物保管委員會，後來於1950年1月更名為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1950年代，先更名為上海市人民政府文物保管委員會（1953年8月），接著又更名為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1955年4月）。後來成為上海市人委文藝辦公室的一個單位（1956年6月），其後與上海博物館合併（1960年2月）。見馬承源等編，《上海文物博物館志》，頁370–371。

20 1988年9月，上海博物館與上海文化局分開，再次受上海文物保管委員會領導。同上註，頁370。

21 上海市檔案館S172-4-67，頁1。

長甚至親自批示購買藝術品。²² 與鍾銀蘭同批加入上海博物館的李俊傑回憶道：「我們把好東西帶來，請陳老總看。要不要買？他說要買。錢沒有了怎麼辦？他說那趕緊寫報告，我來批。」如此一來，上海博物館就在上海財政局有了一位擔保人。春節期間，當藏家們急於出售藏品以結清債務時，儘管博物館的財年已經結束，但有陳毅作為政治靠山，博物館仍能補充資金購入藏品。²³

上海博物館的領導層一直十分清楚博取政治關注的重要性。即使在1958年陳毅擔任外交部長之後，他仍會回到博物館參觀。1961年，他與包括周恩來總理在內的幾位中央領導人來館參觀，希望一睹館藏珍品的風采。在青銅器的青年專家馬承源的陪同下，周總理雙手捧著一面西漢銅鏡，鏡上的雕花紋迎著正午的陽光在牆上閃爍。²⁴ 上海博物館契合了裴宜理所說的「贊助文化」(cultural patronage)，從不放過任何一個宣傳文博工作和「為領導人工作」的機會。²⁵

儘管上海博物館被定位為新型的社會主義博物館，但它的建立離不開1949年前博物館學和鑒賞學的專業知識。時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副主任的徐森玉，曾是國民黨時期中央博物院和故宮博物院的領導成員之一。在陳毅市長的邀請下，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匯集了一批上海最重要的文化人士，他們既具備豐富的藝術史知識，也擁有收藏家的人脈網絡。²⁶ 上海博物館聘用的不少工作人員都曾任職於民國時期的上海市博物館，其中包括前館長楊寬(負責為1952年展覽撰寫大綱)以及其他

22 沈之瑜，〈懷念陳毅同志對文博事業的巨大關懷〉，頁362。

23 2011年7月20日在上海與李俊傑的採訪。

24 鄭重，《博物館與收藏家》，頁186-188。

25 Perry, *Anyuan*, 11-13. 在後來的幾年裏，上海博物館甚至舉辦了幹部學習班，講述文物保存與修復的故事、辨別真偽的方法以及文物的珍貴價值。2011年7月20日在上海與李俊傑的採訪。

26 馬承源等編，《上海文物博物館志》，頁474-475；2011年7月20日在上海與李俊傑的採訪。

編寫圖錄的工作人員。上海博物館的初級領導層以沈之瑜等曾經加入中共地下組織的藝術家們為代表，這些年輕領導在舊中國接受藝術訓練，而更年輕的一代工作人員亦是由舊中國專業人士來訓練的。上博1952年屆的學員包括陳佩芬、李俊傑和鍾銀蘭（馬承源於1954年加入），他們參加了由舊時代的專家們傳授的美術史講座。同樣，在國有化的古玩市場，新一代買家也透過師徒傳承學習鑒定技能。²⁷

在上海博物館1952年的這批學員中，有四名成員於1959年被選中接受進一步培訓，成為年輕一代的中堅力量。陳佩芬從17歲開始就在博物館工作——保持清潔、看護文物、回答簡單的問題，她很快就晉升為編目組的一員，並參與藏品收集工作。1959年，她被分配跟考古學家蔣大沂學習研究青銅器。根據她的口述史，在開始每週日的課程之前，老師都要求她先抄寫容庚1925年的青銅器銘文字典。²⁸ 鍾銀蘭的繪畫訓練同樣遵循傳統。她也是離開中學直接進入上海博物館，開始接受講解員的培訓；但她寫得一手好字，為她爭取到了圖錄組的職位。²⁹ 1959年，鍾銀蘭被選中學習繪畫鑒定，每週一上午，她都會跟隨畫家兼收藏家沈劍知學習。鍾銀蘭像舊時代的徒弟一樣，在沈劍知起床之前就來到教室，擦桌備水，用墨條和硯台磨墨。沈劍知告訴鍾銀蘭：「假如不懂得書畫用筆、用墨，就不要學書畫鑒定。中國書畫就是筆墨，每個畫家的性格都從筆墨中表現出來。」³⁰ 此後七年，每晚等弟弟們完成

27 2011年7月20日在上海與李俊傑的採訪；2011年7月18日在上海與朱力的採訪。李俊傑仍然保留了原始的手抄教材，題為《玉器類別與用法》等等。盧笛音的口述史講述了這一批人的受訓過程，她將他們稱之為「紅色古文物學家」。見Lu, "Seizing Civilization," 53–62, 112–121, 131–139。

28 段煉等編，《往事與記憶》，頁14–18。容庚的文稿再版為《金文編》（中華書局，1985），全書超過1,500頁，但陳佩芬僅用三個月就將其抄完。

29 張凌，〈看畫一輩子，只求是真偽〉。亦參見李泓冰，〈看畫一輩子：訪上海博物館國家級文物鑒定專家鍾銀蘭〉，《人民日報》，2000年8月14日（特刊），頁16。

30 鄭重，〈鍾銀蘭的書畫鑒定生涯〉，《文物天地》，第3期（2006），頁48–53。

功課後，鍾銀蘭就在家裏的桌上畫畫。1966年，她正式成為一名鑒定師。同年，文革開始。³¹

陳、鍾二人接受了古典訓練，能夠參與上海博物館的藏品收集工作，為上博館藏的增長做貢獻。建國初期，上海博物館透過多種方式收集藏品。新政權接管上海後，國家吸收了1949年前各博物館以及震旦大學和皇家亞洲學會的文物。³²上海博物館還從工業區的金屬廢料中搶救文物殘片，有時經多年收集的古青銅器片甚至能夠拼合完整。³³但博物館藏品的主要來源還是購買和捐贈。就購入藏品而言，上海的藝術市場十分優越。這座國際大都市歷來都是財富的中心，這是藝術鑒賞的必要條件，而在民國時期的戰亂動盪中，上海與其租界更成為周邊省份收藏家的避難所，名貴珍藏也隨之來到上海。1930年代，兩百多家古董店群集於江西路、河南路之間的廣東路一帶，1949年後，這一區仍是古玩市場的地盤。³⁴直到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前，文物的私人交易仍屬合法，上海的古玩店與其他轉為國營的私有企業一樣，由上海貿易局管理。³⁵當時，朱力是一名中學畢業生，1962年開始在古玩市場當學徒，他表示，1956年之前，私人收藏家可以選擇將文物賣給其他個人、商店或上海博物館等國家機構，但在社會主義改造之後，藏家則必須按照固定價格賣給國家。他指出，「那個時候一段時間叫公私合營，實際上已經是國家領導了。」³⁶

31 張凌，〈看畫一輩子，只求是真偽〉。

32 戚文娟，〈上海文物整理倉庫的歷史功績〉，《上海文化史志通訊》，第33期（1994），頁74-75。

33 鄭重，《博物館與收藏家》，頁168-174。盧笛音將這一過程稱為「搶救性考古」，她還記述了博物館如何在第一年（1959至1960年）就找回了一萬多件文物。參見Lu, “Seizing Civilization,” 121-131。

34 馬承源等編，《上海文物博物館志》，頁424-427。

35 同上註。亦參見Ho, “Reforming Connoisseurship”。

36 2011年7月18日在上海與朱力的採訪。

上海博物館藏品收集的第二個來源是私人收藏家的捐贈。到1959年，估計有1,011人和198個組織共捐贈7萬件文物和27萬冊書籍。³⁷個人捐贈的原因多種多樣。曾陪同周總理參觀庫房的青銅器青年專家馬承源在其口述史中提到：「解放之初，沒有太多的政治運動，文物收藏者並沒有向政府捐獻文物的壓力。因此，如何說服他們把文物高高興興地捐獻出來，就全憑文博工作者的能耐了。凡是50年代從事過文物徵集工作的人都知道，吃閉門羹是司空見慣的事情。」³⁸儘管當時大力鼓勵捐贈，收藏者也用文化資本購買政治資本，但在政治運動中捐贈文物始終被視為愛國行為。上海本地《文匯報》在報道1961年的捐贈活動時，稱「黨保護文物的政策深深的感動了文物愛好者」，收藏者與家人也在發言中恰如其分地如此複述。³⁹在1961年的一次捐贈活動中，收藏家吳芳生的兒子宣稱：「這些古書畫都是我國先民的勞動創造，是屬於民族文化範疇的，通過近一時期對黨和政府的保護民族文化遺物政策的學習，體會到先父一留下來的這些文物，應當作為人民的財富。」⁴⁰收藏家們響應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向國家支援文物，提升其政治資質。為表彰這種捐贈行為，上海博物館向捐贈人頒發證書、給予小額的現金獎勵，並舉辦捐贈者藏品展，以彰顯收藏者的藝術品位和愛國精神。⁴¹

捐贈也可能是出於經濟壓力——以文化資本換取經濟資本。幾乎所有的收藏家在1949年以前都是資本家，在1952年的五反運動中，他

37 〈千年文物放射奪目光彩〉，《文匯報》，1959年9月20日，頁2。

38 段煉等編，《往事與記憶》，頁2。

39 徐潔人、彭建安，〈文物重生〉，《文匯報》，1959年5月31日，頁3；〈上海博物館新添一批珍貴文物〉，《光明日報》，1961年11月10日，頁1。

40 鄭重，《海上收藏世家》（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頁242。

41 上海博物館編，《過雲樓書畫集萃》（上海書畫出版社，2002）。朱力指出，現金獎勵的金額很少，一幅價值千元的畫只獎勵十元。2011年7月18日在上海與朱力的採訪。盧笛音引用鄭重的說法，稱這些行為是「收藏家心理」，但她更進一步提出了「同意文化」（cult of consent）的概念，還有捐贈表演的舞台。參見Lu, "Seizing Civilization," 29, 94–107, 341。

們的企業被收歸國有，而且由於階級地位低下，他們很難找到工作。⁴²雖然小額現金只是象徵性的獎勵，但上海博物館卻能為他們提供實質性的福利，如分配工作或安排子女上大學等。例如，曾被上海階級教育展覽點名的資本家龔旭人，據說擁有一件以戰國思想家商鞅（公元前390至338年）命名的青銅方升，上海博物館曾多次試圖說服，不但請他開價，還提出可以安排他的女兒入讀交通大學，並解決他的住房問題，但龔旭人堅稱早在數年前他的父親就已賣掉了這件青銅方升。⁴³儘管收購未果，但由此可以看出上海博物館何其關注藏家及其私人事務；當陳佩芬和鍾銀蘭輪流接聽博物館的緊急熱線時，她們已對藏家及其私人財產熟稔於心。

上海博物館利用這些藏品舉辦了哪些展覽？在他們的設想中，參觀者將是新中國的公民，的確，到1956年，上海博物館的參觀者中至少有四成是工人出身。為了將藝術與生產、歷史與革命相聯繫，講解員們編寫了特別的解說詞，旨在激發參觀者對生產的興趣。講解員會將「陳列品〔與〕他們所熟悉的生產知識結合起來進行講解」，例如向紡織工人展示早期的手織布，或向機械師講解鐵和青銅的發展。⁴⁴然而，展覽並不局限於藝術或手工藝品。上海博物館一直是政治的助力，並舉辦特別展覽以配合政治運動。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期間，上海博物館就展出了革命文物和棚屋複製品。⁴⁵策展人還利用臨時展覽為博物館自身的工作做宣傳。例如，1956年，上海博物館展出照片和青銅器，講解如何從

42 關於1949年後上海的失業狀況，見Eddy U, “The Making of Zhishifenzi: The Critical Impact of the Registration of Unemployed Intellectuals in the Early PRC,”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73 (March 2003): 100–121。

43 鄭重，《海上收藏世家》，頁52–58。

44 黎明，〈上海博物館對工人觀眾進行講解的幾點經驗〉，《文物參考資料》，第2期（1956），頁64。

45 〈今昔對比激發階級感情〉，《文匯報》，1964年2月16日，頁2。



圖 6.2. 上海博物館展出的青銅器，約 1960 年代。上海市檔案館 H1-14-3-23。



圖 6.3. 委內瑞拉婦女代表團參觀上海博物館，1963 年 7 月 21 日。上海市檔案館 H1-13-2-84。

金屬廢料中搶救文物。⁴⁶ 195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週年之際，博物館工作人員策劃了一場展覽，以上海第一個十年文物工作為主題。上海兩家主要報紙的展評都將中國本身喻為一座博物館，經歷了修繕復蘇，終於在1949年向外開放。⁴⁷

這場十年展在上海博物館的新館——位於河南南路16號的中匯大廈舉行。這棟建築採用裝飾藝術風格，在黃色石膏牆和魚骨紋木地板的房間裏，設計師費欽生負責製作一場「以歷史時期為經，以藝術門類為緯」的展覽。費欽生是一位油畫家，於1954年加入上海博物館。在1950年代的國際背景下，費欽生在中蘇友好大廈師從一位蘇聯宣傳畫藝術家，並向一位日本廣告專家學習。費欽生曾與阿部正捷策劃過一場展覽，得到了國家文物局的認可，成為全中國學習的典範。費欽生在回憶錄中寫道，從今天來看，那場展覽的設計非常老舊，但在當時，「陳列風貌是純淨的，沒有喧嘩和浮躁」。⁴⁸

當被問及講解員和上海博物館的解說詞時，李俊傑表示，講解員會按照陳列的內容，經博物館領導批准後，自己撰寫解說詞：「真正好的講解，不是根據講解的稿子去念，而是根據不同的物件。學生有學生的講法，年紀不同講法不一樣。高中裏來的，初中裏來的學生不一樣。問題是講解的人呢，他要有比較豐富的內容。」除了學生和工人，上海博物館也接待外國遊客；為了吸引更多參觀者，工作人員還在文化宮甚至農村進行巡迴展覽。李俊傑還記得，當時的巡展以當代政治為主題，用來自台灣的手工藝品以呼籲解放台灣：「當時我們是帶照片的，照片掛起來去講解、去介紹。到工廠、到農村、到馬路上都去過的，在那個

46 徐孝穆，〈上海博物館舉辦「從廢銅中搶救文物展覽」〉，《文物參考資料》，第4期（1957），頁45。

47 谷葦，〈知古愛今：看十年來上海文物博物館事業成績展覽〉，《解放日報》，1959年6月12日，頁5；徐潔人、彭建安，〈文物重生〉，《文匯報》，1959年5月31日，頁3。

48 費欽生，《六十年陳列藝術之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1-14。

外灘，一拉拉上去，掛起來，講解宣傳。」⁴⁹ 在中匯大廈的展館內外，上海博物館利用文物講述歷史敘事，表達政治主張。

雖然上海博物館的文物為政治運動提供了實物證明，但作為國家機構，它也未能免於毛時代中國此起彼伏的政治運動。雖然沈之瑜等領導者兼具政治「紅色」與藝術「專家」的雙重身分，但職員之中不乏帶有資產階級家庭背景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以1960年為例，當時從事文物工作的大部分人員都是「剝削階級出身」，而在上海博物館的121名工作人員中，只有15%是工人或農民出身。與其他單位一樣，上海博物館每月召開政治會，組織馬列主義學習小組，並派工作人員下鄉勞動。⁵⁰ 上海博物館的講解員們時刻注意「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並在《文物參考資料》上發表自我批評，供所有同事閱讀。透過對兩千多名工人觀眾的調查，上博的講解員們承認自己對工人們不夠熱情耐心，甚至捏著鼻子避開工人身上的氣味。⁵¹ 無論這些批評是否屬實，上海博物館的工作人員都格外容易受到攻擊。

在一些政治運動中，上海博物館和上海的收藏家受到重創。在1957年的百花運動中，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主任徐森玉站出來列舉了文物保護工作的失誤，另一位與會者也表示認同，並指出黨的幹部扼殺了對學術問題的公開討論。⁵² 儘管這些批評意見一路傳達至國家文物局的鄭振鐸，但隨後的反右運動終結了任何進一步的異議。⁵³ 在政治運動中，收藏家們也深受其害。1952年，鍾銀蘭上班的第一天，就參加

49 2011年7月20日在上海與李俊傑的採訪。

50 沈之瑜，〈學習毛澤東思想，提高文物、博物館工作中的政策性和思想性〉，頁7-8。

51 黎明，〈上海博物館對工人觀眾進行講解的幾點經驗〉，頁63。

52 馬藍，〈視寶藏如廢物的人民：名畫古物當作次品廢品被打進「冷宮」〉，《新民報》，1957年5月15日，頁2。

53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an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Frederick A. Praeger, 1960), 174-176; 鄭振鐸，〈黨和政府是怎樣保護文物的？〉，《人民日報》，1957年7月22日，頁8。

了針對畫家、鑒賞家謝稚柳的批鬥會，其罪名是炒賣藝術品。⁵⁴ 1964年，農村的「四清」運動作為新「五反」運動的一部分擴展到城市，收藏家們再次被指控涉嫌違法，罪名包括投機倒把、走私、偽造、逃稅等等，在有罪的判決下，藏家們不得不變賣文物以支付罰款。在愛國捐贈與收藏家展的背後，隱藏著陰暗的一面：將受政治運動勒令的文物國有化。⁵⁵

在政治運動的過程中，文物成為商品。但在博物館中，它們也有自己需要扮演的政治角色。正如沈之瑜在1960年的一次演講中所說，上海博物館的藏品培養了一種新的唯物主義世界觀。首先，按照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展覽應表達對歷史的尊重，引導人們展望未來。其次，沈之瑜引用毛澤東的《實踐論》，主張僅僅感知一件物品是不夠的，還必須了解其發展的邏輯。因此，展覽的工作就是引導參觀者從感知走向理性，將文物視為更大系統中的一部分。⁵⁶ 1964年，沈之瑜進一步闡述了以理解培養思考的理念。透過觀察博物館中的手工藝品，工人們可以將自身與自身的勞動視為社會主義革命進程的一部分。當參觀者看到按階級社會不同階段展示的藝術品時，則可以了解藝術品如何反映「不同階級的誕生、發展與衰落」。最後，參觀者需要對藝術品保持批判性，注意權衡藝術品的藝術成就與藝術家的階級背景；「藝術貢獻」不能掩蓋對其「反動政治」的批評。自始至終，沈之瑜都在告誡人們，無論是展品之美還是展覽之美，都以政治為先。觀眾不應「產生頌古非今的印象」。⁵⁷ 展覽應遵循毛澤東的箴言，「古為今用」。

之所以出現這些規訓，表明觀眾的觀看方式並不總是符合策展人的預期。很可能有些人仍將文物視為對過去的讚頌，有些人則先感知到美

54 鄭重，《博物館與收藏家》，頁121–126。

55 Ho, "Reforming Connoisseurship."

56 沈之瑜，〈學習毛澤東思想，提高文物、博物館工作中的政策性和思想性〉，頁5–7。

57 沈之瑜，〈上海博物館工作綱要〉，陳秋輝編，《沈之瑜文博論集》，頁60–67。

而後才理解政治，很少有人能在欣賞藝術家的畫工之前先關注其階級背景的污點。核心問題在於文物的雙重性，這點策展人有目共睹。一件物品既可以是反動分子手中的愛國藝術品，也可以是剝削階級享用的工人血汗。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主張：

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並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⁵⁸

然而，雖然毛澤東確定了古代文化兼具封建性和民主性，卻沒有給出明確指示如何區分二者。沈之瑜告誡道：「凡是兩者混為一體的文物……原則上概不公開陳列。」⁵⁹ 當文革首先開火「破四舊」時，如何批判古代文化正是文革面臨的兩難問題。

文化大革命與「破四舊」

「破四舊」開始後，上海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宣稱藝術品和古物是受國家保護的文物。鍾銀蘭等一眾人手牽手包圍龍華塔做人肉盾牌時，疾呼龍華塔屬於文物，不是「四舊」。其實，龍華塔一類的歷史古跡此前早已被列為文物保護單位。龍華塔與龍華寺都屬於上海古建築，中共一大會址則屬於革命紀念建築。⁶⁰ 1963年，國務院頒佈了相關規定，以保

58 Stuart R. Schram,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Praeger, 1963), 356–367.

59 沈之瑜，〈上海博物館工作綱要〉，頁64。其他不能展出的物品包括「有損國家榮譽……或對政治或社會生活有不良影響」的文物。沈之瑜沒有舉例說明，但從其他關於外國博物館的文章可以推斷，裹腳鞋等物品屬於前一類。

60 文化部文物管理局編，《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第一批文物保護單位名單匯編》，頁18。

護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和紀念意義」的文物。⁶¹ 國家保護的範圍還包括可移動的文物，並規定各行政區域的人民委員會應對其管轄範圍內的所有文物負責。⁶² 當鍾銀蘭和同事在紅衛兵抄家時趕到藏家住處時，她便自我介紹是上海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因為他們分別不清楚哪個是文物，哪個是四舊。文物他們也知道是要保護的。所以我們講，那麼你們去破四舊，金銀啊什麼的要破的你們去破，文物我們來保護，金銀首飾這些東西我們不管的。」⁶³

但對許多人來說，「四舊」的定義並不明確，如何「破」法也模糊不清。1966年6月1日，「四舊」的概念首次出現在《人民日報》上，社論將「文化大革命」定義為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培養無產階級文化的革命。1966年8月8日，「破四舊」、「立四新」被寫入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8月19日，北京紅衛兵首開「破四舊」運動。⁶⁴ 但如歷史學家王年一所言，「舊」與「新」的區別從未明確。⁶⁵ 例如，北京紅衛兵在一份題為《破舊立新一百例》的宣言中，號召紅衛兵「向『四舊』猛烈開火，把帝國主義、修正主義、資產階級的東西，把一切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東西徹底砸爛。」。文中一處提到了文物，宣稱「一切書店、圖書館必須清理內部，清除一切毒草」。⁶⁶ 這種解讀得到了上海的「燒塔指揮部」的認同，成為了全面摧毀的許可。

隨著「破四舊」運動在北京等地蔓延，紅衛兵們急於證明自己的革命意志，大肆塗抹歷史遺跡和寺廟，洗劫私人收藏。為防止運動的破

61 范敬宜等編，《文物保護法律指南》（中國城市出版社，2003），頁473–476。這些規定後來被1982年的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取代。

62 《文物商店工作手冊》（中國文物商店總店，1981）。

63 2009年12月25日、2010年8月12日在上海與鍾銀蘭的採訪。

64 Kwok-sing Li, comp., *A Glossary of Political Term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rans. Mary Lok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95), 426–428.

65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67–68。

66 毛澤東主義學校紅衛兵，〈破舊立新一百例〉（1966），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壞，也有人試圖早做準備。北京故宮博物院在運動開始數日前就關閉院門，周恩來總理派出解放軍部隊守衛故宮博物院周邊；唯一對外開放的部分是「收租院」展區，即以雕塑模型抨擊「舊社會」地主的階級教育展覽。⁶⁷ 在更加遠離權力中心的地方，破壞與保護之間的矛盾升級為暴力事件。歷史學家何大鵬指出，在孔子的出生地曲阜，當地居民為保衛孔廟古跡群而與「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相對抗。與龍華塔的上海人一樣，保衛者們為文物與民族挺身而出，曲阜縣委書記李秀也發表講話，宣稱孔廟遺址是「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遺產」。孔府門口的工人們也發聲支援，高喊「這是我們祖先世代代的心血」，這正呼應了幾天前人們在龍華塔前的吶喊。⁶⁸ 在這一刻，大大小小的文物，都逃不開這樣的爭辯。⁶⁹

在上海，在這座因過去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歷史而備受抨擊的城市，紅衛兵湧上街頭，進行「無產階級化」和「革命化」的改造。從南京路和永安百貨到外灘的洋式建築，紅衛兵拆除了西方的標誌，包括前滙豐銀行大樓前的石獅子。⁷⁰ 雖然《人民日報》對上海的報道強調根除外國事物，但實際上傳統的歷史遺跡也遭到了攻擊。大多數古跡都不如龍華塔幸運：城隍廟的神像全部被砸毀、靜安寺的文物全部丟失、龍華寺的

-
- 67 梁丹，〈北京博物館工作紀事〉，《中國博物館》，第1期（1994），頁88–95；Elliott and Shambaugh, *The Odyssey of China's Imperial Art Treasures*, 129–131；北京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北京志·文物卷·文物志》（北京出版社，2006），頁694；〈戚本禹在故宮的講話〉（1966年12月1日），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 68 Dahpon David Ho, “To Protect and Preserve: Resisting the Destroy the Four Olds Campaign, 1966–1967,”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ed. Joseph W. Esherick et 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84–92.
- 69 李秀於1966年8月24日發表演講。曲阜事件被稱為「8·26事件」，當地群眾成功抵禦了曲阜師範學院的進攻。同上註，頁84–88。
- 70 〈上海天津革命小將和商業職工向剝削階級「四舊」發動總攻：揮起革命鐵掃帚，橫掃一起舊習俗〉，《人民日報》，1966年8月25日，頁2。詳細的二手記述，見李遜，《文革造反年代》，頁98–103。

數千卷經書被燒毀、徐家匯天主堂的十字架被拆除，內部也遭到焚燒。⁷¹ 1966年10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對文物保護單位的破壞情況進行了彙報，他們表示，紅衛兵和革命群眾對一些遺址的破壞非常徹底，再談保護已毫無意義。因此，文物保管委員會撤銷了歷史遺跡的文物保護單位稱號。⁷²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的這一行政舉措似乎是在向紅衛兵的命令低頭。委員會在給上海市人民委員會的報告中寫道，撤銷文物保護單位符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破『四舊』立『四新』的要求」。但同時，報告也暗示出一場悄無聲息的搶救行動。委員會認定四處遺址具有「明確的歷史價值」，包括郊區的一座寺廟、一座會館和兩座佛塔，並要求如果以後需要移除、重建或拆毀其中的任何建築，必須進行拍照和調查。對於一些倖存的文物，如廟宇神像、孔子牌位和墓碑，委員會建議將其轉移至當地博物館。最後，委員會強調，如需在墓地遺址附近進行任何工程建設或農業開發，委員會保留協調挖掘工作的權力。⁷³ 在「破四舊」之後，文物保管委員會進行了清點。由於無法直接給歷史遺址關門拒客，又受縛於未來的不確定性，文化機關只能努力守衛陣地。

然而，與北京故宮博物院一樣，上海博物館也關上了館門，託故為了「鬧革命」。⁷⁴ 館長沈之瑜和副館長馬承源給上海市人民政府寫了一份報告，提出以下三點建議：第一，如果要查抄藏家，應通知博物館，博物館會派人處理文物；第二，送館的文物應由博物館替藏家代管，並開

71 馬承源等編，《上海文物博物館志》，頁171、174、177。關於這些歷史遺址的更多信息，包括目擊者的描述和預先對文物的儲放，參見陳志強，《文博先驅》，頁193–203。

72 上海市檔案館B172-3-5，頁11–14。

73 同上註，頁12–14。

74 鄭重，《博物館與收藏家》，頁217。特別訪問似乎仍在繼續。1966年11月，藝術史學家宮川寅雄在《朝日新聞》上記述了他在8月份的一次訪問，聲稱沒有看到任何破壞文物的證據。見宮川寅雄，〈紅衛兵與文物〉，伊藤武雄編，《外國人看文化大革命》（大生出版社，1969），頁122–123。

具收據；第三，政治運動結束後，政府應就下一步行動發佈規定。⁷⁵市長曹荻秋批准了這份文件，上海博物館隨即開始行動。博物館根據一份記錄了藏家姓名、工作單位、地址和所藏文物等信息的詳細清單，致電所有相關工作單位，並開通熱線電話。馬副館長也負責接聽電話，並先發制人，派人在玻璃櫃刷上革命標語。博物館工作人員外出公幹時，也都戴上紅衛兵袖章。⁷⁶

建立響應系統後，上海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時刻在電話旁守候。有時是單位致電，有時是藏家偷跑出門使用公用電話。還有一位匿名人士打來電話，把紅衛兵從外灘搶走的兩尊睡獅用吊車送了過來。⁷⁷每當博物館接到藏家的電話，至少包含一名專家的工作小組就會匆忙趕去，有時趕到恰逢抄家。鍾銀蘭講述了前紡織廠工人、繪畫收藏家劉靖基的故事：

我到劉靖基家裏去，一個通宵，6點鐘多到他家裏，到第二天11點多回來的，一個晚上沒有睡覺。他收藏東西很多的，兩千件左右。造反派先是鬥他，鬥好以後讓他站在花園裏面，他就站著；等到造反派出去了，他就偷偷進來。他看我們在做清單，他就

75 鄭重，《博物館與收藏家》，頁215。我未能在館藏檔案中找到這份報告，但李俊傑和鍾銀蘭的口述都與鄭重的記錄吻合。黨委書記陳丕顯在回憶錄中提到，他的辦公室於8月24日發佈了一項命令，其中包括禁止抄家、破壞公共財產、焚燒檔案、銷毀文件，但不清楚這份政令是否包括文物在內。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頁58。

76 鄭重，《博物館與收藏家》，頁215–218。在與我的採訪中，鍾銀蘭對博物館工作人員扮成紅衛兵的說法提出了質疑，但她告訴盧笛音，上海博物館有自己的紅衛兵部隊。見Lu, “Seizing Civilization,” 176。據《紐約時報》的馬承源訃告所描述，他曾命令博物館工作人員扮成紅衛兵。參見The Associated Press, “Ma Chengyuan, 77, President of Shanghai Museum, Dies,”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5, 2004, <https://www.nytimes.com/2004/10/15/arts/ma-chengyuan-77-president-of-shanghai-museum-dies.html>.

77 鄭重，《博物館與收藏家》，頁217；段煉等編，《往事與記憶》，頁19；上海市檔案館B3-2-199，頁10–14。

站在我的旁邊。我在做清單，這個編號，那個編號，什麼什麼圖，什麼什麼卷，一件一件都要定名的，這是什麼畫家什麼圖，他站在我旁邊，站了很久他就問：哎，你這位女士，對文物很內行嘛，你是行家嘛，我看你定的名字一看就這知道了，你是哪個單位的？我說：上海博物館。他說：哇，怪不得，你是上海博物館的，那我就放心了，今天的東西都是你們上海市博物館給我拿去的？我說：對，我們博物館會保護好的。他馬上精神好得不得了，說一件都不要漏。他拿來一看文鵬的行書的，還有石濤的山作品。他講：拿去，都拿去，一件都不要漏。⁷⁸

劉靖基的經歷成為了上海博物館的成功故事，被反復講述和傳頌。文革結束後，上博完好無損地交還了他的藏品，他深受感動，讓鍾銀蘭從中挑選了四十幅最好的繪畫贈予上博。⁷⁹

但並非所有私人收藏的文物都能如此幸運。博物館的名單只包括他們已知的擁有大量藏品的收藏家，最終他們只收到了大約兩百戶家庭的文物。⁸⁰ 那些未能列入名單的收藏者可能聽到過文物保護的消息，但也無濟於事。⁸¹ 而且，上海博物館的名單一旦落入紅衛兵之手，可能在不經意間釀成悲劇。據說擁有商鞅方升的龔旭人，被紅衛兵在家中連續批鬥了28個晝夜。龔旭人先在抗戰時期藏匿青銅方升，躲過了日軍，後來又在1960年代瞞過了上海博物館，如今卻被紅衛兵從他侄子家中搜出。當他們「敲鑼打鼓」，把青銅方升作為「勝利果實」高高舉起時，龔旭人突發心臟病，在送醫途中去世。⁸² 隨後，上海紅衛兵階級教育展覽增設了關於龔旭人生平的陳列，但從未提及龔旭人的死訊與死因。⁸³

78 2010年8月12日在上海與鍾銀蘭的採訪。

79 同上註。

80 陳志強，《文博先驅》，頁204。

81 Nien Cheng,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Penguin Books, 1986), 69–78.

82 馬承源等編，《上海文物博物館志》，頁297；鄭重，《海上收藏世家》，頁52–58。

83 上海市檔案館C4-2-8，頁11。

儘管上海的文化機關對「破四舊」主動採取了自下而上的應對措施，但充其量也只是將損害降到最低的被動對策。龍華寺被砸，但保住了龍華塔；紅衛兵搶走了龔旭人的傳家之寶，鍾銀蘭卻救出了劉靖基的藏畫。不論在上海，還是中國其他地區，博物館工作者致力於保護藝術和文物，它們是民族的文物，是中國勞動人民的手工創造。但這些論點並不總能奏效，當上海文物保管委員會在紅衛兵掃蕩之後收撿殘珍，當上海博物館的展廳裏堆滿一箱箱來自私人藏家的文物時，上博自己的領導層也陷入了攻擊的漩渦。1966年10月，沈之瑜的住宅遭到搜查，上海博物館的紅色革命造反派向保衛者們發起了鬥爭。⁸⁴ 1967年一月革命爆發，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市人民委員會被推翻。在上海博物館，沈之瑜被打成走資派，並遭到撤職。⁸⁵ 在上海人民公社（上海博物館還收藏了人民公社的標牌作為文革文物）管理下的短暫過渡期後，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成為上海市的新政府。現在，文物保護需要革命的論證。

文物小組、上海博物館與文化保護

1966至1967年的那個冬天，上海博物館來到命運的轉捩點。正如圖6.4顯示，門廳裏掛滿了造反有理的橫幅，年輕一代的工作人員聚集在熠熠生輝的毛澤東雕像周圍，然而此時他們已經沒有了領導。既然之前的掌權者失去了合法性，那麼藝術品和古物作為文物受國家保護的說法也就站不住腳。但此刻，上海博物館的工作人員並不孤單。從「破四舊」開始，他們就與北京的中央領導人保持聯繫。在龍華塔事件發生的當天，市長曹荻秋召開會議，傳達了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在掃四舊

84 陳志強，《文博先驅》，頁209–212。當時掀起了一股搜查浪潮，專門針對1930年代與江青有關聯的藝術家，這導致沈之瑜也被搜查。從1966年9月到1972年10月，在121次大批鬥和109次小批鬥中，上海博物館有60名幹部遭到批鬥。沈之瑜被批鬥了52次。1967年12月至1968年9月，有三人自殺，兩人自殺未遂。

85 同上註，頁210。



圖 6.4. 上海博物館工作人員在購入上海人民公社標牌時的合影，無日期。
圖片由《文匯報》鄭重收藏惠允使用。

中，必須千方百計保護好歷史文物。」因此，在保衛上海玉佛寺和其他古跡的過程中，周總理的名字被反復援引。⁸⁶ 但是，儘管周總理的名號引起了一定反響，收效仍然有限，即使在北京也不例外。1966年12月1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初級成員戚本禹前往北京故宮博物院發表演講。戚本禹是歷史學家，也是《紅旗》雜誌的副總編，1966年5月成為毛澤東的秘書，他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其他成員負責指導了文化大革命的進程。在故宮博物院，戚本禹建議將御花園改建為階級教育展覽館，即「革命的故宮」，他主張文物是人民的財產，應加以保護，並用於提高階級覺悟。⁸⁷

86 同上註，頁200–203。

87 〈戚本禹在故宮的講話〉（1966年12月1日）。在他2015年於網上出版的回憶錄中，戚本禹稱，他是在秘書靳耀南的敦促下發表了禁止燒書的講話，見戚本禹，〈回憶江青同志〉，第三部分。在2016年出版的完整回憶錄中，戚本禹記得曾向江青彙報文物的損壞情況，她又向毛澤東做了彙報。見戚本禹，《戚本禹回憶錄》，頁505。

兩個月後，在上海一月革命之後，戚本禹於1967年1月27日在北京召開了第二次座談會。這一次，他向來自北京圖書館、書店、文物保護單位、博物館和造紙廠的文化工作者發表了講話，更請來陳伯達、康生等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高級成員，號召大家討論文物的現狀：珍本為何會被當廢紙賣掉，該如何才能讓人正確認識文物保護？與會者表示，普通百姓不堪紅衛兵之擾，因此提前銷毀了自己的收藏。正如中華書局和新華書店的代表所述：「住戶有燒字畫的。」以前曾購買珍本書籍的機構也不敢介入。戚本禹怒不可遏，回應道：「我就要去買，有些書需要看。……你們造反派也不贊成燒書。你們可以搞個倡議，『線裝書不要燒』，你們看怎麼辦？……不論哪個階級起來造反，都要拿這些東西在製造輿論。」戚本禹認為保護是破除四舊的前提，他批下指示：文物保護單位要寫請願書，文物要集中整理保存，紅衛兵和博物館要合作。戚本禹強調，無論屬於哪一派，所有文化工作者都必須堅持以下原則：圖書鑒別、文物保管、絕不破壞。⁸⁸

隨後的反應既自下而上，也自上而下。1967年2月中旬，北京文化機構中的造反派發表了一份請願書，借用〈新民主主義論〉闡述了古代文化對於發展新民主文化的必要性。雖然請願書讚揚「破四舊」，但作者認為「如果只是從形式上把古舊書刊、字畫統統燒掉，這不僅不能徹底肅清其流毒，反而使我們失掉了批判的物件，不利於減資興無的鬥爭」。他們的建議響應了戚本禹在座談會上的主張，他們呼籲購買珍本、封存國家收藏、從造紙廠搶救文物、購買私人藏書。⁸⁹ 雖然這份宣

88 〈戚本禹與圖書文物考古博物館等單位革命造反派代表座談〉（1967年1月27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首長講話彙編》（1967年4月），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請留意，中華書局主營古籍和舊書，新華書店銷售新書，兩家書店都屬國營。戚本禹在2016年的回憶錄中透露，他是奉毛澤東之命召開這場座談會的，毛澤東看到會議報告後很高興，也對他的講話和措施表示贊同。見戚本禹，《戚本禹回憶錄》，頁505。

89 北京造紙總廠首都職工革命造反者連總站，《關於保護古舊書刊字畫的倡議書》（未出版的宣傳單，1967年2月15日）。

言看似革命號召，但其實得到了中央權力的支持。就在請願書發佈的當天，中國科學院要求上海文化局公佈有關文物狀況的報告。⁹⁰幾天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向文化部和文物局發出指令，通知上海各下屬單位對金屬冶煉廠的金屬佛像和其他文物進行鑒定和保護。⁹¹隨後數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上海革委會均發佈命令，肯定了保舊建新的重要性；保護文物就是革命。⁹²

隨著請願書的傳播，北京成立了北京市古書文物清理小組。⁹³與此同時，在上海徐家匯天主堂裏，鍾銀蘭也開始了工作。⁹⁴上海市查抄文

90 上海市檔案館B172-3-5，頁8-9。

91 同上註，頁1。

92 按時間順序：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出關於國有財產的通知，題為〈關於保護國家財產，節約鬧革命的通知〉；1967年5月14日則發出了〈中國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保護文物圖書的幾點意見〉。兩則通知分別收錄於1967年6月和1968年4月1日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關文件彙集》，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1967年6月19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政治宣傳組發佈了《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上海市文物圖書清理小組在市革命文物委員會的直接領導下已經真實成立，並開始工作》（未出版的宣傳單）。

93 北京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北京志·文物卷·文物志》，頁558-559。值得注意的是，小組於1967年2月13日成立，比請願早了兩天。在北京，小組最終聘用八十多名工作人員，從八千戶家庭中清理出5,385,000件文物、185,300幅字畫和2,357,000冊圖書；從廢品處理廠搶救出314噸書籍和85噸金屬。就我對目前文化地方志的研究，只有北京的地方志提到了這個小組，廣州市的地方志則概述了1984年至1986年的文物分類和歸還工作，見廣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廣州市志》（廣州出版社，1999），第16卷，頁759。文革期間的文宣品顯示，其他地方也在開展此類工作，例如南京博物院和南京圖書館重印的一份宣傳單就有相關報道，見〈北京市古書文物清理小組關於挑選古舊書刊標準的意見〉，1967年6月。

94 儘管檔案文件和地方志表明文物小組成立於1967年4月，但鍾銀蘭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她記得是在1967年2月。很可能上海和北京的小組同時開始工作，只是正式成立的時間較晚。2009年12月25日和2010年8月12日在上海與鍾銀蘭的採訪。

物圖書清理小組（後文簡稱「文物小組」），最終由來自上海市文化局、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等12個單位的一百多名工作人員構成。⁹⁵到1967年9月，文物小組報告已收到28萬件文物和36萬冊圖書。其成員從金屬廢料廠回收了八千多斤青銅器和工藝品，從廢紙廠回收了四千多斤書籍。文物小組編纂了一份索引，整理了最珍貴的文物和書籍照片，包括商周青銅器、宋元明清瓷器、古書、印章、錢幣和現代手工藝品。編纂者特別突出了一些歌頌國家的物品，尤其介紹了宋瓷的色彩和燒製工藝，以顯示中國的技術成就。⁹⁶在描述工作時，文物小組為紅衛兵的文革行動創造了一種敘事，表明他們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將文物歸還給勞動群眾。就像上海階展隻字不提龔旭人的死因，文物小組誇耀道，上海麵粉廠的革命群眾觀察敏銳，從「吸血鬼」手中奪回了商鞅方升。他們寫道，現在商鞅方升終於「重新回到了勞動人民手中」。⁹⁷

從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到上海革命委員會，在所有權力機關的支持下，文物小組的言辭愈發底氣十足。它借鑒了〈新民主主義論〉之外的毛澤東作品，引用了他在1938年六中全會上的講話：「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之一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該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該給以總結，我們要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⁹⁸此外，對於紅衛兵的抄家行動，文物小組也美其名曰是為了保護群眾的文化：

在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小將和革命群眾，在那些黨內一小撮

95 上海市檔案館B172-3-5，頁26。

96 同上註，頁31-33。

97 同上註，頁35。

98 同上註，頁30。這句話引自〈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在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的報告〉。

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牛鬼蛇神家中，抄查出祖國歷代勞動人民創造的大量珍貴的文物圖書。這是紅衛兵立下的不朽功勳，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⁹⁹

為了強調文物的收集和保存工作始終是文革的組成部分，文物小組在報告中更改了其成立日期。文物小組從未提及鍾銀蘭從2月起才在小組開始工作，也未提及4月的正式成立，但到了1967年10月，文物小組卻聲稱他們的工作從1966年8月就已經開始。¹⁰⁰ 如此一來，文物小組將所有文物保護的相關活動都變成了將藝術和文物還給群眾的正確做法。所有這些都被視為紅衛兵的革命成果。

文革期間，文物小組繼續開展工作。從1967年6月到1968年12月，小組共收到332萬件文物和手工藝品、547萬冊書籍。¹⁰¹ 小組工作人員的職責是接收文物，如果文物的所有者信息明確，則開具收據，表明上海博物館代為保管。如今在上海的文革文宣品中還能找到收據和清單，關於書畫的單據上還註明了鍾銀蘭的名字。

但同時，許多收集到的文物來源並不明確。大部分文物被胡亂堆放在文物小組的收藏站裏，有些在被搶救出來時即將被投入冶煉或打漿。文物小組工作人員的工作之一是進行分類，將乾隆時期（1735至1796年）或更早的文物藝術品與其他工藝品區分開來，後者將通過國營出口公司出售以換取外匯。¹⁰² 對此，鍾銀蘭和同事們採取了重要的干預行動，他們向上海革命委員會請願，認為這種定義並不「科學」，不

99 上海市檔案館B172-3-5，頁30。

100 同上註，頁31。

101 馬承源等編，《上海文物博物館志》，頁376。作為對比，北京共接收185萬幅畫、2,357萬冊書和538萬件其他文物。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70-71。

102 受訪者經常提到毛澤東時代中國對外匯的需求，並表示不太重要的藝術品可以出口換取外匯。我搜索了關於出口商品換取外匯的資料，但從未找到文物一類。



圖 6.5. 上海博物館工作人員在上海博物館門廳合影，1967年9月27日。圖片由《文匯報》鄭重收藏惠允使用。

文物圖書清理小組清單

3510 字號 上海第一文物材料整理小組 1968年8月14日

編號	品名	數量	備註
甲318	鄭板橋、徐悲鴻、康大平字框	3件	
319	馬路山水 (鏡框)	1"	
320	柳溪松猿 (")	1"	
321	刺繡人物袖	1"	
322	木框	1"	
	以上書局 伍件		
	宋畫 壹件		
	竹林 壹件		
	製景人 鍾張三 程才受		

第 頁 共 頁

以上共計 5 件

整理人 丁玉卿 1968.8.14

第 頁 共 頁

圖 6.6. 上海市查抄文物圖書清理小組的收據，1968年8月14日。圖片由上海海燕圖書文化有限公司瞿永發惠允使用。

能以此割裂中國藝術的歷史。考慮到未來的策展工作，鍾銀蘭主張保留乾隆以後的優秀藝術品；經上海革委會批准，她清點了出口公司的倉庫，救回了大約六萬件藝術品。¹⁰³即使是在革命時期，或者說尤其在革命時期，上海博物館仍在繼續收藏。

由此，上海博物館與其他革命時期的收藏聯繫在一起。例如，盧浮宮於1793年法國大革命期間開館。安德魯·麥克萊倫 (Andrew McClellan) 在談到盧浮宮開館之初的幾個月時寫道：「在博物館內，大革命征服的氛圍非常明顯。展出的藝術品脫離了大革命前的環境，回到了它們的『合法』主人手中——人民。」革命時期的盧浮宮還憑藉軍事上的戰利品擴大了館藏；拿破崙從義大利凱旋後，將義大利的繪畫和雕塑作為戰利品公開展示。¹⁰⁴在蘇聯，1917年革命之後，皇室、私人和教堂收藏的藝術品遭到了大規模的國有化收歸。除建立國家博物館之外，政府還透過官方法令和人民啟蒙委員會的博物館部，銷售藝術品和其他貴重物品，為工業化提供黃金。¹⁰⁵盧笛音對上海博物館的研究表明，在1966年「破四舊」運動的15天內，上海博物館清點出6,184件文物（其中38件是頂級文物，超過了之前一年的平均水準）。1966年至1969年期間，上海博物館接收了106,000件文物，館藏增加71%。¹⁰⁶在收藏領域，紅衛兵所言非虛，文化大革命對中國來說的確史無前例。¹⁰⁷

103 2009年12月26日在上海與鍾銀蘭的採訪。

104 Andrew McClellan, *Inventing the Louvre: Art, Politic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Museum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98, 116–123.

105 參見 Natalya Semyonova and Nicolas V. Iljine, eds., *Selling Russia's Treasures: The Soviet Trade in Nationalized Art, 1917–1938*, trans. Andrew Bromfield and Howard M. Goldfinger (Abbeville Press, 2013), 尤其是第一章。

106 Lu, “Seizing Civilization,” 198–199, 219–225. 如果考慮到頂級（三類）文物，這一點尤為重要。在破四舊期間收集的6,184件文物中，有38件是頂級文物，超過了前幾年的平均水準。在106,000件文物中，有6,650件是頂級文物。據盧笛音計算，1949至1964年間收集的頂級文物有539件，「文革的查抄……令館藏增加1,234%」，見本註頁225。

107 這種現象並不局限於革命。最著名的例子可能是納粹德國對歐洲藝術品的

文革後期，策展工作恢復。1973年6月，沈之瑜從五七幹校返回，籌備復館工作，並被任命為上海博物館革命委員會委員。次年，在馬承源的指導下，青銅廳以「奴隸創造歷史」為主題重新佈展。¹⁰⁸為了呼應「勞動創造世界」的理念，中國陶瓷廳成為第二個陳列室。¹⁰⁹展覽的政治性毋庸置疑；為配合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上海博物館舉辦了關於秦始皇的展覽。¹¹⁰與此同時，在孔子的出生地山東曲阜，當地官員將孔府改建為展覽空間，展出了孔家的牌位、御賜品、財產紀錄和私人物品。¹¹¹參觀者痛罵孔府門匾的照片和講解員描述孔家奢華生活的圖片流傳開來，成為一場關於展覽的展覽。

隨著博物館重新開放，文物工作重新在國內媒體上出現。在1971年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秘密訪華期間，以及1972年尼克森(Richard Nixon)總統訪華的最後一天，都有關於文物的文章發表；兩人也都參觀了故宮博物院。¹¹²尼克森訪華後，馬承源受命籌備赴美展覽。¹¹³同樣

劫掠。在對維希法國的研究中，伊莉莎白·卡斯戈特(Elizabeth Karlsodt)講述了納粹合作者如何假藉法國遺產的概念扣留從猶太收藏家那裏沒收的藝術品，法國的博物館系統(包括其相關政策和法律)又如何因為納粹的佔領而變得日益強大。參見Elizabeth Campbell Karlsodt, *Defending National Treasures: French Art and Heritage Under Vich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08 陳志強，《文博先驅》，頁232；馮丹楓等，〈從青銅器看吃人的「禮治」：上海博物館青銅器陳列室巡禮〉，《學習與批判》，第6期(1974)，頁23-24。

109 陳志強，《文博先驅》，頁232。

110 〈上海博物館為配合批林批孔運動：舉辦「秦始皇統一中國文物圖片展覽」〉，《文匯報》，1974年10月3日，頁3。

111 新華通訊社，《決不允許開歷史倒車：曲阜人民揭發批判孔府罪惡》(人民美術教育出版社，1974)。

112 《中國大陸報紙選譯》(*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指出了這一規律，見第4949期，頁71，以及第5090期，頁201。前一篇文章在1971年7月24日的新華社新聞上發表，後一篇文章則發表於1972年2月28日的《人民日報》。關於故宮博物院的重新開放，參見Elliott and Shambaugh, *The Odyssey of China's Imperial Art Treasures*, 130-131。

113 The Associated Press, "Ma Chengyuan, 77, President of Shanghai Museum, Dies."



圖 6.7. 及圖 6.8. 譴責孔家門匾，審查孔家的奢華生活。上海新聞圖片社，1974。圖片由托馬斯·H·哈恩紀錄圖片庫 (Thomas H. Hahn Docu-Images) 惠允使用。

在1972年，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英文書，題為《中國考古新發現：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發現》(*New Archaeological Finds in China: Discoverie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高度評價了農民對考古發掘的貢獻。¹¹⁴ 上海博物館的工作也再次得到了本地報紙的報道。1975年，上海《文匯報》發表題為〈文物新發現〉的文章，以兩件西周酒器為例，講述了上海博物館從冶煉廠搶救文物的事跡。不同於前一年《文匯報》對文物的報道，這篇文章沒有意識形態色彩，只表明歷史研究的重要性。¹¹⁵ 甚至在1976年文革結束之前，上海博物館的青銅器就已經作為文化交流的一部分走出國門。上海博物館也成為改革開放的一部分。

1980年代，黨中央和國務院頒佈了關於歸還文物和書籍的規定。¹¹⁶ 1984年，地方政府受命負責將文物歸還原主。在上海，據文物小組估計，在1986年的文物和書籍中，76%文物和50%的書籍物歸原主。¹¹⁷ 劉靖基重新見到了自己的收藏，欣喜若狂，將部分藏畫贈給了上海博物館。龔旭人的妻子在文革中去世，龔旭人的家人決定將商鞅方升賣給博物館，如今商鞅方升已成為上博的鎮館之寶之一。¹¹⁸ 然而，散失的文物更是不可勝數。即使不考慮在「破四舊」中遭到毀壞的文物，也不考慮收集到的文物與剩餘文物之間的數量差異（1967至1968年文物小組共收集332萬件文物和工藝品，到1986年只剩81萬件），國家以現金形式

114 *New Archaeological Finds in China: Discoverie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2), 11–12, 47–54. 同年，文物出版社與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了至少三本同名書，均題為《文化大革命時期出土文物》。參見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特藏。

115 〈文物新發現〉，《文匯報》，1975年7月22日，頁3。

116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收回文化大革命期間散失的珍貴文物和圖書的規定〉（1980年6月4日），《幹審工作政策文件選編》（黨建讀物出版社，1993），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17 馬承源等編，《上海文物博物館志》，頁377。

118 鄭重，《海上收藏世家》，頁56。亦參見陳燮君《上海博物館珍品》（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頁47。

賠償的遺失文物和工藝品就高達192萬件。¹¹⁹一個核心問題依然存在：收集文物到底是為了誰？

文物小組的報告稱，收集文物既是由革命群眾發起的，也是為了革命群眾。對於文物混雜著「民主精華與封建糟粕」的問題，文革的回答是物質文化的階級地位取決於其所有權的歸屬。文物小組表示，紅衛兵把文物還給群眾，文物就可以「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創造出極其輝煌燦爛的社會主義新文化服務」。¹²⁰但是，如果說當年的檔案報告講述了一個恰到好處的革命故事，那麼曾在文物小組工作過的鍾銀蘭和李俊傑則堅定地主張，他們只是代替藏家妥善保管這些文物。在鍾銀蘭的記憶中，革命言論只是口號。她自豪地描述自己在農村整理文物時的生活：「我們應該說覺悟也是很高的，生活條件一點也不計較的。今天如果突然跳出來一張乾隆的東西，一張明代的東西，或是董其昌的，我們高興得不得了。這麼好的東西，董其昌的！能從我們手裏把文物保護好，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非常開心的事情。」¹²¹同樣，受古玩市場委派參與文物小組的朱力也將自己的工作視作為博物館服務，進而為國家服務。據他計算，古玩商店將七千件文物移交給上海博物館，他還表示：「雖然我們是在經商，但實際上也是在保護，所以我感覺很榮幸、很開心，感覺我所做的工作，為國家做的貢獻是偉大的。」¹²²

對這一代人而言，博物館工作的確是新中國的產物，他們在文物小組的工作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教育。鍾銀蘭天不亮就起床，每天鑒定一千幅畫；身旁一邊是鋪展卷軸的助手，另一邊是抄寫員；午飯時間只有半小時。在下鄉兩年以及文物小組工作的六年間，鍾銀蘭看過的畫可能

119 馬承源等編，《上海文物博物館志》，頁376–377。

120 上海市檔案館B172-3-5，頁36。

121 2010年8月12日在上海與鍾銀蘭的採訪。

122 2011年7月18日在上海與朱力的採訪。

比大多數收藏家一輩子看過的都多。¹²³ 古玩市場的鑒定師朱力將鍾銀蘭稱為「姐姐」，他也回憶道：「別人去造反，寫大字報，我就去鑽研，鑽研我們古代的文化藝術，我感到很榮幸，因為別人沒有這個機會，而我有這個機會接觸到這麼多。」¹²⁴ 也許諷刺的是，儘管文革與文革言論遭到批判，但收集文物最終還是服務了群眾——先是培育了在新中國成長的一代人，接著又在文革後的改革時代成為面向公眾的展覽。

小結：改革時期的文化與民族

1996年，在人民廣場上一座宏偉的新建築中，上海博物館重新開館。新中國的工作人員曾從工業廢墟中搶救出一件青銅鼎，上海博物館的外形正如這座大鼎，為當時引領中國經濟騰飛的國家政權賦予了合法性。民國時期的上海市博物館構成了上海市政中心的一部分，今天的上海博物館也與上海市人民政府相向而立。如果說上海市博物館反映了民國時期的文化建設之夢，那麼1996年的上海博物館則代表了中國的四個現代化。

在博物館內部，展覽也脫胎換骨。上博的展覽從1952年開始，最初按朝代排列；1959年調整展覽，以順應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階段；後來又舉辦各類臨時展覽，以配合歷次政治運動。今天，上海博物館共設置十個常設展廳，按照藝術門類展示12萬件珍貴館藏。上海博物館館長陳燮君寫道，展覽的任務是「使觀眾在喜聞樂見的形式中悄然接受陳列設計理念，讓觀眾通過參觀展覽得到美的享受、審美情趣的提升〔以及〕歷史和文物、美學和藝術等方面的薰陶」。¹²⁵

123 2010年8月12日在上海與鍾銀蘭的採訪。作為參考，上海收藏家錢鏡塘（1908–1983）一生鑒定了超過五萬幅畫。Ho, “Reforming Connoisseurship,” 614。

124 2011年7月18日在上海與朱力的採訪。

125 李蓉蓉編，《寧靜的輝煌：上海博物館新館陳列設計解析》（文物出版社，

上海博物館強調「美」，似乎沒有留下任何毛時代的印記。但社會主義的經歷塑造了它的今天。當年，沈之瑜和馬承源是奮力應對「破四舊」的指揮者，改革開放後，他們重返上海博物館擔任館長。對沈之瑜來說，他的文革歲月在研究甲骨文中度過，年輕一代有文物小組作為課堂，而政治失勢的他只有自己的研究。對馬承源而言，目睹中國文物流散海外，激發了他領導博物館的雄心。在一份口述史中，他描述了1980年他在美國旅行時遇到中國文物時既喜又悲的矛盾心情。文化大革命的惡果激勵著馬承源從海外尋回文物，為上海建立一座世界級的博物館。如不然，他宣稱：「上愧對先人，下難向子孫交待。」¹²⁶ 毛時代的經歷在許多方面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馬承源積極發展政治關係，為博物館爭取到了城市中心的新址；今天的館藏分類也始於沈之瑜和馬承源在1970年的設計；當然，博物館的許多藏品都是政治運動的成果。¹²⁷

與中共一大會址一樣，上海博物館是一所長期舉辦各類展覽的機構。在毛澤東時代，上博的展覽敘述官方歷史、對比新舊中國、批判階級社會。但最重要的是，不管過去或現在，它的展覽都是圍繞古代文物，因此，上海博物館的案例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思路，探究中國傳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命運。博物館工作者在「破四舊」運動中對文物的捍衛與以文革為名的文物收集，為近年來的文革文化研究增添了一重物質文化的視角。例如，梅嘉樂就對海報藝術、宣傳音樂等文化產品進行了研究。這些學術探討表明，文革文化是現代化長期進程的一環，它有意識地融入了更多的中國傳統，而不只是流行說法中的反傳統主義。¹²⁸

2005)，頁12。其館藏文物近百萬件，包括青銅器、陶瓷、書法、繪畫、玉器、象牙、泥雕、彩繪竹雕木雕、甲骨龜甲、印章、家具等21個門類。

126 段煉等編，《往事與記憶》，頁5-6。

127 在鄭重《海上收藏世家》的序言中，上海博物館的汪慶正指出，有九成館藏是來自人民的。

128 Mittler, *A Continuous Revolution*. 與這種解讀形成對比的是，林毓生提出了「全面反傳統主義」(totalistic iconoclasm)的概念，這全盤否定了追溯至五四運動的歷史。參見 Yü-sheng Lin,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對於上海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而言，中國古代的文物始終都是革命敘事的一部分。從一開始，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就表明了文物存在的理由：沒有歷史的連續性，就沒有新文化。

上海博物館的故事不僅有助於我們理解文革，更揭示出毛時代中國在更長時期中的情況。雖然馬承源的口述歷史將解放時期稱為「一張白紙」，是建立「新型社會主義博物館」的契機，但現實要複雜得多。¹²⁹ 上海博物館由共產黨地下組織的藝術家建立，新一代的博物館人由老一代培養，它的館藏更是建立於過去的鑒賞基礎之上。與前幾代政權一樣，上海博物館的展覽都是當權國家的展覽。文物管理賦予了政權合法性，這種感受不只在1949年深切可感，在改革時代也同樣強烈，正如馬承源以及之前的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當他們目睹中國文物在國外展出時不禁感到一陣悲慟。裴宜理在分析早期中國共產黨的成功時表示：「文化民族主義始終是中國共產主義的基石與試金石」。¹³⁰ 上海博物館證明了這一觀點，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危機時刻也不例外。透過在革命中為革命收集古代文物，上海博物館繼續策展著中華民族。

129 段煉等編，《往事與記憶》，頁5–6。

130 Perry, *Anyuan*, 285.

結語

灰色的磚樓、乞討的破瓢、解剖的青蛙、工人身上的傷疤、奢華的裘皮大衣、宋代的瓷瓶——所有的這些物品，上海人在毛澤東時代的展覽中都見過。每一件物品都是一堂政治課，每一件物品都為革命而展出。灰磚建築是中共一大會址，從默默無聞中被發掘而出，成為中國共產黨建黨神話的標誌。乞討瓢是「舊社會」生活的殘跡，是對比過去的苦難與工人新村安穩生活的道具。在科學實驗中展示的青蛙，是為了讓孩子們相信世上沒有邪靈；真正的革命接班人要熱愛科學，破除迷信。策展人利用工人身上的傷疤，以個人故事述說階級苦難，階級地位在此得到了具體的體現。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模仿以前的展覽舉辦了自己的紅衛兵展，以裘皮大衣等沒收財物作為資本主義貪欲的證明。宋代瓷瓶在意義上的變遷，遵循了文物在毛時代及其後年代中所扮演角色的敘事弧線：它是古代民主精華的結晶，是階級社會的象徵，是最終回歸人民的古代勞動群眾的手工藝品，是在後毛澤東的改革時期培養觀眾審美意趣的藝術珍品。

這類策展都懷有政治目的，且往往是為配合當時的政治運動。1951年上海的《街道里弄居民生活手冊》指導幹部們要「胸有成竹」，要

有亟待實現的明確願景。¹ 就像鍾銀蘭手握畫筆，學習成為一名書畫鑒定家，策展人也懷竹在心，從物質現象中展望真理。儘管展覽傳達的信息看似清晰，儘管實物的展示更強化了敘述，但從本書可以看到，毛澤東時代的文化政治中存在重重矛盾。在中共一大會址，博物館工作人員努力追求歷史的準確性，但又不得不遵循「紅線」。在改造後的蕃瓜弄，精心策劃的社區化身中國工人階級的代表，特殊化的生活條件許諾了一個屬於所有人的社會主義未來。對反迷信展覽中的少先隊員而言，在毛澤東崇拜方興未艾的年代，科學教育者用對科學的信仰替換了另一種信仰。在階級教育展覽中，策展人努力刻畫一種潛藏暗處但注定滅亡的階級威脅。在這些展覽和紅衛兵展覽中，解說員們努力在觀眾中激發出恰當的感情，同時防止出現有違正統的解讀。文革期間，上海博物館的工作人員為了革命保護文物；而他們代表群眾進行的文物收集，最終服務於一個從未放棄文化民族主義的國家。在所有這些案例中，策展革命就是在努力應對毛時代的種種矛盾。

本書使用「策展」一詞指代舉辦展覽的所有階段，從收集物品到展示、敘述，再到展廳的各項儀式。將「策展」視為一個過程，可以闡明毛時代的中國如何透過這種多形式的媒介來完成宣傳的製造與消費。如同教科書和報紙、廣播和公告一樣，博物館同時展示文字和聲音。與繪畫和連環畫類似，展覽也是視覺性的，它將圖像與文物相結合。展廳也近似教室，是授課和學習的課堂。展覽與會議室或公共廣場也有相似之處，都是舉行政治儀式的場所。展覽的獨特之處在於，它以真實物品為基礎，以其他媒介所不具備的方式反映世界的真相。參觀者一旦學會將物品視為那個系統的一部分，就會將這套系統理解為整個外部世界（包括其中的所有實物）。透過策展的各個階段，革命都以物質形式體現，完成了實質的轉化。

1 《街道里弄居民生活手冊》，頁42–43。

策展收藏

策展始於收藏。這一過程在中共一大會址和上海博物館的例子中最為明顯，不論是過去或現在，它們的任務都是保管革命文物或古代文物。就中共一大會址而言，收藏工作包括收集數以萬計的革命文物，開展調查研究以定位、修復具有革命價值的遺址，並採訪數千名老幹部以搜集關於中共黨史的材料。就上海博物館而言，策展工作也始於艱苦的收集工作，無論是說服鑒賞家捐贈藏品，還是從廢品堆中拼湊青銅殘片，或是從沒收財產中揀選藝術品。革命持續不斷，收藏也堅持不懈，一大會址收集了文革時期的物品，上海博物館也收藏了上海人民公社的標牌。即使在不能展示某些物品的政治敏感時期，收藏也照行不誤：中共一大會址副主任任武雄研究不輟，只為等待「時機成熟」；上海博物館策展人鍾銀蘭也深切理解「當然這些都是文化遺產，都是重要的東西，怎麼重要，弄掉一件就沒有一件了」。²

收藏以及相關研究並不局限於博物館。帶著政治目的「胸有成竹」的展覽工作者，往往從分析群眾的思想入手。這種調查在反迷信展覽中體現得最為明顯，教師們在展覽中注意到了少先隊員中的迷信思想，並將學生們有關超自然現象的問題整理成清單。除了收集需要針對的觀點，策展人也收集材料。根據1961年對工廠展覽的指示，宣傳就是「放箭」，箭尖就是在研究過程中所收集的歷史資料。正如工廠宣傳員的提問：「材料從哪裏來？從群眾來，群眾中的哪一部分呢？主要是老工人（真正血統的產業老工人）……這些老工人始終是我們最好的活教材，因為在他的身上比較集中地體現了我們工人階級的優秀品質。」³在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運動展覽中，策展人深入群眾：階級教育展覽的工作人員採訪了階級敵人的受害者，而紅衛兵講解員也主張，在人們親耳聽到苦難的回憶時最能喚起觀眾的情感。

2 段煉等編，《往事與記憶》，頁66；2009年12月25日與鍾銀蘭在上海的採訪。

3 上海市檔案館C1-2-3596，頁46-52。

策展人所說的「材料」，既指文物，也指文物背後的故事。例如，根據上海農村階級教育展覽的採訪步驟清單，採訪者不僅要確定農民是否保留任何文物，也要收集相關敘述。採訪者需要詢問解放前後的生活，傾聽農民遭受壓迫的故事，觀察農民生活的轉變，啟發農民的階級意識，記錄農民的控訴。在這裏，收集就是在最基層創造歷史，歷史學家伍國將此描述為「一場試圖重建中國現代歷史敘事、讓工農群眾講述自身生活和歷史的基層文化運動」。⁴ 在本書中，對文物與故事最為全面的展示當屬蕃瓜弄，從「舊社會」的人力車到「新社會」的公寓樓，加上居民自己的故事，令展示臻於完整。還有什麼能比人們親口講述的真事更加真實的呢？

最後，收藏還以一種為政治運動收集罪證的形式現身。例如，階級教育展覽的策展人可以從國家機關獲取各種訊息，檔案館和公安局提供了從土地改革到「五反」運動的文件，法院則出借了過去案件中的文物和照片。⁵ 在政治運動中，革命材料往往就是為了控訴而收集。這種做法影響了後來的文革抄家。一旦發現某些物品——武器、國民黨旗、金條，就能證明屋主是階級敵人。紅衛兵各派利用展覽互相鬥爭，無論是親身捍衛藏品，還是利用反面展覽來詆毀對手，從中都可以看出材料的關鍵作用。收藏可以具有殺伐之氣，策展也是一種戰鬥之道。對於外灘上曾為前滙豐銀行看守門戶的石獅，上海文化局寫道：「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眾把這對銅獅押解來我館。讓它保存在這裏，永遠作為帝國主義侵華的罪證昭示後人。」⁶ 策展革命為實物賦予了發聲的權力。

4 Wu, "Recalling Bitterness," 246.

5 上海市檔案館 C4-2-1，頁 117–118。

6 鄭重，《海上收藏世家》，頁 217；段煉等編，《往事與記憶》，頁 19；上海市檔案館 B3-2-199，頁 10–14。

策劃展覽，策展敘事

如何讓文物發聲？儘管人們相信文物可以自我表達，但文物是經過挑選、組織後才變成展覽，再以文字敘述。正如沈之瑜在1960年對上博同事的演講中所說，博物館的教育任務是將感知提升到理性的高度。⁷對於第一項感知任務，毛時代中國的展覽呈現出多種形式。博物館中的展覽是正式展覽：在中共一大會址，參觀者可以觀賞油畫、查閱文件；在上海博物館，參觀者可以在簡易的玻璃展櫃中欣賞文物。相比之下，地方和基層的展覽往往只是在牆上張貼照片和圖畫。階級教育展覽和紅衛兵展覽則將日常用品擺放在蓋著布的桌子上，以便更好地將材料作為證據展示。不論哪種展覽，展品的選擇都必須慎之又慎；策展人被告誡不要傳達混雜的訊息。關於文物，沈之瑜在1964年寫道，如果文物的藝術成就並不明確，就不該展出，任何具有不良政治或社會影響的物品也不應該展出。⁸階級教育展覽的批評者曾警告策展人不要把物品擺得像百貨商店的商品或「廟宇裏的菩薩」，要利用物品本身的品質來達到展覽的政治目的。⁹

的確，藉助於物品和圖像，敘事可以躍然紙上。畫家李斌（1949年生）記得，當時他還是上海的一名小學生，和母親一起去參加當地文化宮舉辦的反間諜展覽。當時李彬太小，漢字認得不全，但他被圖像深深吸引。畫面中有個和他一樣的男孩，正注視著一個女人從老虎灶上取開水。只見她提水的動作舉重若輕，男孩感到十分奇怪，於是尾隨她回到家，發現了她膂力過人的秘密。「女人」摘下了假髮……原來她是一個男間諜！將近六十年後，李斌回憶道：「當時我嚇得汗毛直豎！現在回想起來，真像一部電影。共產黨真會辦事。」間諜被俘時的物品在玻璃

7 沈之瑜，〈學習毛澤東思想，提高文物、博物館工作中的政策性和思想性〉，頁6-7。

8 沈之瑜，〈上海博物館工作綱要〉，頁64。

9 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34，頁9。

櫃裏一一陳列：假髮、裙子和無線電發報機。對李斌而言，這次展覽改變了他對世界的看法：「我始終害怕間諜……我習慣了觀察身邊的女的，看看她們有沒有喉結！」¹⁰ 根據街道幹部手冊的標準——為觀眾帶來新的視角，這次展覽顯然大獲成功。

毛澤東時代的展覽講述了許多地方故事，並將它們與革命的主要敘事聯繫起來。中共一大會址是「我黨的誕生之地」，無論是實際上或想像中的朝聖，它都是中共黨史尋根的第一站。「紅線」是策展的指導原則，即依據毛澤東相關著作而書寫的中國歷史。儘管在毛澤東逝世後，陳列技術發生了改變，但「紅線」仍指導著歷史敘事。如中共一大會址的案例所示，敘事也起到了將革命本地化的作用，突出了上海在黨史中的地位。向下來到街道層面，蕃瓜弄的展示證明，個人敘事也與革命息息相關。例如王蘭花，她可以追溯家族發展史，從棚戶區的滾地龍，到擔任黨支部書記，再到她的孩子們在新中國的美好未來。延安根據地時期被視為對毛澤東思想的嚴峻考驗。政治學家阿普特 (David Apter) 和賽奇 (Tony Saich) 通過採訪在延安與毛澤東共事過的人，認為毛澤東精心構造了一種革命話語，透過解釋世界來改變世界。¹¹ 同樣，蕃瓜弄等地方展覽也鼓勵個人用革命的詞彙來書寫自己的人生歷史：解放前與解放後、站起來、「舊」社會與「新」社會。透過展覽，我們可以了解革命話語是如何滲透到最基層的。

毛澤東時代的古代敘事與革命敘事密不可分。上海博物館自1952年成立以來，一直將文物作為國家歷史的構成部分和社會主義當代的靈感源泉來展示。策展人們寫道，歷史文物的展示可以讓群眾吸收「古代

10 2013年7月10日與李斌在上海的採訪。沈麥克的著作附有一張反間諜展覽的照片，見Michael Schoenhals, *Spying for the People: Mao's Secret Agents, 1949–196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圖11。

11 David E. Apter and Tony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文化的精華，以提高民族自尊心，發展民族新文化」。¹²畢竟，正是革命保存了民族的文物；1959年上海博物館舉辦了「十年來上海文物、博物館事業成就展覽」，展覽表示只有在新中國，文物才得到保護，並得以向群眾展示。今天我們將上海博物館視為一座藝術博物館，但在毛澤東時代，這裏舉辦過各類展覽：黨史展、抗日戰爭展、1949年前後的上海展。¹³所有這些敘事——地方與民族、戰爭與革命、過去與現在——都可以在同一個機構中展示，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權合法性奠定了廣泛的基礎。在此背景下，上海博物館在文革期間的活動並不顯得突兀；從一開始，古代文物就是革命的組成部分。這並不意味著古代與革命之間的關係毫無齟齬。文物既是過去勞動階級的產物，也是階級壓迫者的奢侈用品；一幅畫可以反映文化的精髓，但一筆一畫卻又出自統治階級的藝術家之手；策展人或許是最優秀的專家，但他的階級背景可能不夠根正苗紅。在新中國，矛盾帶來新的融合，新文化建立在舊文化之上。

在革命和民族的敘事中，還有第三重敘事——階級敘事。即使是共青團的「熱愛科學、破除迷信」展覽，也是以階級的歷史為前提：在古代，人們不了解自然，於是編造出迷信；在階級社會，統治階級利用迷信壓迫人民；而在解放後，人民群眾可以超越古人的想像，用科學征服自然。透過本書第四章和第五章對階級教育展覽和紅衛兵展覽的案例研究，可以看出關於階級的敘事是如何在毛時代接連不斷的革命中產生的。這些敘事解釋了社會主義社會中階級為何持續存在：階級教育展覽支持毛澤東的號召，要不斷進行階級鬥爭，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紅衛兵展覽則證明隱藏的階級敵人已經找到，為紅衛兵的批鬥攻擊提供了正當理由。藉此，毛時代中國的展覽創造並強化了新與舊的階級敘事。

12 上海博物館編，《上海博物館陳列品說明書》，頁4。

13 〈今昔對比激發階級感情〉，《文匯報》，1964年2月16日，頁2。

所有這些敘事都必須借發聲來表達，方式通常是透過講解員的講述，在極少數情況下，比如文革期間的中共一大會址，則是藉助於錄音。本書展示出講解員如何仔細謹慎地撰寫講稿：在一大會址，不僅有針對國內和國外訪客的兩版講稿、預先準備的問答清單，還有關於何處應做強調以及何時轉移話題的指示。上海博物館退休官員的回憶文字講述了他們如何編寫講稿，又如何根據不同觀眾調整自己的解說詞。從始至終，講解員的階級地位都極其重要；在蕃瓜弄，只有被選中的模範人物才有望接待外賓代表團，而在階級教育展覽和紅衛兵展覽中，講解員的背景也必須無可指摘。在上海的階級教育展覽上，最優秀的講解員「一講到階級兄弟的仇和苦，就是自己的仇和苦……甚至激動地落下了眼淚」。¹⁴ 東方紅百貨中的一位紅衛兵所寫，只有「變成自己心裏要說的話」，才能真正駕馭文字。¹⁵ 在將感知上升為理性的過程中，情感的作用舉足輕重。

由於每場展覽都代表官方歷史與政治，每個敘事文本的政治內容都要接受審查，因此不可能存在其他的敘事。本書認為，非官方敘事只存在於邊緣。中共一大的革命敘事將毛澤東和建黨的重要性置於首要地位，其他人的作用遭到了壓制或完全的抹殺。蕃瓜弄是典範，但也是一個例外；上海其他大多數人，包括絕大多數蕃瓜弄的原住民，都不享受蕃瓜弄的生活條件。至於孩子們，即便是少先隊員，也可能在學校和在家中表現出對宗教的不同理解。雖然階級教育展覽和紅衛兵展覽似乎沒有遇到反對的聲音，但當時的評論和今天的回顧顯示，相比起憤怒，有些人更多是感到頭暈目眩，未能看清事實的全貌。如果說上海博物館的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篇拯救文物的英雄事跡，那麼被毀文物或失蹤文物的故事則隨著實物的散失也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14 上海市檔案館 C4-2-1，頁 93。

15 上海市檔案館 B123-6-1536，頁 15。

如果存在另一種展覽敘事，其部分內容可能封存在公安局的密封檔案中。1960年，在遠離上海的重慶市人民公社展覽館，一位參觀者寫道：

謝謝你們底熱情解說，可是這展覽會還是掩飾不了人民的災難——爺爺吃著火麻葉子，媽媽在旁邊流眼淚。幸好爺爺今年餓死了，不然還不知道要受好久的活罪。¹⁶

伍國等人認為，憶苦思甜以及整個1960年代初的歷史實踐，都是為了掩蓋大躍進的失敗。¹⁷ 上面這篇觀眾評論被標為「反動字句」，這不僅證實展覽是同謀，更表明一些參觀者也將展覽視為同謀。正如鄧騰克在研究當今博物館時的警語，我們不應該假定所有或很多參觀者都持懷疑態度，「如果忽視這些官方敘事及其說服力，我們就無法全面了解中國」。¹⁸ 對於許多毛時代展覽的參與者而言，從陪同費利克斯·比達·羅德里格斯參觀的王蘭花，到趕往收藏家的家中搶救文物的鍾銀蘭，這些敘述都是真實的。

策展儀式

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參觀展覽是一種儀式：參觀者在空間和時間中前行，他們聆聽講解並根據提示參與其中，有時還會在講解員的建議下抒發情感或呼喊口號。博物館和展覽廳都是一種儀式空間。雖然其正式程度取決於展覽的規模和範疇，但參觀者都遵循一條預先規定的模式與路徑，先從開場空間開始，也許引用一段毛澤東語錄或展示一尊毛

16 〈人民公社展覽館意見簿上發現反動字句〉，《敵社情簡報》，第10期（1960），頁1。四川省安仁鎮建川博物館聚落所藏文宣品。

17 Wu, "Recalling Bitterness," 250.

18 Denton, *Exhibiting the Past*, 267.

澤東半身像，然後蜿蜒穿過各個房間，聆聽講解員講述展品和圖像，最後總結陳詞，可能還包括齊聲高喊口號，或再次瞻仰毛澤東雕像。在廣泛的政治文化中，許多儀式人們早已熟練，在此背景下，這種跟隨講解員穿梭於展廳之間或聆聽展廳固定講解員的集體參觀儀式更加得以強化。從這一時期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參觀者的姿態。例如，在北京的中國革命博物館，少先隊員向國旗宣誓；孩子們抱膝而坐聆聽講解員的解說，仰起的臉龐隨著講解員的白色教棒轉動；人們圍在李大釗被施絞刑的腳手架旁，不禁垂下了雙眼。¹⁹ 本書中的例子也反映出這類官方的描述：上海階展之後的會議揭示出策展人精心策劃了觀眾的參與，並對其進行了細緻的觀察；紅衛兵展覽的檔案照片則展現出背誦《毛澤東語錄》的觀眾群體；上海的學生們也還記得在軍訓中向蕃瓜弄行軍的情景——一切都是對過去的朝拜。²⁰

對於這些精心策劃的敘述，其呈現方式也是一種儀式，是展覽的參與式宣傳的一部分。至少在地方展覽中，展品和故事都來源於群眾。在參觀過程中，講解員努力激發自己和觀眾的情感。有時，憶苦思甜的儀式由舊社會的親歷者來完成，比如蕃瓜弄的老工人站在滾地龍前，主動講述他們的辛酸往事。有時，講解員會複述他們從採訪中收集到的故事，將他們親眼目睹和親身經歷的情感傳遞出來。正如紅衛兵的報告所述，「感動」由兩個字組成，一是「感」（感情、情緒），代表說話者的感情，另一個是「動」（觸動、變化），代表受到觸動的聽者。²¹ 一場階級教育展覽成功與否的最好證明，就是參觀者是否受到感動，主動去憶苦思甜。在這樣的環境中，參觀者感受到參與展覽的壓力。在其他人高喊紅衛兵口號或重現抄家儀式的情形下，誰敢不高舉拳頭？

19 〈在中國革命博物館裏〉，《文物》，第10期（1964），頁3–20。

20 上海市檔案館C4-2-1，頁80；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40，頁3；2013年7月24日在上海的採訪。

21 上海市檔案館B123-6-1534，頁8。「感動」其實只應被說話者或聽者其中一方所感受到，而不涉及兩方。

策展儀式延伸到參觀結束後的活動。有時，參觀結束後會召開一次會議，讓參觀者公開反省自己的反應，甚至進行自我檢討。展覽的目的是讓觀眾成為老師：少先隊員會教導長輩丟掉代表迷信的香爐、工人父親用自己的舊勞動合同教育兒子、階級教育展覽的參觀者抄下講解文字給自己的工作單位上課。除了教學，策展革命還創造了政治行動的詞彙和全套技術。這在階級教育展覽和隨後的紅衛兵展覽中顯露無遺。二者左右開弓，階展告訴人們，要識別階級敵人，主要看他們藏匿的財產，紅衛兵展覽則將沒收財產展示出來；階級鬥爭持續不斷，造反也的確有理。政治運動展覽不僅培養觀眾用新的眼光看待世界，還為他們提供了控訴和批判的文本。展覽不僅是革命的教科書，也可以是革命的指導手冊。

在毛時代的中國，人們究竟有多積極參與展覽文化？有些人，尤其在早期，可能只是把參加展覽當作一種消遣。一位退休幹部（1950年生）曾在黑黢黢的教堂地下室裏看過槍枝、金條和美金，他對此記憶猶新，並且表示他母親的親戚就住在附近，一起吃完晚飯後，「我們就串門去看一眼」。²²紅衛兵展覽的參觀者可能也是為了看熱鬧。除了最基層的臨時展覽外，大多數展覽都需要預約購票，並和學校或單位一起參加。不過，即使觀眾是被強逼參與展覽，了解展覽內容也對他們有利無弊。一些上海階展的參觀者花費數小時抄寫展覽內容，之後再傳授給所在單位，並將其作為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範本。在政治局勢瞬息萬變的時代，展覽的內容尤為重要：它是受黨認可的最新文本，其語言也是為大眾量身定製的。1966年夏，上海階級教育展覽加上了文革的新內容，個人也要求參觀展覽，這表明他們由衷希望理解這場風譁雲詭的政治運動。參觀展覽就是學習腳本的一種方式。

22 2013年7月2日在上海的採訪。

社會主義博物館與新型展覽

新中國的策展人將博物館稱為「社會主義博物館」，強調其前所未有的屬性、意識形態功能及其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相比之前的博物館，社會主義博物館舉辦了更多的展覽，觸及了更多觀眾。1952年，上海博物館在介紹其館藏時表示，隨著1950年代初各種政治運動的開展，人民群眾具備了更高的政治覺悟和高漲的生產熱情，他們對教育和文化的需求也相應增加。²³ 在整個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博物館繼續為古代、民族、革命和新文化代言。即使在文革期間，宣傳材料也強調對文物的保護。1972年發行的一本小冊子收錄了國家文件，讚揚了1949年以來的文物工作，宣稱是「歷代勞動人民所創造的文化的精華」，將會創造出新的文化。²⁴ 在後毛澤東時代的改革時期，文化工作者手冊也強調了同樣的主題。在社會主義博物館中，展覽必須具有思想性、科學性和藝術性，同時反映發展規律，「使人民認識自己的歷史和創造力量」。²⁵

雖然提出了這些開創性的主張，但社會主義博物館其實與民國時期博物館具有頗多共通之處，儘管創館者們並不願承認。民國時期的博物館也將古物視為國寶。²⁶ 國民政府也展示革命，樹立紀念碑，陳列烈士遺物，頌揚開國國父。地方政府也利用博物館開展公眾教育。例如，上海市博物館就重點展示上海和國家的文物；²⁷ 民族博物館、革命博物館和地方博物館都以塑造民國公民為己任。與19世紀的歐洲博物館努力進行公眾教育一樣，上海市博物館也要求參觀者入館登記、使用禮貌

23 上海博物館編，《上海博物館陳列品說明書》，頁4。

24 《文物保護管理宣傳資料》（上海文物保管委員會，1972），頁1-4。

25 《文物工作手冊》，頁164。手冊涵括了直到1990年代初的文件，這句引文來自其中一份1979年的文件。

26 Wang, “The Qing Imperial Collection, Circa 1905–1925.”

27 上海市博物館編，《上海市博物館章則彙編》（上海市博物館，1936），頁1-2。

用語，並按規定路線列隊參觀。²⁸ 民國時期和社會主義時期的博物館都參與了當權國家的展覽文化，但中國共產黨更進一步。由於軍事上的勝利、控制權的鞏固以及對地方社會的滲透，中國共產黨得以將文化作為1949年後建設的關鍵要素：它吸收了原有博物館的藏品，控制了海關和市場，並指揮著所有的文化行業。新中國財富尚淺，但它已經手握權力，而這種權力正是利用文化為其服務所必需的條件。如果說民族和革命是政治合法性的兩大支柱，那麼面對台灣海峽對岸的對手時，共產黨便將這兩大支柱都展示出來。

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博物館與民國時期博物館的不同之處在於其意識形態。雖然意識形態的效力會隨時間而改變，但社會主義博物館旨在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應用於民族和革命之物。在許多方面，毛時代中國的展覽文化效仿了蘇聯的先例。蘇聯將保護歷史遺址歸功於紅軍，並迅速採取行動保護博物館；與蘇聯一樣，新中國在接管新的管轄區時，也調動解放軍並成立文物保管委員會。社會主義中國的文化官僚體制也與蘇聯保持一致；儘管博物館歸文化局管轄，但它們始終受到宣傳部的控制。在形式和陳列方面，中國的革命博物館也與蘇聯如出一轍，最明顯的是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斯大林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二者均為各自的展覽提供了綱要。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一樣，中國也採用了蘇聯展覽文化的原則和技術。例如，德國歷史博物館直接受到蘇聯的啟發，以人民博物館的形式展示來自人民的文物；該博物館於1952年開館，與上海博物館同年。²⁹ 越南革命博物館成立於1959年，與北京的中國革命博物館同年開館，時至今日，其敘事和文

28 參見Bennett, "The Exhibitionary Complex," 133–139；《上海市博物館要覽》，頁16。

29 Jon Berndt Olsen, *Tailoring Truth: Politicizing the Past and Negotiating Memory in East Germany, 1945–1990* (Berghahn Books, 2015). 德國統一後，德國歷史博物館 (Museum für Deutsche Geschichte) 將館藏轉移至新的德國歷史博物館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物展示仍保留了當時的風格。³⁰

由此可見，毛澤東時代的博物館追隨蘇聯，是為社會主義國家服務的展覽文化。這種共同的博物館學不僅以相似的方式展示相似的事物，而且還將歷史進程展示為社會主義原則的必然結果。華若璧將中國與其他國家社會主義的案例聯繫起來，認為毛澤東「將自己寫入歷史，使他自已、他的追隨者和他的『路線』成為歷史力量的必然結果，從而證明他的領導與黨的領導的正當性」。³¹ 這一歷史敘事就是中國社會主義博物館的敘事，無論是中共一大會址這樣的革命歷史博物館，還是如上海博物館一類的藝術博物館。由於當下也是歷史發展的產物，社會主義博物館與蕃瓜弄一樣，都是對當代成就的歌頌。同樣，中國也效仿了蘇聯的農業或基建發展展覽。³² 實際上在那個年代，「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蘇聯的成就展自然也在北京展出。³³ 然而，在蘇聯展覽文化中，有一個方面是社會主義中國並未效法的：雖然中國舉辦了反迷信展覽，有時也抨擊宗教人士，但並沒有建立任何反宗教博物館。³⁴

社會主義中國與民國模式、蘇聯模式的不同之處在於第二種展覽文化模式，即革命運動展覽。這種模式起源於土改運動中的「新展覽會」，它不僅僅是對階級鬥爭的展示，更是階級鬥爭的一個環節。新展覽會透過模擬階級鬥爭的儀式來策展革命；後來演變為紅衛兵展覽的階級教育展覽則是控訴與揭露的載體，並以其他宣傳媒介所不曾運用的方式，將

30 Tiên Dững Lê, ed., *Guidebook: Vietnam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National Museum of Vietnamese History, 2014), 70–194. 2011 年，越南革命博物館併入越南國家歷史博物館，正如北京的中國革命博物館現已與中國國家博物館合併。

31 Rubie S. Watson, ed., *Memory, History, and Opposition Under State Socialism*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1994), 2.

32 Sheila Fitzpatrick, *Everyday Stalinism: Ordinary Life in Extraordinary Times: Soviet Russia in the 1930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71; Petrone, *Life Has Become More Joyous, Comrades*, 155–156.

33 《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圖片介紹》（朝花美術出版社，1955）。

34 Smith, “Contentious Heritage,” 194, 196.

物質財富與階級聯繫起來。毛澤東宣稱，階級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長期存在，階級鬥爭也將長期存在，因此新型展覽成為不斷革命的一個部分。蘇聯之所以沒有舉辦類似的展覽，是因為其階級言論和譴責文化之間存在差異。菲茨派翠克 (Sheila Fitzpatrick) 和蓋拉特利 (Robert Gellately) 在談到歐洲現代史中的譴責現象時，將革命期間對敵人的集體公開譴責與個人自發向極權國家的檢舉指控區分開來。³⁵ 在中國的不斷革命中，批鬥始終會是集體的、公開的，看似自發，但往往是有組織的。在蘇聯，國家會根據郵寄的舉報信展開調查；而在中國，私人信件可以公開展示，供革命群眾攻擊和譴責。

展覽文化的革命模式借鑒了傳統的中國文化路數，這在中國的階級展示中最為明顯。³⁶ 蘇聯的博物館借用工具和文件，以馬克思主義語彙闡明生產資料的所有者，而中國的策展人則選擇以講述苦難、數說冤情算總賬的方式來展示階級。³⁷ 不僅傷疤與受傷的軀體歷歷在目，策展人還將剝削階級的財富換算為工農生存的必需品：一件裘皮大衣的價格等同於 120 名工人一年的生活用度。這些手法類似寺廟的列舉罪狀，像佛教的功過簿一樣細數罪行，毛時代的政治文化對於傳統形式的借鑒由此可見一斑。³⁸ 如安德訓所言，訴苦儀式可能起源於中國的鄉村文化，在這種儀式中，受害者往往當眾訴說冤屈，接受眾人的肯定或質疑。³⁹ 同

35 Sheila Fitzpatrick and Robert Gellately, eds., *Accusatory Practices: Denunciation in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1789–1989*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1–2.

36 關於傳統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參見 Joseph W. Esherick and Jeffrey N. Wasserstrom, “Acting Out Democracy: Political Theater in Moder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9, no. 4 (November 1990): 835–865。

37 蘇聯博物館學科學研究所編，《蘇聯博物館學基礎》，頁 307–308。我在 2015 年 4 月 5 日的河內胡志明博物館內觀察到了資產階級與農民貧富差距的差異。

38 參見 Anne Swann Goodrich, *The Peking Temple of the Eastern Peak* (Monumenta Serica, 1964), 248。廟中有一部分刻畫了一個「掌掠剩財物司」，罪人們手持珊瑚和金銀錠等貴重物品。

39 Anagnost, *National Past-Times*, 31.

吃憶苦飯則類似宗族儀式 (lineage ceremonies)，所有參與者一起食用具有象徵意義的食物。⁴⁰ 就連展示活人的想法也讓人聯想到帝制時代縣衙裏的場景：犯人脖子上套著沉重的枷項，或被關在籠子裏公開示眾，自生自滅。⁴¹ 在上海階級教育展覽中，一些參觀者的行為進一步表明了展覽與寺廟的相似之處；在展覽中，資本家在講解員和模範們的注視下渾身顫抖，恍若罪人置身於城隍廟神像之前。⁴² 在革命模式下，毛時代展覽文化的中國特色最為突出。

可見，毛時代中國的展覽文化以兩種模式運作：社會主義博物館和新型展覽，反映出當權國家和革命國家兩種不同的展覽實踐。政權合法化與群眾動員的模式可以重疊，事實也的確如此：比如中共一大會址變身文革宣傳物，或者一月風暴展覽取代了紅衛兵展覽。雖然二者的政治功能並不相同，但都具有群眾性。不同於民國時期的展覽，毛澤東時代的展覽立足草根。故事來自人民，雖然由官員策劃、由講解員敘述，但講述的真實性來自於傾聽當事人的故事。文物也來自群眾，無論是街道展覽還是階級教育展覽，也無論展品多麼微不足道：一個乞討瓢、一張身分證，甚至是身體上的一道傷疤。展覽雖然由黨指導，但這並不削弱宣傳的參與性——曾經的乞丐王蘭花提出了保留蕃瓜弄部分棚屋的建議，而陳佩芬和鍾銀蘭這兩位出身貧寒的年輕女性成了上海博物館的領導。如果說歷史由群眾創造，那麼革命則由人民策展。

40 參見 Jun Jing, *The Temple of Memories: History, Power, and Morality in a Chinese Villag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55–157.

41 關於這類刑罰，參見 Philip A. Kuhn,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7–22。

42 上海市檔案館 C4-2-1，頁 92。

毛時代展覽文化的遺存

在我們這個時代，很難再找到本書描述的毛時代展覽的痕跡。中共一大會址和上海博物館依然以機構的形式存在，但策展人在改革初期便致力於在展覽中還原歷史。蕃瓜弄的展覽一直接受學校參觀，直到1996年拆除，它所代表的對社會主義未來的憧憬也隨之破滅。⁴³ 儘管可以在網上買到階級教育展覽的文宣品，博客上也記錄了一些關於紅衛兵展覽的回憶，但與當時的政治運動聯繫最緊密的展覽在檔案館外幾乎沒有留下任何蹤跡。前文提過永安百貨的老闆、紅衛兵展覽的打擊對象郭琳爽，當被問及他的下落時，負責永安公司歷史的工作人員表示，並不清楚郭琳爽在社會主義改造之後的情況。這些曾為策展革命而精心保存的物品和歷史，大多已經消失殆盡或被刻意忘卻了。無論是舊社會還是新社會，這類物質文化都越來越少。

如果說毛時代的展覽文化有兩種模式，那麼今天的中國則主要採用當權國家的展覽文化，利用博物館來創造、反映官方敘事。在中共一大會址，常設展覽仍然以官方黨史為框架，宣揚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在蠟製群像中，毛澤東仍然佔據中心地位。上海博物館享譽世界，利用海外展覽宣傳中國的「燦爛歷史和民族文化」，實現了改革時代的目標。⁴⁴ 中國的展覽繼續描繪現代化與發展的敘事。與蕃瓜弄一樣，在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中國館，參觀者看到了家庭空間隨時間變遷在物質條件上的改善。博物館依然是政治合法性的儀式空間。1990年，江澤民主席在發表「愛國主義教育」和「社會主義教育」的講話時，選擇了北京的中國革命博物館作為背景，呼籲博物館承擔起責

43 關於拆除蕃瓜弄棚屋展覽的記錄，參見Wing-Chung Ho, “Building Up Modernity? The Changing Spatial Representations of State Power in a Chinese Socialist ‘Model Community,’” *Modern Asian Studies* 42, no. 6 (2008): 1146。

44 關於1984年的文化局通知，見《文物工作手冊》，頁168。

任。⁴⁵ 2012年，習近平主席也在中國國家博物館提出了他執政的標誌性口號「中國夢」。⁴⁶

一旦中國進入政治運動的模式，革命運動的展覽文化便會再次出現。例如，1989年天安門學生運動發生兩個月後，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舉辦了「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亂」展覽，每天接待超過三萬名參觀者。⁴⁷ 2000年，以氣功為旗號的組織法輪功被定性為邪教，此時反迷信展覽再次出現，警示人們法輪功的危害。⁴⁸ 在天安門事件和法輪功事件中，展覽都被用於控制敘述以及識別、壓制敵人。近年中國的反腐行動又復興了毛澤東時代的階級教育展覽。這些反腐倡廉展覽展示了沒收的酒水、宴會場景，以及抄寫在展板上的悔過書和認罪狀。參觀者不僅看到了罪行，還看到手銬、監獄模型所代表的懲罰。反腐倡廉展還加入了真人演示，既透過影片，也安排官員現場講述自己的故事。據報道，一些官員在參觀反腐展覽後深感愧疚，主動上繳了收受的賄賂，與當年參觀上海階級後懺悔的資本家如出一轍。⁴⁹ 但這些展覽與革命展覽文化並不完全一致。今天的展覽並非以革命為目的；展出的是國家的對頭，而非革命的敵人。

毛時代的展覽文化與當今中國展覽文化之間最明顯的區別，或許就是如今已沒有任何關於毛時代本身的展覽。在1950和1960年代，當代

45 〈江澤民同志通知參觀「中國革命史陳列」結束時的講話〉，頁2-3。

46 Kirk A. Denton, "China Dreams and the 'Road to Revival,'" *Origins: Current Event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ccessed September 30, 2016, <http://origins.osu.edu/article/china-dreams-and-road-revival>; Denton, *Exhibiting the Past*, 73-74.

47 徐運平，〈血寫的教科書：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亂展覽側記〉，《人民日報》，1989年9月1日，頁1。

48 建平，〈讓科學的光輝驅散「陰霾」〉，頁37-38。

49 Ma Xiaochun and Bianji, eds., "The Emerging Business of Anti-Corruption Shows," *People's Daily Online*, July 28, 2015, <http://en.people.cn/n/2015/0728/c90882-8927675.html>; Guizhou City News, "Anti-Corruption Exhibition a Spectacle of Shame, Confiscated Baijiu," *Global Times*, December 21, 2015, <https://www.globaltimes.cn/content/959732.shtml>.

歷史是展覽主題的核心，是策展人心中的頭等大事——利用過去服務現在；相比之下，今天的展覽則對革命小心翼翼。上海歷史博物館曾在東方明珠塔底策劃舉辦了一場展覽，展示民國時期的社會和文化生活，但對民國工人運動或中共的成立隻字未提。⁵⁰ 在2010年的上海世博會上，近代歷史從1978年開始，即中國改革開放的發端。在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新館介紹了毛澤東時代的成就，稱之為「社會主義建設」，卻沒有提及從土地改革到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政治運動，而在過去，這些運動正是「新型展覽」的素材。⁵¹ 除了中共領導人紀念館或雷鋒等社會主義模範紀念館之外，沒有一家官方博物館以毛澤東時代為展覽重點；近年來，一些私人博物館曾做出這類嘗試，但它們之所以能夠存在，也只是因為成功躲過了地方機構的審查。⁵² 出於多重原因，關於毛時代中國的展覽仍屬禁忌：它們會揭露毛時代政治運動的悲劇和暴力，可能引發關於個人和國家責任的問題，更可能挑戰黨的意識形態及其權力體系。畢竟，毛時代的展覽創造了敘事與觀點，調動了記憶與情感，動員觀眾成為革命的參與者，賦予物品以生命，既頌揚革命，又控訴革命的反對者。這些政治陳列展示了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其強大與脆弱皆一覽無餘。

50 2007年5月11日在上海與上海歷史博物館副館長房芸芳的採訪；Perry, “Shanghai’s Politicized Skyline,” 107。

51 Denton, *Exhibiting the Past*, 72–73.

52 Ho and Li, “From Landlord Manor to Red Memorabilia,” 30–31.

參考文獻

報章、檔案(按筆畫排序)

《人民日報》
《上海教育》
《工人造反報》
《內參選編》
《內部參考》
《文匯報》
《史林》
《申報》
《光明日報》
《東北日報》
《浙江日報》
《新民晚報》
《新聞日報》
《解放日報》
《解放軍畫報》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政治宣傳組。《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上海市文物圖書清理小組在市革命文物委員會的直接領導下已經真實成立，並開始工作》。未出版的宣傳單。1967年6月19日。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工作通訊》。內部文件。

北京造紙總廠首都職工革命造反者連總站。《關於保護古舊書刊、字畫的倡議書》。未出版的宣傳單。1967年2月15日。

東北人民政府衛生部編。《打破迷信》。1950年9月。

展覽文件、館藏(按筆畫排序)

上海市檔案館

北京市檔案館

黃浦區檔案館

閘北區檔案館

廣西壯族自治區檔案館

《上海市立博物館要覽》。1948年8月。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天津市紅橋區三條石歷史博物館階級教育展覽》。無日期。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雲南省階級教育展覽館內容簡介》。1966年1月。

《山東省階級教育展覽會會刊》。1964年10月。

山東省階級教育展覽會編。《不可忘記階級鬥爭：介紹山東省階級教育展覽會》。無日期。

《江蘇省階級教育展覽會說明書》。1965。

《武漢社會主義階級教育展覽會會刊》。1964年6月1日。

《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展覽會》。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1967。

《湖南省社會主義階級教育展覽會簡介》。1964年3月。

《廣州地區紅衛兵革命造反戰果展覽會》。1966年12月。

中文文獻(按筆畫排序)

丁大華。〈世所罕見的紅衛兵抄家戰果展覽會〉。《文史精華》，第1期(2008)，頁25–31。

丁裕國。〈上海貧富差距調查報告〉。2011年8月29日。<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100-480892.html>。訪問於2014年3月9日。

〈人民公社展覽館意見簿上發現反動字句〉。《敵社情簡報》，第10期(1960)，頁1。

《十萬個為什麼》。少年兒童出版社，1962。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破除迷信問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編。《上海的光輝革命史跡》。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

上海市徐匯區組織人民經濟生活工作組編。《居民生活服務手冊》。上海文化出版社，1960。

上海市博物館編。《上海市博物館章則彙編》。上海市博物館，1936。

- 〈上海市道教協會第二屆第二次理事會決議〉。《上海道教》，第2期（1991），頁1-2。
- 上海京劇團《海港》劇組編。《海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4。
-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上海永安公司的產生、發展和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 上海城市歷史發展陳列館有限公司編。《百年回味：上海城市歷史發展陳列館巡禮》。上海遠東出版社，2003。
- 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編。《上海革命史研究資料：紀念建黨70週年》。上海三聯書店，1991。
- 上海教育出版社編。《加強對青少年的階級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63。
- 上海通社編。《舊上海史料彙編》，兩卷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 上海博物館編。《上海博物館陳列品說明書》。上海博物館，1952。
- 。《過雲樓書畫集萃》。上海書畫出版社，2002。
- 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與世博：歷史紀錄（1851-1940）》。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2。
- 。《老上海風情錄：建築尋夢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
- 〈中央工委關於阻止毀壞古書古籍的指示〉，1947年7月10日。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中央檔案館編研部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49-1956》。學習出版社，1996。
- 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編。《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議實錄》。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1935。
- 中央宣傳部辦公廳編。《黨的宣傳工作文件選編》，四卷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
- 〈中央宣傳部關於收集革命文物的通知〉，1949年10月11日。中央宣傳部辦公廳編，《黨的宣傳工作文件選編》，四卷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
- 〈中央關於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地址保存問題給上海市委的指示〉，1951年7月3日。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中央檔案館編研部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49-1956》。學習出版社，1996。
-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上海市文物局編。《中國共產黨早期在上海史跡》。同濟大學出版社，2013。
-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上海毛澤東舊居編。《毛澤東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

-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市閘北區委員會編。《上海改革開放二十年系列叢書：閘北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8。
-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收回文化大革命期間散失的珍貴文物和圖書的規定〉（1980年6月4日）。《幹審工作政策文件選編》（黨建讀物出版社，1993）。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CD-ROM。
- 中共中央宣傳部編。《宣傳動態（選編）：1980》。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 。《宣傳動態（選編）：1983》。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 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中央檔案館編研部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四卷本。學習出版社，1996。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重慶市委員會學習及文史委員會編。《重慶文史資料》，第二輯。重慶出版社，1999。
-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址紀念館編。《看革命文物，學革命傳統》。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1。
- 中國革命博物館編。《解放區展覽會資料》。文物出版社，1988。
- 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陳列部。〈黨史陳列的幾個問題〉。《黨史研究資料》，第6期（1979），頁122-129。
- 文化部文物管理局編。《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第一批文物保護單位名單匯編》。文物出版社，1958。
- 《文物工作手冊》。上海文物管理委員會，無日期。
- 《文物保護管理宣傳資料》。上海文物保管委員會，1972。
- 《文物商店工作手冊》。中國文物商店總店，1981。
- 毛澤東主義學校紅衛兵。〈破舊立新一百例〉（1966）。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CD-ROM。
-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 王冶秋。〈蘇聯國立革命博物館〉。《文物參考資料》，第10期（1950），頁66-77。
- 〈北京市古書文物清理小組關於挑選古舊書刊標準的意見〉。1967年6月。北京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北京志·文物卷·文物志》。北京出版社，2006。

- 光勤。〈洗後望贈我一張〉。《魯迅研究動態》，第1期（1989），頁24-31。
- 向達。〈為文物請命〉。《中建半月刊》，第3卷，第6期（1948），頁8。
- 〈在中國革命博物館裏〉。《文物》，第10期（1964），頁3-20。
- 江怡、邵有民編。《中共上海黨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
- 〈江澤民同志參觀「中國革命史陳列」結束時的講話〉。《黨史研究資料》，第9期（1990），頁2-3。
- 〈江蘇革命博物館籌備處徵集細則〉。《上海特別市教育局教育週報》，第4期（1929），頁7-8。
- 何曉倩。〈我們行走在南京路上〉。少年兒童出版社編，《新上海的故事》。少年兒童出版社，1964。
- 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CD-ROM。
- 李果河。〈我成了「活人展覽」的展品〉。《炎黃春秋》，第1期（2012），頁58-60。
- 李恩傑、王光彥導演。《一貫害人道》。中央電影局北京電影製片廠，1952。
- 李純康。〈上海的博物館〉。《旅行雜誌》，第22卷，第7期（1948），頁23-24。
- 李蓉蓉編。《寧靜的輝煌：上海博物館新館陳列設計解析》。文物出版社，2005。
- 李遜。《文革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兩卷本。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
- 杜學峰。〈「文革」的「活人展覽」〉。《鐘山風雨》，第2期（2010），頁49。
- 杜興。〈「破四舊」展覽記〉。《時代教育》。2010年1月。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iquing/xiaohua/detail_2012_07/04/15759320_0.shtml。訪問於2016年9月30日。
- 沈之瑜。〈一大會址是怎樣找到的〉。陳秋輝編，《沈之瑜文博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上海博物館工作綱要〉。陳秋輝編，《沈之瑜文博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博物館學概論〉。陳秋輝編，《沈之瑜文博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學習毛澤東思想，提高文物、博物館工作中的政策性和思想性〉。陳秋輝編，《沈之瑜文博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懷念陳毅同志對文博事業的巨大關懷〉。陳秋輝編，《沈之瑜文博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沈怡。〈工程師與地方古跡〉。《工程：中國工程師學會會刊》，第16卷，第2期（1943），頁23–24。
- 肖鳴、心得、葆元編。《講科學破迷信》。山東人民出版社，1963。
- 孟醒。《誰主沉浮：中共一大代表沉浮錄》。人民出版社，2009。
- 河北人民出版社編。《農村美術手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75。
- 金大陸。《非常與正常：上海「文革」時期的社會生活》，兩卷本。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
- 金鼎。〈不倒的龍華塔〉。陳鵬舉編，《收藏歷史》。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
- 長庚。《講科學破迷信》。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64。
- 阿勵編。《上海的故事》。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3。
- 建平、少真、東輝。〈讓科學的光輝驅散「陰霾」〉。《黨建雜誌》，第5期（2000），頁37–38。
- 段煉、宋時娟、陳凌編。《往事與記憶：上海地區博物館、紀念館口述訪談錄》。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
- 洪宏。〈郭琳爽和上海永安公司〉。柳渝編，《中國百年商業鉅子》。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 科學普及出版社編繪。《破除迷信掛圖》。科學普及出版社，1965。
- 紅衛兵電影製片廠一革命群眾。〈上海紅衛兵革命造反展覽會徵集文化大革命重要文獻〉。《文藝戰報》，第36期（1967），頁4。
- 胡杰導演。《我雖死去》。dGenerateFilms，2007。DVD。
- 范敬宜、張春生、徐玉麟、單霽翔編。《文物保護法律指南》。中國城市出版社，2003。
- 倪興祥。〈貫徹「以物代史」陳列指導思想的體會〉。《中國博物館通訊》，第9期（2000），頁6–8。
- 孫武編。《談天說地破迷信》。天津人民出版社，1964。
- 宮川寅雄。〈紅衛兵與文物〉。伊藤武雄編，《外國人看文化大革命》。大生出版社，1969。
- 容庚。《金文編》。中華書局，1985。
- 徐孝穆。〈上海博物館舉辦「從廢銅中搶救文物展覽」〉。《文物參考資料》，第4期（1957），頁45。
- 海楓。《廣州地區文革歷程述略》。友聯研究所，1971。

- 《破除林彪，「四人幫」的現代迷信》。人民出版社，1978。
- 袁同禮。〈抗戰期中我國博物館之動態與前途〉。《中國博物館協會會報》，復刊，第1卷，第1期（1941），頁2-4。
- 馬承源、黃宣佩、李俊杰編。《上海文物博物館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
- 《偉大的一月革命勝利萬歲展覽會》。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1968年8月。
- 張行。〈博物館科普教育功能探討〉。《絲綢之路》，第6期（1995），頁54-55。
- 張笑川。《近代上海閘北居民社會生活》。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
- 戚文娟。〈上海文物整理倉庫的歷史功績〉。《上海文化史志通訊》，第33期（1994），頁74-75。
- 戚本禹。〈回憶江青同志〉。復興網。2015年7月30日。www.mzfxw.com/c/action/ShowInfo.php?classid=18&cid=44595。訪問於2016年6月2日。
- 。《戚本禹回憶錄》。中國文革歷史出版有限公司，2016。
- 〈戚本禹在故宮的講話〉（1966年12月1日）。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CD-ROM。
- 〈戚本禹與圖書文物考古博物館等單位革命造反派代表座談〉（1967年1月27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首長講話彙編》（1967年4月）。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CD-ROM。
- 梁丹。〈北京博物館工作紀事〉。《中國博物館》，第1期（1994），頁88-95。
- 許漢輝、黃富廂、洪碧榮。〈上海市閘北區蕃瓜弄改建規劃設計介紹〉。《建築學報》，第2期（1964），頁20-22。
- 郭天成、曹一丁、錢學忠編。《閘北區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
- 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三聯書店，2005。
- 陳志強。《文博先驅：沈之瑜傳》。上海文化出版社，2011。
- 陳沛存、任銳。〈建館四十年之回顧〉。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編，《上海革命史資料與研究》，卷一。開明出版社，1992。
- 陳映芳編。《棚戶區：記憶中的生活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社會空間結構與城市貧困——1949年後的上海棚戶區〉。中國城市與區域研究中心，香港浸會大學學術論文集，第80期，2008年2月。
- 陳端志編。《博物館學通論》。上海博物館，1936。
- 。《博物館》。商務印書館，1937。

- 陳燮君編。《上海博物館珍品》。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 陳鵬舉編。《收藏歷史》。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
- 陸建雲。〈鄰居聚會〉。2012年2月25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27a6cc01011dqp.html。訪問於2014年3月9日。
- 〈博物館界〉。《中國博物館協會會報》，第2卷，第3期（1937），頁11–21。
- 湯志鈞。《戊戌時期的學會和報刊》。台灣商務印書館，1993。
- 華辛。〈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毛澤東在上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
- 《街道里弄居民生活手冊》。新聞日報出版社，1951。
- 費利克斯·比達·羅德里格斯著、趙金平譯。《中國人民的手》。作家出版社，1964。
- 費欽生。《六十年陳列藝術之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馮丹楓、茅伯科、翁長松、黃龍珍。〈從青銅器看吃人的「禮治」：上海博物館青銅器陳列室巡禮〉。《學習與批判》，第6期（1974），頁23–24。
- 馮梅春。〈蕃瓜弄的變遷〉。政協上海市閘北區委員會、政協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上海文史資料選輯：閘北卷》。上海政協文史資料編輯部，2004。
- 黃碧。〈龍華古塔的青春〉。《旅行家》，第3期（1956），頁20–21。
- 黃龍保、顏曉峰編。《中國歷代反對迷信縱橫談》。學習出版社，1999。
- 新華通訊社。《決不允許開歷史倒車：曲阜人民揭發批判孔府罪惡》。人民美術教育出版社，1974。
- 楊耀健。〈守衛造反展覽〉。《紅岩春秋》，第1期（1968），頁40–42。
- 葉永烈。〈中共之初的追尋：訪沈之瑜同志〉。陳秋輝編，《沈之瑜文博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董庭芝、章祖蓉。〈關於中共「一大」代表人數的幾種說法〉。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編，《黨史研究資料：第一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 靳邊。〈蕃瓜弄的今昔〉。上海人民出版社編，《上海的故事》，第四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 廣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廣州市志》。廣州出版社，1999。
- 蔡豐明、張麗麗編。《民俗上海：閘北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
- 衛東風。〈另類的展示：文革時期展覽活動案例分析〉。《大眾文藝》，第9期（2009），頁98–100。
- 諸民誼。《行政院文物保管委員會年刊》。行政院文物保管委員會，1941。

- 鄭重。《博物館與收藏家》。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
- 。《海上收藏世家》。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
- 。〈鍾銀蘭的書畫鑒定生涯〉。《文物天地》，第3期（2006），頁48–53。
- 黎明。〈上海博物館對工人觀眾進行講解的幾點經驗〉。《文物參考資料》，第2期（1956），頁63–64。
- 韓英傑。〈上海老城隍廟〉。《旅行家》，第11期（1959），頁34–36。
- 羅定江。〈介紹月亮展覽會〉。《科學大眾》，第6期（1952），頁172–175。
- 〈關於保護國家財產，節約鬧革命的通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關文件彙集》，第2期（1967年6月）。宋永毅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CD-ROM。
- 〈關於黨的誕生日的公開宣傳〉。中共中央宣傳部編，《宣傳動態（選編）：1980》。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 蘇聯博物館學科學研究所編。《蘇聯博物館學基礎》。文物出版社，1957。
- 《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圖片介紹》。朝花美術出版社，1955。
- 顧冠英編。《中華全國名勝古跡大觀》。大陸圖書公司，1921。
- 顧炳權編。《上海風俗古跡考》。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

英文文獻（按字母排序）

- Anagnost, Ann. *National Past-Times: Narrative, Representation, and Power in Modern Ch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Antonioni, Michelangelo, dir. *Cina*. Rai Trade, 2007.
- Apter, David E., and Tony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Ba Jin. "A Cultrev Museum." In *Seeds of Fire: Chinese Voices of Conscience*, edited by Geremie Barmé and John Minford. Hill and Wang, 1988.
- Baum, Richard. *Prelude to Revolution: Mao, the Party, and the Peasant Question, 1962–66*.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 , and Frederick C. Teiwes. *Ssu-Ch'ing: The Socialist Education Movement of 1962–1966*.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8.
- Bennett, Tony. "The Exhibitionary Complex." In *Culture/Power/History: A Rea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edited by Nicholas B. Dirks, Geoff Eley, and Sherry B. Ortn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Bergère, Marie-Claire. *Shanghai: China's Gateway to Modernity*. 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Blake, C. Fred. *Burning Money: The Material Spirit of the Chinese Lifeworld*.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1.
- Brady, Anne-Marie. *Making the Foreign Serve China: Managing Foreigner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 Braester, Yomi. *Painting the City Red: Chinese Cinema and the Urban Contract*.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Brown, Jeremy. *City Versus Countryside in Mao's China: Negotiating the Divi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 "Moving Targets: Changing Class Labels in Rural Hebei and Henan, 1960–1979." In *Maoism at the Grassroots: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Era of High Socialism*, edited by Jeremy Brown and Matthew D. Johns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 and Matthew D. Johnson, eds. *Maoism at the Grassroots: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Era of High Socia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Chan, Anita, Richard Madsen, and Jonathan Unger. *Chen Village: 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ty in Mao's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 Chen, Janet Y. *Guilty of Indigence: The Urban Poor in China, 1900–1953*.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 Chen, Ruoxi. *The Execution of Mayor Yin and Other Stories from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Nancy Ing and Howard Goldblatt.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revised ed., 2004.
- Chen, Xiaomei. "Performing the 'Red Classics': From The East is Red to The Road to Revival." In *Red Legacies in China: Cultural Afterlives of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edited by Jie Li and Enhua Zhang. Asia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2016.
- Chen, Yunqian. "Local Exhibitions and the Molding of Revolutionary Memory (1927–1949)."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47, no. 1 (2013): 29–52.
- Cheng, Nien.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Penguin Books, 1988.
- Clark, Paul.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Clunas, Craig.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Polity Press, 1991.
- Coble, Parks M., Jr. *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n's New Order: The Occupied Lower Yangzi, 1937–194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 .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0.
- Compton, Boyd, trans. *Mao's China: Party Reform Documents, 1942–44*.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2.

- Corney, Frederick C. *Telling October: Memory and the Making of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 Cultural Revolution Video Collection. *Decade in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Fairbank Collection, Fu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DVD (VHS Tape Transfer), ca. 1978.
- David-Fox, Michael. *Showcasing the Great Experiment: Cultural Diplomacy and Western Visitors to the Soviet Union, 1921–194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DeMare, Brian James. *Mao's Cultural Army: Drama Troupes in China's R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 Denton, Kirk A. *Exhibiting the Past: Historical Memory and the Politics of Museums in Postsocialist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4.
- . "China Dreams and the 'Road to Revival.'" Origins: Current Event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ccessed September 30, 2016. <http://origins.osu.edu/article/china-dreams-and-road-revival>.
- Diamond, Norma. "Model Villages and Village Realities." *Modern China* 9, no. 2 (April 1983): 163–181.
- 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G. Walder. "Local Politic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anjing Under Military Contro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0, no. 2 (May 2011): 425–447.
- Elleman, Bruce A. *Diplomacy and Deception: The Secret History of Sino-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s, 1917–1927*. M. E. Sharpe, 1997.
- . *Moscow and the Emergence of Communist Power in China, 1925–30: The Nanchang Uprising and the Birth of the Red Army*. Routledge, 2009.
- Elliott, Jeannette Shambaugh, and David Shambaugh. *The Odyssey of China's Imperial Art Treasur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
- Esherick, Joseph W., and Jeffrey N. Wasserstrom. "Acting Out Democracy: Political Theater in Moder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9, no. 4 (November 1990): 835–865.
- Eustace, Nicole, Eugenia Lean, Julie Livingston, Jan Plamper, William M. Reddy, and Barbara H. Rosenwein. "AHR Conversation: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Emotion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7, no. 5 (December 2012): 1487–1531.
- Feng, Xiaocai. "Rushing Toward Soci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ath of Private Business Enterprises in Shanghai, 1949–1956."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60: An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edited by William C. Kirby. Asia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2011.

- Fernsebner, Susan R. "Objects, Spectacle, and a Nation on Display at the Nanyang Exposition of 1910." *Late Imperial China* 27, no. 2 (December 2006): 99–124.
- Fitzpatrick, Sheila. *Everyday Stalinism: Ordinary Life in Extraordinary Times: Soviet Russia in the 1930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 and Robert Gellately, eds. *Accusatory Practices: Denunciation in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1789–1989*.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 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Vintage Books, 2nd ed., 1995.
- Friedman, Edward, Paul G. 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 *Revolution, 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Village China*.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Gao, Mobo. *The Battle for China's Past: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luto Press, 2008.
- Gao, Yuan. *Born Red: A Chronicl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Gerth, Karl. "Wu Yunchu and the Fate of the Bourgeoisie and Bourgeois Lifestyles Under Communism." In *The Capitalist Dilemma in China's Communist Revolution*, edited by Sherman Cochran.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2014.
- Goodrich, Anne Swann. *The Peking Temple of the Eastern Peak*. Monumenta Serica, 1964.
- Goossaert, Vincent, and David A. Palmer.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 Gross, Miriam. *Farewell to the God of Plague: Chairman Mao's Campaign to Deworm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
- Guizhou City News. "Anti-Corruption Exhibition a Spectacle of Shame, Confiscated *Baijiu*." *Global Times*. December 21, 2015. <https://www.globaltimes.cn/content/959732.shtml>.
- Guy, R. Kent.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r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7.
- Harrison, Henrietta.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 "A Penny for the Little Chinese: The French Holy Childhood Association in China, 1843–1951."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3, no. 1 (February 2008): 72–92.
- Henriot, Christian. "A Neighbourhood Under Storm: Zhabei and Shanghai Wars." *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9, no. 2 (2010): 291–319.

- Henriot, Christian. "Slums, Squats, or Hutments? Constructing and Deconstructing an In-Between Space in Modern Shanghai (1926–65)."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7, no. 4 (2012): 499–528.
- Hershatter, Gail. *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 Hess, Christian. "Revolutionary Real Estate: Envisioning Space in Communist Dalian." In *Visualizing Modern China: Image, History, and Memory, 1750–Present*, edited by James A. Cook, Joshua Goldstein, Matthew D. Johnson, and Sigrid Schmalzer. Lexington Books, 2014.
- Hinton, William.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Vintage Books, 1966.
- Ho, Dahpon David. "To Protect and Preserve: Resisting the Destroy the Four Olds Campaign, 1966–1967."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edited by Joseph W. Esherick, Paul G. Pickowicz, and Andrew G. Walde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Ho, Denise Y. "Reforming Connoisseurship: State and Collectors in Shanghai in the 1950s and 1960s."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7, no. 4 (2012): 608–637.
- . "From Confiscation to Collection: The Objects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History and Material Culture*, edited by Sarah Carter and Ivan Gaskel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 , and Jie Li. "From Landlord Manor to Red Memorabilia: Reincarnations of a Chinese Museum Town." *Modern China* 42, no. 1 (2016): 3–37.
- Ho, Wing-Chung. "Building Up Modernity? The Changing Spatial Representations of State Power in a Chinese Socialist 'Model Community.'" *Modern Asian Studies* 42, no. 6 (2008): 1137–1171.
- . *The Transition Study of Postsocialist China: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a Model Community*. World Scientific, 2010.
- , and Petrus Ng. "Public Amnesia and Multiple Modernities in Shanghai: Narrating the Socialist Future in a Former Socialist 'Model Communit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7, no. 4 (August 2008): 383–416.
- Honig, Emily.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Hung, Chang-tai. *Mao's New Worl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 Jing, Jun. *The Temple of Memories: History, Power, and Morality in a Chinese Villag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Jolles, Adam. "Stalin's Talking Museums." *Oxford Art Journal* 28, no. 3 (October 2005): 429–455.

- Kamm, John. "Shanghaied at the Feather and Down Minifair." In *My First Trip to China: Scholars, Diplomats, and Journalists Reflect on their First Encounters with China*, edited by Kin-ming Liu. East Slope Publishing Limited, 2012.
- Karlsogdt, Elizabeth Campbell. *Defending National Treasures: French Art and Heritage Under Vich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Knight, Sophia. *Window on Shanghai: Letters from China, 1965–67*. Deutsch, 1967.
- Koloskvoa, T. G. "Central Museum of V. I. Lenin." In *Museums in Revolution: Four Historical Museums in Moscow*, edited by Marien van de Heijden. Stichting beheer IISG, 1998.
- Kotkin, Stephen. *Magnetic Mountain: Stalinism as a Civiliz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 Kraus, Richard Curt. *Class Conflict in Chinese Soci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 Kuhn, Philip A.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Lai, Delin. "Searching for a Modern Chinese Monument: The Design of the Sun Yat-sen Mausoleum in Nanjing."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64, no. 1 (March 2005): 22–54.
- Lao Sheh. *Dragon Beard Ditch: A Play in Three Acts*. Translated by Liao Hung-y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6.
- Lê, Tiên Dũng, ed. *Guidebook: Vietnam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National Museum of Vietnamese History, 2014.
- Lee, Haiyan. *The Stranger and the Chinese Moral Imagin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Leese, Daniel. *Mao Cult: Rhetoric and Ritual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Leighton, Christopher R. *The Revolutionary Rich: Political Fortune and Red Capitalism in China, 1949–1979*. Forthcoming.
- Leonova, Olga. *Museums of the U.S.S.R.*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39.
- Leys, Simon. *Chinese Shadows*. Penguin Books, 1974.
- Li, Jie. *Shanghai Homes: Palimpsests of Private Lif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 Li, Kwok-sing, comp. *A Glossary of Political Term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ranslated by Mary Lok.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95.
- Li, Zhensheng. *Red-Color News Soldier: A Chinese Photographer's Odyssey Throug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haidon Press, 2003.

- Liang, Samuel Y. "Amnesiac Monument, Nostalgic Fashion: Shanghai's New Heaven and Earth." *Wasafiri* 23, no. 3 (2008): 47–55.
- Lifton, Robert Jay. *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 W. W. Norton, 1963.
- Lin, Yü-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 Lu, Di Yin. "Seizing Civilization: Antiquities in Shanghai's Custody, 1949–1996."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2012.
- Lu, Hanchao. *Beyond the Neon Lights: 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 Lu, Tracey L.-D. *Museums in China: Materialized Power and Objectified Identities*. Routledge, 2014.
- Ludden, Yawen. "Making Politics Serve Music: Yu Huiyong, Composer and Minister of Culture." *TDR: The Drama Review* 56, no. 2 (Summer 2012): 152–168.
- Ma, Xiaochun, and Bianji, eds. "The Emerging Business of Anti-Corruption Shows." *People's Daily Online*. July 28, 2015. <http://en.people.cn/n/2015/0728/c90882-8927675.html>.
-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an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Frederick A. Praeger, 1960.
- .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Mao, Zedong. "On Practice." In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Vol. VI: The New Stage, August 1937–1938*, edited by Stuart R. Schram. M.E. Sharpe, 2004.
- . "On New Democracy." In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Vol. VII: New Democracy, 1939–1941*, edited by Stuart R. Schram. M.E. Sharpe, 2005.
- Mariani, Paul P. *Church Militant: Bishop Kung and Catholic Resistance in Communist Shanghai*.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Matten, Marc Andre, ed. *Places of Memory in Modern China: History, Politics, and Identity*. Brill, 2012.
- McClellan, Andrew. *Inventing the Louvre: Art, Politic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useum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 McDougall, Bonnie S. *Mao Zedong's "Talks at the Yan'an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 A Translation of the 1943 Text with Commentar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0.

- Meyer-Fong, Tobie. *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Mitchell, Timothy. *Colonising Egyp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 Mittler, Barbara. *A Continuous Revolution: Making Sense of Cultural Revolution Culture*. Asia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2012.
- Munro, Donald J. "Egalitarian Ideal and Educational Fact in Communist China." In *China: Management of a Revolutionary Society*, edited by John M. H. Lindbeck.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1.
- . *The Concept of Man in Contemporary China*.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 Naquin, Susan. "True Confessions: Criminal Interrogations as Sources for Ch'ing History." *National Palace Museum Bulletin (Taipei)* 11, no. 1 (March–April 1976): 1–17.
- Nedostup, Rebecca. *Superstitious Regimes: Relig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Modernity*. Asia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2009.
- . *New Archaeological Finds in China: Discoverie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2.
- Nora, Pierre.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Representations*, no. 26 (Spring 1989): 7–24.
- Olsen, Jon Berndt. *Tailoring Truth: Politicizing the Past and Negotiating Memory in East Germany, 1945–1990*. Berghahn Books, 2015.
- Pantsov, Alexander V., and Steven I. Levine. *Mao: The Real Story*. Simon & Schuster, 2012.
- Perry, Elizabeth J.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 "Moving the Masses: Emotion Work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bilization* 7, no. 2 (June 2002): 111–128.
- . "Shanghai's Politicized Skyline." In *Shanghai: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for Modern China*, edited by Peter G. Rowe and Seng Kuan. Prestel, 2004.
- .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 , and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estview Press, 1997.
- Petrone, Karen. *Life Has Become More Joyous, Comrades: Celebrations in the Time of Stal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 Sang, Ye. *China Candid: The People on the People's Republic*, edited by Geremie R. Barmé, and Miriam La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 Scarlett, Zachary A. "China After the Sino-Soviet Split: Maoist Politics, Global Narratives, an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World." PhD diss.,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2013.
- Schmalzer, Sigrid. "Speaking About China, Learning from China: Amateur China Experts in 1970s America."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16, no. 4 (Winter 2009): 313–352.
- . *The People's Peking Man: Popular Science and Human Ident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 . *Red Revolution, Green Revolution: Scientific Farming in Socialist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 Schoenhals, Michael. *Doing Things with Words in Chinese Politics*.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2.
- . *Spying for the People: Mao's Secret Agents, 1949–196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 Schram, Stuart R.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Praeger, 1963.
- , ed. *Chairman Mao Talks to the People: Talks and Letters, 1956–1971*. Pantheon Books, 1974.
- Schwarcz, Vera. *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 Conversations with Zhang Shenfu*.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Semyonova, Natalya, and Nicolas V. Iljine, eds. *Selling Russia's Treasures: The Soviet Trade in Nationalized Art, 1917–1938*. Translated by Andrew Bromfield and Howard M. Goldfinger. Abbeville Press, 2013.
- Shao, Qin. "Exhibiting the Modern: The Creation of the First Chinese Museum, 1905–1930." *The China Quarterly* 179 (September 2004): 684–702.
- Shapiro, Judith. *Mao's War Against Nature: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Smith, Stephen A. *Like Cattle and Horses: Nationalism and Labor in Shanghai, 1895–1927*.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 "Local Cadres Confront the Supernatural: The Politics of Holy Water (Shenshui) in the PRC, 1949–1966." In *The History of the PRC (1949–1976)*, edited by Julia Strau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 "Contentious Heritage: The Preservation of Churches and Temples in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Russia and China." *Past and Present* 226, supplement 10 (2015): 178–213.
- . "Redemptive Religious Societies and the Communist State, 1949 to the 1980s." In *Maoism at the Grassroots: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Era of High Socialism*, edited by Jeremy Brown and Matthew D. Johns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Snow, Edgar. *Red China Today: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Penguin Books, 1970.
- Sowerby, Arthur de Carle. "The History of the Shanghai Museum (R.A.S.)." *Journal of the North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65 (1934): 3–10.
- Stalin, Joseph.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s): Short Course*.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9.
- Su, Yang. *Collective Killings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 U.S. Consulate, 1950–1973.
- Tang, Xiaobing. *Visual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Paradigms and Shif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 The Associated Press. "Ma Chengyuan, 77, President of Shanghai Museum, Dies."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5, 2004. <https://www.nytimes.com/2004/10/15/arts/ma-chengyuan-77-president-of-shanghai-museum-dies.html>.
- Tian, Xiaofei. "The Making of a Hero: Lei Feng and Some Issues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60: An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edited by William C. Kirby. Asia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2011.
- U, Eddy. "The Making of Zhishifenzi: The Critical Impact of the Registration of Unemployed Intellectuals in the Early PRC."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73 (March 2003): 100–121.
- United States Congress. *How the Chinese Reds Hoodwink Visiting Foreigners: Consultation with Mr. Robert Loh*.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0.
- Van de Ven, Hans J. *From Friend to Comrade: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0–192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 Van der Heijden, Marien, ed. *Museums in Revolution: Four Historical Museums in Moscow*. Stichting beheer IISG, 1998.
- Verlagsgenossenschaft Ausländischer Arbeiter in der UdSSR. *Guide to the City of Moscow: A Handbook for Tourists, with Information on the City's Past, Present & Future; Descriptions of Its Museums and Points of Interest*. Co-operative Publishing Society of Foreign Workers in the U.S.S.R., 1937.
- Vogel, Ezra F.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 Wakeman, Frederic, Jr. "'Cleanup': The New Order in Shanghai." In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ited by Jeremy Brown and Paul G. Pickowicz.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Walder, Andrew G.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Wang, Cheng-hua. "The Qing Imperial Collection, Circa 1905–1925: National Humiliation, Heritage Preservation, and Exhibition Culture." In *Reinventing the Past: Archaism and Antiquarianism in Chinese Art and Visual Culture*, edited by Hung Wu. Center for the Art of East As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0.
- Wang, Xiaoxuan. "The Dilemma of Implementation: The State and Relig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90." In *Maoism at the Grassroots: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Era of High Socialism*, edited by Jeremy Brown and Matthew D. Johns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Watson, Rubie S., ed. *Memory, History, and Opposition Under State Socialism*.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1994.
- Weigelin-Schwiedrzik, Susanne. "Party Historiography." In *Using the Past to Serve the Present: Historiography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edited by Jonathan Unger. M. E. Sharpe, 1993.
- Wu, Guo. "Recalling Bitterness: Historiography, Memory, and Myth in Maoist China." *Twentieth-Century China* 39, no. 3 (October 2014): 245–268.
- Wu, Hung. *The Wu Liang Shrine: 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Wu, Yiching. "Revolutionary Alchemy: Economism and the Making of Shanghai's January Revolution." In Yiching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Yeh, Wen-hsin. *Shanghai Splendor: Economic Sentiment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1843–1949*.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 Yue, Daiyun, and Carolyn Wakeman. *To the Storm: The Odyssey of a Revolutionary Chinese Wom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 Zhai, Qiang. "Mao Zedong and Dulles's 'Peaceful Evolution' Strategy: Revelations from Bo Yibo's Memoir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Bulletin*, nos. 6/7 (Winter 1995/1996): 228–331.
- Zhou, Xun, ed. *The Great Famine in China, 1958–1962: A Documentary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索引

一畫

一月革命 206, 232, 234

《一貫害人道》108–109, 114

一貫道 108, 137

二畫

丁大華 186n48, 187

《人民日報》24, 67, 89, 181–183, 187, 191, 227–228；關於「四舊」的社論 227；沒收清單 191

人民解放軍 24, 57, 124, 154, 158, 176, 186n48, 202, 216；與文物 10, 228, 259；政治部 149；「兩億三查」運動 76, 149–150。另見士兵十大建築 50

十月革命 36n35, 39, 52

「又紅又專」224, 253

三畫

三條石歷史博物館 151

上海：藝術市場 217, 219, 236；共產黨接管上海 10, 23–24, 76, 219；早期博物館 6；八景 50, 211；五反運動 145, 220, 225；法租界 26, 28, 43, 45–46, 67, 106；歷史遺跡 26, 33–34, 111, 228–229；外國在上海的歷史 2, 6, 24, 146, 219；抄家 177, 181–183, 190–191, 213, 230；一月革命 206, 232, 234；龍華塔 211–212, 214–215, 226, 228, 232；過去與現在 19, 89, 146, 228–229；東方明珠電視塔 101；紅衛兵 170–171, 181, 186, 211, 229；民國時期的市中心 9；棚戶區 18, 23, 69, 96, 100–102, 252, 262；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14；作為資本主義的象徵 67–68, 146, 157, 160, 176, 181, 228；作為革命的象徵 23–24, 30,

- 34–35；戰時的破壞 68；文物小組 236–237, 242–243, 245；憶苦思甜展覽 76–77, 149；永安百貨 177–181。另見城隍廟、紅衛兵功勳展、蕃瓜弄、中共一大會址、上海階級教育展覽
- 上海大學 170
- 上海工人宮 38, 150
- 上海世博會 102–103, 263, 265
- 上海市人民公社 232–233, 249
-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 167–168, 178, 208
- 上海市人民委員會 113, 229, 232：文化教育辦公室 22
- 上海市人民政府 229, 232, 244
- 上海市文化局 22, 34n24, 37, 46–47, 54, 55n104, 111, 156, 157n58, 213, 216, 235–236, 250：反右運動對文化局的攻擊 47；與文物保管委員會的關係 216
-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 10, 212n4–5, 213, 216–217, 224, 229, 232, 236：機構歷史 216n19；對紅衛兵的回應 229–232
- 上海市博物館(民國時期) 9, 11–12, 217, 244, 258
- 上海市委 22, 25, 29–30, 37, 52, 73, 76, 80, 142, 156, 157n58, 164, 170, 171n115, 173, 182：宣傳部 22, 25, 29, 43, 156–157, 170；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72–173
- 上海市政府 28, 216
-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50, 65, 206, 232, 235n92, 236–237
- 上海市商務局 175n3, 176, 181n30, 198
- 上海城市建設局 211n1
- 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 30, 37, 44, 50n83
- 《上海教育》145
- 上海博物館 2–3, 5, 8, 10, 17, 19, 23–24, 38, 47, 53, 61, 88, 150, 210, 211–246, 248–249, 251–254, 258–263：圖錄 213–214, 218；收藏 3, 10, 13, 22–23, 210, 216–223, 225, 237, 239–240, 242, 249, 251–252；與文化大革命 10, 13, 19, 226–232, 246, 250, 253, 258；策展過程 250–251；講解員講稿 223–224, 254；捐贈 220–221；教育任務 251–252；展覽 38, 150, 221, 223, 244–246, 251–253；成立 19, 213, 246, 258；使命 213–214；作為模範 23–24；新館 223, 245；「今與昔」展覽 80, 150；與政治運動 220–226；保護龍華塔 211–212, 228；當權國家的反映 246；在改革時期 242, 244–246, 263；重新開館 240, 242；紅衛兵 19, 211–213, 229–232；革命委員會 240；沈之瑜館長 245；工作人員 216–219, 223–224, 229–232, 237, 240；聲望 23, 244–245, 263；來訪 221, 223–226；文物 19, 23–24,

- 210, 212–214, 224, 226–227,
229–246, 249, 252–254；文物小組
236–237, 242–243, 245
- 上海階級教育展覽 18–19, 65, 77,
143, 155–174, 176, 180, 199, 236：
聚焦於反資本主義 157, 221；
批評 167, 203；根據文化大革
命的修訂 173；策展 159–165,
172–173, 249；講解員 254；成功
的衡量標準 165–166；作為政治
運動 173；與紅衛兵 169–174；儀
式 255–257；規模 157–158, 165；
所聲稱的目的 159；陳列佈局
160–161；參觀者 158, 165–170,
257, 262
- 上海歷史博物館 55n104, 264,
265n50
- 乞討 62, 69, 81, 247, 262
- 口述歷史 22, 47, 213n8, 246
- 口號 14, 19–20, 147, 165, 172, 243,
255–256, 263
- 土地改革 9, 13, 156, 199, 250, 265：
與階級定義 153；與新型展覽
189, 260；與「算賬」187, 189；與
「訴苦」16
- 士兵 42, 54, 69, 76, 82–83, 150, 155,
166
- 大上海市中心 9
- 大字報 19, 172, 174, 181, 186, 199,
244
- 大寨 92
- 大衛·福克斯 (Michael David-Fox) 95
- 大躍進 37, 72–73, 89, 93, 142, 144, 151,
179；大躍進期間的宗教 113；失
敗 135, 148, 255。另見饑荒
- 小靳莊 92
- 山東省 23, 144n8, 240：階級教育展
覽 151, 153–154, 156, 158；紅衛
兵 171–172, 204
- 工人 20, 24, 38, 99, 171, 249：安源運
動 56；身體 194, 249；「牛馬」比
喻 77, 80, 88–89；工人子女 139,
145–146；與階級教育展覽 142,
150–152, 155–156, 160–162, 166,
193, 256–257；服裝 193；過去與
現在的生活對比 88–89, 152–153,
160–161；模型 141；沒收物品
的展示 197；剝削 157, 160–161,
166–167；家庭出身 138；蕃瓜
弄工人新村 18, 62, 75–77, 83, 87,
89–90, 93–94, 247；「蕃瓜弄展
覽」與「關於工人的階展」的對比
161；參觀蕃瓜弄 65n14, 88；湖
南運動 40；受傷 153, 157, 161,
176, 193, 248；參觀博物館 3,
50, 84, 221, 223, 225；工人敘事
250；1960年代工人下崗 164；
工人擁有的物品 139, 141, 152,
166；傷疤 146, 153, 201, 248,
261–262；與上海博物館 221；棚
戶區的生活條件 67–70, 72；與壓
迫的象徵 152；與文物 253。另見
階級鬥爭、無產階級
- 工作小組 156, 165n86, 166, 169, 173,
185

工廠 68, 76–77, 145：展示 4, 76–77,
153, 249；監管 152
工藝品。見文物

四畫

中央文物委員會 214
中央文革小組 186, 206, 207n128, 233
中央委員會 169, 227, 242：毛澤東作
為中央委員會會員 47–49；六中
全會 236；十中全會 143–144, 159
中共一大：確定日期 25–26, 43, 58；
與會代表 43, 45–50；文件記錄
47–50；與「紅線」40；轉捩點 45,
49
中共一大會址 8, 25–59, 172, 201：
模糊性和矛盾 40, 48, 247；鑒
定 29–30, 33–34；收藏 10, 13,
22–24, 26, 252；作為文化遺址 8,
18, 23, 25, 33, 57, 226；與文化
大革命 10, 27, 50–55, 176, 249,
262；策展過程 248–249；展覽
佈局 37–39, 57–59；講解員講稿
40, 43–48, 51, 187, 253–254；發
現與鑒定 26–30；與當權國家的
展覽文化 58, 87, 201；外觀 30；
外國訪客 39, 44–47, 50, 83；與建
黨神話 17–18, 66, 252；與歷史研
究 46–50；作為標誌 23–24, 26,
247；在毛時代的重要性 23；作
為毛澤東的紀念碑 50；標記 26；
總敘事 36, 39–41, 87, 254；多重
功能 8, 37；新型展覽 55–56；繪

畫 42–43；朝聖 23；與巡迴展
53–54；今天的一大會址 23, 54,
56–59, 262–263；對與會者名單
的修改 55；遵守「紅線」40–43,
45, 49–50, 75, 201, 248；與改革
時期 27, 55–57, 263；修復 25–27,
29–30, 33, 43；改動 42–43, 158；
李克曼的批評 39–40；搜索 17,
25–26, 213；今天的地位 22–23,
26, 55–59, 263；磁帶錄音 52,
254；參觀者的問題 47–49

《中國》(*Cina*) 90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 264
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參見策展革
命、中國革命博物館、革命
中國共產黨 10, 14–16, 33, 41：反
迷信運動 108–127, 129；階級意
識 142–143, 145–146；收藏 9–10,
13；文化產品 15–16, 245–246,
248, 259；失敗 134–135；建黨
17–18, 23–27, 39, 40, 42, 46–47,
49, 252, 254, 263–264；建黨日
26, 59；建黨神話 34–39, 49–50,
248, 252；歷史材料 41, 46–50, 56,
58–58, 249；建黨標誌（見中共
一大會址）；合法化 36；毛澤東
在中共的角色（見毛澤東）；黨員
發展 49；軍事勝利 259；與博物
館 2–4, 8–10；官方歷史 4, 16–17,
38–39, 47, 263；組織 49；宣傳
部 259；宣傳工具 10, 15, 28, 30,
38, 111, 198, 259–260；宗教政策
111, 131–132, 137–138；與科學

- 110–111, 116, 124–127；書記處成員 48n78；當權國家 259；文物保護 2, 5–6, 9–10, 13, 17, 19, 25, 30, 33, 56, 213–217, 227–228, 232, 234–235, 242, 259。另見中央委員會、毛澤東時代、改革時期
- 中國科學院 235
- 中國革命博物館 13, 37, 39, 47–48, 59, 259：成立 10, 35–36, 258；與歷史文獻 55–56；與江澤民的講話 57, 264；與「紅線」40–42, 52, 56；更名為中國國家博物館 59；參觀儀式 255–256
- 中國國家博物館 59, 265：習近平的講話 263
- 中國博物館協會 8
- 「中國夢」263
- 中國館 102, 104, 263
- 中華人民共和國：古巴友好訪問 61；經濟奇跡 208, 244；建國 1, 4, 10, 25, 63；新精英 143；十週年 35, 50；十五週年 75。另見中國共產黨、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時代、改革時期
- 中華全國總工會 159
- 中蘇分裂 39, 48
- 中蘇友誼：中蘇友好大廈 223；中蘇友誼宮 152
- 丹尼爾·里斯 (Daniel Leese) 17, 76, 177
- 五卅運動 49
- 五反運動 132n86, 144–145, 161, 186n48, 220, 225, 250
- 五四運動 38, 40, 214, 245n128
- 今昔對比。見回憶對比、舊中國和新中國、憶苦思甜
- 《內部參考》77, 97, 131–132, 134, 150n29, 153
- 內戰。見國共內戰
- 反右運動 47, 224
- 反封建迷信展 18, 22, 108, 137, 154, 165, 172, 248–249, 260, 264
- 反革命/反革命分子 2, 24, 43, 70, 76, 138, 154, 157, 184, 264：罪行 90, 200；意圖 191, 195；扣押物品 174, 177, 180, 182, 192, 194–195；宗教 129；作為反革命工具的迷信 108, 121–123, 126。另見階級敵人
- 反迷信運動 18, 108–127, 129, 132, 138：階級教育展覽 153–154, 248；手冊 137；侷限性 131–135；學生的問題 249。另見「熱愛科學、破除迷信」展覽
- 反傳統主義 245
- 天主教 111, 121, 131, 134, 146
- 天安門：學生運動 57, 264
- 天津 92, 134, 151–152
- 太平天國起義 38, 42
- 太空探索 125
- 孔子 52, 228, 236, 240：孔子故里的展覽 240；孔府 228, 240；牌匾和墓碑 229；孔廟 113n30, 138n107, 228。另見批林批孔運動
- 孔飛力 (Philip A. Kuhn) 262n41
- 孔祥熙 194

- 少年先鋒隊(少先隊):「熱愛科學、破除迷信」展覽 18, 116–117, 124, 126–130, 248–249; 與宗教信仰 134–135, 254
- 少年宮 38
- 巴金 208
- 手工藝品 221, 223, 225, 236–237, 247
- 文化: 文化的政治 14–17; 傳統文化 2, 19, 251。另見展覽文化、政治文化
- 文化大革命: 大字報 19, 172, 174, 181, 186, 199; 中央文革小組 186, 206, 233; 與階級鬥爭 142–143, 174, 197; 集體殺戮 209; 文革時期的文化產品 14, 246; 策展文革 10, 13, 197–198; 定義 227; 結束 135; 展覽 4–5, 10, 13, 19, 138, 176–198, 208–209, 248, 263; 與派系之爭 204; 文革期間的蕃瓜弄 65n14, 94, 97; 五十週年 208; 與中共一大會址 10, 27, 50–56, 249, 262; 開始 169–170, 176, 227; 與毛澤東思想 197; 與階級標誌 15, 17–18, 83, 139, 141, 145, 147–148, 153, 196, 198, 205, 210, 248, 250, 253, 262; 公開批鬥的特權 170; 擬建博物館 208; 平反受害者 208; 與上海博物館 19, 211–246, 248–249, 253; 標語 192;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作為文革的前身 19, 142, 165, 173–174, 257; 研究 246; 對待知識分子 184; 文物 53, 215, 232–237, 242–243; 與文物小組 235–237, 243–244; 與工人 163–164; 文革之前 39–42。另見「破四舊」、四人幫、紅衛兵、批鬥會
- 文化大革命博物館 208
- 文化民族主義 7, 246, 248
- 文化生產 14–17, 220–226
- 文化遺跡。見文物
- 文化部 37, 235
- 文件 13, 27, 33, 38, 47, 48, 55, 96, 100, 121, 127, 131, 135, 152, 156, 170, 174 176, 181, 187, 191n66; 歷史文獻 8, 34, 41, 55–56
- 文物: 海外 245; 與階級 225–226, 253; 文化大革命 53, 216, 232, 234, 237, 243; 破壞 227, 234, 243; 陳列 240, 242, 252; 雙重性質 226, 253; 中共一大會址 8, 17, 23, 25–27, 30, 33, 46–47, 57; 與百花運動 224; 完整性 56; 在文化大革命中丟失的文物 243; 在媒體中 242; 記憶 34; 國有化 225; 國寶 3, 23, 185, 258; 在革命中的地位 210; 與政治運動 220–221; 1949 年前後博物館對文物的處理 258–260; 保存 214–217; 私人交易 219–220, 225, 244; 關於文物的宣傳 258–259; 文物保護單位 33, 234–237, 244; 紅衛兵對文物的威脅 19, 210, 211–213, 226–232; 革命文物 8, 10, 17, 19, 26, 33–35, 37, 39, 53, 55, 58–59, 65, 221, 249; 搶救

- 228–234, 242–244；上海博物館的早期收藏 2–3, 216, 219, 224, 240；上海博物館搶救文物 19, 23, 211–213, 215, 226–227, 229–244, 246, 249, 253, 255；當權國家 58；國家對文物的保護 2, 5–6, 9–10, 14, 17–19, 25, 29, 33–34, 214–217, 227–228, 260；寺廟和教堂 109；頂級文物 240；文物小組索引 236；與憶苦思甜敘事 16, 78, 94
- 文物小組 235–239, 242–243, 246；成立日期 237；收據 230, 237, 238
- 文物局 10, 30, 34, 223–224, 235
- 文物委員會 111, 113, 214, 235n92
- 《文物參考資料》10, 36, 224
- 《文匯報》24, 74–75, 88, 99, 139, 213n8, 220, 233, 238, 242
- 方德萬 (Hans J. van de Ven) 48n78, 49
- 日佔 9, 68, 93n113, 148, 214
- 日記 77n59, 162, 164–165, 174, 183, 196, 205–206
- 日常生活：作為日常生活中心的文化實踐 14–15；材料 100, 102；敘事 17；物品（見實物）；符號 1, 3
- 日常生活的工藝品。見實物
- 月亮 109
- 毛澤東：革命分析 40；中央委員會 47–49；與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18, 42, 47–50, 55, 58–59；階級意識形態 141–143；個人崇拜 16, 39, 76, 248；逝世 4, 54, 135, 252；與一大會址 18, 30, 37, 40, 43, 46–50, 55, 58–59, 254, 263；與建黨日期 26, 58–59；與建黨神話 18, 49–50；建黨中的作用 18, 41, 47；對毛澤東的恩情 76, 84, 108；歷史敘事 259–260；關於模範與模仿者之間的辯證關係 91；與自然 124；與「和平演變」159, 164；與費利克斯·比達·羅德里格斯 62n4；肖像 51, 74–75, 104, 179；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宣言 10；語錄 20, 38, 51, 56, 141, 165, 171, 196, 255, 256；紅衛兵 177, 185, 186, 191；與「紅線」18, 27, 39–42, 45, 49–52, 77, 80, 248, 252；與宗教信仰 134；對毛澤東的描繪 43, 265；與革命話語 252–254；與革命場所 33–34；與科學 124；雕塑 191, 256；著作 18, 20, 40, 236, 252；〈新民主主義論〉2, 15, 37, 39, 42, 214, 220, 225, 226, 234, 236, 246, 259；〈實踐論〉3；《毛主席語錄》51；《毛澤東選集》125, 138；〈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4；三大革命運動 114
- 毛澤東主義。見毛澤東思想、「紅線」
- 毛澤東思想 17, 20, 39, 41, 49, 56, 80, 137, 171–172, 196, 197, 200–203, 209, 236, 252, 259；紅衛兵 170, 184, 196–197, 200, 211, 228, 236–237
- 毛澤東時代：文化官僚主義 259；

策展革命 1-6, 17, 26-27, 38-39, 49-50, 248, 265；展覽文化 4, 8, 13, 20, 65-66, 84, 89, 101-102, 251-255；與蕃瓜弄的意義 65, 100；與中共一大會址的重要性 23, 28, 49-50, 59；模範 91-92；作為「新社會」4, 63, 67, 70, 250；矛盾 248；政治文化 14-17, 248-249；與宗教實踐 132-138；與上海博物館 213, 245-246；與中蘇分裂 38, 48；當今中國的禁忌 265-266；悲劇 265-266

水鬼 116, 118, 129

《火花》(*Iskra*) 179

「牛馬」比喻 77n59

王光彥 108n10

王年一 192n68, 227

王冶秋 10, 30, 34, 36

王延春 151-152

王馬克 (Marc Andre Matten) 6

王朝聞 43

王盡美 43

王福清 90

王蘭花 60, 62, 64, 68-70, 75, 77, 179, 252, 255, 262：作為批評者 94；與蕃瓜弄展覽 78, 81-82, 90-91；關於滾地龍 67；作為組織者 96；改革時期的自我描述 90, 99

包惠僧 30

包瑞嘉 (Richard Baum) 144

五畫

北伐 8, 68

北京：抄家 181n29；紅衛兵 (見北京紅衛兵)；天安門廣場 6, 10, 50, 57, 82, 177, 264；與文物保護 232-235。另見龍鬚溝、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國國家博物館、故宮博物院

北京人 58n113

北京大學 183-184

北京市古書文物清理小組 235-236

北京紅衛兵 23, 170, 177, 182-183, 185-186, 194, 227；展覽 183-186, 191n66, 207n129；展覽解散 206；宣言 227-228

北京師範大學 184

古巴 61-62

古代文化 2, 5, 14, 247, 258：關於自然現象的信仰 117, 253；毛澤東時代的敘事 253-254；毛澤東對古代文化的定義 226；自然現象 117, 253；對工藝品的保護 5, 19, 213-216, 254。另見文物

古玩市場 218-219, 243-244

古董 169, 196, 207

台灣 86, 223, 259

司馬克 (Zachary A. Scarlett) 54n100, 84n80

四人幫 55, 137, 142, 156。另見江青、姚文元、張春橋

四川省 131, 134, 144n8, 181n30：收租院展覽 142, 151

四個現代化 125, 244
 「四清運動」 144, 158, 162, 165n85, 225
 「四舊」 19, 190, 210, 214, 229, 233 : 定義不明 227–228。見「破四舊」
 外文出版社 36, 242
 外國訪客 23, 60, 95, 254 : 1970 年代來到中國 95, 240 ; 文化大革命 52n90 ; 參觀展覽 17, 23, 44, 254 ; 參觀蕃瓜弄 17, 23, 62–64, 75, 79, 83–90, 93 ; 參觀一大會址 39, 45–47, 50, 52n90, 83 ; 參觀上海博物館 223 ; 訪問蘇聯 95
 外匯 168, 207, 237
 外灘 24, 82, 224, 228, 230, 250
 尼克森 (Richard Nixon) 240
 尼科爾斯基 (Nikolsky) 45。見弗拉基米爾·內曼
 布魯斯·艾里曼 (Bruce A. Elleman) 49n80
 平湖縣 156, 158n62
 弗拉基米爾·內曼 (Vladimir Neiman) 45n69。見尼科爾斯基
 民國時期：與內戰 9, 64, 69, 215 ; 民國時期的展覽 8–9, 262 ; 與日佔 9, 68, 93n113, 148, 214 ; 與博物館發展 7–9, 34–35, 217, 219, 244 ; 與社會主義博物館相對比 259–260
 民族主義 6–7, 14, 253 : 文化民族主義 246, 248 ; 民族主義敘事 13, 253, 259

永安公司 175, 178–180, 182n31, 194–195, 208, 210, 263
 永安百貨 19, 146, 162, 175–180 : 國際執照 194 ; 紅衛兵接管 19, 181, 229 ; 恢復名稱 208 ; 社會主義改造 178–180
 玉佛寺 136, 233
 玉器 192, 245n125
 申新紡織廠 160–161, 167–168
 白吉爾 (Marie-Claire Bergère) 63
 白銀 191, 196, 203 ; 美元 122, 181n30, 257
 皮埃爾·諾拉 (Pierre Nora) 6

六畫

任武雄 41, 46–47, 49, 53, 249
 伊莉莎白·卡斯戈特 (Elizabeth Campbell Karlsgodt) 240n107
 伊莉莎白二世 (Elizabeth II) 136
 伊斯蘭教 111
 伍國 16, 76n55, 174n124, 250, 255
 全景敞視監獄 152
 共青團 133–134, 145–146, 253
 共產主義 2, 4, 10, 18, 83, 84, 128, 134, 146, 159, 246, 265
 共產主義中國。見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
 共產國際 45, 48–49
 列寧 (Vladimir Lenin) 30, 42–43
 列寧主義 3, 47, 49, 259
 列寧博物館 36–37
 吉林省 131, 133, 189

- 同濟大學 183
- 向達 215
- 回憶對比 16, 66, 76, 88, 145, 163：
與階級教育展覽 65；展示 2,
16, 34；蕃瓜弄居民的回憶對比
76–77, 80；與五反運動 145；
老工人的回憶對比 88, 152–153,
160；與上海博物館 150。另見憶
苦思甜
- 回憶錄 22–23, 26–28, 33, 39, 47–
49, 55, 159, 174n124, 182n33,
183–185, 207n128, 223, 230n75,
233n87, 234n88
- 地主 10, 143, 145, 184, 199：陳列
151–153；抄家 189–190, 195–
96；財產再分配 187, 189
- 地契 122n51, 154, 191–192,
205n122。另見變天圖／變天賬
地圖。見變天圖／變天賬
- 好八連運動 24n62
- 安戈 (Jonathan Unger) 41n58
- 安克強 (Christian Henriot) 69, 96
- 安東尼奧尼 (Michelangelo Antonioni)
90, 94
- 安亭事件 53
- 安源 16, 53n94, 55–56
- 安德訓 (Ann Anagnost) 16, 77, 261
- 安德魯·麥克萊倫 (Andrew
McClellan) 239
- 安徽省 131
- 寺廟 70, 111–114, 116, 128, 229,
261–262：參觀率增加 131；紅衛
兵的破壞 227；限制進入 113–
114, 138n107
- 托尼·本尼特 (Tony Bennett) 6, 84
- 托爾斯泰 (Leo Tolstoy) 36
- 《收租院》141–142, 151
- 收藏 20, 34, 248–249：中國共產黨的
收藏 9–10；策展過程 248–249；
文化大革命期間 10, 19, 52, 227,
239；抄家的對象 213, 227；帝
制時期的收藏 5–7；政治威脅
225；現今對收藏的維護 23；保
存 242；目的 4；紅衛兵的破壞
227。另見藝術收藏、文獻收藏、
上海博物館、文物
- 收藏家。見收藏
- 曲阜 228, 240。另見孔子
- 朱力 218n27, 219, 220n41, 243–244
- 朱鎔基 100–101
- 死亡 115, 130：葬禮 132n86；墳墓
132。另見鬼魂
- 江青 92, 185, 205n122, 207n128,
232n84, 233n87
- 江澤民 57, 263
- 江曠 (Brian DeMare) 15
- 江蘇省 7, 129n74, 153–154, 158
- 百花運動 131, 224
- 百貨公司 19, 180, 198, 200, 203,
208。另見永安百貨
- 老舍：《龍鬚溝》78
- 自我批評 22, 168, 224
- 自然災害：對饑荒的諱稱 39, 131,
148, 150, 194；作為自然現象
117–118, 121

自然現象 117–118, 121, 126, 137：擬人化 124, 253
 艾森豪 (Dwight D. Eisenhower) 158
 西湖國際博覽會革命紀念館 8, 35
 西蒙·萊斯 (Simon Leys) 40n53
 西藏 176

七畫

亨德里克斯·斯內弗利特 (Hendricus Sneevliet) 45n69。見馬林
 住房：上海世博會的立體模型 102。
 另見蕃瓜弄、滾地龍、棚戶區
 何大鵬 228
 何叔衡 43
 何凱思 (Christian Hess) 73n45
 何榮宗 61n2, 67n21, 69, 70n37, 76, 91, 94, 100n139
 佘山天主教堂 146
 余偉康 (Eddy U) 221n42
 佛：佛像 112, 114, 210, 211, 235
 佛教：功過簿 261
 克利夫頓·費斯 (Clifton Firth) 79–80
 克里斯·萊頓 (Christopher R. Leighton) 180n25
 克勞斯 (Richard Kraus) 143
 吳一慶 143
 吳日嵐 91
 吳芳生 220
 呂烈丹 10, 35
 宋美齡 102
 宋朝：瓷盆 185；宋塔 111；瓷瓶 247

巫鴻 5n12, 7n23
 《我雖死去》205n122
 批林批孔運動 52, 94, 240
 批鬥 76, 165, 173–174, 184：集體與自發 260–261
 批鬥會 151n35, 175–176, 182, 186–187, 199–200, 210, 232n84, 261：作為集體 261；與批鬥會搭配的展覽 183n37；批鬥謝稚柳 225
 抄家 14, 19, 174–175, 181–183, 187, 198, 200, 205–208, 227：藝術收藏家成為抄家對象 213, 220, 226, 230–231, 233；沒收 10, 19, 174–175, 181–183, 187, 191, 195–198, 200, 206–210, 251；為群眾保護文化 236；影像 187–188；與藏匿的物品 189–192, 195–197, 200, 203；與舉報人 190, 195；回憶錄 207n128；重演 256；與上海博物館 230。另見實物
 抗日戰爭 9, 214, 253
 抗美援朝戰爭 2
 改革時期：反迷信手冊 136–137；展覽文化 262–265；與蕃瓜弄 65n14, 97–99, 104；與中共一大會址 27, 56–57, 263；與四個現代化 244；與愛國主義教育 57；繁榮敘事 102, 245；與紅色旅遊 57；與青年的宗教信仰 135–136；與上海博物館 242, 244–246, 262–263
 李大釗：〈問題與主義〉42
 李何林 184

李克曼 (Pierre Ryckmans) 39–40, 45–46
 李亞農 216
 李泳炎 139, 141, 145, 147
 李俊傑 218, 223, 243
 李恩傑 108n10
 李振盛 151n35
 李書城 28, 30
 李海燕 91
 李斌 199, 251–252
 李幹成 73
 李達 28, 46, 48n78
 李漢俊 28, 45
 李蓉蓉 244n125
 李遜 164, 181n30, 182, 192n66, 205n122
 李潔 207
 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 158–159
 杜博妮 (Bonnie S. McDougall) 14n42
 汪小烜 135n96
 汪精衛 27, 194, 214
 汪慶正 245n127
 沈之瑜 6, 61, 215, 224：關於展覽工作 20, 225–226, 251；搜尋中共一大會址 17, 25–29, 33–34, 213；關於博物館的教育作用 2–3, 251；保護上海博物館 229；與紅衛兵 232；返回上海博物館 240；擔任上海博物館館長 245
 沈艾娣 (Henrietta Harrison) 35, 123n55
 沈麥克 (Michael Schoenhals) 177, 186n53, 198, 252n10

沈劍知 218
 沒收的財物。見抄家、實物
 身分證 20, 139, 141, 152, 262
 辛亥革命 8, 38

八畫

亞歷山大·潘佐夫 (Alexander V. Pantsov) 42n69
 兒童：與反迷信運動 18, 22, 116, 123, 126–128；相信鬼怪故事 128；博物館儀式 256；與宗教 254。另見學生、青少年
 「兩憶三查」76, 150
 典型。見模範
 周之友 27
 周佛海 27–28, 33
 周恩來 55, 206, 212n5, 228：三條石歷史博物館題字 151；逝世 54；保護文物的指示 233；與上海博物館 217
 周傑榮 (Jeremy Brown) 4n8, 92, 145
 周遜 131
 周錫瑞 (Joseph W. Esherick) 228n68, 261n36
 「和平演變」142, 158–159, 161, 166：前提 164；與紅衛兵的控訴 170
 孟子 52
 孟旦 (Donald J. Munro) 91–92
 宗教：反宗教運動 106, 109–114, 121–124, 128–129, 133, 137, 261；與展覽文本 18；五大宗教 111；大躍進 137；與傳教士 123, 152；

- 宗教活動繼續存在 112, 116,
130–135；恢復合法性 136；「科學實驗」與「宗教」的對比 117；
與世俗化 111；與迷信 110, 123,
128–129, 138。另見寺廟、個別宗教的條目
- 宗樹人 (David Palmer) 110
- 延安 252
- 彼得·羅 (Peter B. Rowe) 102n144
- 房芸芳 265n50
- 于會泳 139
- 杭州 114
- 東方明珠電視塔 101
- 《東方紅》42
- 東方紅百貨公司 (前永安百貨) 19,
181–182, 194, 198, 200, 202, 207,
210, 254；更名 176, 181
- 《東北日報》189
- 林伯渠 43n65
- 林彪 52, 86, 185–186
- 林毓生 245n128
- 武器 122n51, 138, 196, 250：陳列
153–154, 169, 182, 187, 189, 191–192
- 河北省 184
- 河南省 152n39,
- 法租界 26, 28, 43, 45–46, 67, 106
- 法國 6, 90, 123, 240n107
- 法國大革命 239
- 法輪功 137, 264
- 波將金村 (Potemkin village) 95
- 物質文化。見實物
- 知識：經核准的知識 4；感知 3, 22,
251, 254；權力的投射 7；理性 3,
20, 117, 166, 251, 255
- 知識分子 9, 45, 184, 208, 214, 224, 246
- 社會主義 4, 89, 143, 146, 260：與資本主義 144；標誌 265；視覺文化 15。另見共產主義
- 社會主義改造 143, 162, 178–180,
210, 219, 263
- 社會主義建設 2, 4, 14, 42, 68, 84,
149：科學的作用 110；蘇聯對社會主義建設的展示 37；今天對社會主義建設的展示 26
-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6, 114, 133, 143–150, 162, 221；與階級教育展覽 141–142, 150–151, 153–154, 158, 166, 172, 197, 199, 258；與文化大革命 18, 142, 165, 173–174, 258；起源 143–144；目的 171–173；範圍 143–150；對象 161；《二十三條》144
- 社會主義博物館 258–262：特徵 256–258；敘事 260；對比民國時期的博物館 258–259
- 邵勤 8n24
- 金大陸 53n92, 97n133, 182
- 長弓村 (山西) 189
- 長沙 151
- 阿部正捷 223
- 阿普特 (David E. Apter) 252
- 青少年：青少年中的不滿 148–149；宗教信仰增加 135–136；下放農村 206, 223, 243。另見兒童、學生
- 青銅 102, 213, 217–222, 236, 240,
242, 244, 245n125, 249；商鞅方升 221, 231；天命 5

九畫

保祿·馬里安尼 (Paul P. Mariani)

122n51

南市區 107, 112–113, 135, 162

南市區人民政府 136

南市區人民委員會 113

南京路 19, 24, 173, 178, 181, 208, 228

南通博物院 7–8

哈同 (Silas Hardoon) 102

哈爾濱 176, 183n37

城隍 103, 111, 116, 262

城隍廟 22n57, 111, 113, 129, 136,

216：參謁 112, 114, 130–132,

135：紅衛兵的破壞 228

姚文元 53, 169, 185n48

姚石峰 190–191, 193–194, 197, 200

姚溱 25–26

姚慶雄 55

宣傳：反迷信 113–116, 134；藝術

15；中共對宣傳的利用 10, 14,

29–30, 38, 111, 198, 259；階級

106, 145, 249；與階級教育 145,

148–150, 155, 172–173；與策展

過程 248；作為宣傳的展示 (見展

覽文化)；形式 14, 22, 148–150,

248；基層 1–4, 16, 18；關於文物

保護 258。另見參與式宣傳

封建主義 80, 106, 128, 160, 171, 177,

181, 192, 212, 226：舉例 194

帝國主義 8, 20, 24, 80, 84, 89, 102,

111, 123, 146, 171, 174, 179, 194,

197, 227–228, 250：與階級教育展

覽 146, 152, 160；文化 2；反對帝
國主義 42；與迷信 121

《建築學報》70

後社會主義。見改革時期

「思想工作」113–114, 145n15, 224,

249

持續革命 42

指導手冊 14, 227n62, 247, 258：反

迷信；幹部 1–4, 14, 17, 20, 83n78,

252；展覽 1, 4, 14, 152, 165, 185,

257；博物館工作人員 22, 258；

蘇聯博物館學 36；農村藝術家

1n1

政治文化 14, 16–18, 36, 66, 84, 177,

256, 261

政治合法性 26, 33, 56, 58, 263：文化

和軍事權力 16；國家和革命 259

政治意識。見階級意識。

政治運動：與文化生產 14–17, 220–

226；策展革命 248–249；與展覽

1, 4, 6–7, 13, 18–19, 84, 94, 173,

187, 245, 247, 249–250, 257–258,

263–265；與文物 220–225。另見

個別運動的條目

故宮博物院 7, 217, 228, 233,

240n112；尼克森和基辛格之旅

240

施拉姆 (Stuart R. Schram) 3n4–5,

143n6, 226n58

春節 74–75, 83, 104, 114, 131, 135,

150, 178, 211, 217

柏右銘 (Yomi Braester) 15, 24n62, 78

- 柏樺 (C. Fred Blake) 105n2
 柯律格 (Craig Clunas) 6n14
 柯博文 (Parks M. Coble) 168n98
 柯爾尼 (Frederick Corney) 33n19, 39
 洪長泰 16, 36, 39, 43
 活展覽 65, 79, 84–104, 205, 209,
 261–262：與階級教育 146–150；
 作為參與式宣傳 86–89, 147
 活教材 39, 42, 126, 153, 249
 珍妮特·艾利奧特 (Jeanette
 Shambaugh Elliott) 5n13, 228n67,
 240n112
 皇家亞洲學會 6, 219
 科洛斯科瓦 (T. G. Koloskova) 38
 科學 104–111, 116–129, 135–138：實
 驗 114, 116–117, 247；意識形態
 對科學的利用 108, 114, 117, 124,
 137；毛時代的教學 23, 107, 118,
 121, 126, 133, 247；新民主主義文
 化 14；社會主義博物館 259。另
 見「熱愛科學、破除迷信」展覽
 《科學大眾》107
 紀念碑 8, 29。另見中共一大會址
 紅色恐怖 177, 195
 紅色旅遊 56–57
 紅軍 (蘇聯) 36, 259
 《紅旗》233
 「紅線」18, 27, 39, 77, 248, 252：模糊
 性和矛盾性 40, 46–47, 248；組成
 部分 40–42；文化大革命 50–56；
 策劃革命 40–42；與中共一大 18,
 41–42, 45, 49–51, 77, 201；作為指
 導原則 39；毛澤東 18, 27, 39–41,
 49, 51–52, 77, 248, 252；推翻
 56；與紅衛兵展覽 201；視覺表
 現 42–43
 紅衛兵 175–210：北京紅衛兵宣言
 227；與大字報 19, 172, 181, 186,
 199；與階級教育展覽 19, 142,
 165, 169–174, 184, 204, 254；
 策展 19, 23, 138, 176–177, 182,
 187, 189–193, 197–206, 250, 253,
 257；運動結束 205–207；破壞
 收藏 210, 227；紅衛兵講解員
 19, 176–177, 183, 189, 196–205,
 249, 254；革命的展覽 201；與派
 系鬥爭 204, 250；與抄家 (見抄
 家)；紅衛兵運動的開始 169；為
 造反辯護 197, 236–237；毛澤東
 思想 170, 184, 196–197, 200, 211,
 228, 236–237；與上海博物館 19,
 211–212, 229–233；口號 256；
 對象 211–214；暴力 174n124,
 177, 181, 211；為了群眾收集文物
 243。另見「破四舊」、北京紅衛
 兵、紅衛兵功勳展、批鬥會
 紅衛兵功勳展 19, 22–23, 175–210,
 253–257：目標和成就 204–205；
 評價 205–210；在北京 183–187,
 191n66, 207n129；階級敘事 193–
 198, 202, 253；持續革命 210；
 策展技巧 187, 192–193；不同形
 式 186；展示階級敵人 189–198,
 209, 249, 261；沒收物品的展示

- 9–10, 19, 175–176, 181, 183–184, 186–193, 203–204, 247, 249, 251 ; 沒收物品的處理 206–207 ; 講解員準備 196, 198–205, 249 ; 在廣州 184, 192n66, 205–206 ; 重演抄家 200 ; 想法 182–183 ; 與土地改革 188–189, 260 ; 教訓 210 ; 與毛澤東思想 197 ; 物質性 203 ; 混雜的記憶 204, 263 ; 敘事 199–202, 248, 254 ; 與「紅線」201 ; 被一月革命展覽所取代 262 ; 作為儀式 255–257 ; 參觀人數 176 ; 參觀步驟 191–192, 255–256 ; 參觀者的反應 197, 202–205, 256 ; 參觀者的儀式 255–257
- 紅寶書 191
- 美國 2, 64, 82, 94, 90, 245, 108n11, 171, 189–190, 192, 194–195, 245 : 帝國主義 121, 197 ; 麥卡錫時代 95 ; 軍事 152–153 ; 尼克森訪問 240 ; 「和平演變」158–159
- 胡志明博物館 261n37
- 胡杰 205n122
- 胡喬木 114n36
- 胡適 42
- 英國 6, 136, 183, 195
- 虹口公園 146
- 軍事 16, 259。另見中國人民解放軍、士兵
- 重慶 184–185, 205, 207, 255
- 革命：基於階級的革命 17 ; 與階級教育展覽 173 ; 與收藏 239 ; 與集體譴責 261 ; 持續革命 4, 42, 210, 249, 253, 257, 261 ; 與情感 198–199 ; 標誌 22–23 ; 合法化 13 ; 毛澤東的分析 40, 114 ; 總敘事 36 ; 博物館 8, 10, 17, 19, 34–37, 239, 258–260, 263–264 ; 敘事 3, 9, 19, 23, 36, 50, 57, 252–255, 260 ; 與政治合法性 259 ; 與「紅線」41, 77 ; 文物 3, 5–6, 8, 10, 17, 19–20, 33–35, 37, 57–59, 65, 199, 225–227, 242–243, 248–249, 253 ; 修辭 243 ; 遺址 23, 28, 33, 38, 57, 59, 249 ; 階段 41 ; 詞彙 4 ; 世界 24, 54。另見持續革命、反革命 / 反革命分子、文化大革命、策展革命，以及個別革命的條目
- 革命文物 8, 10, 17, 19, 26, 33–35, 37, 39, 53, 55, 58–59, 65, 221, 235, 249
- 革命國家：展覽文化 4, 10, 18–19, 94, 189, 260–262, 264–265。另見革命
- 革命歷史博物館 8, 17, 53, 260 : 改變觀點 55–56 ; 定義 10 ; 陳列手法 34 ; 毛澤東思想 41 ; 與國民黨 8, 34 ; 上海的規劃 26, 37
- 風水 114
- 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展覽會 185
- 香港 64, 82, 97, 177–178, 180, 208
- 十畫
- 修正主義 42, 52n90, 94, 142, 144, 159, 171, 227

- 倪興祥 56
- 倫敦萬國工業博覽會 7
- 剝削 75, 146, 148, 152–153, 156–157, 159–161, 166–169, 175, 179, 198, 226; 財產作為剝削的證據 190, 195, 252, 262
- 唐小兵 15
- 埃德加·斯諾 (Edgar Snow) 64–65, 68, 70
- 夏竹麗 (Judith Shapiro) 124
- 孫中山 8–9, 236, 258; 故居 33n21, 35; 陵墓 6, 35; 三民主義 35
- 宮川寅雄 229
- 容庚 218
- 展板 118, 133, 157, 158n60, 159, 173–174, 264
- 展覽：臨時展覽 18–19, 107, 109, 186, 221, 244, 257; 中國共產黨建黨 26; 培養階級仇恨 189; 強化階級敘事 253; 與其他媒介的比較 248; 作為文化產品 15; 策展過程 (見策展); 要素 1–3, 13, 16–17, 20; 工廠 4, 77, 250; 形式 251; 目標 2; 基層 1–4, 18, 256, 262; 作為指導手冊 1, 4, 13, 174, 257; 活展覽 65, 79, 84–104, 205, 209, 261–262; 地方 18, 107, 251–252; 作為群眾教育的工具 9; 現代化 263; 多媒體 14, 150–151; 敘事搭配 20, 251–255; 個人影響 250; 圖片 17; 政治用途 1, 4, 6–7, 10, 13, 16, 18, 83, 94, 172–173, 187–188, 240, 247, 249–251, 256–257, 263–264; 準備過程 (見策展); 目的 4 (另見宣傳); 問答形式 83–84; 巡迴展 2, 23n61, 53, 107, 114, 167, 223; 指代詞 8。另見陳列、講解員、博物館、新型展覽、參觀者, 以及個別展覽的條目
- 展覽文化：中國歷史 2, 5–17, 261; 文化大革命 177; 定義 6; 陳列的定義 20; 毛澤東時代 2, 4, 8, 13, 20, 58, 65, 84, 89–90, 100, 251–254, 259, 261–265; 戰鬥之道 250; 與現代化 7; 與民族主義 7; 參與 256–257; 力量 17, 84; 作為宣傳 14, 18; 紅衛兵對展覽文化的使用 18–19, 175–177, 190–192, 198, 250; 改革時期 263–265; 革命運動 4, 13, 18–19, 94, 189, 260, 262, 264; 與儀式 17, 255–257; 蘇聯模式 36, 260–261; 當權國家 13, 259–260, 262–263。另見展覽、博物館、新型展覽, 以及個別展覽和博物館的條目
- 徐家匯：天主堂 111, 130, 229, 235; 育嬰堂 123
- 徐家匯博物院 6
- 徐森玉 217, 224
- 徐匯區 67, 83n78, 106n5, 123, 129
- 徐耀：《春滿蕃瓜弄》63
- 拿破崙 239

- 書法 30, 245n125
 書信 9, 76, 150, 183, 261, 264
 書籍：燒書 234；書籍保護 10, 236, 242
 桑曄 58n115
 氣功 137, 264
 泰偉斯 (Frederick C. Teiwes) 144n12
 浙江大學 46
 浙江省 23n61, 114
 《海港》 20–22, 24, 139–141
 消費品 102, 146, 179
 珠寶 169, 189, 191, 195, 203, 207n129
 真實性 17, 33, 58, 92, 262
 「破四舊」 19, 169, 173, 181–182, 184, 206, 211–213, 215, 226–232, 234, 239, 242, 245：定義與含義 227；上海博物館的應對 239, 244–245
 祖墳 (為先人掃墓) 132
 神水 109, 121, 123, 132, 134
 神靈：信仰 110, 113, 116, 129；批駁 118, 121
 秦始皇 240
 納粹德國 239n107
 紙錢 105–106, 111, 128
 索菲亞·奈特 (Sophia Knight) 183
 記者 64, 74, 87, 158, 168, 179
 記憶 34, 64, 265：集體記憶 76n55。另見回憶錄、口述歷史
 財產。見實物
 迷信 18, 104, 105–138, 180, 247–249, 253：對兒童的吸引力 128–129；迷信用品 111, 257；與迷信有關的階級 109–110, 117, 126, 137–138；迷信的危險 121, 123–124, 128；根深蒂固的迷信 128–130, 133；定義 116。另見反迷信運動
 馬克思 (Marx Karl) 30, 43, 128
 馬克思主義 17, 19, 45, 244, 259, 261；中國的解讀 91, 236
 馬克思列寧主義 3, 38, 40, 47, 50n82, 58, 137, 224
 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17, 40, 137, 259
 馬承源 217–218, 220, 229, 230n76, 240, 245–246
 馬拉維 (Malawi) 45
 馬林 (Maring) 45, 45n69。見亨德里克斯·斯內弗利特
 馬若德 (Roderick MacFarquhar) 144, 177, 186n53
 馬修·約翰遜 (Matthew D. Johnson) 4n8
 馬格尼托哥爾斯克 (Magnitogorsk) 68–69
 高原 184, 204
 高崗 43n65
 高敏 (Miriam Gross) 107
 高萬桑 (Vincent Goossaert) 110
 高默波 215n16
 鬼火 118, 128
 鬼魂 105–107, 110, 116–118, 122：信仰 129–130；批駁 118
- ## 十一畫
- 乾隆帝 237, 239, 243

- 動員 1, 262：展覽作為動員工具 4, 14
- 參與式宣傳 198, 256–257, 262, 265：階級教育展覽 142；定義 13；蕃瓜弄 66, 86, 88–89, 95–96；紅衛兵展覽 198
- 參觀者 13, 16, 20, 254, 263–264：階級教育展覽 158, 165–174, 261；蕃瓜弄 18, 65n14, 84–88；中共一大會址 40–41, 50–52；動員 14；參與 19, 84；與參與式宣傳 13；問題 46；紅衛兵展覽 176, 184, 187, 190–192, 197, 203, 257；回應 2, 16, 18–20, 153, 202–203, 225, 250, 254–256, 261；儀式 5, 8, 142, 255–257；上海市博物館 258；工人 3, 50, 84, 221, 224–225；世界觀 3–4。另見外國訪客、學生
- 唯物主義 3, 13, 17, 110, 225
- 國民黨 8, 49, 69, 111, 153, 250；反迷信運動 110, 125；與文物 214；與博物館 8, 35, 217, 258–259；北伐 8, 68；與紅衛兵的控訴 175, 183, 192, 194, 206；與宗教 138n107
- 國共內戰 9, 35, 214, 215
- 國家文物局 10, 34, 223–224, 235
- 國際租界 38, 68, 219
- 國際博覽會 7–8, 35
- 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240
- 基督教 106n5, 111, 130–131, 133
- 奢侈品 146, 192–193, 196：作為剝削的象徵 179, 195, 253
- 康生 234
- 康有為 7–8, 194
- 康浩 (Paul Clark) 15
- 張春橋 142, 156, 158, 159n66, 164, 171, 185n48
- 張倩雯 (Rebecca Nedostup) 110, 126
- 張國燾 48n78
- 張瑞恆：《乘飛船，探索外太空》125
- 張謇 7
- 情感：與中國共產主義革命 198–199；激發情感 19, 199–200, 250, 254–256, 265。另見階級情感、階級仇恨
- 戚本禹 185n48, 206–207, 233–234
- 控訴。見批鬥
- 敘事 3, 41, 196, 248, 251–255, 265：其他敘事 254；關於古代文化 252–253；真實性 262；關於階級 84, 198–206, 254；講解員 20, 42, 196, 254；關於日常生活 18；關於蕃瓜弄 75–76, 100；關於未來的繁榮 102；歷史敘事 4, 17, 52, 251, 260；「鬧革命」19；總敘事 36；模範 93；關於民族 13, 253, 259–260；官方 254–255；個人 13, 16, 75, 250, 253；紅衛兵展覽 193–203, 248, 253–254；關於革命 3, 9, 19, 23, 36, 50, 57, 252–254, 259–260；儀式化 256；磁帶記錄 52, 254；關於轉變 75。參見講稿、憶苦思甜
- 教育：融入教育的階級意識形態 142, 146；群眾 1–2, 8；模範 92；博物館的角色 3, 8, 10, 34, 258；

愛國教育 3, 26, 264；社會主義教育 14, 16, 18, 257, 263。另見反迷信運動、階級教育展覽、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教科書 4–5, 13, 17, 26, 36–37, 40, 52, 80, 109, 122, 137, 151, 160, 165, 173, 248, 257

教堂 106n5, 111–113, 122, 131, 134, 137, 146, 184, 239, 257

曹荻秋 72, 182, 230, 233

曹楊新村 63n7

梁允翔 57

梁思文 (Steven I. Levine) 45n69

梁思成 37

梁啟超 110

梅嘉樂 (Barbara Mittler) 15, 245

梅爾清 (Tobie Meyer-Fong) 6n14

清朝 6–8, 64, 67, 110, 204

現代化 7, 14–15, 102, 110, 125, 245, 263

細菌 109, 133

統一戰線 42, 49, 216

習近平：反腐行動 264；「中國夢」 263

船民子女 127–129

貧民窟。見棚戶區

郭志楷 208

郭泉 194

郭琳爽 175, 177–180, 194, 208–210, 264；控告 179；死亡 207；往事 178–179, 194–195, 209；海外後裔 208；紅衛兵如何對待 175–176, 180–182, 191, 193–198, 201

陳小眉 42

陳丕顯 142, 159, 164, 166, 173, 182, 230n75

陳列展示：階級敵人 189, 191–198, 262；在展覽工作中的重要性 20, 22；敘事支持 3, 251–255；物品陳列 (見實物)；反響 204；陳列現場 17–19；當權國家模式 58；對受傷身體的陳列 147, 153, 155, 200, 247, 261–262。另見展覽文化、展覽

陳伯達 151, 185n48, 186, 234

陳志強 25n1, 27n6, 28n7, 28n8, 29n11, 211n3, 213n7, 229n71, 231n80, 232n84, 240n108, 240n109

陳沛存 30, 33, 37, 46

陳佩芬 213–214, 218, 221, 262

陳佩華 144n9

陳映芳 96

陳若曦 87

陳端志 9

陳毅 5–6, 9, 25, 93, 185, 216–217

陳潭秋 43

陳蓮笙 136

陳獨秀 28, 40, 48n78, 52, 55

陳燮君 244

陶瓷 240, 245n125

十二畫

傅高義 (Ezra F. Vogel) 144n9

凱倫·佩羅內 (Karen Petrone) 73n46

- 勞動合同 139, 141, 145, 148, 152, 160, 257
 博文女校 28–29, 33, 37
 博物館 1–10：反宗教 137；特徵和展覽模式 13–14, 20, 22；中共的改造 2–4, 8–10；中國歷史上的博物館 5–10, 34–38, 217–219, 244, 258–261；教育作用 3–4, 8, 10, 34, 259；基層屬性 1–2；作為意識形態工具 9；作為活教材 37；現代化的作用 7；與民族主義者 6, 248；與政治合法性 13, 263；私人博物館 265；目的 20；革命 8, 17, 239, 258–262；作為儀式空間 255–256；社會主義 258–262；蘇聯模式 10, 35–36, 38, 259–260；名詞 8；類型 4。另見策展、講解員、展覽文化、展覽、參觀者，以及個別博物館的條目
 喬·奧森 (Jon Berndt Olsen) 259n29
 富平安 (Anne Swann Goodrich) 261n38
 彭德懷 52
 復興中學 145–146, 148, 204
 斯大林 (Joseph Stalin) 36–37, 259
 斯蒂芬·史密斯 (Stephen Smith) 109, 121n50, 134, 138n107
 斯蒂芬·考特金 (Stephen Kotkin) 69
 普希金 (Alexander Pushkin) 36
 普陀區 63n7, 167
 景軍 262n40
 朝聖 23, 25, 50, 109, 134n95, 252
 棚戶區 18, 23, 64–65, 72, 221, 252：與階級教育展覽 151, 160–161, 176；生活條件 66–70, 89, 90n98, 93；今天對棚戶區的描述 99–100；模型 101；與蕃瓜弄公寓對比 62, 66, 73–74, 89；1960年代的發展 96；「今與昔」展覽 79–80, 150；為展覽保留棚屋 64–65, 90, 213, 262；與紅衛兵展覽 176；參觀者 80, 85–87, 97。另見蕃瓜弄
 殖民主義。見帝國主義
 湖南省 45, 47, 53, 151, 154；工人運動 40
 焚香 111–113, 123, 128, 131, 135
 無神論 110, 133, 137
 無產階級 24, 28, 45, 127, 144, 146, 157, 169, 171, 227–229, 236, 243, 250；與資產階級 144, 149, 157, 159, 161–162, 164, 169–170, 172, 174–175, 184, 224, 227, 261。另見工人
 無線電發報機 252
 策展 249–257：定義 247–248；並置方法 192–193；社會主義博物館 258–263；策展階段 20, 22, 248；策展工具 160–161, 249–250。另見敘事、儀式
 策展革命 1, 20–24, 39–56, 263：與階級教育展覽 172；與示範物品 247；與定罪證據 250；策展革命的開始 24；並置 66, 192–193；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 1–6, 13, 17, 27,

- 38–39, 49–50, 90, 265；博物館的功能 3–4, 13, 15–17, 34–35；與敘事 3, 9, 22–23, 36, 40, 252–255；毛時代的悖論 249；人民在其中的作用 262；政治目標 247–248；過程 20, 22, 39–43, 249–257, 259–260；紅衛兵的做法 23, 176, 187, 189–194, 197–206；與「紅線」40–42；蘇聯模式 9, 36–37, 39, 260–261。另見階級教育展覽、蕃瓜弄、中共一大會址
- 舒喜樂 (Sigrid Schmalzer) 58n113, 95, 107n9, 111, 124
- 舒衡哲 (Vera Schwarcz) 41n56
- 華志堅 (Jeffrey N. Wasserstrom) 261n36
- 華若璧 (Rubic Watson) 260
- 華僑 93, 179, 208
- 菲茨派翠克 (Sheila Fitzpatrick) 261
- 視覺文化 14–15, 42, 171–172
- 訴苦 16, 76–77, 80, 92, 145, 148, 150, 157, 189, 249, 256：中國傳統中的淵源 261
- 費利克斯·比達·羅德里格斯 (Félix Pita Rodríguez) 61–64, 99, 255
- 費欽生 223
- 賀蕭 (Gail Hershatter) 63, 76, 92
- 超自然 104, 116–117, 131, 133, 249
- 越南 84, 88
- 越南革命博物館 259, 260n30
- 《開國大典》(繪畫)：改動 43
- 閔行區 90
- 階展。見階級教育展覽
- 階級：反映階級的藝術品 225–226；階級罪行 195–196, 199 (另見階級敵人)；與文化大革命 195–196, 204–206；講解員的階級 157, 254；關於階級的展覽 (見階級教育展覽)；蕃瓜弄的階級差別 97；蕃瓜弄接待者的階級 88；對復辟的恐懼 151–152；階級的意識形態 141–146；土地改革對階級的定義 153；階級的語言 205；階級模範 92；階級敘事 84, 198–206, 253；負面標籤 143；作為階級標記的物品 15, 17–18, 24, 84, 139, 141, 147, 152–153, 180, 195–196, 206, 210, 247, 250, 252, 260–261；1949 年前對階級的定義 143；關於階級的宣傳 106, 145, 249；重劃階級標籤 143–145；階級修辭 148；階級地位的認定 143–144；與迷信 109–110, 117, 126, 128, 138；與苦難的標誌 23, 139, 247；階級的受害者 164；與文物 225–226, 253；憶苦思甜與對階級的理解 16。另見資本階級、資本家、群眾、農民、無產階級、工人
- 階級矛盾 144。另見階級敵人、階級鬥爭
- 階級身分。見階級
- 階級苦難 146–147, 155：代表階級苦難的物品 23, 248

- 階級鬥爭 45, 76n55, 110, 114, 129, 142–147, 151–152, 253, 260：與文化大革命 142–143, 174, 197；描繪階級鬥爭的展覽 153–154, 157, 169, 171, 173；敘述 198；過去與現在 151–153；紅衛兵展覽 21, 177, 183–184, 200–201, 205, 209。另見剝削
- 階級教育展覽 4–5, 8, 19, 22, 138, 139–174, 199, 228, 247, 262, 264：與中央文革小組 233–235；「文化大革命特權」與「階級教育展覽」的對比 170–174；策展手法 152–154, 159–165, 172–173, 193, 250, 256, 262；展品陳列 151–152, 155, 160, 195, 251；講解員 254；階展的有效性 141；階展的要素 145–152；標誌性物品 153–154；揭露 197–198；對饑荒的應對 150；蕃瓜弄 64–65, 74；思想核心 143；參觀時長 158；源起 76；道具設計 140；省級階展 150–158；目的 169；與紅衛兵 19, 142, 165, 169–172, 176, 184, 198–199, 203–205, 208, 253；對展覽的反饋 76, 89, 142, 153–157, 176, 256；成功 153；手法 142, 145–148, 160–161, 197–198, 250；工人 149。另見上海階級教育展覽
- 階級意識 3, 66, 75, 76n55, 80, 141–143, 145n15, 149, 159, 250, 258
- 階級感情 147, 154, 176, 198–199, 201–204：與仇恨 189, 201, 205
- 階級敵人 138, 143, 145, 164, 170, 173, 185, 197, 205：對階級敵人的展覽 189, 191–198, 209, 249, 260；揭露階級敵人 17, 138, 175, 182, 253, 257；隱藏的階級敵人 153–154, 176, 210, 253；將新舊階級敵人聯繫起來 153–154, 164；標誌階級敵人的物品 153, 194–196, 198, 210, 250, 257；對階級敵人的刻畫 164, 176。另見階級鬥爭、反革命/反革命分子
- 集體化 37, 131, 143
- 集體身分 6
- 集體記憶 76n55
- 雲南省 131, 151–152, 154
- 馮筱才 178n14
- 黃金 30, 181, 190–192, 204–205, 207, 239：藏匿黃金 190–191, 195, 200, 203
- 黑龍江省 144n8, 151n35, 183n37, 199
- 蕃瓜弄 23, 59, 61–104, 172, 252, 256, 260, 262–263：公寓樓 18, 62, 64, 73, 78, 89, 94–98；翻新費用 96；文物狀況 97；文化大革命 88, 94, 97, 99；拆除棚屋展覽 263；指定翻新 73, 77–78；衰敗 99, 104；作為上海的象徵 86；外國訪客 18, 62–65, 85–90, 254；歷史 66–78；材料 250；

媒體圖像 73-75, 84；作為新中國的縮影 18, 59, 62-63, 77-78, 89, 91, 93-94, 99, 254；模範居民 83-84, 86, 93-94；敘事 75-76, 99-100, 254；全景 71；參與式宣傳 66, 88-90, 94-95；「今與昔」展覽 66, 78-84, 88, 96, 102, 192；掛畫 63；居民的回歸 70, 72-73, 77, 83；居民故事 77, 90-91, 252；與棚屋展 93, 213, 262；春節 74；學生參觀 65, 88-89, 97；遠景 63；戰時的破壞 68, 93；與憶苦思甜 18, 75-78, 83, 88, 94, 256

蕃瓜弄小學 94, 100

十三畫

傳教士 123, 152

傷疤：展示傷疤 146, 153, 201, 248, 261-262

滙豐銀行 24, 250

奧爾加·列奧諾娃 (Olga Leonova) 36

幹部 10, 20, 94, 249：與階級教育展覽 154, 156, 158；幹部手冊 1-4, 14, 17, 65n13, 83n78, 247, 252；清洗 143-144；與宗教實踐 131-132, 134；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14, 143-144, 151

意識形態：美學為意識形態服務 3；階級 142；正確性 16-17, 19, 112, 156-157；科學為意識形態服務 110-111, 126；社會主義博物館 258-259

愛國主義 4, 26, 56-57, 214, 263

感知 3, 22, 117, 225, 251, 254

新中國。見舊中國和新中國、憶苦思甜

新天地 26, 37, 57

新文化運動 8

新民主主義。見毛澤東

《新民晚報》167

新社會。見舊中國和新中國、憶苦思甜

《新青年》：雜誌 37；編輯部 28-29

新型展覽 189, 258-262, 265：定義 260-261

新華社 136, 240n112

新華書店 234

《新聞日報》178

新疆省 54, 83, 97, 149

楊西光 164

楊重光 25, 28

楊浦區 9, 130

楊淑慧 27-29

楊寬 217

楊耀健 184

照片 1, 153, 175, 251：改動 55；沒收物品的照片 19；紅衛兵對照片的使用 183-184, 193-196；工人照片 157, 176

當權國家：與反迷信展覽 137；展覽文化 13, 259-260, 262-263；與一大會址 58, 84, 201；「革命運動」與「當權國家」的對比 13, 58, 201, 262；與上海博物館展覽 246

- 群眾：階級教育展覽 142；與階級敵人 175；共產黨為群眾代言 77；教育群眾 1-2；群眾的歷史作用 262；群眾動員 41, 261-262；模範 93；參加展覽 261, 263；與愛國主義 2；與宣傳 106-107, 250；與宗教活動 132-133；與上海博物館 2；與社會主義教育 151-152；為群眾沒收文物 236-237, 242-244, 248, 253
- 「群眾工作」：博物館在其中的作用 20
- 群眾文化 14。另見政治文化
- 群眾動員 1, 262
- 群眾教育 1-2, 9
- 葉文心 178, 195n72
- 葉劍英 206n128
- 葛凱 (Karl Gerth) 180n23
- 董必武 28, 30, 33, 43, 46-49
- 董希文：《開國大典》42-43
- 董國強 205
- 蒂莫西·米切爾 (Timothy Mitchell) 7n20
- 裘皮大衣 184, 192-193, 247, 261
- 解放 (1949) 2, 4, 67, 70, 76-77, 178-180；解放前的財產 152-153；與上海博物館 216, 246；作為時間框架 63-64。另見舊中國和新中國
- 《解放日報》51, 55, 73-74, 104, 136
- 解放軍。見人民解放軍
- 話劇 15, 78, 147
- 資本家 24, 152, 180, 191, 262；對資本家的控訴 163, 175, 183；資本家的藝術收藏 213, 221；針對資本家的階級教育展覽 157-170, 193, 221；階級地位 142-144, 157；資本家的剝削 152, 166；國有化 220-221；代表物 247；復辟的「和平演變」159, 164；與上海博物館 220-221；上海與資本家的關係 69, 146, 157, 160, 176, 180-181, 228；社會主義與資本家的鬥爭 144；資本家的受害者 199
- 資產階級 144, 149, 157, 159, 161-162, 164, 169-170, 172, 174, 184, 224, 227；民族資產階級 207n132, 208
- 農民 41, 142, 144n8, 187, 242；與中國共產主義革命 24, 42；與階級教育展覽 156, 193, 261；與階級感情 154-156；服裝 147；參觀博物館 50；敘事 250；與紅衛兵展覽 176, 184；與宗教復興 131-134；與棚戶區棚屋 23；與「訴苦」76, 189
- 農村：與階級地位 144；饑荒 148；「四清」運動 144；紅衛兵展覽 184；宗教復興 131-132；返回農村 105-106；下鄉青年 206, 223, 243
- 農業 4n8, 28, 37, 106, 124, 135, 143-144, 229
- 道教 111, 136

聞北區 22, 62, 104：區誌 100；人民
委員會 64；戰時的破壞 64, 68；
工人宮 65, 79, 80。另見蕃瓜弄
雷鋒 93, 92, 150, 162n75, 265
電腦 125, 137
電影 15, 20, 24, 78, 90, 94, 97, 108,
114, 150–151, 167–168, 205

十四畫

僧侶 112, 211
夢的預兆 117
實物：與階級 15, 17, 19, 24, 79, 82,
86, 139, 141, 148, 152–154, 157,
172, 174, 176, 181, 192–198, 205,
247, 250, 253, 257, 261；今昔對比
150–152, 249；陳列 1–5, 9, 16–19,
22–23, 53, 152–153, 159–164,
166–167, 169, 174, 176, 181–185,
187, 189, 191–198, 200, 202–204,
206, 210, 242, 247, 249, 251, 262；
處置 206–207；作為證據 5, 117,
133, 163, 176, 194–198, 249–250；
蕃瓜弄居民 65, 88–89；來自中
共一大會址 25；藏匿 189–192,
195–197, 200, 203；政治教訓
247；宗教儀式 111；搜查（見抄
家）；工人 139, 141, 152。見文物
實物教育 19, 97, 175–210
旗幟 42, 191, 250
榮宗敬 161, 168, 172
榮漱仁 167–168

榮毅仁 164, 171
槍支。見武器
滬肥船民子弟學校 127
滾地龍 67–68, 78, 81, 84, 88, 90,
99–101, 129n74, 176, 252, 256
算命 114, 116, 119, 121, 125, 130–
131, 179：「科學」算命 137
「算賬」150
翟強 159
肇家浜路 78, 89
腐敗 82, 114, 144–145, 154, 162,
168：對腐敗的陳列 264
蓋拉特利 (Robert Gellately) 261
蓋博堅 (R. Kent Guy) 5n13
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15, 16, 41,
102n144, 164, 181n30, 182, 199,
217, 246
認罪／懺悔 162–163, 168–169：展示
264

十五畫

儀式 22–23, 35, 88–89, 108, 142, 151,
248, 260–262：合法化 16–17,
35；與博物館參觀者 4–5, 8, 142,
255–257
劉少奇 43n65, 52, 55, 94
劉文彩 142
劉靖基 230–232, 242
廣州 176, 184, 192n66, 235n93
廣州紅衛兵展覽 184, 205
廣西大學 209

廣東省 65n13, 68, 132, 179, 209
 德國歷史博物館 259
 樂黛雲 183
 標誌 23–24, 26, 114, 247, 265。另見
 中共一大會址
 模範 18, 26, 83：辯證 91–92；蕃瓜
 弄 91–100；場所 94–95；上海博
 物館 23；鄉村 92
 「熱愛科學、破除迷信」展覽 18, 23,
 104, 106–107, 110, 114–138, 254：
 展覽後的信仰 126–138；修辭與
 敘事 116–127, 137–138, 254；文
 本 128–129, 133。另見反迷信
 運動
 蔣大沂 218
 蔣介石 68, 102, 161, 194, 214；隱藏
 的畫像 192, 195, 200, 203
 蔣文煥 170
 諸民誼 214n12
 賬簿 154。見變天圖／變天賬
 鄧拓 94
 鄧恩銘 43n66
 鄧穎超 55n104
 鄧騰克 (Kirk Denton) 8, 34, 35, 39,
 57, 108n10, 255
 鄭念 231n81
 鄭重 230n75, 233, 238
 鄭振鐸 224
 震旦大學 6n16n, 219
 魯迅 62, 122, 159, 170, 184, 205：紀
 念館 55；墓地 33n21
 鴉片戰爭 38, 52

十六畫

學生：與階級教育 18, 142, 145–
 149；競爭制度 130n80；龍華塔
 211–212；宗教實踐 133；與科
 學普及 105–108；與迷信 116,
 129–130, 138, 249；與傳統信仰
 18, 116；參觀蕃瓜弄 18, 65, 88,
 94, 97, 263。另見紅衛兵、少先隊
 憶苦。見「憶苦思甜」
 憶苦思甜 18, 92, 104, 139, 145, 147,
 174n124, 249, 256, 261–262：與
 階級教育展覽 75–76, 88, 153–157,
 176；與蕃瓜弄 16, 18, 75–78, 83,
 88, 94, 256–257；目標 76；與大
 躍進的饑荒 255；起源 75–76；
 「今與昔」展覽 65–66, 78–84,
 88, 96, 104, 192；套路 149–150,
 160–161；與上海階級教育展覽
 163–164, 168；上海展覽 77, 139,
 142, 149；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6。另見舊中國和新中國
 憶苦飯 66, 88–89, 147, 150, 262
 歷史：中國共產黨 4, 16, 38–39,
 263–264；與展示 3–4, 8–9, 19,
 252–253；從歷史中略去 253,
 262–263；基層 13, 250, 262；與
 實物物件 (見文物)；官方解讀 4,
 16–17, 39, 41, 43, 48–50, 254；
 口述 22, 47, 213n8, 246；與宣傳
 14；與「紅線」46–47, 49；書寫 16
 歷史研究 46, 48, 56, 248

歷史遺跡 2, 215, 259：留存的寺廟
 111；紅衛兵的污損 227, 229；修
 復與遊覽 6, 36。另見中共一大
 會址
 澳門 65
 盧浮宮 239
 盧笛音 213n8, 218n27, 219n33,
 220n41, 230n76, 239
 盧漢超 69, 81n68
 豫園 2, 216
 錢鏡塘 244n123
 錫礦 151
 靜安寺 228
 駱根妹 105–107, 111, 116, 130, 135
 龍王 121, 131
 龍華寺 111, 211, 213, 226, 228, 232
 龍華塔 2, 211–212, 228, 232：紅衛兵
 214；修繕 215；與上海博物館工
 作人員 226
 龍鬚溝（北京）78
 《龍鬚溝》78

十七畫

戲劇 16, 20, 24, 78, 94, 129, 209, 210
 戴瑪瑙 (Norma Diamond) 92n104
 檔案 22–23, 33, 39–40, 43n66, 47–49,
 52, 90, 112–113, 156, 243, 250,
 255–256, 263
 薄一波 159
 薛文淑 (李書城夫人) 30
 講述故事 16, 18, 66, 127, 129, 142,
 250

講解員：階級地位 157, 254–255；激
 發的情感 16, 256；對文化大革命
 的解說 51；指導手冊 22；意識形
 態正確性 157；敘事 22, 42, 196,
 254；街道展覽 3, 54；參與式宣
 傳 13；紅衛兵 19, 176–177, 183,
 189, 196–197, 198–206, 254；講稿
 40, 43–48, 201, 223, 254；上海博
 物館 221, 223–224；用錄音代替
 講解員 52, 254；參觀者的問題 46
 謝富治 205n122
 謝稚柳 225
 賽奇 (Tony Saich) 252
 鍾銀蘭：保護文物 211–214, 221,
 226–227, 231–232, 237–238, 243；
 培訓 218–219
 韓丁 (William Hinton) 187
 韓小強 (虛構人物) 20, 22, 24, 141
 韓伯祿 (Pierre Heude) 6
 韓起瀾 (Emily Honig) 93n113

十八畫

翻身 2, 84, 88, 148, 157, 201：蕃瓜弄
 作為翻身的化身 63, 66
 聶元梓 184, 185n48, 186
 舊中國和新中國 2, 4, 6, 23–24, 70,
 245, 253, 263：二者的模糊性
 164；在階級教育中 142, 146,
 150–153, 160–163, 172–173；與
 階級鬥爭 143, 151–154；與階級
 的定義 143；作為轉喻的蕃瓜弄

18, 59, 61–66, 75, 78–84, 88–89,
91–100, 172–173, 250, 256；與
郭琳爽 178–180；與勞動活動
164；與解放共同作為時間框架
2, 4, 63；毛時代的展覽綜合體
84, 101–102；比較新舊中國的
物品 151–153, 247；憶苦 76, 88,
155；革命話語 252；上海博物館
213, 216–226, 243；迷信 106, 110,
117。另見憶苦思甜
魏昂德 (Andrew G. Walder) 130n80,
205
魏格林 (Susanne Weigeli-Schwiedrzik) 41

十九畫

羅伯特·利夫頓 (Robert Jay Lifton)
126
羅伯特·洛 (Robert Loh) 95n120
藝術 252：對藝術的正確解讀
42–43；藝術市場 219；藝術保護
9–10；作為宣傳手段 15；紅衛兵
查抄 168, 213；與政治的關係 5,
14–16, 42；與革命敘事 23
藝術收藏 213, 220, 230–232, 234。
另見上海博物館
藥水弄 78, 150
藥材 192, 194
證據：策展 163, 250；實物即證據
196；傷疤 247, 261, 262；科學
證據 115
識字 4, 93；與文盲 3, 82n74

邊沁 (Jeremy Bentham) 152
關牛棚 182, 215
關晟 144n102
難民 3, 64, 68, 69, 81, 93

二十畫及以上

嚴紀常：裘皮大衣 184, 192–193,
247, 261
蘇州河 68, 81
蘇陽 209
蘇聯 68, 73n46, 111, 215, 223：反宗
教 137；檔案文件 47；文化官僚
主義 259；作為策展模式 8, 10,
36–37, 39, 260；批鬥會 261；展
覽文化 36, 259–261；作為博物館
模式 8, 10, 36–38, 259–260；十月
革命 36n35, 39, 52, 239；革命博
物館 259；與中國的分裂 39, 48；
西方的遊客 95。另見蘇聯革命博
物館
蘇聯革命博物館 10, 34, 36
饑荒 39, 76, 106, 131–132, 135, 148,
150
顧鏡清 110
驅魔道士 120
龔旭人 169, 221, 231–232, 236, 242
龔招娣 82–84
龔品梅樞機 121
變天圖／變天眼 154–155, 161, 163,
169, 174, 183, 191, 192n66, 194,
196

靈魂：靈媒 121, 123；世界 110, 116,

121, 248

鑰匙 175–176, 195

鑽石 162, 192

三十·三十書系

《高家村：共和國農村生活素描》高默波

《受苦人的講述：驢村歷史與一種文明的邏輯》郭于華

《中國農民反行為研究（1950–1980）》高王凌

《中國農業的不穩定性（1931–1991）：氣候、技術、制度》郭益耀

《文革時期中國農村的集體殺戮》蘇陽

《紅色工程師的崛起：清華大學與中國技術官僚階級的起源》安舟 (Joel Andreas)

《饑荒政治：毛時代中國與蘇聯的比較研究》文浩 (Felix Wemheuer)

《崇拜毛：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辭崇拜與儀式崇拜》丹尼爾·里斯 (Daniel Leese)

《複製的藝術：文革期間的文化生產及實踐》彭麗君

《中國學習蘇聯（1949年至今）》白思鼎 (Thomas P. Bernstein)、李華鈺編

《接管杭州：城市改造與幹部蟬變（1949–1954）》高崢 (James Z. Gao)

《毛澤東的新世界：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政治文化》洪長泰

《文革中的公民權競爭與集體暴力》楊麗君

《失序的造反：文革初期集體行動的內在機制》魏昂德 (Andrew G. Walder)

《人民的西湖：毛澤東時代的宣傳、自然與能動性（1949–1976）》何其亮

《經驗饑荒：自然環境、社會機制和中國農民的生與死（1958–1961）》陳意新

《送瘟神：毛澤東時代的血吸蟲病防治運動》高敏 (Miriam Gross)

《縣裏的文革：江蘇豐縣的動亂十年》董國強、魏昂德 (Andrew G. Walder)

《策展革命：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陳列》何若書 (Denise Y. Ho)

在毛時代的中國，革命不僅是口號或意識形態，而是融入日常的現實。毛時代的政治展覽一方面將革命納入官方論述，鞏固政權合法性；另一方面作為參與式宣傳手段，賦予物品階級意涵、鼓勵群眾參與憶苦思甜等儀式，使革命敘事具象化、易於理解，從而深入基層。本書以上海六個關鍵的博物館和展覽為案例，揭示展覽文化透過改造群眾思想、激發愛憎之情，最終動員人民將話語化為行動，製造並成就了革命。

本書基於扎實的檔案與訪談資料，完整追蹤從文物徵集到展覽反饋的過程，考察了策展人、講解員與參觀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作者指出，展覽策劃於當下，立基於過去，也將塑造未來，為群眾建立全新的世界觀。本書為理解社會主義中國如何策展物質、儀式與敘事，進行意識形態建構與動員，提供了全新視角。

在毛時代的中國，展覽文化深深融入日常生活的肌理。作者精彩呈現了塑造這種文化的多元群體的歷史圖像，包括策展人、收藏家、工人、教師、學生、解說員與城市居民。

——鄧騰克（Kirk A. Denton，俄亥俄州立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學系榮休教授）

毛時代的中國比任何國家都更致力於向公民灌輸新的意識形態。本書創新地結合群眾運動的制度研究與口述歷史，揭示實物展覽如何透過敘述過去、闡釋當下並動員觀眾捍衛革命。

——葛凱（Karl Gerth，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歷史系教授）

本書從大量檔案、文獻與訪談中萃取新銳洞見，清晰有力地闡釋「以展覽製造革命」的核心命題，是當代中國歷史研究的典範之作。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哈佛大學亨利·羅索夫斯基政府學講席教授）

本書深入分析了「實物教學」的功能與目的，首次系統性地揭示毛時代政治文化中意識形態與物質性的深層關聯。在此過程中，革命、歷史、文化、宣傳、參與等常見範疇均被賦予嶄新而豐富的內涵。

——舒喜樂（Sigrid Schmalzer，麻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歷史系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cup.cuhk.edu.hk | HONG KONG, CHINA

